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中国乡村，

〔美〕弗里曼 毕克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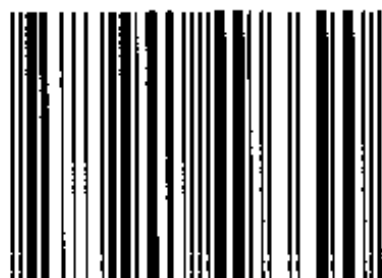
赛尔登 著
陶鹤山 译

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叙述、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后在华北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分析了这些改革在不同时期对农村社会及农民的影响，对战争及国家建设的作用，以及它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些分析与探讨，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有着广泛参考价值。

ISBN 7-80149-669-8



9 787801 496690 >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49-669-8/K · 092

定价： 26.00元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美]弗里曼(Edward Friedman)

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 著

赛尔登(Mark Selden)

陶鹤山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著;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ISBN 7-80149-669-8

I.中… II.①弗… ②毕… ③赛… ④陶… III.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IV.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0317号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著者:[美]弗里曼(Edward Friedman)
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
赛尔登(Mark Selden)

译者:陶鹤山

责任编辑:罗琳 杨群

责任校对:张景秋

责任印制:同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65139961 邮编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889×1194毫米 1/32开

印张:13.25

字数:314千字

版次:2002年3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669-8/K·092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by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opyright © 1991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经美国 Yale University Press 许可根据 1991 年英文版译出

阅读中国序

刘 东

已经是第二次在为这类译丛撰写总序了，这件事本身就使我忧心忡忡——我们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当代汉学，究竟最终对中国文化是福是祸？

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那么今番再来作序，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换句话说，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这当然可以算作一种成绩，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反倒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神煎熬。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作的主要主持者，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说，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本身，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象”，以致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会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学术研究家的文化使命，才恰在于检讨现有的

知识缺陷，适时地进行修补、突破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挑明：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然而，僵化的另一面却又是泡沫化。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幸而，我们还没有泯灭进行文明对话的渴望，还把这种对话看成惟一现实的救度之路。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国学与汉学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就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的“中国性”来。换句话说，对抗着堕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那个构成了两大学术群体之对话基础的“中国性”，作为双方共同意识的主动构成物，仍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超越的文明对话中不断漂移，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

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由此一来，“中国”一词所包藏的无尽学术潜力，中国研究领域所蕴涵的无穷思想魅力，也就太值得发挥主动精神去阅读去领略了！这个肯定要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的学习过程，也同样需要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阅读心态，以便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像当年的佛学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一样，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的汉学成果，也有可能表现为空前文化创造力的机遇和前奏；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大家赶紧打开这些书本吧，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全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

刘 东

2001年12月18日于北大草庐

中文版序

本书考察了 1935~1960 年这 1/4 世纪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在此期间，乡村经历了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后数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朝鲜战争、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高潮”、百花齐放、反右运动、苏俄集体农庄式的高级社、大跃进及其造成的人间悲剧。我们不仅想要按时间顺序来表述这些不寻常事件对农民的影响，也想理解农民如何去影响或对付这些事件。本书考察的重点是河北省衡水地区饶阳县五公村。

我们在饶阳总是受到热情的款待。不过，我们毕竟是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远方陌生人，提出的问题也许常令人难以回答甚至难堪，我们也对打扰过村民的家庭生活感到不安。由于对当地文化的无知，我们出过不少洋相，并肯定在许多场合下无意间冒犯过人们。

简直数不清有多少饶阳县特别是五公村的朋友帮助过我们，即使这会给他们带来不便。假如没有他们的合作，此书便不可能问世。从 1978 年起，我们就和那里的村民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我们眼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又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曾高兴地参加过婚礼，也曾悲伤地在坟墓旁献过花圈。在那些年代，我们彼此间逐渐建立了尊重、信任和友谊的

关系。我们睡在老乡的大炕上，吃过鲜美的饺子，也喝过衡水老白干。我们欣赏过河北梆子，甚至也曾在偏僻的田间小路上被强盗打劫过。

我们很高兴将此书献给中国读者。1992年，我们在南京大学就此书作了讲演，该校历史系的一些研究生随即建议将其译成中文。张宪文教授支持了这个想法，南大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陶鹤山则担任了翻译任务。我们非常感激译者所做的努力。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的博士候选人马克（Mark Eykholt）和汪利平在南京准备博士论文期间，给予译者许多帮助。毕业于宾汉姆顿（Binghamton）大学社会学系的程铁军博士刚好是饶阳人，他对修改本书译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我们感谢两位在北京工作的学者使此书引起中国读者的注意。北京大学历史系刘一皋教授在1994年3月号的《中国书评》上，对本书发表了评论，文章详细而令人兴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刘东教授负责了本书中译文的全部审校工作。

函盼读者能告知对于此书的看法，并纠正我们的错误。来信请寄以下地址：

Edward Friedman（弗里曼）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North Hal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Madison, Wisconsin 53706 USA

Paul G Pickowicz（毕克伟）
History Department 010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La Jolla, California 92093 USA

Mark Selden (赛尔登)
Sociology Department
Binghamton University
Binghamton, New York 13901 USA

自《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于1991年在英语世界出版后，我们一直在准备此书的续篇。那本新作将要讨论饶阳人民在生活中或许是最剧烈的变迁。我们并不是想要评论“文化大革命”——尽管它的确深刻地影响了农村——而是想要讨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建造一条京九铁路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这条铁路终于在1996年通车了。由于五公村领导人耿长锁的努力，铁路在饶阳县城和五公村都建了车站。《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描述的乡村社区很快就将消失。世界现在变得小多了。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应忽视自身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但人们也不应低估同样作为地球大家庭成员的意义。我们能够互相学习。正如中国老话所云：四海一家。

阅读中国系列书目

《中国问题研究的范式》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先哲的民主》



阅读中国系列编委

沟口雄三 贺照田 黄宗智
刘 东 李 强 孙 歌
汪 晖 杨念群 罗 琳

《中国问题研究的范式》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先哲的民主》

喜玛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导 言	1
第一章 郡县式微，乡村瓦解	21
第二章 战争的纽带	57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张力	84
第四章 静悄悄的革命，恐怖之声	122
第五章 蜜月	161
第六章 冒险	190
第七章 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	225
第八章 反对合作	259
第九章 生死之争	300
第十章 革命的国家	343
结 语	370
附 表	401
译后记	408

导 言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研究了华北平原的社会状况，重点放在一些家庭、村民和当地干部是如何置身于带来生存机遇的、新产生的社会主义之中的。它集中阐述了新政权的领导者们如何在中国革命时期，开始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创造了一个十分平等的社会，把分裂的家族和村庄重新联结起来^①；并进一步研究一个新体制建立时，限制其取得更大成果，甚至损毁早期成果，或前功尽弃的因素。本书详述了这个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如何强化了传统文化中某些违反人道的方面，从而不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中国人民陷入痛苦和羞辱的困境。在描述内地农村的破坏性变迁中，把重点放在民族主义、农民特性、贫困、国家和社会主义等方面，它们的影响延伸到几乎占人类 1/4 的中国人身上。本书还描述了前社会主义时代的长期衰落，它摧毁了社会约束力量；接着在取得团结和成功的喜气洋洋的蜜月年代，革命修复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再接着当国家对农民强制实行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时，又被另一种分裂所代替，导致农民们对现代世界的期望最后破灭。

资料搜集工作始于 1978 年 5 月。当时我们交了好运，成为第一批到中国农村进行系统研究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我们要求去说标准普通话的农村，以便我们不需翻译就可以展开工

作。我们把接近城市、有助于经济上获得成功的郊区和长期与革命军队缠结在一起的英雄的山区农村排除在外。为了降低对于往日之政治化回忆的依赖程度，提供一个衡量变迁的标准，我们到了1949年以前社会科学家们研究过的华北平原地区。

中国官方建议我们去位于河北省中部、定县专区西南端的饶阳县。西德尼·甘布尔的可靠之作《定县》和《华北农村》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作过精彩的介绍^②。1978年5月，我们访问了饶阳县邹村集市，发现正如甘布尔在《定县》中所说，老汉们都剃光头。当我们问为什么要剃光头时，一个当地人回答说：“这样，我的头发就不会脱落了。”现在一些年轻人也剃光头，认为这样能促进头发的生长，使脱落的头发再生。从源远流长的传统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东西。文化在所有演变出的差异性中渗透和充满了意蕴和目的。本书试图弄清楚与其他方面迅速变迁相关的深层次的文化连续性。

文化准则（包括统治方式）充斥于农民生活之中，它没有使农村成为田园诗般的和谐社会。文化预设（cultural presupposition）和文化认同行为结合成暴力、酷行和草菅人命等。共产党的军队实际上把政权植根于对健壮而思想狭隘的青年男子的文化影响之中。在努力把传统农民从草菅人命的迷信习惯中解放出来的同时，新权力秩序又恰恰加强了传统文化中的某种铁腕。

为了核对作者对农村文化的理解，我们接受了以前曾在这个地区居住过的两个美国研究生的独到见解，他们纠正了一些事实上的失误，提供了有关的资料，并建议改变对农村文化否定太多的一些观点，帮助解释晦涩的含义。我们接受了这些读者的纠正和建议，并特别对在饶阳农村长大的程铁军博士的长期帮助及其见识表示由衷的感谢。

饶阳位于北京的南面，相距190公里，公元前239年称为

饶，战国时期，赵王把这块领地当作礼物送给一名忠心的贵族^③。赵国的都城在邯郸，位于饶的西南，相距 190 公里，赵国是首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出生地^④。公元前 206 年，汉高帝把这个地区重新命名为饶阳。城墙于宋朝建成，在明朝末年又大规模重修。在 20 世纪初，饶阳是相对富裕的定县专区中最穷的县，于 1962 年划归当时河北省最穷的衡水专区，直到 80 年代，饶阳依然远离通向北京、天津、保定和石家庄这些重要城市的现代铁路和水路运输线。

在第一次调查之行中，除了访问饶阳县的三个村庄外，我们还去过相邻的安平县和深县的一些村庄。我们发现，正如甘布尔早在半个世纪前所说，它们在收入、经济和文化活动、血缘关系以及与国家联系上有很大差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典型化的村庄。本书介绍了一系列来源及社会文化传统各异的村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与国家发生联系。所有的饶阳人都很穷。我们注意到贫瘠的土壤、不稳定的水资源、灾难性的天气长期以来如何使饶阳人生活陷入困境。老人们说：“春旱夏涝地难种，遍地盐碱无收成。”

尽管共产党努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适应和转变农民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但中国农民（包括党员在内）继续保持他们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即使党带来了经济成就和文化整合，中央与穷乡僻壤的关系也常常是临时性的。时间一长，个人关系网就出现了，它以复杂而矛盾的方式维系着体制的存在。这种结构不仅仅是上下层之间的。农民们不是让社会主义领导者任意摆布的小卒。地方干部们竭力追求并赢得上层领导控制的资源，正如在不同朝代许多代人所做的那样，农民则和他们在官场中的姻亲及庇护人同样试图逃避、偏离和削弱不利于地方利益及价值的要求和冲击。这些消极影响逐渐侵蚀着政权的普遍合法性。

为了获得这类详细而大量的事实，我们在离开中国的途中，搜集了亚洲和美国出版的研究文集和档案资料。有用的材料包括18世纪饶阳地名索引、20世纪初出版的该地区政治概况，以及大量的省报、无线电广播稿、中文书籍和文章。在1949年以来出版并由香港大学服务中心收集的中文期刊内，有很多有关饶阳和河北中部地区的资料。这些资料全面展示了我们曾访问过5次的五公村，它常被官方用来举例说明社会主义成就，在1953年被视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几百个模范典型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被当做社会主义使农村战胜贫困的一个典型例子介绍给世人。^⑤

纪实研究与反映中国农村的传说之间的差距，使得在中国和香港的访谈结果大相径庭。由阿妮塔·詹、理查德·迈特森、乔得森·昂格尔、埃兹拉·沃格尔、简·奥依、马丁·惠特、威廉·帕列希和伯纳德·弗路列克撰写的有关中国农村的著作，都是以在香港的访谈为基础的，具有在免遭外来政权干涉的氛围中进行研究的长处^⑥。接受访问的饶阳人遵守当时的政策路线，村民们实际上已接到指示，强调“文化大革命”已结束，警告不要谈及由“大跃进”所造成的饥荒灾害时期的任何事情。生活本身也教育人们在公众场合必须小心谨慎，不出差错。

当然，在农村和这个地区进行访问也有优势。我们找到了与农民和干部们打交道的人向我们提供情况，并成功地取得了重要的当地档案资料。最后，我们住在地方政策和权力斗争中的失意者家中，而他们也乐意叙述其一面之辞。十多年里，当事实已水落石出，政策路线已改变，而我们也越来越有能力把可信的资料作为进一步深入调查的基础时，我们一次次地去寻找被访问者。最有趣的是毛泽东逝世后，饶阳许多当地干部继续捍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反对改革。官员们并未拼命地抓紧改革的机遇。

在数千小时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访问和讨论中，我们在增加记录材料的同时，还找到了引导我们获得幕后真相的线索。为了得到官方宣传以外的资料，我们访问了所有随机抽样的小路旁的家庭，在理发店和面馆里闲聊，此外还设法与当地及在此工作的外地人进行交谈。当我们用这种方式解开了1953年的一场权力斗争之谜时，县政府的一位官员说：“祝贺你们，你们说得很对。”但帮助外人深入了解隐藏的事实，并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

我们在饶阳县档案馆拍摄了一部分档案，其中有向上级汇报的党内秘密报告；看到了地区报纸的农村剪报合订本和发表的文章，中国这些内部资料只对那些登记过的本地区居民开放。任职30多年的村会计让我们看他的记账本，上面记载了1944年以来的收支情况，详细反映了其他资料中记录的有关内容和疏漏的问题。在1978年、1984年和1987年，我们从事了有关半个世纪以来人口统计、经济、收入、教育和政治模式变迁的家庭调查，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在书中的表格和附录中做了摘要。

在北京和河北省石家庄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管理员们提供了未列入目录的有价值的书籍和文章。我们还得以住在特殊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的家中，他们后来搬到别处去了。台湾档案馆藏有河北省中部有关抗日和土改时期的有价值的资料，它们是在内战时期从共产党手中获取的。北京、天津、石家庄和衡水的新闻记者、艺术家、作家、当地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和见解。访问五公村的其他中国农村学生慷慨地让我们分享他们得到的数据、笔记和结论。^⑦另外，我们还得到农业专家的帮助，他们了解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信息，而研究苏联式农业经济的专家D. 盖尔·约翰逊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农业发展研究专家西奥多·舒尔茨尤其提供了

许多帮助。这些提供帮助者对本书的所有文字均不负任何责任。

本书通过综合原始记录材料和访问所得的资料写成。尽管我们记下了一些资料提供者的某些话，但我们不愿披露与几百个农民和官员会谈的内容。注释中出现的记录材料和档案可以证明会谈确是事实。

调查中我们得到了五公村、饶阳县和华北内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资料，因为它们与国家上层领域之间建立了联系，而本书的中心内容正是国家—社会的关系，而非农村本身。有关饶阳县、河北省和华北农村的资料，从历史和结构上反映了农民们处于动荡多变的国家—社会背景之中。资料集中在非正式的忠诚网络和相互支持这一点上。这些网络开辟出宝贵的资源——工作、旅游、医疗卫生、投资、技术人员等等——使村社、地区和家庭从中得益。被迫单纯地依靠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却并无所获。

从等级制度看，只有少数受偏爱的地方才能进入新体制中的特权领域，大部分被排斥、遗忘、有时遭破坏的乡镇和村庄（如尹村、杨各庄、耿口、邹村）的命运（大部分饶阳村庄均遭此命运）是多舛的，这正是其邻近的五公村受到国家偏爱的整个历史的补充。惠赐少数、排斥多数的模式已随着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迁而宣告结束。特权与权力的牢固网络曾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本书揭示了受惠者和被排斥者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越变越大的。^⑧

本书把饶阳视作处于外国影响之下的、位于主要世界市场和现代工业之边缘地带的广大中国农村内地具有某些显著特征的代表。开头部分研究帝国统治时期和民国早期失败的改革，然后概述导致农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崛起的原因。我们着眼于国家——社会的关系，把五公村看做有助于建构新体制的政

治网络中的结合点。把受偏爱的村庄与当地、县、地区甚至省和中央各个层次的干部们联结起来的网络，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变得更加坚不可摧。本书记述了它被巩固的过程，揭示了在革命军队到来之前，它是怎样由起关键作用的力量形成的，这与历史学家柯文的关于“打破‘1949年’的障碍”，寻找内在连续性，而不仅仅是断裂的观点是一致的^⑤。

在解剖社会主义体系方面，五公村不止是展现社会主义制度关系网络的肌肉和骨骼的结合点。该村还在40年代参与了从文化上倡导并为农民接受的合作模式，在50年代初提倡走苏联式集体化道路，以及此后更多的教条主义（fundamentalism）*政策。在群众性改革和自愿合作的时代，它的历史与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悲惨结局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撇开领导人、团结和资源优势不说，光是国家的惠赐就足以使它在企图很快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教条主义政策时期走在前头。而那些不受偏袒、没有这些特殊利益的村庄，就有可能发生毁灭性的后果。

1938~1952年，在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群众性改革和静悄悄的革命年代中，党指明的方案最早起源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这一政策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要，消灭了农村内部

* Fundamentalism 有两种释义。一为基要主义。19世纪末，在美国尼亚加拉城（Niagara）举行的《圣经》研讨会上，西方尤其是美国一些“保守”的基督教新教神学家为反对现代主义，尤其是圣经评断学家提出了不可动摇的5个基本要点，即：①承认《圣经》字句无错谬；②耶稣基督是神；③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④基督代替人死而使人类同上帝重新和好；⑤人类终将身体复活且基督将以肉身再次降临人世。一为原教旨主义，主要指一些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神学政治主张。作者在本书中使用该词，主要指中国从苏联斯大林主义接受了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原译为基要主义，为避免歧义，意译为教条主义。但必须说清楚的是，这里的教条主义与毛泽东所批判的教条主义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译者注

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制度的主要形式。但当新的统治者试图拉平贫富家庭之间的差距时，以及当他们通过抑制市场和强制推行传统的苏联集体化社会主义来消灭混合经济、进一步加强教条主义政策时，最后却自食其果，地区、村庄、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产生了。铲除任何固有的私有财产、习俗和市场以及与共产主义价值观不一致的观念的教条主义政策，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使经济陷入了泥潭，甚至把经济推入可怕的倒退之中。本书探索了这个衰退过程的起因和动力。即使在“大跃进”期间，发生在没有权势的农村饥民身上的悲剧性后果，也未能打破或动摇这些网络。我们认为，它们在“大跃进”之后的改革中被进一步制度化，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得到巩固。

本书阐述的历史连续性主题实际上没有一个被中国官员充分认识到。他们关心的是通过构造一个历史故事而使其政策完全合法化。官员们很容易隐瞒细节，使走马观花的外国研究人员误入歧途，甚至使他们看不到大部分关键性的社会关系。

五公村的每个人，即使是小孩，都知道在社会主义时代，宗族冲突把住在村中央的、曾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族赶出了权力中心。我们看到父子俩一起走到村中央，指着一扇坚硬的木门解释说，他的家庭曾经是老一代精英中的成员，而即使是在1978年，普通村民也买不起如此昂贵的木门。我们自己不容易从这些材料中判断或体验一个当地人在看到由好木料做的木门时的感受。在这个地区，珍贵的木材是建造房屋、棺材并自我炫耀的重要材料。

我们没被介绍给村中央、原李氏宗族势力堡垒中的任何人。在此之前，我们实际上已住下12天了。自公元6世纪以来，李氏在五公村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每个小孩都知道这一点。旧木门就说明了一切。李氏宗族的这个地位是在20世纪

长期的革命中丧失的。实际上，宗族关系及居住地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在地方权力游戏中的胜败，尽管这一历史存于轶闻和人们生活之中，它们反映出居住、权力和土地增加的历史悠久的格局，但外人却很难把握得住那些关系。

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建议我们寻找这些难以把握的东西^①。本书一开始就勾勒出由行政部门遮掩的图景，从向上、向下和总的大背景进行讲述。向上是指经过党、国家和军队网络，专区、省、中央和国际秩序，向下是指村庄、宗族和家庭，接着努力从总体上描述文化、价值观念、市场和个人关系网，它们都有助于维系中国社会，并形成革命期望、社会主义国家大厦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

这项研究不同于由杨庆堃、威廉·欣顿、伊萨贝尔和戴维·克鲁克等人所提供的有关土改的第一手现场记录^②。这些作者所提供的是他们所目击的事件。与此不同的是，国家—社会关系变迁这一历史肇始于几个世纪之前，并在我们进入饶阳之前17年结束。许多人追忆往事，但其记忆常常与文献记载相冲突^③。我们只得发掘资料来核实访问所得的结果。

促使我们继续研究的是官方传说与历史记载之间的矛盾。1978年官方发表的历史忽视了共同的文化，抬高了毁灭性的阶级斗争。按照那部历史的说法，从前富裕的少数人剥削穷苦大众，然后穷人反抗，加入革命军队，而以军队为权力基础的党—国家领导人民走上了广受欢迎的集体化道路，而这条路能使曾经忍受贫穷和压迫的人民得到富裕、尊严和安定。可事实上，老一辈精英的子女在革命中充当了领导角色，而集体道路也没给穷人带来富裕。

超越官方传说的关键在于十多年间，我们有多达18次的机会去观察深埋于表层变化中的连续性，追查与官方传说不一致的资料。1984年，把新鲜血液输入党内的新运动（在五公

村象征性地由张满囤当村支书)，显然没有带来多少变化。的确，年轻的张满囤是住在东村的张氏家族中第一个掌此大权的人。但他的母亲是近40年中当地最有权力的领导人耿长锁的长女。耿惟一成年的孙子是保定市的银行负责人。党内家长制把村社权力的火炬交给家族血统中最有前途的人。我们找到了隐秘的因素，揭示出即使在社会主义秩序中，有组织的文化力量也在深刻地塑造着国家与社会。

在与村民们以及国家、省、专区、县、公社、村和街道的许多干部的反复交谈中，我们发现了文献和访问中所显示出的不同观点和自相矛盾的资料。这些线索逐渐形成了本书所阐述的四大方面的问题：党—国家体系的动力、文化连续性、新民族主义、由20世纪初混乱和战争及后来又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所强化的几代人的困境和冲突。

在那次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最早的华北之行期间，当地干部先是编造了一个天方夜谭，遂使访问该村惟一幸存的地主李茂修的请求遭到拒绝。当地官员警告说，地主会用谎言来迷惑我们。可我们坚持要去访问，县长李光辉则答复说，“我们可以安排会见”，但又说，“不过首先必须召集全村会议，解释你们坚持要访问一个阶级敌人，而解释之后，村民们可能不愿与你们说话了”。这个代价似乎太高了。

在经过两年共4次访问之后，李县长^⑩对调研小组说：“对了，你们不是要见一见地主李茂修吗？”可实际上我们已见过了。从1980年起，与已恢复名誉的李茂修、他的妻子范淑芳及他的整个家庭之间的谈话已成为可能。官方不再限制与各级领导、积极分子、劳模、英雄战士、旧社会的被剥削者及今天的富有者之间的会谈。结果，在对农村生活进行描绘时，不仅增添了地主，还有尼姑、强奸犯、打老婆者、道士、开小差的士兵、身体残废的年轻恶棍、过去的领导、下台干部、失意

的乡绅、强权的受害者与对手、现在仍很穷的人与以前的富人、宣传员、教师、作家和艺术家、从未参与政治运动的人和那些遭到政治迫害的人，包括那些被称为阶级敌人并送到监狱劳改的人，被当作替罪羊的无辜者，“地主”李茂修，以及由于驳斥“大跃进”经济的不合理性而被判25年徒刑的拖拉机站站长师喜生之类的人物。

在毛泽东以后伟大的开放时代，出现了一个更加复杂而有细微差别的局面。由于实行了面向世界的改革政策，使我们已有可能进行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调研旅行；尽管官方的限制继续存在，但已较易接近具有各种经历和观点的村民了^④。不过，饶阳县的官员们仍坚持许多改革前的提法。

为了证实我们调查结果的正确性，我们便把本书最初的草稿送给了当地官员们，它在省里被传阅，向本书提及的人大声诵读，这有利于纠正事实上的错误（包括地点、姓名、日期、官职、关系和年表），对于这一帮助，我们深表谢意。

地方官员们也对他们发现有缺陷的结论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本书对历史过程作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阐释，轻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成就。他们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详细而频繁地讨论解释上的差异。他们不想让本书披露有关在饥荒年代食人的惯例、反美运动、各地的苦楚、官员的腐败和蛮横、篡改过的统计数据、“大跃进”中饿死人的内容，但所有这些都已被记录在本书中。

为了进一步加以证实，我们在对话（驳斥和反驳斥）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与人们交谈。十多年中，有些人被访问了数十次，内容也更为丰富了。这种与许多村民、作家、干部、研究人员和其他人讨论矛盾的新观点的能力，对于获得不是道听途说的资料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所有现场访问，本书采纳了大量权威学者的观点，充

分利用了档案馆、图书馆、访问调查、文献和许多学者的成果。从民国时代的税收危机到有助于共产党人取得合法性的税制改革^①、弗里德里克·泰维斯有关 1948 年阶级斗争土改的论述^②、80 年代中国内部关于 50 年代邓子恢与毛泽东之间争论的新认识^③、琼-鲁克·多梅那赫关于 1953~1958 年大社的研究^④、费孝通对 1955~1956 年集体化的分析^⑤、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托马斯·伯恩斯坦“大跃进”饥荒之政治原因和结果的精彩论述^⑥，本书在如此多方面的问题上引用了世界著名的学者们有说服力的结论，或与他们的结论相同。

有些学者，如查尔斯·约翰逊^⑦，坚决认为农民的民族主义是共产主义胜利的关键，而其他学者，如罗伯特·马克斯和马克·赛尔登^⑧则强调改革在赢得农民参加革命运动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发现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本书描述了贫苦农民的爱国主义如何与社会革命的允诺相结合，解释了许多民族精英为什么去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如果以前在这个专业问题上的纷争有所弥合的话，则新的争论又产生了。

最近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包括几本专门分析华北平原的书，都着重强调中国经济与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体制危机，但在分析阻碍国家发展的力量的性质和原因时，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尽管本书的第一章概述了那种危机的特征，但并没有引用详细的资料去加入有关晚清时期衰落的讨论^⑨。不过，与赵冈和黄宗智一样，我们的材料说明了偏僻的农村地区长期衰落的过程^⑩。

本书与日本（满铁）的研究人员和拉蒙·迈尔斯关于传统经济得到加强的观点^⑪也是一致的，即从历史角度描述了农村集市如何使农民依靠摆摊、做生意、卖苦力、出售家庭副业产品赚取所需的现金。可是到了 20 世纪，这类偏僻的农村处于分裂的痛苦之中，农村精英和耕种土地或在脱离土地的职业中

寻找生存空间的穷人遭到了打击^⑧。

老一代精英的子女们转向反对他们父辈的统治体制，因为父辈们无力抗击日本侵略者，或挽救正统性遭到破坏的中华民族。这些激进的爱国青年精英争取所有阶层的农民加入领导着各阶级统一战线的共产党。人们重新凝聚成抗战和改革的整体。以税制改革为核心，改革给华北农村根据地地区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解放的、平等化的革命。

成功的抗战和改革产生了一个受到广泛支持的和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蜜月气氛，以便建设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发展一种将给所有人、尤其是最穷困的农民带来尊严和安定的经济。蜜月气氛在国家权力统一之后还在继续。因而我们认为，不能把1949年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看做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即旧秩序的结束和新秩序的开端。

另一个漫长而强烈的连续性寓于群众性的爱国主义激情之中。在共产党和红军的组织者开始在农村重新崛起之前，民族主义已在农村知识分子中扎根。爱国主义在抗战时期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得到组织化。另外，农村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中的重要因素保持和加强了产生新国家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复杂的文化有时与社会主义政策分庭抗礼，有时则保持一致。^⑨不过，社会主义这一外来概念日益与传统的合作方式相冲突，这一冲突早在1944年就露出端倪。

新体制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几乎难以根治的问题：国力虚弱、离心离德、技术落后和民众贫困。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统治者，也不可能轻易地被新的统治者所解决。通过对贯穿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深层连续性的重点考察，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以便进一步调查分析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对农村和国家的发展问题是一个解决途径，或者障碍，甚至背道而驰。

本书重点突出的一个消极的连续性是市场混乱。与彼得·珀杜^⑧、赵冈、洛伦·伯兰特等学者一样，我们发现集市对于传统的内地经济的繁荣远比老一代研究人员所认为的更为重要。集市活动是如此重要（即使对贫困的地区也如此），以致由战争、政治斗争和外来入侵造成的集市中断和社会失序，使许多农民破产。矛头对着市场、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战争继续损害穷人中赤贫者的利益，使他们永远不能摆脱贫困。

统治集团在抛弃植根于有着广泛基础的联盟以及与民众意识相一致的改革政策的同时，代之以毁坏集市、传统文化、家庭经济，他们在低得不能再低的水平上冻结消费。当以苏联传统和共产主义的教条为前提的政策得到强化时，蜜月便结束了。统治集团以防止阶级两极分化和反动阶级进攻的名义，把社会割裂开来，使人际关系趋于疏远和对抗。^⑨这些不合理的政策建立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制度的倾向性上，此类倾向在1949年以前的革命年代就已形成，如把农村阶级关系和谐与繁荣的农民家庭经济当作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来对待。因而1949年不是一个绝对的分水岭。在长期以来通过群众性改革消灭了私有财产的最大程度的聚敛之后，给农民们贴上好的和罪恶的阶级成分，使用没收和暴力手段进攻假想中的罪恶阶级，甚至在1949年之前就已使许多农民非常惊恐。人们只得通过学会扮演伪君子、向当权者装出一付假面具而部分地幸存下来。

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1947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团结，内战中你死我活的特征迫使党的领导人从破坏性和不受群众欢迎的政策退回来。不过，一旦他们拥有垄断权力，党的一些领导人又放弃了被群众接受的改革办法。在1949年以前，党的机

构恢复了忠诚的基础。为了保持权力，这些个人关系网几乎都采纳任何来自中央的政策。甚至在1949年之前，效法斯大林的无处不在的保安系统和铁血手腕，使得潜在的对手和反对者保持缄默。

到1953年，在一个罕为人知的悲剧中，贫困的杨各庄村民们已遭到针对农村贸易的战争的破坏。为了把农业剩余产品集中用于国家建设、军费开支和以城市为基础的重工业，国家抓住粮食贸易的垄断控制权，把固定的低价强加给农民。被剥夺了商业和副业收入的杨各庄农民在经济上走了下坡路。对小农经济的战争也损害了已培育起来的文化结构，这些文化结构在革命胜利、和平、统一与发展的蜜月时期已得到重建和赞扬。市场和文化不是牢牢地封闭和割裂开来的领域，当这两方面一起遭到破坏时，蜜月气氛便消失了。

随着“大跃进”的到来，党把群众的习俗和农民的准则当作落后力量来对待。其后，由于革命已建立起新的权力结构，已使人民保持民族主义的同一性，因而毛泽东和社会主义仍可在落后的农村地区保持其合法性，忠诚的爱国者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单个的坏人，而不是毛泽东或社会主义。本书描述了农村文化中倾向于暴力的某些成分，通过民兵、军队和毛泽东的神话表现出来，并促使健壮的农民汉子保卫社会主义国家。

本书试图阐明导致大有希望的国家与人民陷入1959~1961年可怕的“大跃进”饥荒的动因。在那场饥荒中，有千百万人饿死。对于朝向一种现代化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期望而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领袖们不禁感到茫然。

大权在握者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但尽管有了这一切，过高的理想仍激励着政府和农村中的许多人。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再次考虑重新回到40年代的静悄悄革命和50年代初蜜月时期取得成功的群众性改革，考虑这对保障发展是否必要。其他

人则遵循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要么认为是时代需要传统的斯大林模式，要么认为需要再次严厉地强制实行通过阶级斗争完成革命的共产主义基本原则。但是革命的形势已不再为这种或那种政策所主宰。相反，国家事务的运作已有了既定程式，它们从大饥荒的创伤中幸存了下来，保存得完好无缺，并且与乡村文化因素联结得如此和谐，以至于看上去与沿袭的旧传统并无二致。这个体制堵死了任何容易通向现代化形式的更自由的途径。本书详细阐述了这一体制的产生和巩固过程。

注 释

1.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 ~ 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该书详细论述了前共产主义时代传统文化的这种脱节现象。
2. Sidney D. Gamble,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3. 关于饶阳古代历史，请参阅张永富《饶阳史考》，载《衡水日报》1980年9月27日。
4. Luo Ziwen et al. *The Great Wall* (New York: MacGraw - Hill, 1981), p. 22.
5. 读者可把本书与五公村的其他著作做一比较，如 Marsh Marshall, *Organization and Growth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Keith Griffin and Ashwani Saith, *Growth and Equity In Rural China* (Singapore: Maruzen Asia, 1981)。
6.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a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

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Richard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Ezra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 ~ 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William Parish and Martin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and Bernard Frolic, *Mao's Peop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Jean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7. 1978年5~6月, 我们进行为期5周的最早一次实地访问之后, 每位作者负责整理各个题目和时期的材料。1978年11月又回来进行其他方面资料的调查, 最后我们共访问饶阳18次, 除了1981和1982年, 当时官方阻止在饶阳的调查之外, 我们在1978~1987年间至少每年访问该地两次, 时间在几天至三周之间。有两次两位作者一起去, 一次三位作者一起, 4人一起到饶阳至少有4次。尽管Kay Johnson做了大量的笔记, 并提出许多见解, 但由于身体不佳, 她未能参加写作。由于每位作者多次使用新材料修改所有的章节, 因而在形成概念和连续修改方面, 我们进行了真正的合作。
8. 关于共产主义如何在那些受国家偏爱者与所有其他村庄之间产生的差距一度拉大的结构性逻辑, 请参阅Michael Schoenhals, "Saltationist Socialism: Mao Zedong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1987), pp. 110~167。
9. 见Paul A. Cohen, "The 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 3 (August 1988), p. 519。
10. 由于费在30年代的调查中已揭示出副业、贸易和运输业对农民经济的重要性, 所以当他在集体化后回到开弦弓村调查时, 看到了正在失去什么。只有回过头去费才知道什么消失了。
11. 见C. K. Yang,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59);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Issbel and David Crook, *Ten Mile Inn: Mass Move-*

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1979); Yuan-tsung Chen, *The Dragon's Village: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of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Pantheon, 1980)。

12. 注释中提供了公开的有价值的文献和档案资料。大量使用的、仅保存在我们私人资料库中的访问、调查及其他资料不作注释。由于大量出版的资料是政治方面的，因而在引用公开发表的资料时，调查结果使我们相信这一特殊论据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如果论据不能加以证实，那么所提供的个人观点也就不能被人接受。
13. 五公村一半以上的人姓李，由于村里有人数少的宗族，为了保持姓名原义，并与村民中广泛使用的绰号相一致，我们通常使用当地的绰号，我们引用自己发明的绰号的地方则加以解释。李光辉是接待我们第一次访问的饶阳官员，也是我们接触的惟一的李副县长。我们称之为李县长。
14. 最初由于得到石家庄和北京的对外友好协会这一专门机构的帮助，调查很便利，后来又得到河北省政府官员的帮助，尤其重要的是徐福、张凤桐及他们在饶阳和衡水的同事。
15.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一书得出结论认为，“减轻税收负担是群众的最迫切要求”（第 252 页）；Jerome Ch'en 即将出版的 *The Highlanders of China: A History, 1895 ~ 1937* (Armonk, N. Y.: M. E. Sharpe), 描述了华南丘陵地区土地改革对共产主义获得成功具有的关键性作用。
16. Frederick Teiwes, "The Origins of Rectification," *China Quarterly*, No. 65 (January, 1976), pp. 32~49.
17. 在最近发表的有关邓子恢生平的著作中，有很多档案资料，如蒋伯英编《邓子恢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8. Jean-Luc Domenach, *Aux Origines du Grand Bond en Avant*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82).
19. 费孝通：《中国农村特写》，第 158~196 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3。
20.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II,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 ~ 1960* (New York: Columbia U-

- niversity Press, 1983); Thomas Bernstein, "Stalinism, Famine and the Chinese Peasants," *Theory and Society* 13: 3 (1984), pp. 339~377.
21.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2. Robert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Mark Selden, *The 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3. Loren Brandt,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1870~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伯兰特批驳了衰败的观点。
 24.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Kang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5. Ramon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也可以参阅 Prasenjit Duara, "Power in Rural Society: North China Villages, 1900~1940"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26. 经济危机的解释有很多种方式, 赵冈的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论述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生态环境衰败。Mark Elvin 在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中讨论了技术落后的原因。Prasenjit Duara 在 "State Involvement: 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 1911~193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 1 (January 1987), 第132~161页发现了财政危机。E. L. Jones 在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中断定, 粗放发展与内部殖民化的表面上的政治保障, 使明朝统治者不必作任何冒险, 除了进行必要的改革。中国学者认为, 长期的经济危机是由误入歧途的政治领导人造成的。与毛泽东以后的改革政策相一致, 萧蓬父

认为，由于17世纪中叶明朝闭关锁国，驱赶传教士，对哥白尼和开普勒的理论当作邪说拒绝接受，强制实行封建文化专制，它拒绝把培养天才和吸收诸如数学、历史和绘画之类的外国知识这些民族觉醒的早期政策当作一条选择道路（《对外开放的历史回顾》，《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31~42页）。尽管有关长期危机的所有这些及其他解释尚存在争论，但本书例举的数据与世俗社会长期衰落观点是一致的。

27. 在 Alexander [Vasil'evich] Chayanov 的著作基础上，Basile Kerblay 和 Teodor Shanin 等学者已研究了农民家庭文化和经济为什么存在于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中。这种研究思路使人把农民特性看做具有内在力量的、持久的、局部的社会特征，不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限制，也不等同或随之消失。参见 A. V. Chayanov,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and Basile Kerblay, "Chayanov and the Theory of Peasantry as a Specific Type of Economy", 该文收入 Teodor Shanin 编的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y* (Baltimore: Penguin, 1971), 第 150~160 页。
28. Peter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9. 关于那些关系频繁遭破坏的资料，可参阅 Chan, Madsen, and Unger 的 *Chan Village*; Gao Yuan, *Born R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and Anne Thurston, *Enemies of the Peopl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7)。

第一章 郡县式微，乡村瓦解

1744年，即乾隆登基的第九年，一个新知县单作哲来到饶阳。我们所知的很多有关这个偏僻小县在19世纪和20世纪受到革命潮流影响之前的许多年中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的知识，都来源于1749年单亲自编定的详细的县志。当时，国家发起了一场传播儒家思想的运动^①。饶阳在清朝统治处于顶峰时的概貌，为说明继之而来的衰落和连革命也不能改变的连续性提供了一个尺度。

饶阳南北27公里，东西24公里，是直隶省最小的县之一，它隶属于深州府，而府的行政中心在西南32公里。由于在元朝末年，直隶南部遭受了大规模的动乱，人口急剧减少，因而在明朝初年被看做边疆地区。^②在新政权鼓励重新在此定居的影响下，从邻省山西来的移民潮水般地涌入这个地区。1369~1404年间，仅在饶阳就新建了68个村庄，而整个清朝时期，饶阳仅增加6个村庄，可人口却继续增多。1749年共有175个村庄*，23753户，约12万人。

* 据《饶阳县志·方域·乡村》载，“共大小189村”。——译注

饶阳的政治经济

1749年，饶阳有540181亩耕地，平均每户仅23亩，略少于4英亩。主要农作物有小米、玉米、高粱和棉花，春耕秋收，在深秋季节种植一些冬小麦，6月份收割。辣椒、大蒜、韭菜和红薯的味道充满了泥砖结构的农村小居。马、牛、驴是常用的载重牲畜，鸡、鹅、鸭、羊，尤其是猪，提供了难得奢侈的肉食品。

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农业是较为复杂的经济的主要产业。最重要的副业是纺棉线、织棉布，一般情况下由熟练的妇女来做。其他副业包括食用油加工，酿酒和酿醋，用芦苇编织篓子和席子，加工大豆酱，搓绳，制造蜡烛，熬盐，烧砖，制鞭炮。对许多人来说，出售农副产品是生死攸关之事。对少数人来说，集市提供了通向相对富裕和扩大土地占有量的渠道。购买牲畜和家具，支付婚丧、节日所需的开支，都必须有现金。为了获得现金，许多人盯住了集市，流动的摊贩和诸如理发师、兽医、搓绳者、劊猪匠、做棺材的手艺人从一个集市跑到另一个集市。宋朝时期，饶阳因替皇帝和朝廷高级官员纺织“饶”丝，制作乌纱帽而著名。清朝时期又以美味的杂面汤而著称，其原料是绿豆、小麦和鸡蛋。饶阳劊猪师傅（有些变为兽医）和理发师跑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如蒙古）去找活干；饶阳鞭炮（曾供皇室使用）远近畅销。

1749年，饶阳出现了熙熙攘攘的集市网络。除了县城有持久的日常集市之外，还有张平铺（西8公里）、孔店（北11公里）、杨各庄（西南10公里）、小堤（在通往深州大路上西南16公里）。而且在另外22个地点每隔5天就有定期集市，如在该县南部地区，除了杨各庄和小堤每天都有集市之外，还

有邹村在 10 天集市周期的第一和第六天，曹庄在第二和第七天，韩合在第三和第八天，小堤在第四和第九天，张保在第五和第十天举办定期集市，在每个约定的时间里大部分农民都去几公里远的集市。

政府开支主要依靠广泛地征税。农业税是最重要的税种，它在夏季收获时节从土地所有者手中收取。普通百姓还有被迫完成徭役劳动的义务，为地方官员的马提供饲料，应付对丝绸、黑豆、棉花的征调，缴纳盐与酒的特别税。

除了“人太多、地太少”这一相对较新的问题之外，几个世纪以来，饶阳农民与华北平原上许多农民一样，被旱和涝这一对天灾弄得苦不堪言。1737 年，贯穿该县中部的滹沱河发生洪灾，淹没了 27 个村庄。1738 年，再一次洪涝吞没了 43 个村庄。到 1742 年，服徭役的劳力挖掘了 7 条排水渠，防止洪灾。但在 1743 年，也即单到来的前一年，在整个地区发生了比 1738 年洪涝更具破坏性的旱灾；国家给灾区送来了必要的粮食救济和银子。粮食从经过直隶东部的大运河运来。1744 年，饶阳的邻县河间和献县一起被划入“重灾区”。^③ 1368 ~ 1749 年间，自然灾害平均每 7 年劫掠饶阳一次。

旱涝问题与特殊的生态环境有关。饶阳处于 18.7 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平原中部，太行山在饶阳以西 160 公里，向东 192 公里是太平洋^④。在晴朗而干旱的冬季，中亚草原上空稳定的高气压团到太行山区后，给华北平原上空送来了寒冷的西南风。到了 3 月，气温升高，足以开始春耕，但天气仍很干燥。小块融化的冰雪提供了一些水分。只有当中亚草原变热，形成一个巨大的低压区时，降水很少的季节才从仲夏开始。来自太平洋的暖湿空气吸收了水分，从东北方向穿过平原。饶阳地区每年的降雨平均仅 508 毫米（20 英寸），其中 70% 又集中在 7、8 月份。到仲秋季节，气候凉爽宜人，干燥，天空晴朗。

在与缺乏地表水资源的饶阳相似的地方，每年 508 毫米的降雨勉强能够维持农业生产。当春夏降雨少时，大风刮过干透了的平原，卷起尘土，带走了宝贵的土壤表层。如果夏季不下雨，那么秋季就颗粒无收。每年的降雨通常是以一些区域性的雷暴雨出现，遂使紧挨着可以享受正常降雨量的村庄，就可能有受旱的地区。在单当知县期间，粮食丰收几乎都依赖于自然降雨量。

洪涝问题与源自太行山区流向平原的河流有关。在河的上游地区，河道窄，流速快，但与穿过饶阳的滹沱河一样，当这些河流经过平原地区时，流速变慢，河道张平，沉积了一层又一层的淤泥，河床逐渐加高，结果，夏季的暴雨带来了溢过防护堤的洪水。地势低的地区很容易因大堤决口而被洪水淹没。当整个地区的积水无法渗入粘土般的土壤层时，庄稼便会腐烂。大多数年份的不均衡降雨意味着碱化了的土壤不能正常地被滤去，碱性荒地上覆盖了一层沉积下来的碱，看似白雪，却坚如岩石。^⑤

在 18 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主要通过救灾，给穷人提供一些短期生活保障。1732 年，有 140 万斤储备粮，大约人均 12 斤，储备在饶阳县的中心粮仓^⑥。1738 年增加了 160 万斤。1740 年再有 140 万斤被贮存在东部和西部的附属粮仓中，县衙门还在城墙外开设两个养济院，每月拨出 200 多两银子，养活 100 个孤儿和穷人。

单知县最得意的工程是发展了由慈善捐献建立的附属义仓网络。他上任后不久，就号召大家捐献，并举了饶阳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市民们慷慨解囊的故事，提醒人们在明朝即将覆灭的 1641 年，严重的旱灾期间，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饶阳人不得不吃人肉^⑦。父母们不忍心吃他们自己的孩子，于是就与其他人换着孩子吃。据说吃了人肉的人开始 5 天还觉得不

错，但在随后的5天里，人就生病了，到11天时，他们就开始露出中毒的症状，在20天之内离开人世。

单知县决心在他的饶阳境内阻止这样的梦魇再次发生。到1748年，共有9个义仓，贮存了38.75万斤粮食。单知县还建了一块碑，上面刻了捐献粮食超过3000斤的人的姓名。当春季粮食供应不足时，饥民可以在这里借到粮食，到秋季收获之后再归还，并付10%的利息。当旱涝灾害造成了超过常年收获30%或者更大损失时，利息可以免除。

权威性仪式

精英们为了保持其特权地位和维持社会秩序所作出的长期努力，重点还在教育和仪式上。文庙是饶阳高等教育的中心，其首要原则是“忠于皇帝和帝国”。在庙墙内勤奋学习的20多名秀才，已经通过了在地区首府深州举行的科举考试，正准备省里的考试，它是通往与仕途生涯相联的财富和权力道路上的主要关口。大有可为的当地读书人和有抱负的官员常常得到来自县里的全面财政支持。但在这文化教育落后的乡村，在清朝统治最初的100年间，饶阳只有28个秀才通过会试（省级考试），仅有两人参加殿试（全国性考试），获得进士名銜。

县城许多文化设施集中在20多个祠堂和庙宇。单知县是一个通过北京殿试的精英，他细心地发现，儒教仪式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结合剂。每年春秋季，在户外4个神坛举行的公开仪式上，分别向天、地、风、雨四感恩祈祷。同样，在每年春秋季，必须向文庙献上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和酒器，放在孔子、孟子和其他圣人的神像面前。

单通过奖励道德高尚的典型来形成公共伦理观念。文庙里

的纪念亭供奉着著名学者、杰出的官员和忠于君主的模范人物。在文庙主要入口处，外面是供奉着孝子烈女的祠堂。1748年，在由国家发起的灌输儒家伦理的运动期间，单知县亲自嘉奖了一位63岁的寡妇。他说，她在丈夫去世后的44年中，拒绝改嫁，以示对丈夫的怀念^⑧。

每年两次表彰烈女的活动在节孝祠举行。对于被排斥在正规教育、仕途和财产所有权之外的妇女，这真是得到褒奖和官方赏识的惟一途径。在清朝统治的最初100年间，仅有171名妇女被作为烈女受到表彰，其中两名是被强奸后自杀，169人则在丈夫和未婚夫死后发誓不再嫁人^⑨。可是在帝国时代末期，寡妇改嫁是常事，她们常常被亲戚逼着改嫁，其亲戚企图既得到男方的彩礼，又得到寡妇死去的丈夫遗留下的财产。可一旦改嫁，她们就常常被邻居们视作道德败坏的女人。

妻子们是丈夫所在的宗族的财产，对于已婚女儿的父母来说，他们失去了一个劳力和晚年的供养者，有代表性的是，妇女们出嫁，离开她们出生的村庄，必须对丈夫家庭保持忠贞。由于国家被当作家庭的放大，妻子对丈夫的家庭保持绝对忠贞，被归结为所有人对君主和他的官僚行政系统的忠诚，包括单知县在内。

不过，在饶阳，国家并不垄断所有的仪式文化。多少年以来，国家倡导的儒教仪式融入了佛教、道教和其他广泛被民众所接受信念。该县早年曾是佛教活动中心。公元541年，在该县北部一座住着约200多名僧侣的寺庙里，有一尊石刻佛陀。国家的推行使农民家庭文化的准则得到加强，并取得合法地位，这种文化从宗族仪式和生命周期的庆祝活动到权力关系和季节性的公共义务，对生活中的许多行为起着支配作用。

集市与文化

在县城，排列着信徒甚众的神灵，希望能保佑好的天气和粮食丰收。水神被恭奉在龙王庙，人们可以到虫王庙*祈祷避免蝗虫的侵扰。关帝庙是恭奉战神的，同时还有好几个庙宇敬奉佛教神灵，大部分敬拜仁慈之神观音。

该县南部的邹村和杨各庄集市也是培育大众文化的中心。经常性的定期集市把买卖人、卖艺人和观众、拜神者和郎中以及各个阶层的人聚在一起。每年的庙会和节日集市吸引了方圆几公里内数以万计的买卖人和观光者。农民们交换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如耕畜、鸡、猪、线、纱布、家具、篮子、种子、农具和各种各样的节日与婚丧用品。尽管在内地的饶阳缺少书写文化（written cultural），但使集市中心和偏僻村庄一样富有生气的大众文化却十分丰富，如舞狮，踩高跷，舞龙灯，赛旱船，武术和其他尚武的艺术（二鬼摔跤），鼓和喇叭吹奏的音乐，以及传统戏剧等。

20 世纪初的衰落

到了 18 世纪末，清朝急剧地走下坡路。在因官场腐败而掀起的反抗浪潮以及与帝国主义相关的分裂的背景下，白莲教起义爆发了。19 世纪初，外国势力的打击迫使清朝统治寻求更多的钱用于军队现代化，建立军事工业，引进现代技术教育。在维持防护堤、慈善机构和能够为经济上受灾难性打击的

* 田祖祠，俗称虫王庙，《饶阳县志》记载：“据诗田祖有神秉界炎火更之。”——译者注

人们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网络的粮仓方面，一个处于衰落之中且负担沉重的传统政府不可能应付新的挑战，它已经落后了。假如中国政府和经济不进行革命和现代化，不扩展财富，不增加新的公共工程所需的税收，那么像饶阳这类县的许多农民就难以弥补因削弱保险网络而裂开的缺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生死攸关。

19世纪中叶，由以救世主自居的基督教和中国农民的价值观激起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到华北直隶省这块对于穷人大有希望的土地。在正定，太平军转向东进，并于天津港附近被清军堵住之前，穿过了饶阳县。^⑩

19世纪末，有一个饶阳精英名叫张老虎，在当地民间传说中，他有三妻四妾，三个戏班子，并收买了县里的戏班子。清朝最后几十年中，中国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太后请饶阳戏班子去演戏。当张老虎爬梯子掉下来时，太后的表现成了饶阳传说的内容。据说当他摔倒时，太后喊道：“我的孩子。”由于太后的话是金口玉言，于是张几乎被当作养子受到特殊对待。太后赏了他一只象征着宫殿的石蜡灯笼。此后不久，在一次巡回演出期间，戏班子遇到一个当地恶棍，恶棍看到宫灯后，立即跪下磕头，变成喵喵叫的小猫。饶阳人为他们的戏班子感到自豪，这个以御赐宫灯作为记号的戏班子使该县闻名于世。

到了20世纪初，有几个饶阳商人在北京开了布店和饭馆，饶阳商人还远行到蒙古的乌兰巴托，甚至到沙俄去做生意。他们在北京、保定和天津买了纺织品、服装和瓷器，把它们带到满族的东北诸省。然后带回草药，在饶阳附近安国县全国最大的草药市场或大城市卖掉。饶阳商人在蒙古卖丝绸和茶叶，带回羊毛、兽皮、草药、马和牛。饶阳人认为，他们的鬃猪技术是全中国最好的，被请到像新疆那么远的地方。他们还认为，在华北只有宝坻县（现属天津市）才有技术较好的理发师。

尽管为了支持膨胀的国家开支而进行了增税，但民族耻辱和经济混乱却日益加剧，导致了在1900年排外、反洋教的义和团运动中爆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政治意识抬头。慈禧太后南逃，躲避讨伐的外国军队。一个反映新民族主义的民谚传开了：“百姓怕官僚，官僚怕洋人，洋人怕百姓。”1902年，在外国军队撤走之后，慈禧命令直隶总督袁世凯接她回京。袁以巨大的代价做好了回到正定（饶阳以西）最初一段240公里路程的准备^①。三个月后，直隶南部爆发了反抗把苛捐杂税强加给这个地区的起义。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不过，对于每况愈下的农村饥民来说，到正在扩编的军队中当兵成了救命草。人们说：

有扯旗的，
就有吃粮的；
有招兵的，
就有卖命的。

据不完全资料表明，与华北很多地方一样，在乾隆以后，偏僻的饶阳经历了漫长的衰落过程。当耕地面积减少，人口增多，农业技术停滞发展时，控制水灾和提供灾难救济的能力就减弱。手工艺、商业和其他弃农的职业成为免遭厄运的较为理想的行业，可是该县的集市网络已经萎缩。

一份1904年的省报把饶阳描绘成一个挣扎中的小贸易中心，“尽管土地是贫瘠的，但人民是勤劳的，大部分男人从事小买卖，妇女们从事编织”。饶阳主要产品是用于运输和存放商品的麻袋和棉绑腿^②。该县北部的一些商人与以天津为中心的生气勃勃的地区和国际市场连接起来，但华北并入世界市场，却是以饶阳周围的传统纺织品市场为代价的。每年秋季，

饶阳的劳力继续到天津和北京寻找买卖、建筑、手工艺方面的活计。寄回来的钱保证全家不致挨饿，继续过一种保持习惯性仪式、合乎道德规范的生活。还有一种“张岗高粱酒”在当地享有盛誉。

在整个地区，国家直接向每个村庄强征新税收，以从财政上支持学校、工业、军队和警察的现代化，并用于向外国列强支付赔款。新税收很快就超过作为国家岁入主要来源的土地税。

清朝末年，饶阳进行了教育和工业的改革，它是由整个处于领先的深州府发动的。1907年，饶阳自夸道，在现代学堂里有2494名学生，有个厂被直隶省劝业道选为模范纺织厂^③。与知县共事的地方精英们提供了很多资本。工厂出资让20名年轻工人学习现代染色和纺织技术。可几年后，工厂就关了门，从此再也没有其他新的工业在此落根。

1911年，清朝灭亡，此后没有出现强大的政权来确保一个安定的和平环境，取而代之的是军阀统治和暴政。由于京城控制权是关键，而且据此得到国际的承认（掌握国家海关岁入的大权），因而直隶省成为军阀相互争夺的战场。

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了下来^④。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921年，饶阳收到由国际联盟赈灾委员会所提供的第二笔最大数目的粮食。救灾专家们认为，饶阳有成为人口密集地区的危险，所调查的两个村庄人均土地2.2亩。人口密度大和易遭旱涝侵害的弱点，意味着将遭受损失更惨重的灾难。^⑤与直隶南部大部分地区一样，在饶阳，很少有资本用于挖深井，寻找地下水。按照约翰·布克所编的资料，在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在最穷的

地区，饿死的人也最多。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性别比例失衡，结果是10个男人中有一个结不成婚，从而不能履行延续宗族香火这一基本道德准则。^⑩

共产党在革命中的失败

1923年，重新改组的国民党与年轻幼稚的共产党结成联盟，他们开始在华南从事发动学生、教师、工人和农民的活动，不久就提出了消灭华北军阀势力的计划。共产党首先在偏僻的饶阳建立了一个立足点。1925年，年轻的知识分子王耀玉是受华北局党组织（在北京）派遣的许多积极分子之一，他的任务是到直隶南部贫困农村建立地下组织。王在县城谋得一份教师工作，在饶阳第一高等小学和男子师范学校动员学生。^⑪

饶阳党支部最初由12个学生和农村知识分子组成，其中包括一个留学回国的学生韩梓穆，他的父亲有200~300亩地，是该县最大的地主之一，还有毕业于屯里（位于该县南部的一个集镇）师范学校的王春海。像王那样的学校教师把党的信息带给农民，这些农村知识分子对于在1919年激动人心的反帝反儒的五四运动唤醒城市知识分子的东西很感兴趣。这些富裕地主的后裔转向反对传统秩序，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寻求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富裕。他们建立了青年团体，阅读进步杂志，并为改变传统的课程设置进行斗争。但由于军阀张作霖统治着这个地区，党组织仍很小，且处于地下状态。

到了1926年，人们听到了在国民党领导下消灭军阀和统一国家的北伐战争的隆隆炮声。当地官员们的反应是把饶阳提升为二类县，成为税收较高的县（附加税每亩80分），主要目的是把能够拦截北伐军的部队拉上战场。西面的安平县和东面

的武强县列为三类县，南面的深县列为一类县。征收附加税引起了骚乱，因为初生的共产党提出要讲信用，并于1926年底发动了一场反对征税的运动。少量的农民和佃户被40人的党支部组成一个新农民协会，通过连夜收割庄稼来阻止收税员征税。但在1927年初，军阀当局逮捕了一些领导人，其他人被迫逃离该县，党组织和青年团体陷入混乱之中。

1928年初，北伐军到达华北平原，驱逐了军阀张作霖，而当张的军队逃离饶阳时，实行大肆抢劫。获胜的国民党定都南京，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1929年初，饶阳人怀着对和平与繁荣的期望，组成了国民党支部，它采取的第一批步骤中包括建立一个盐专卖局，以便政府能卖盐和征收盐税，以及镇压共产党，国民党把这一政策推行至全国各地。

1930年，当党中央号召举行武装起义时，饶阳地下党组织仍处于瘫痪状态。弱小的饶阳党组织在一个乡村教师（中医大夫的儿子）的领导下，希望把强烈的抗税情绪转化为反抗浪潮。人们对杀猪自家食用也须交税很不满，因为他们没有赚到钱。他们痛恨收税员及其雇用的暴徒。这些人拚命扩大收税的权力范围。由于贪婪的收税员雇用当地流氓向纳税人催讨，获取税收，因而实际收到的和政府作为预算收入所记载的税款远不能说明农民的实际负担。在小堤庙会期间，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力劝人们拿起武器，但几乎没有反应。虽然当地治安部队很快镇压了起义，但地方当局还是取消了杀猪税，他们意识到政治合法性及稳定局面和税收负担密切相关。

小堤暴动失败后，当地的共产党员继续秘密地进行组织活动。一个名叫侯宇天的武术爱好者在1931~1932年组织了一支“盐军”，有10个人，专门从饶阳南部走私盐，连连得手，不交任何税。共产党设法组织和保持走私者，探寻要求减轻可恨的税收负担的群众呼声。党员们还与饶阳学生一起说服政府

给予非国民党员学生的活动以合法性，并改变陈旧过时的课程，但遭到拒绝。1933年，共产党保定特委的一个委员叛变，他供出了包括饶阳在内6个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导致党组织被破坏。没有逃脱的孤立的知识分子党员被捕或被杀。

国民党现代化努力的失败

国民党并不能使国家这艘摇晃中的船稳定下来。在最初5年中，平均每位县长任职298天。该县再一次遭受了多种自然灾害。1932年，肆虐的滹沱河淹没了全县1/3的地方，毁坏了庄稼，在洪水经过的地势低的地区，冬小麦无法耕种，因而1933年6月颗粒无收。相反，该县南部则遭到严重的旱灾。1933年夏发生的洪水淹死了耕畜，全县一半居民无家可归。^⑩政府调查人员把农业危机归咎于自然灾害。

那年夏天，杨风玉县长所作的调查发现，饶阳县的村庄总数比清朝鼎盛时期少了4个。县长汇报说征得税款181747元，其中92506元用于本县开支，40%的预算用于教育，与1907年的2494名学生相对照，有216所小学，452名教师，6980名学生。30%用于公共治安，每个警察月薪6~7元。现代警察的训练计划只得作罢。

家庭手工业包括养蜂、孵小鸡、搓绳、用柳条编篮子。饶阳商人把芝麻油、豆油、麻袋、粮食和土布运出去。1932年，全县用于挖井的投资仅2000元。民间组织有30人的商会，以及教师联合会、妇女协会和农民协会。全县有610座庙宇（拥有财产5万元），1个银行和10个合作社。县城有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诊疗所。

1935年，当国民党委派另一名新县长王文斌到任时，老天仅下了17英寸（约43厘米）的雨。他警告说，饶阳已处于

变成荒地的边缘，“土壤贫瘠……没有足够的水”，老百姓的生活“不堪设想”^⑨。王县长的资料表明，200年后，农民们比18世纪40年代时遭灾更多，气候也更加恶劣。1748年，饶阳县有23753户，大约12万人，到1935年，已增至33184户，192819人，人口增加了60%。按照王县长的调查，1933年耕地面积从545500亩降至512800亩，减少5%。1748年平均每户土地面积22.7亩，到1935年仅为15.4亩（2.5英亩）。随着税收的增加，集市和副业的萎缩，在技术、水利、土壤和粮食主产方面没有明显的改进，农民的生存保障受到可怕的削弱。

当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苏联附庸国在1921年成立以及日本在1931年占领满洲时，饶阳商人和小贩失去了这两个重要市场，因而加剧了商业的衰弱。随着外国的棉纱在20世纪初进入华北，饶阳的家庭棉纺业也衰落下去。一些处于战略交通要道的县着手发展工业，但内地饶阳远离铁路，又没有可供航运的水路，不通汽车，也没有公路，不可能发展工业。

当地棉花生产也猛烈下滑。1936年，饶阳棉花种植面积不到耕地面积的1%^⑩。这个历史上输出棉纺织品的县，到1935年时需从国内市场输入2万斤棉花，9000卷棉布，从国外市场输入另外的4000卷棉纺织品和3000箱煤油，总价值为37.8万银元，而输出产品主要是花生、麻袋和榔腿，总价值仅为10万银元。^⑪

该县北部的集镇尹村，是饶阳唯一与20年代华北经济之现代化中心地区有着商贸、手工业和工业往来的地方。尹村热电厂最早为饶阳提供电力，在那儿，家具、服装、五金甚至电力机器均有出售。但到1937年，尹村的商人有一半破了产，而且惟一的现代工厂，即与天津资本家合办的纺织厂也迁到了保定。全县商业衰退还可以从当地集市网络的严重萎缩得到反

映。1748年，饶阳有5个日常性集市和22个定期集市，而1935年时已没有日常性集市，仅有8个定期集市保留下来，而且限制在粮食、家畜、蔬菜和各种日用品的买卖上。在张岗和小堤，只有酒馆可维持营业。

像饶阳这样的内地县，包括精英在内的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没落状态。有时穷人们把怒火发泄到相对富裕的人身上，因为败落的精英拒绝履行他们对其他农民的义务。但地主剥削并不是衰落的原因。地主和有雇工帮忙的富农（managerial farmer）仅仅拥有一小部分土地。^②该县80%的农民是自耕农（owner-cultivators），拥有73%的耕地。

1744年和1935年的饶阳有一个重要差别，即国家对天灾的反应能力不同。乾隆政府提供财力物力，救济难民，但到了20世纪，清朝脆弱的保障网络已整个地消失了，应付紧急情况的粮仓没有了。县财政也陷入赤字状态：收入65838银元，而支出（大部分用于警察方面）则达71083银元，其中仅仅100银元用于抚养孤儿和救济穷人。与清朝政府相对照，1935年发生洪灾时，中央政府没有给予救济。王县长向第二区和第四区的地主征用了13万斤粮食，因为仅有这两个区有余粮，每100亩私有土地捐献150斤粮食，可谓杯水车薪。

长期的社会经济衰落使饶阳文化生活一蹶不振。文庙长期关闭，季节性的拜祭仪式不再举行，严守道德戒律的典型人物也不再在国敕的庙宇中受到表彰。可是在许多方面与儒家伦理相共鸣的农民价值观，在饶阳仍然根深蒂固。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使许多民众无力以历史悠久的方式庆祝一生中婚姻、生与死这些重要时刻。随着敬奉仁慈的观音和其他传说中的神灵的寺庙长期失修，百姓的宗教生活发生了变化，宗教派别、秘密会社和像取名龙帮、无常士帮（Temporary Soldiers）和穷人帮之类的自助团体广泛散布于各地，为农民提供自我保护，并

弥补国家和衰落的传统精英无力提供救济的缺口。

文化成了充满竞争的领域。虽然许多农民逃到关东和沿海城市去做工，但其他人则希望原有的和新的神灵会保佑他们。他们在 610 座庙宇中求雨，祈祷免遭蝗虫、水灾、疾病和抢劫。有些人则到天主教堂寻求救济。此时冀南约有 78358 人改信天主教，占冀南人口的 1% 略多。^②

人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有时会利用宗教活动进行保护性敲诈。在其历史可追溯到西汉时期的杨各庄，共产党员白清才在 30 年代中期逃离饶阳县城后，在乡村学校教书，他争取了 20 多个学生参加秘密党组织的活动。白氏宗族在杨各庄占有优势，宗族的黑山庙始建于元朝。党组织力劝农民们成立一个自助团体——平民协会。当时杨各庄有一个重要的家族成员去世，协会迫使村民联合抵制葬礼，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抬棺人。在协会成员把棺材上下翻倒之后，死者家族不得不在葬礼上付给村民救济金。

维新者也为文化霸权而斗争。裹脚已过时，现代戏剧团体上演了突出自主的夫妻结合和爱情婚姻、嘲笑传统父亲和岳母的戏。然而，任凭灌输现代的、非正统的观点，30 年代民间戏剧还是反映出妇女从属于男人的价值观，尤其是反对妇女在丈夫去世后改嫁的戒律依然存在。^③在集市，特别是在收割季节，新年和庙会期间演出的民间戏剧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使人暂时忘却了日益严重的危机。

王县长想通过以教育为重点的各种现代化改革，使饶阳摆脱困境。几个世纪以来，官员们一直在试图培养能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天才人物。到 1935 年，有 171 所男子初小，35 所刚办的女子小学。平均每村有一所小学，为全县大约 7000 名青少年提供 3~4 年的基础教育。另外还有 4 所高小，其中一所是女校，水平最高的是两所师范学校，分别培养男、女教师，

为年轻人和成年人开办阅读、卫生和娱乐课程的“平民教育中心”，分散在160所初小中。

县里还开设了禁毒中心，1934~1935年间，共收治了400多人。官方估计该县还有1000名吸毒上瘾者。由日本商人走私到天津的毒品，经过当地中间商转运到饶阳。^⑤人们咒骂日本人，是他们的毒品正在吞噬着中国人的生命。县衙出钱悬赏提供毒品交易商消息的人。

政府突出强调了4个模范村：王岗、南韩、西里满、西沿湾把教育改革和介绍科学种田结合起来的现代化成就。每个村庄有男女混合初小一所，另有免费的、在农闲季节开办的“民校”。当地官员们在社会治安、植树和挖井上进行了试验。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该县还帮助建立起51个合作社，为长期缺少资金的农民提供资助。同时又建立了3个消费合作社，5个商品运输和供销综合信用合作社。严重的资金短缺和过重的税收负担限制了在这几个试验点作新的尝试。

找水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在富裕的定县，地下水接近地表，将近一半的农户使用水牛^⑥。但在偏僻的饶阳，很少有人出得起资金、劳力和材料挖一口起码4.5米深的水井。虽然两县相距不远，但地理条件相差甚大。铁路和现代公路网使定县与北京、保定和天津联结起来。现代观念和数千名现代人使保定地区充满生气，而偏僻的饶阳却因水土贫瘠，依然被可怜巴巴地排拒在现代化大门之外。

面对长期的预算赤字，王县长手中缺少用于现代化的资金。1935年水灾之后，该县3.3万户中有半数陷入困境，税收的来源大大减少。王县长优先考虑的是警察和公共治安。1935年，有一支102人组成的保安队和144人组成的民兵组织。这一年县政府总的开支是71083银元，有34232银元用于治安，其中13732元用于5个区的保安队，16314元用于当地

民兵组织。即使没有不断增长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税收负担，现代化也会陷入困境。可是随着日军入侵和中国分裂威胁的不断扩大，人们的爱国激情越来越强烈起来。

一个偏僻村庄的崩溃

对一个饶阳村庄的了解越详细，我们对焦点问题的认识也就越明了，即农村危机是如何割断联结村社成员的纽带的。五公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隋文帝在位期间，祖籍饶阳的李德林成为朝廷御书院的御史令（正三品）。在风水先生的劝说下，李德林于586年回到饶阳，替他死去的父亲在县城附近建一座坟。据说这个地点是块风水宝地，可以保佑五代家族成员仕途发达。于是荆新村改名为五公村，意指5个公爵或大官。如果德林和他的父亲算作安平郡（辖饶阳）最早的帝国高官，那么德林的曾孙李忠承就是第五代。在684年，他在一次反对唐朝皇帝武则天的流产政变中受牵连。武则天剥夺了李氏家族的称号，下令毁掉他们的祖坟，永远不准李氏家族的成员做官。传说证实了风水先生的预言，李氏几代连续有5人做官，且只有5个。

在五公村，宗族居住地和土地占有量（land access）结合起来，表明权力关系和声望。该村位于饶阳县城西南14公里，定期集市邹村的正西面。李氏家族从开始在此定居起就支配着五公村^②。在15世纪初庞大的移民潮期间，有一些后来者从邻省山西的洪洞县迁移来此，他们不得不在外围住下，耕种很不理想的土地。姓耿和乔的家族住在东村，姓张、杨和徐的住在西村，还有一些姓柯、王、刘的则分散在别处。东村的农民擅长于搓绳和制蜡，那些村中央的村民种植和贩卖蔬菜，西村的居民则加工豆腐。

20 世纪的危机威胁着很多农户以及乡村生活文化纽带的许多方面，从而迫使传统宗族关系重新组合。为了重新聚合分裂的社会，必须形成新的结合力。与衰落中的饶阳经济相关的紧张状况加剧了李氏宗族南支和北支之间的对抗。19 世纪初，五公分裂为两个村，大五公村在北，小五公村在南，各自由北李和南李控制。在 19 世纪 70 年代，北李势力占上风，但 19 世纪末，它衰落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南李宗族的土地占有量上升到 700~800 亩。1911 年清朝灭亡后，五公村一分为二的百年历史结束了，南李支配着合并后的五公村。由于出现地区性经济灾难，南李的首领们组成一个名为八院的组织，它的有效权力一直保持到 30 年代。全村 2/3 的农户姓李，南李宗族占一半。^②

教育改革有助于把民族主义带给农村知识分子，他们为北伐战争打倒地主和外国剥削者的前景激动不已。到了 20 年代，有 30~40 个五公人在清朝灭亡后开设的私立“新式”学校中，接受了 5~6 年的初级教育。在 20 年代中期，学校招收了 70 名学生，每年交 3 元学费。到 1937 年，共招收 150 名学生。有些学生在五公小学毕业后继续求学。八院首领李春龙的儿子李书德在定居天津之前，曾在 30 年代初留学法国，学习纺织生产技术。在五公村出生、曾在饶阳男子师范学校学习的教师耿满良，鼓励学生成为崇高的爱国者。在 30 年代，有三个小学教师从县政府支领薪水。尽管许多农民从学校毕业后忘记了政治，但还是有许多人聚集在村上的小店里，交流有关政治事件的新闻、传说和故事。在饶阳南部活动的共产党组织者从没有接近五公村可资动员的农村知识分子。

1936 年，该村 285 户共 1390 人，耕种 4620 亩（约 770 英亩）土地。平均每户 16 亩，人均半英亩多一点，接近全县人均水平。在五公村仅有 4 户拥有土地在 80 亩以上，而最多

的为 123 亩，出租土地不超过 24 亩。这些富裕家庭中的首富也与其他人一样下地劳动。仅有 80 亩私有土地（占总面积的 2%）出租给佃农，租金平均一年每亩 3 块银元，在 1935 年其价值相当于 75 斤粗粮。^⑧租约一般为 3 年。土质最好、利于灌溉的土地偶尔也出租 10 年以下，专门种蔬菜，每年租金 8~10 银元。

6 户人家（5 户属于南李家族，1 户是东村的乔万象）雇佣一个长工，在耕种和收割季节，他们与别的一些农户都雇佣短工，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的仅为少数几个中等收入的农户。贫穷是普遍的，即使富裕家庭也仅仅在节日时才吃细粮。与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一样，绝大多数是自耕农。五公村有 200 户（占总户数 70%）不租别人的地和雇佣帮工。

在五公村，自己有地的佃农（owner-tenant）有 70 多户，他们租耕小块土地以弥补自己的瘠薄土地之不足。租耕的土地大部分来源于村里 150 亩宗族和庙宇的土地。^⑨1936 年，自己有地的佃农平均每户承租 3.2 亩，其中有些家庭成员还去当雇工。短工大约 5 天赚 1 块银元，长工一年挣 40~50 银元，并提供住房和伙食。^⑩在农忙季节，他们一天劳动近 12 小时，农闲季节工时较短。

1936 年，有 33 个村民被雇作长工，其中 5 个在邻村干活，95 人被雇为短工，几乎全是有自己土地的农户。他们一大早去邹村集市（它是一个有围墙的村庄，其贸易集市起源于明朝），在雇主面前排成一行。五公村 1/3 的家庭有人被雇作临时工。在该村经济梯级（economic ladder）的底层，5 户无地的农民依靠没有保障的劳务费艰难地挣扎着。勉强维持生存的无地农户的男性后代由于太穷，结不起婚，他们家族的香火就要断绝，这对祖宗来说是最大的不道德行为。

平均 5 口之家耕种 15 亩（2.5 英亩）土地，在好年成里

能够收获 2250 斤粮食，除去每人生存需要 300 斤之外，用于种地开支、修缮、税收、家庭日用品、衣服和应付紧急情况，或支付结婚、节日和葬礼的开支已所剩无几了。³⁰ 1935 年，购买一亩土质好的土地要花 100 银元，150 元可建造三间标准房，婚礼和葬礼的开支分别为 70 元和 100 元。1 块银元可买 25 斤粗粮。

与华北平原的其他地方一样，在 30 年代，土地—人口比率变得更糟，农业萧条。农业技术是原始的，耕地时仅把地表几英寸厚的硬土翻过来，从未听说过农药和化肥，缺少耕畜，甚至起码的工具。几乎从未有人对种子的品系、间作、庄稼轮作的方法进行试验，电力和拖拉机则连做梦也想不到。

五公村的贫穷还反映在它的生态环境上。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的高地上，不在滹沱河洪泛区内。它的主要气候问题是干旱而不是水涝，地表没有水，1936 年时仅有 30 口井，大部分在属于李氏宗族的土地上。有时轻微的干旱都会导致粮食的明显减产。严重的旱灾则意味着挨饿，妻离子散，逃荒，甚至饿死。

张颀生于 1921 年，12 岁时丧父，他的一个哥哥大约同时去世，紧接着是另外两个兄弟，最后就剩下张颀、他母亲和一个弟弟。18 岁那年，全家卖掉了仅剩的两亩地，靠租种张氏家族的两亩地和做雇工挣钱生存。全家对张颀娶妻生子延续香火不抱希望。

在 30 年代，越来越多的农户遭了灾。西村张宙的父亲在 1905 年她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她孩提时代就学会织布，用裹足脚操作织布机，上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后来她嫁给五公村一个劊猪师傅，在丈夫逃到关东后，她独自抚养一儿一女，丈夫音讯全无，也没有钱寄回来。张宙织布，在地里拉犁，耕种家里的 4 亩地。她和两个小孩勉强躲过了饥荒。

在农民生活变得日益艰难时，政府的救济能力却每况愈下。偷窃越来越猖獗。由于五公处于通往集市邹村的土路上，在刚发生的水灾中所受的损失要比邻村小得多，因而村民们觉得他们会成为偷盗的目标。在院子入口处有“影壁”，除了驱除鬼神和恶魔之外，还可以在开门时使陌生人看不到里面。社会不安定使税收迅速增加。1936年，中央税为每10亩半元，而地方税比这高出10倍，每亩就要半元多。越来越多的苛捐杂税，极其沉重地压在困苦的农民头上，导致农民与收税政府之间的对立。

尽管人们对葬着祖宗的土地怀有神圣的情感，但生存需要却迫使家庭分裂。年轻的男人到别处找活干。有些人在天津和北京寻找建筑活计和工厂的工作以及商业机遇，远的甚至到上海和福州。其他人则在华北全境的集镇上充当兽医和打绳者。在20世纪前半半个世纪中，从华北迁居到关东去寻找土地和工作的近800万人，其中也有五公村的农民。^③

文化混乱

社会经济的衰败伴随着文化上的混乱。传统通过性别、年龄和家庭支配文化准则，虽然男孩子被培养得强悍粗犷，但村民们却担心他们在被迫逃生时会失去控制，干出不道德的事情。因此，年长者劝告年轻人不要学“猴子”，因猴子孙悟空是个十分有害的榜样。到30年代农村正经历一个难以保持风俗习惯的时期，社会似乎即将四分五裂。

在五公，有两个最受欢迎的庙宇，它们靠捐赠、售香、出租20亩庙地来维持，由于缺少修缮资金，已渐趋破落^④。菩萨庙（也称奶奶庙）是一个敬奉观音的破落佛寺，观音是能给那些遭受人生苦难的人带来好运的仁慈之神，特别受穷人喜

欢。它坐落在穿过村中央的土路的西端。三官庙在东端，尊奉天、地、水三位世界主宰者，庙中有三位主要神灵的大型神像，大肚的笑面弥勒佛是该庙的特色，它是普通百姓的谦恭而不装腔作势的保护神。到三官庙膜拜的主要时节是在新年，婴儿出生之后，父母也抱着新生儿（尤其是男孩）到庙中祈求保佑。三官庙中住着的是40岁的和尚乔曾骠和20岁的尼姑田常瑾，她的父母先把她卖给人家做佣人，后来进了邻近的观音庙作了尼姑。在那儿，一个老尼姑因她错待香客就用燃着的香刺其面部，在她脸上留下了伤痕。1934年，18岁的田被卖给五公村三官庙的乔曾骠作妻子。三官庙有两个院子，分别用于起居和膜拜烧香。与这个地区许多婚姻一样，它打破了神圣的传统，即男人娶年龄稍大的妇女这一风俗。人们说：“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

在五公村还有三个无人主持的小庙。在村东北郊的田野里，成功地打出了几口井，于是水神龙王被恭奉在这儿的小庙里。败落的精英们特别钟情于两个小神龛，即坐落在村中央、敬奉勇猛的红脸战神的关帝庙和东村的田忌庙，它敬奉的是被神化了的战国时期名将田忌。国民政府支持具有历史价值的寺庙，又努力发展科学，减少迷信，不支持与纯属传说人物相关的寺庙，并劝阻人们烧香。^⑤

南李、北李和张氏这三个主要宗族在困难时期通过向较穷的宗族成员出租150亩公地来帮助村民，地租只有平均水平的1/3，并允许无家可归者住在各个宗族的祠堂里^⑥。最有势力的南李集中在宗族祠堂里举行活动，把从开山祖到目前所有祖先的名字都用墨汁写在白布上，但只有男性的名字才能记录下来。

宗族仪式活动的高潮是清明节，在农历三月的第三天祭拜祖先。清明一大早，宗族首领带着每户的男人到宗族墓地，每

个坟头都清扫，填上新土，焚烧白纸和香，以示对已故祖先的怀念。紧接着是在宗族祠堂设宴款待，就餐者、厨师和所有服务人员都是宗族的男性成员。饭后，男人们带一些馒头回家给妇女们。在清明，李氏宗族内部两个死对头表演了象征团结的一幕，北李的男人们带着食物和酒到南李的祠堂中，在南李创始者的木牌前磕头敬拜。然后居高临下的南李酬答，派代表到北李的祠堂中敬拜，并送一些食物作为礼物。

清明节的重要性还不能与新年相比。在新年除夕，村民们常常彻夜不眠，庆祝活动延续两周，在正月十五的爆竹声中达到高潮。在此期间，村民们换上新衣，清扫院子和房间，走亲戚，赌博，祭拜祖宗和当地的神灵。当他们期待蘸着醋狼吞虎咽美味可口的白面肉馅饺子时，便尽情地轻松享乐，放鞭炮，喝酒，欢度佳节。

吃到净肉饺子是一个好兆头，过新年没吃到肉馅饺子就像根本没过新年一样不吉利。命运在新年时就注定了：“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但在 20 世纪的那段艰难岁月里，贫苦农民只得求助于假饺子（称为红饺子，高粱面为皮，菜为馅）来欺骗神灵，这个季节的反差强烈地反映在当地的悲叹之中。

新年到，新年到，
闺女要花儿，小子要炮，
老婆子说，我要三斗麦子二斗米，
老头子说，我越没钱你们越瞎叨叨。

村民们在除夕和年初五到主要的庙宇烧香，敲打 18 只鼓，其中最大的有 1.2 米宽，每个鼓都架在马车上，由 4 个人击打，还有小鼓、铙钹、锣和两个舞狮者。73 岁的刘玉福为我

们表演了敲鼓，叙述了他于 30 年代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光里，在仪式上敲鼓的情景。

在集市邹村，药王庙会在农历四月底举行，是当地最激动人心的活动。每年吸引了两万或更多的人和来自山东、河南、山西的商人。在庙会期间，在村北集中了数百头牲畜，附近有很多露天小吃，喧闹的布和鞋市场，一直延伸到村西头。在 5 天集市期间，用大帐篷搭起一个舞台，人们可以免费观看传统和当代的戏剧，每天三场。巡游的说书人和民谣歌手传递着古代传说和当代军阀争斗的情节和阴谋。魔术表演，唱戏和到 30 年代才出现的灯影戏（lantern shadow）使观众一饱眼福。赌博的人也大批来到。村民们赶来祈神、看热闹、卖蔬菜和副产品，买一些贵重的特制品，如用于婚丧仪式的商品。赶集预示着健康：赶集者们到观音庙中烧香，奉上食物，希望治愈疾病，保佑安康，来年顺利。当庙里的铃声一响，人们就磕头，把钱抛进一个大募捐箱里。

宗教文化不仅体现在集市上，而且充溢于宗族生活的关键性场合。办婚丧事是最重要的场合。以不同于惯有的方式进行庆祝是卑下的，也是不祥之兆。但传统方式又花费太高。按照风俗，财礼应很多，但一些家庭越来越承担不起。女儿常常被迫嫁给老头子、酒鬼、大烟鬼或是打老婆的人。例如一个名叫卞巧的新娘嫁给了一个比她大 16 岁的男人，她大笑着向我们叙说有关 30 年代的婚后生活，“我婚后什么也没发生，他太老了，不能使我满意”。名不符实的婚姻带来的是幻灭和绝望。

1935 年，一次婚礼可接受的开支标准为 1750 斤粗粮，相当于五公村许多农户一年的粮食收成^⑧。正式的婚礼从一大早开始，4 个轿夫抬着红轿子，里面坐着新郎，另有 4 个轿夫抬着为新娘准备的绿轿子，从新郎家出发。轿子通常是租来的，不过有时也是由较穷的宗族成员提供的一种服务。在新娘家，

新郎从轿子里出来，向新娘和岳父母磕头。回到新郎家，一对新人走下轿，向天帝神居住的北面磕头，然后进入院子，向新郎的父母和其他亲戚磕头。接着他们吃饺子，象征结合为夫妻，客人们献上钱礼（通常是一元或两元）后，都坐下来享用馒头、米饭和干姜。如果这家有钱，一对新人则穿戴着特制的服饰，新郎是礼帽和传统的长袍，新娘是美丽的头饰。

婚礼之后的仪式是闹洞房，众人要求新娘跪着，一个客人则端着钱盘，新娘每次迅速地抓钱时，盘子就很快地被移走。当年轻人在外面大声地嬉笑，两个新人退到他们的卧室之后，嬉闹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仪式安排，如把食物放在砖炕上作为献给神灵的贡品之类，意味着保佑生个儿子来继承家业。若结婚没有喜宴、宾客和音乐，就会感觉像过年时喝粗粮稀饭，而不是吃肉馅饺子一样。不合礼仪的婚礼在30年代增多了，它被认为是有悖于传统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对宗族是个不祥之兆。

葬礼的花费比婚礼更高，不能很好地安葬父母，是侮辱他们死后的名声，使全家感到羞辱，宣告死者来生不得安宁，而这又将给不孝子孙带来报应。当然，如果死者断绝了宗族的香火，那么仪式也就不需要了。如果一对没有子女的老夫妇中有一个死去，那么尸体要放在院子中间的棺材里，周围堆上砖，留一个孔用于烧香，一种难闻的恶臭散发出来，但棺材和臭味必须保留到另一个配偶去世为止，以省去分开下葬的费用，让他们合葬在一起。在50年代，老年人回忆说，在清代那艰难岁月里，“六十还字子”^{*}，这句话表达出令人恐惧的味道。据说有些贫困不堪的家庭挖一个坟，让老人住在里面，直到他们死去。

^{*} 意谓到60岁就该死了。——译注

在葬礼中最大的一笔开支是棺材。树和木材是稀少而昂贵的，但棺材却是必不可少的。家里活着的人常常举债来办一个体面的葬礼，包括抬棺、仪式开支、有几个和尚的佛事和盛宴。在合乎惯例的葬礼被安排好之前，老人们很怕死。那些作好准备的老人为自己买好了棺材。几十年之后，人们仍记得在30年代，刘玉桥的岳父没有棺材，就被埋在地下，邻居们送来了两块小木板，把死者的脸与泥土隔开。^⑧

共同的文化使农民们对正常的生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时兴的方式结婚，生很多孩子（至少有一个儿子，留在家中延续香火），过年时吃肉馅饺子，清明节祭拜祖宗，死后有木棺下葬。在农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能实现这些目标的社会便是缺乏合理性。在30年代，许多人发现这些正常生活的目标可望而不可及。文化的支撑结构正在崩溃。

在那艰难的岁月中，新的生存方式冲破了社会道德约束。男人们外出找活儿挣钱，一去就是好几年，留下妻子看家和照顾孩子。全家人担心，在外地干活并生活在不道德的陌生人中的男人们会忘却他们对家庭应尽的义务。一个死于异乡的父亲不能葬在宗族的土地上。由于女儿不能继承家产，因而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被认为是邻居们有正当理由进行攻击的对象，他们也正渴望侵占其土地、树木和院落。断了香火的家庭成为众矢之的。只要文化约束一瓦解，土匪、偷盗和绑架等暴力现象就随之增加。人们常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冲突的分析

李明德及其儿子们的故事就是30年代农村衰落和社会动荡如何加剧冲突的例证。李明德是南李宗族的首领，也是该村在19世纪末分为两部分的中间人（broker）。在南李和北李的

对抗中，他渴望巩固其地位，但却没有儿子来继承他做宗族的头领。明德从附近的深县收养了一个男孩，取名李化南。后来，明德又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化岐，民国初年被立为继承人和宗族的头领。化南被取消了作为大儿子的假定继承权后，十分痛苦，开始转向犯罪，领导一个小的流氓团伙，在南李祠堂里开了一个赌窝。^⑨李的帮伙，有在深县由声名狼藉的徐率领的第二黑帮，和武强与献县附近的其他团伙，他们都以绑架、敲诈、偷盗、勒索保护费为生。当国民党在全省范围内发动一场清除侵占国家税收的地方恶霸的运动时^⑩，李化南被逮捕和枪决。

1936年，威胁南李统治地位的事件发生了，这一冲突加剧了当时原有的社会紧张状况。按照惯例，在收割前，较穷的村民被组织起来看护庄稼，防止被偷^⑪。这年秋，李化岐宣布，大部分属于南李宗族的70户村民各自看护庄稼，而不再支付看护费用。不久，家住西村的李化岐的佃户徐敦，被指控偷了李的还未收割的谷子，以补偿他看护庄稼的收入损失。饶阳公安局把徐抓进监狱，把谷子交还给李化岐^⑫。可朋友和宗族成员都把徐看做贪婪的无辜牺牲品。他们说，由于他的孩子已饥饿难忍，所以他把自家还未成熟的谷子收割下来，正放在院子里晒。

徐敦事件加剧了该村生活结构的破裂。徐被捕后，李化岐同族的70户村民拒绝提供办婚丧事用的驴子、马车和工具。败落中的精英感到经济上有压力，于是抵制传统性服务。当东村的乔老惠要求用马车把他父亲的尸体运到坟地却遭到拒绝时，混战爆发了。祠堂突然起火，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前，匕首掠过，数人受伤。

1935年，南李宗族的掌权者李瀛洲的滔天大罪已激起普遍的愤怒。瀛洲指责刚停止为他于活的李铁头偷了他的鸡，然

后几乎杀掉了铁头全家。经济衰败对家庭构成威胁。1936年，7个妇女在生下孩子一月内便死去了，许多新生儿在分娩中或生下后不久就死了。对破落的穷人来说，结婚更是成问题的了。生活在五公村主持红白喜事的风水先生二师傅（the Second Master）于30年代初去世之后，仅有少数较为富裕的农户才请得起风水先生操办红白喜事。

尽管李化岐一派内有几户富裕家庭，但它最初是由南李宗族成员（大部分是自耕农）组成的。李春龙和乔万象这些富裕家庭与李化岐并不是一条心。支持徐敦的一派起初也由自耕农组成。100户保持中立，有110户在徐敦的亲戚徐义洲带领下，组织起来与李化岐一派进行斗争。^④冲突使地主与有地的佃农针锋相对，但战线主要依据宗族、惯例和居住地而形成。李化岐一派大抵占据村中央，而徐义洲一派则把东村和西村的村民集中起来。持不同意见的首领还包括败落中的北李宗族成员。这是居住在村子外围的外来者第一次联合起来。1936年秋收之后，徐敦的支持者在西村的观音堂里与徐氏宗族开会，他们在仁慈之神面前，磕头烧香，宣誓联合起来，防止类似于徐敦的冤枉事件发生。

徐义洲是一个说话抑扬顿挫的瘦弱文盲，对同族的徐敦和他处于绝望中的家庭充满同情心。他出生于仅有三亩地的五公村最穷的家庭之一。1919年1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因病长期卧床，他的3岁和7岁的妹妹年龄尚幼，不能干活。在1921~1922年的旱灾中，死了一个妹妹。由于无力偿还借贷，1922年他父亲逃到关东，不久去世。15岁的徐义洲不得不靠自己维持生存，他把妹妹放在舅舅家中，自己去了3000公里之外的华南海滨城市福州。他在一个手艺店做学徒，5年后，回到家乡，耕种家里的一点薄地，并用积蓄租了一块菜地。他通过做短工增加收入。25岁那年，他终于结了婚。婚事办得

很简单，不过，新娘带来了一台大而漂亮的木制浆纱机。

徐在观音堂中告诉村民们，他们团结一致就能避免徐敦的命运。有人提议联合起来组成联合会。在一个家庭中，命运与道德缺陷有关，与上苍的随心所欲无关。当地人说：“河里没鱼市上看”，意即如果你没能抓到鱼（挣到钱，有儿子等），你只能怪你自己，因为很明显，正在集市上卖的鱼是从河里捞上来的。在整个地区，各种各样的半秘密状态的自助组织，如天道会（Celestial Way）、茶叶会（Tea Leaf Society）、中门正义会（the Just Sect of the Central Gate）等早已在发挥作用。西村张文琛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极为谨慎的中庸之人（*means*），后来当过一段时间的村长，是他帮助起草了抗议声明。在富有同情心的仁慈之神眼睛注视下，联合会会员宣誓，向联合会会首高声朗诵每一行字：

五公穷人，
为求生存，
自愿联合，
同甘共苦，
一人有难，
全体相帮，
誓言奋斗，
反对财主。^④

联合会派代表陪徐敦的 20 个亲戚到小堤区政府，并两次到饶阳县城徐所在的监狱，均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徐义洲要求新当选的村长李春龙（与李化岐一派没有联系的传统精英成员）和他一起到饶阳，凭借其影响力进行申诉。李打通了关节，徐被释放，但仍有被扣押的粮食问题。联合会是跟李化岐

算账的力量，于是李化岐乖乖地把粮食归还给徐敦，然后以徐敦的名义办了酒席，公开向徐承认其错误做法。^④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出现真正的和解。

村庄陷入混乱之中。没有人愿意担任村长之职，承担收税、组织夫役、调解冲突、充当村民与饶阳县衙之间的联络人之责。张云山是受人尊敬的西村的自耕农，于1911年被宗族首领们推举为村长，并于1936年初徐敦事件之前卸任。他的继任者是经济上富裕的李春龙，勉强干了一年。^⑤1937年初，名叫李振嘉的贫农当村长，但仅几个月他就不干了。同年春，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落到李建亭的身上，他是挣扎中的“八大院”的重要成员，八大院已再也不能使全村保持一致了。

抗战的负担

1937年7月，6年前已占领满洲的日军在华北发动全面进攻，日军首先占领了铁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和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周围的平原地区。通过饶阳的第一支日军部队仅仅侵袭了一些村庄，发了一些糖果，和小孩子玩，并未遇到反抗。他们迅速开拔了。是年秋，县政府试图组织农民准备对付日军的进攻，下令落实集体责任制。与帝国时代一样，10户一组，以便于收税和为公共工程征调劳力。此外，组员之间相互监视，并要求不定期汇报情况，一旦出错，累及所有人。这个体制加剧了农村的分裂。

饶阳的国民党当局命令五公村村长李建亭征募劳力，加固西北9公里处南韩村的防御工事。李通知这些民工每天工钱6角，比农忙季节的短工略高一点，贫困的农民们志愿于冬闲季节的活儿，半个月后回家。可李村长却没有收到支付薪水的

钱。愤怒爆发成反抗。由徐敦冲突事件造成的裂痕在人们记忆中还未褪去，而李建亭又是李化岐宗族的重要成员（建亭的父亲和化岐是同一个祖父）。联合会站起来代表这些农民，要求李建亭支付所有的工钱。建亭在说清楚由于县政府没有拨款下来，他本人不负责任之后，为了缓和紧张气氛，他提议富裕的农户每户捐献一块银元，联合会各户也捐一块银元。联合会中有积蓄的自耕农核心人物同意这个建议。双方都捐了100银元，然后联合会照顾自己的成员，200银元几乎都分给了属于联合会会员的民工。

此后不久，又筹集了200多银元，有3/4分给联合会会员。最后第三次200银元分完之后，还有一些民工尚未领到应有的工钱。到了新年除夕这一传统的结账时间，事情就结束了。联合会把李村长当作这些民工的代 表，如果他们得不到全部的工钱，他们就不能吃上美味的猪肉馅饺子。前已提及，村民们以这种时兴的方式来庆祝新年，保佑他们来年吉祥。

把1938年新年事件称为元宵节起义似乎不太合适，向李村长抗议的主要不满是，较为富裕的家庭在元宵节吃上肉馅饺子，而更多的其他村民只能喝粗粮稀饭。李建亭知道饺子的象征意义，同意把1000斤税粮分给仍未得到全部工钱的那些村民。几星期之后，李建亭也不干村长了。贫农李福祥干了两年。老的地方精英不再提供更多的救灾保障或争取上层的援助。

国民党的现代化努力仅仅是对土匪发动了一次无力的进攻，与穷人的宗教信仰进行了微不足道的交锋。它不能激起潜在的民族主义，阐明增加税收的关键原因，或者逆转经济衰退的势头。农村处于分裂之中，传统地方精英不再使社会结构保持完整。

注 释

1. 本书对 18 世纪饶阳的描述，主要依据 1749 年刊刻的，由单作哲知县编定的《饶阳县志》。
2. 关于饶阳的早期历史，参见张永富《饶阳史考》，载《衡水日报》1980 年 9 月 27 日。
3. Pierre - Etienne Will, *Bureaucratic et famine en 18e siècle Chine* (Paris: Mouton, 1980), p.176.
4. 关于地理条件概况，参见任育地《中国地理概述》（北京，外文出版社，1964），第 72～75 页；以及 Ramon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 - 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8~12。
5. World Bank, *Waterlogging, Salinity and Drought: North China Plain* (Washington, D.C., 1983), p.12.
6. 1 斤等于 1.1 磅，1 亩等于 1/6 英亩。在《饶阳县志》（1749）中，数量单位是担，在中心粮仓有 3 万担，在附属粮仓有 1.4 万担。我们估算在饶阳，一担有 100 斤，一斗（或配克）为 10 斤。
7. 关于 1887 年定县在饥荒期间出现的吃人肉的描述，可参见 Sidney D. Gamble, *Ting Hsien: A North Rural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446。
8. Compare Susan Mann, "Widows in the Kinship, Clas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s of Qing Dynast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1 (February 1987), pp. 37~56.
9. 参见 Vivien W. Ng, "Ideology and Sexuality: Rape Laws in Qing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1 (February 1987), pp. 57~70。
10. Gamble, *Ting Hsien*, p. 437.
11. Stephen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 - 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 California Press, 1981), p. 172。我们对麦金农教授允许引用有关直隶的研究性注释表示感谢。
12. 《直隶土产表》(1904), 载《北京学报》(1905), 《科学丛录》(4), 《调查》第一卷, 第91页。
 13.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o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93, 103, 147; Sally Borthw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on China: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Er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78.
 14. United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ttee, *The North China Famine of 1920 ~ 1921* (Beijing, 1922), pp. 6, 9~11, 13, 26.
 15. William Skinner 认为, 最容易出现人口减少的地区是华北平原上易发生饥荒的人口密集的地区。参见“Social Ecology and the Forces of Repression in North China: A Regional Systems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ACLS Workshop,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 July 27 ~ August 2, 1979, Harvard University)。
 16. Edwin Moise,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3: 1 (January 1977);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4~25.
 17. 有关1925~1933年饶阳政治的描述, 是以《千古英烈》(饶阳, 1984)为基础的, 它由饶阳革命史料编写组编写。
 18. 见《饶阳修治漳沔河意见书》, 河北省建设厅(1932年12月), 第65~66页。我们感谢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允许复印这篇文章。
 19. 有关20世纪30年代中期饶阳经济和社会的描述, 主要依据题为《河北省饶阳县地方实际情况调查报告》的实地调查, 载《津察调查统计丛刊》(1: 4, 1936年10月), 第112~122页。经济学家赵冈认为, 技术条件已经恶化, 见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89, 203, 207, 214, 215; Prasenjit Duara 在“Power in Rural Society: North China Villages, 1900~1940”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第214~217、329页中讨论了税收激增的问题。

20. 《河北省棉产调查报告》(1936), 第 157~158 页。
21. 《饶阳调查》, 第 115 页。
22. 对华北低地租问题进行很好研究的有, Linda Arrigo, "Landownership Concentration in China: The Buck Survey Revisited," *Modern China* 12: 3 (July 1986), pp. 259~360, esp. pp.270, 287, 298, 321; Joseph Esherick, "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7: 4 (October 1981), pp. 323~336;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and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23. *Les Missiones de China onzieme annee (1933~1934)*, pp. 85~87. Jean-Paul West, Coordinator for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and Donald MacInnis, Maryknoll Coordinator for China Research, 慷慨地提供了有关冀南地区教堂的资料。
24. Sidney Gamble, ed., *Chinese Village Plays from the Ting Hsien Region* (Amsterdam: Philo Press, 1970) 精彩地解释了为什么定县的戏剧包含这么多反抗传统行为方式的内容, 参见 David Arkush, "Love and Marriage in North China Peasant Operas," in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ed.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p.72~87。
25. Thomas Gottschang, "Railways, Foreign Trade and Pre-modern Transportation at North China Port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arch 23, 1985, Philadelphia).
26. Gamble, *Ting Hsien*, pp.230~234.
27. 《第四十个春天》(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3), 第 175 页。
28.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第 4 页。
29. 《饶阳调查》, 第 118 页。
30. 共有 80 亩私有土地出租给 25 户农民, 我们估计大约 50 户租耕 150 亩宗族和庙宇的土地。

31. 参见 Gamble 的《定县》(第 79~80 页)对定县附近雇工的评论员文章。
32. 70 年代中国的粮食定量为 300 斤, 参见 Philip C. C. Huang, "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 *Modern China* 1: 2 (April 1975), p. 134.
33. Thomas Gottschang, "Economic Change, Disasters and Migration: The Historical Cade of Manchuria"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5).
34. Gamble 在《定县》第 398~425 页讨论了 30 年代河北省的群众性宗教活动。也可参见 Arthur H.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pp. 98~105.
35. 甘布尔:《定县》, 第 409 页。
36.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329 页。
37. 甘布尔发现, 在定县, 婚礼费用大约等于一年的家庭收入, 贫困户、中等的和富裕户的开支均不等同, 分别约为 135 银元、300 银元、600 银元。在较穷的五公村, 婚礼很少是铺张浪费的。见《定县》, 第 383 页。
38.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177~178 页。
39.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329 页;《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7 页。
40. Prasenjit Duara, "State Involution: 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 1911~193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 1 (January 1987), pp. 156~157.
41. 关于华北看护庄稼组织的讨论, 可参见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pp. 119~124.
42.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8 页。
43. 同上。
44.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13 页。
45. 同上。
46.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16 页。

第二章 战争的纽带

30年代初，日军就开始侵占华北。当时，饶阳和冀中的其他地区都正与经济衰败和社会政治分裂作斗争。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并建立傀儡的“满洲国”。1935年，日军南下到冀北进行刺探，侦察中国军队的防务。学生起来抗议，要求国民政府停止与共产党交战，动员全国力量抗日。1936年12月，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被绑架，导致了国共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形成。但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把华北并入一个经济区，它包括满洲、朝鲜、台湾和吞并的琉球群岛及北海道的大日本。日军战线拉得很长，占领了主要城市、中心集镇和至关重要的铁路沿线，入侵者最初对饶阳这类边远地区并不重视，把那里的管理权交给不可靠的、政治上非法的汉奸。

爱国的城市学生躲到相对说来没有战火的农村地区，与国民党、共产党和独立党派势力一起组织抵抗。对日军没有直接占领的地区，爱国者予以收复并建立解放区^①。这些县（如饶阳）的人民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共产党为了取得群众的支持，除了进行渐进的经济改革之外，还领导了战时抵抗运动，武装群众。她在像冀中这类地方影响和控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使其在战后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占

据极其有利的地位。

地区性抗日

在战争初期，吕正操带领冀中的军队进行抗日。吕的一生说明了一些先前与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的人是如何走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爱国道路的。他原籍东北，小学毕业后，在军阀张作霖的部队当兵，晋升很快。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时，吕的部队撤到河北，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吕是新编第五十三军的团长。1937年7月，日本再次进攻时，吕的部队从河北首府保定撤退，而保定是日军沿京汉铁路南进的第一站。当时，吕与石家庄的共产党代表进行接触，开始在北京以南320公里的地方进行游击战，在冀中和晋冀边界与其他派系的军队联合抗战。^②

共产党游击队与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建立了联系。1937年9月，一一五师与国民党部队在山西的一次重要战役中联合作战，击败了日军。在这次平型关大捷（国共统一战线的一个高潮）之后，聂率领一一五师的部队进入晋冀交界的五台山，最后，他们在那儿与吕正操及其他人指挥的部队会合。20年代初，聂荣臻在法国勤工俭学，然后又到莫斯科学习。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中共华北局成员彭真是掌握军队的党的最高领导人。1937年11月，晋察冀党委成立，总部设在晋冀边界附近、保定以西的山区阜平。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正式成立，它把国民党、共产党和独立势力团结起来，是一系列统一战线根据地中的第一个边区。边区主席宋劭文不是共产党员，原是河北省国民党的一个县长。在边区政府领导层中，共产党扮演的角色非常活跃。1938年4月，晋察冀第一次党代会在安全的冀中落后地区安

平县举行，该县就在饶阳的西面。同月，在这个地区（包括饶阳在内），抗日部队联合组成冀中军区，是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分区。^③饶阳、安平、深县成为冀中抗日力量的牢固的核心。

1938年，冀中军区下辖38个县，日军控制的北京和天津是它最北端的前哨，东西两面分别以日军占领的、从京津向南延伸的铁路线为界。冀中与山区抗日根据地不同，它在华北平原的中心，不能给游击队提供任何掩护。日军可以占领该地区的任何地方，游击队则通过挖掘地道和沟壕来对付敌人，这些地道和沟壕遍布各个抗日的村庄，有的甚至把许多村庄联接起来。^④

冀中军区的军事长官是原来的军阀和国民党官员吕正操。1938年春，冀中抗日政府成立时，吕当选为主席，同时又是晋察冀根据地的9个政府成员之一。在战争最初的几年中，冀中军区党委书记是黄敬。30年代初，黄是江青的政治启蒙老师、情人和丈夫。江出生于山东，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妻子。^⑤黄是山东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时，他参与了学生政治运动。1932年，他加入了共产党，1935年，他领导了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年中，冀中抗日政府成立后不久，国民党派一位将军到冀中，协调武装抗日，可一年之内，合作就转向破裂。这位将军撤走了大部分国民党行政官员。到1939年年中，共产党在政治上控制了这个地区，个别国民党党员和独立人士继续在冀中的军事、政治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从此以后，有组织的国民党军队和文职官员再也没有回来过。^⑥

全县抗日

贫困的内地饶阳，远离铁路、主要用于商贸的运河以及中心市场，用日本军方的话说，是非治安区。它对抗战的价值就

在于，动员人们参军，为抗日部队提供如棉、粮之类的战略物资，骚扰平原上的日军。群众性抗日的主要基层组织者，很多是农村知识分子（通常与衰败的传统精英有关），他们从1925年开始，活跃在精干的县委组织下，直到1933年遭到猛烈打击为止。^⑦1930年流产的小堤起义领导人焦寿坚，在1935年日军开始入侵冀北之后，帮助重建了县地下党组织。新的党组织由王春海和李绪楚等有经验的党员组成，他们与县教育界和医药界人士有密切的联系，并得到男子师范学校秘密小组的支持。到1936年年中，致力于推动阶级联合和爱国事业的地下党员已有70人。

与1935年一样，党把联络全县学校教师和其他受过教育的精英——如在北关村小学教书的于世禹（音）——的任务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于在其原籍辽宁省的一所教会中学接受教育。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他加入撤到河北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因不满于军队生活，于就与原籍饶阳的老同学取得联系，并在县城郊区的北关村住下，发动该县的爱国学生。在抗战中，于与许多当地精英和教师一样，加入共产党，并晋升为该县的行政官员。^⑧

1936年底，重新充满生机的饶阳党组织迅速壮大。1935年第一轮全民抗日动员之后，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的学生和教师们奔赴边远地区。到1937年底，日本发动全面侵略后仅几个月，共产党在饶阳43个村庄建立了组织，共有592名党员。在一些原国民党官员、新建立的共产党和各种独立团体的支持下，饶阳县抗日政府于1937年冬成立。

饶阳抗日武装由大地主和商人共同领导。1937年年中，他们把部队分散为南、北、县城三个支队，每支队300人。这年秋，吕正操到来后，三支部队被改编成饶阳自卫队，但在改编中发生了争吵。第三支队变成偷盗和抢劫的队伍。1938年

初，冀中军区成立，共产党军事力量增强，八路军枪毙了这支叛变部队的头目，把它重新编入县抗日队伍。

另一个当地土匪头子徐二黑组织了一支反共军队，司令部设在深县。由田桐春（音）指挥的饶阳自卫队对之发动进攻，击溃了它，但徐二黑溜掉了。他的手下假扮成抬棺人，徐躺在棺材里，由此成功地逃脱。不过，1938年，徐的部队又被击溃，这次他没有逃得掉。还有一个土匪头子金老太则加入河北抗日部队，她的丈夫手下有一支100多人的土匪队伍，他被杀后，她便成了土匪头子。日本人侵后，她的队伍被编入了八路军。

在规模很大的晋察冀根据地内，饶阳依次隶属于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⑨。1938年，饶阳的农民们纷纷加入八路军一二〇师第十六、二十三、三十团。在饶阳以北和以南的献县和河间县，组建了回民骑兵部队（回民支队），不久，它的战绩便广为流传。对最贫困的村民来说，参军仍是摆脱家境窘迫的一个途径。

由于日军直到1939年还没有关注饶阳，因而抗日动员一帆风顺。1938年5月，冀中税务局建立。8月，由杨秀峰主持的抗日大学在深县开办，它专门为政治干部举办为期3个月的培训班。9月10日，冀中党委的第一张报纸《导报》出版发行，接着是县报，饶阳也有一份。歌舞团扩大抗日宣传，脸上化了妆、穿着戏服的演员们称，他们的工作是“活生生的报纸宣传”。他们在集市上向观众表演，讥讽汉奸，赞颂抗日。青年、教师、工人、农民、妇女纷纷参加全国性抗日救亡组织，新学校和扫盲班受到普遍的青睞。^⑩

在华北抗日期间，党的宣传员们做得更多的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在他们教给农民们的歌曲中，有赞美苏联的抒情作品，作品不仅赞颂红军战士，而且歌颂集体农庄。这些受过教

育的宣传员还试图铲除他们视之为落后的思想，正是它们使非人道的封建专制邪魔长期存在。他们认为，必须代之以选举与宪法基础上的新权威结构，和从地主与高利贷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新生活。这些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把旧文化看做吃人的东西，看做凶残的奴隶社会的残余。因此，宣传员们主张反对宗教，提倡以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改善生活。在党召集的群众大会上，他们号召农民们，为了推动新民主革命，摧毁迷信，希望他们移风易俗，减少葬礼的开支，最终消灭所有封建迷信。

到1938年初，饶阳成为冀中军区抗日模范县，它很安全，因而在1938年这个短暂时期里，重要的地区性抗日组织，包括冀中党委、战地医院、兵工厂、书店都设在县城附近。10月，共产党员杜清哲（音）被任命为饶阳县县长，这是政治转移的象征。^⑩统一战线受到赞扬，曾被宣布为非法的共产党现在却领导着抗战联盟。旧国民党县政府残余和没有南逃的各种独立派组织，被吸收到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机构中来。

建立乡村抗日

五公与相邻的村庄相比，抗日活动起步很慢。在爱国的邹村，村民们拆毁了古老的城墙。这样，日军就不能把邹村变成武装据点。与清朝时期该县北部的一个重要集市，相邻的杨各庄不同，五公村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没有卷入革命运动，它没有共产党的支部组织，与以县城为中心的爱国运动也没有联系。而杨各庄在1937年底已有几十个青年人参加了抗日部队。

到1938年春末，共产党的组织者靳清廉才来到五公，他是饶阳第四区党委书记，与东村的富裕农民乔万象的大女儿结

婚组成家庭。他住在“乔富裕”（我们这么称呼他）的家中，了解到导致联合会产生的徐敦事件，以及有关最近联合会与前村长李建亭形成对立的饺子暴动。乔富裕自己对这些争端避而远之。

靳在行动中遵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强调阶级联合，一致抗日。这个策略反映了占五公农户70%的自耕农的利益要求。起初，靳不想与联合会发生关系，与其他地方党的组织者一样，他帮助建立了一个动员委员会，它包括村里所有的派系，由南李宗族与联合会，东村、西村和村中央，精英和曾受排斥者的代表人物组成。相反，在饶阳其他村庄，有势力的宗族被排斥在抗日组织之外，以便为原来无权者建立报复性统治打下基础。

日本士兵强奸他们抓住的每个妇女，这是逃离日军占领的石家庄（饶阳西面的铁路枢纽）的怀孕妇女所讲述的故事^②。当地还传说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日本强奸犯，即名叫“大金牙”的军官，驻扎在滹沱河畔的吕汗（音）村。据说，他的部队轮奸青年妇女，并强迫她们卖淫。于是父母们让自己的女儿穿得又脏又破，看上去病恹恹的，又老又丑，试图通过这种办法来保护她们。

村民们准备自卫，抗击入侵者及其暴行，动员委员会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以及妇女、青年、儿童的类似组织，西村的自耕农徐升发被推举为农民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③。他在徐敦事件中，与李化岐派有牵连，不属于徐义洲一派。作为一个与李氏集团有关系的徐氏宗族成员，徐升发也许能粘合已经四分五裂的关系。这样，把村庄重新团结在一起的第一步实现了。

靳清廉成功地接近以李化岐为首的传统精英们，完成了组建党支部的计划。不久，1938年7月5日，靳建立了第二个

党支部，它以联合会为核心，由李文考、西村的徐义洲和东村的耿文铎（音）三名新党员组成。每个党支部都相当于该村的一个权力中心，他们都致力于抗日事业。两个党支部都不了解另一个的情况，但有关李化岐支部的情况泄露到徐义洲那儿后，徐问靳清廉谣传是否属实。靳告诉徐，你不必知道，他说，保守秘密对村庄和抗日都有好处。党员们得到警告说，不要与有血缘关系的人讨论党员或党的工作。五公的两个支部独立而秘密地工作，为安全起见，支部没有举行全体会议，党员仅仅知道他们的新成员，靳清廉也仅仅知道所有党员的姓名。靳设法把地下党员放到爱国组织的重要岗位上，从而确立对这些组织的领导。村民们设想，这是统一战线的抗日政府正在协调抗日动员活动，很少有人知道区党委正通过靳清廉作出任命。

李化岐支部在1938年底就解散了。但与整个冀中地区的情况一样，富裕而有权势的家庭继续在抗战时期扮演重要角色。李建亭的儿子、21岁的李锋入了党，接着调到冀中军区的全国性的救国青年团。1946年，李锋加入了人民解放军。1939年，李建亭的二儿子，13岁的李茂修开始在饶阳第四区做了两年的儿童抗日宣传工作，由于得到县青年工作负责人的赏识，最后李茂修全面负责第四区30个村庄的儿童工作。在他的手下，有负责五公村儿童工作的张端，多年以后，这种关系被粗暴地颠倒过来。

1938年，李建亭的侄儿李凤祥在五公入党，年仅20岁，就被提拔到饶阳，负责指导抗日文化工作。他的兄弟李凤泰也入了党，在军队中往上升。前村长李春龙的儿子李永宽，战争爆发时才12岁，他到山西境内山区中的抗日学校学习，作为一个军官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在整个饶阳，来自有钱有势的家族、受过教育的民族主义青年，最先对爱国统一战线的呼吁

作出反应，许多人在家乡担任领导职务，有些人则被提拔到地区党委和军队系统，其他人则在党务和军队生涯中，被带到遥远的其他地方。

1938年底，五公村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由13人组成，队长是可靠而受人尊重的西村自耕农、共产党员徐满堂。“徐稳重”（我们这样称呼他）才20岁，与他母亲生活在一起，耕种5亩地，同时通过做短工和贩卖蔬菜来增加收入。游击队以富裕家庭捐赠的几把旧手枪为武装，负责保卫村庄，提供情报，一旦日军来犯，就击鼓报警。

1938年，耿书普入了党，他是十几岁的小学毕业生，以打绳为生的东村人，日本入侵砸掉了他的饭碗。他的叔叔是杨各庄的党员。第二年，耿书普被派往一二〇师司令部接受游击战术的训练，既是学员，又兼作戴着草帽、穿着汗衫和短裤的贺龙师长的警卫员。回到饶阳后，书普被编入100人的县辖部队（县大队），武器是步枪、手枪和冲锋枪，穿的是当地土布做的军服。他们的任务是保护村庄，捉特务，除汉奸。

耿书普在一支宣传小分队工作，其任务是帮助农民们克服为部队提供住宿、掩护和照料病员的恐惧心理。他的小分队帮助农户打扫院子、担水，做一些零活。由于队员们一直害怕叛徒告密，因而只接近可信之人和可靠的家庭。他们白天躲在地道和家里，只在晚上出来活动，并每两天或三天就转移到另一个村庄。他们从不开大会，一对一地工作，不进饶阳城，也不与不可信的陌生人接触。1939年10月，冀中建立了一支置于党领导下的秘密警察组织，这体现了与斯大林的苏联的一致性，李志光（音）是社会部和公安局的负责人。^④

从1939到1942年，耿书普担任饶阳北部第三区全国青年团的负责人，该团吸收18~25岁的青年人参加，是军队征兵的主要来源。1940年，书普与西村的李秀蓉（音）结婚，不

久有了两个孩子。由于有他的大哥耿建耕种家里的地，照顾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便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工作，这个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可靠的家庭关系网络内进行的。1939年1月底，一小股日本兵占领了县城后，饶阳的游击队组成破坏的队伍，专门捣毁日军运输线和通信线。村民们也有组织地在公路上挖沟和坑，阻止日军通行。五公村民们作为全县行动的一部分，赶到冀西通往华中东部的石家庄—沧州公路（该村西南方向），把它挖得坑坑洼洼。1938年，一个准军事性妇女自卫队在五公组成。一些饶阳妇女入伍，并被派往别的地方，许素波就是其中一名，后来成为保定党委书记。1939年，五公西村的乔文艺才十几岁，就领导妇女组织进行斗争，成为五公第一名女党员。许多参加组织的妇女为战士们做鞋袜和军服，常常干到深夜，她们还挖地道、掩护部队和抗日的同志，担任通信员。抗日积极分子们动员母亲送孩子参加八路军。在爱国者们看来，每个人都参加抗日组织就能彻底改变一盘散沙的弱点。组织起来，意味着国力的增强。当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完成征兵的定额。

100多名日本兵和伪军驻扎在饶阳县城，司令部设在被强行征用的韩树福（音）家中，他是共产党先驱韩梓穆的叔叔。姓田家的院子（另一户饶阳县城地主）被日军充作监狱。1937~1939年，日军没有理会五公村。1939~1941年，五公村也没受到战时恐怖的破坏。日军控制最严的是商业比较发达的该县北部地区，因此，反抗最强烈的则是五公所在的南部地区。日军第一次开到五公是在1939年春。据那些见过日本兵的人说，他们个子矮，穿着皮鞋，戴着帽子，背上带着钢盔，军官可从他们的马、剑和手枪来识别，日本兵很少冒险地走出县城的围墙，它已被几百人组成的游击队所包围。伪县长是一个名叫窦如宇（音）的外地人，1940年被当地游击队击毙。

1942年5月，由于日军和伪政权的武装鞭长莫及，五公的爱国组织活动便公开化了。这些组织总称为五公抗日联盟，它们由南李宗族首领的侄子李凤祥负责协调^⑤。这个联盟与1938年成立的动员委员会一样，把原先村内冲突的各派团结起来。

40年代初，曾是联合会的首领、现为该村与第四区所辖30个村庄的党组织之间情报联络员的徐义洲，换下了李文考，担任村支部书记。在“徐老兵”（村民们都这么称呼他）的领导下，党秘密地组织了100多个“堡垒户”，掩护经过五公的抗日干部，照顾受伤的八路军战士^⑥。红军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杨成武为了与口音令人费解的战士们交谈，便与来自天津、保定、饶阳的战士一起行军。内地农民因他们穷乡僻壤的口音而感到痛苦和害羞，行军时，他们保持沉默，羞于跟嘲笑他们说话方式的城里人交谈。

日军把村庄分为两类，要保留的和要摧毁的。1939~1941年间，五公村满足日军提出的要求，同时又悄悄地向抗日组织纳税，这样，五公村得以保留下来。由于它很安全，于是一些人从别的村庄逃到五公。邻村高桥与此不同，日军活埋了5人。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折磨中，日军把一根长烟杆塞入一个被活埋者的嘴中，烟杆慢慢地塌下，受害者逐渐透不过气来，最后窒息而死。后来，战士们以同样慢的方式杀掉被俘的卖国贼。大部分村民试图两边都搞好关系，两者择一就会成为另一方的目标。饶阳城内以董大车为首的富裕的董氏家庭，经营该县最好的饭馆，他们两面都讨好。

随着继续占领中国，日军变得更加丧心病狂，残暴成性。他们摧毁了献县的天主教堂。对活着的日本人来说，隐蔽的地雷既然把战友炸成碎片，便不可能不把所有陌生的中国人当作可能的敌人。强迫卖淫、狂妄自大、强征徭役和粮食、强奸、

报复性抢劫激起农民们的义愤，他们越来越痛恨日本人。他们描述有关敌人如何以污辱的方式强迫百姓鞠躬和爬行，如何从碉堡的顶端把中国人摔死，或开枪杀人取乐的故事。日军的侮辱和侵害行为是每日谈论和引起愤怒的主题。

当然，也有例外。1942年，日军指挥下的中国伪军部队猛攻五公村时，瘦小的张宙发现自己与2岁的女儿被困在家中。当伪军砸开前门时，她畏缩在后面的小屋里，一个中国士兵抓住她，用步枪猛击她的后背，日军指挥官喝止了这个士兵，说“不要打她，孩子会害怕的”。上述仁慈的例子被视为残暴统治的例外情况。

村民们始终相信，在日军占领的城镇和周围小村庄中，与日军合作的人是卖国贼，把它转换成农民政治文化，就是这些人没有任何道德责任感。据说，对于饶阳县城周围这些道德败坏的村民，人们的顺口溜是：“邵（村）、西（村），菜（园）、白（池），死了也没人埋。”

税制改革的政治经济

冀中边区的知识分子和衰落的传统精英，在建立为抗战服务的组织机构上与共产党进行合作，鉴于此，共产党战略家们相信，农民们难以维持生计的经济状况如果得到改善，那么他们就会特别能接受爱国宣传。这就意味着要设计出改善经济生活的方案。经济上的强大还能使共产党把十分宝贵的资源掌握在自己领导的抗日力量手中。经济重建须跟政权建设齐头并进，但如果经济改革把比较富裕的人和传统精英排斥在统一战线的范围之外，它就不利于抗战。解决办法是渐进的税制改革。

在五公，这项改革是从1938年开始的，也即村支部成立

之后、日军进入饶阳之前。首先，在整个华北根据地内征收“合理负担税”，指标由冀中军区下达到饶阳。^①税制改革是以第四区政府的名义在五公实施的。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府。按照合理负担税，查田者依据肥力、灌溉条件和估产，把所有土地进行分等，把正常年份中可生产一担（150斤）粗粮的一亩地规定为一标准亩，每标准亩定为一个“富力（unit of wealth）”。首先，每人除去1.5个富力免征点，无论土地多少，5口之家可享受1125斤免税粮，因而最穷的人不用交税。比率统一的农业税在免征点以上征收。

五公村的收税员是东村的富裕农民耿连民，他负责村里的财政事务，是村长李子厚的最高助手，开朗的耿因账目无懈可击而赢得赞誉。他注意到共产党组织者们谴责国民党可恨的税收，并告诉被迫参加会议的村民们，共产党要减少税收。在整个40年代，当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解释他们的税制改革时，很少感谢外地人帮助的乡村百姓讥笑道：“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

党的地方政权——饶阳人民政府在五公征收了10万斤粮食。村长李子厚核算了免税部分，然后向每家分派交税义务。村长估算五公村4470亩地，通常可生产804600斤（每亩180斤）粮食，先扣除个人免税的312750斤，余下的491580斤粮食应上交20%略多一点，即10万斤税粮，如果产量较高，则实际比例就降低，反之则高。每年上交10万斤税粮仅为总产量的12%多一点。

这一年征收土地税的总量与以前国民党强加的征税水平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税收欺诈没有了，以个人免征点来分配税收负担，对较穷的农户有利。佃家租耕土地生产的粮食包含在佃家自己的总产量中，他们大部分是免税的。地主雇人耕种生产的粮食则有交税的义务。合理负担税制取代了根据土地面积、

忽视产量来分派交税义务的体制，那种体制对拥有便于灌溉的高产地的富裕地主有利。非农业收入不用纳税。

合理负担税制改革使每个农民免交基数为 225 斤粮食，约有 40% 的五公农户免税。实际上，所有有地的佃农和 20% 的自耕农都在其中。大部分自耕农家庭上交给人民政府的税粮，与上交短命的国民党政权的数量相同或略少一些。税制改革对穷人有利，又不侵犯广大中间阶层自耕农的利益。事实上，在新的名义下上交与原来数目相同的税收的那些自耕农，比较欢迎公平管理、压制富人的体制。

25 户较为富裕的自耕农，特别是雇用长工或租出相当数量土地的 5 户，承受了改革的重负，他们与最穷的农户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但自耕农经济的基本结构则完整无缺。比较富裕的人仍可出租一定数量的土地，雇佣帮工。地主每年每亩从佃户手中收取 3 银元地租。

1939 年的降水非常及时，使得 1940 年的收成创下历史记录。但同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大约 2 万人的生命，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力仍主宰着人们的生与死。

在 1941 年年中，即第一次税改之后第三年，抗日政府开始第二次税改，实行“统一累进税”。合理负担税制是在个人免税基础上，以统一的比率对所有收入进行征税，不管拥有土地的数量或家庭的财产。统一累进税则对高收入者按较高的比率征税，有一担应税粮的农户的征收比率为 10%，有两担的则为 12%，三担的为 13%，依此类推，最高为 40%^⑧。按照这一较高的累进税，一个富裕农户每人生产 4500 斤应税粮，就得上交 1800 斤，占 40%，与合理负担税制下上交 900 斤相比提高了。累进税减轻了一些自耕农的负担，进一步把税收转移到少数人均生产 1500 斤以上的应税粮的家庭。贫富差距正在缩小。

1941年夏，在冀中九县（包括饶阳）对27个村庄的战时调查表明，36%的雇工获得足够的土地而成为被共产党划入贫农的自耕农，另外20%已达到党称之为中农阶层的地步，还有1.8%已成为富农。在原来的贫农中，28%已上升为中农，0.4%转变为富农。这种土地平均化税制改革的另一面是，富农中有34.9%下降为中农，8.1%变为贫农。五公村拥有土地最多的5户农民面临着实物税猛增的局面。设想一下：在总数465亩土地中，他们自己耕种的395亩良田，每亩产量200斤，在免交了11700斤之后，按40%的最高税率上交67300斤，这个数字是合理负担税制的最高税率的两倍。

税制变革在整个根据地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穷人得益最多。像李端府这样的富农迫于增税，卖掉了部分土地^①。在这个时机买土地的那些人，是手头有一些现金的比较富裕的自耕农，可他们中很少有人仓促去买低于市价的土地，因为害怕进入交纳较高实物税的阶层，成为在赐惠于穷人的党看来是腐朽的政治阶层。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们买下了大部分小块耕地。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内部的经济平等。1940年12月24日，毛泽东宣布，在根据地大约只有20%的农户是免税的^②。在1941年中，五公40%的农户全部免税，这说明五公和饶阳相对贫困^③。

较为富裕的农户寻找税制改革的漏洞。李建亭试图以谎报产量和土地数量来逃税，李春龙把土地暂时“转让”给宗族中最穷的人。由于穷人交低税或免税，转让土地的纳税率很低，穷人成为逃税诈骗的同伙。事实上，李让亲戚耕种他的地，不用交税，而土地仍是他的。当这种措置被察觉，他被强迫正式转让土地。李春龙拒绝这么做，并纳了税。传统乡村精英的庇护人不再拥有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力。

其他人在逃避新税收的谋划中典当了他们的土地，那些耕

种典当土地的人有纳税的义务，新生的党—国家要求所有典当土地的人必须保持 10 年以上的期限^②。因而在一些贫困村民的记忆中，这是富人试图“放弃”他们土地的时期。与政治权力一样经济权力也正在从很少的传统精英手中流失。至 30 年代，由召集权（gleaning rights）的丧失，传统服务的取消和家庭离散所造成的长期衰落趋势已经逆转。税制改革在保持抗日阵线内部团结的同时，又使广大的人数正在增多的大部分自耕农和很穷的人从中受益。

静悄悄的革命

1940 年，毛泽东号召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减租最大限度规定为 25%^③。在五公村，这意味着地租将从每亩 3 银元降为 2.25 银元。但在冀中地区，立即实行“双减”的很少。1941 年 11 月初，来自饶阳第四区政府的工作队进驻五公，外地人黄宝芝和田乱子在此推行双减 4 个月^④。可是在五公村，租贷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1936 年仅有 80 亩私地（占总数的 3%）租佃给 25 户耕种，到 1940 年初，租佃土地的数量下降，包括减少不平等和消灭租贷在内的减租目标，已通过税制改革悄悄地实现了。上级的减租政策没有得到贯彻，黄宝芝和田乱子把五公村 33 个长工的工资，稍稍提高到每年 50 银元的普遍水平之上，短工的工资则没有变动。长工们的大量收入集中在象征着人一生中重要时刻的那些场合。在三个主要节日，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雇主们不得不给每个雇工 3 块银元的“赏金”，而过去工人们每个节日仅得到 1 块银元。此外，雇主现在还必须在每年年终时，送给每个工人三丈土布的礼物。

由于村土很多人参军，于是黄和田鼓励村民们组成副业合

作小组，拿出他们的资金进行合伙，但只有稳健的、领导五公游击队的自耕农徐满堂作出响应。1941年底，随着寒冷的农闲季节的到来，徐说服几户西村的邻居合伙榨棉籽，制作花生油和豆腐。

税制改革政策在没有引起新的破裂的情况下，修复了乡村中很多似乎遭到破坏的裂痕。革命也是一种重建。统一战线把相互敌视、有时桀骜不驯的宗族和社会团体凝聚在一起，进行抗日。1938~1940年党的改革政策使经济复苏，愈合了社会裂痕，使党成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力量。到1942年3月初，黄宝芝和田乱子离开的时候，饶阳遭到了日军的进攻。

战 争

1942年春，日军派了一支5万人的部队进攻冀中地区，这是进攻整个华北根据地的一部分，日军包围、封锁和掠夺了这个地区。共产党军事领导人称，冀中抗日根据地是直插日军软肋部的匕首，而日军需要中国的粮食支持他们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太平洋战争。八路军也需要粮食。当干旱和可怕的霍乱遍及华北时，斗争变得异常残酷和激烈。由于日军抢走了粮食，一些农民只得剥树皮，吃树叶，以此挨过饥荒，留下一条活命。^⑤

在5月的第一周，在汉奸部队的支援下，日本侵略者用搜索和破坏的战术，“扫荡”了饶阳境内所有被认为有八路军隐蔽的地方。冀中地区的许多领导对这次“扫荡”没有任何准备，分区政府的司令部隐蔽在邹村。^⑥日本的特务得到这个情报，日军捕获了重要领导人。五公百姓匆忙地把粮食装起来，埋在田野里，盖上泥土，看上去像坟堆，但这种方法愚弄不了日本兵。

为了防范日军的包围，党的领导人寻找像五公这样远离县城的可靠村庄作为安全的隐蔽点。隐匿在该村地道中的那些人中，有第八军分区书记金城，他藏在忠贞不渝的党员、东村的耿书普家中，罗义传（音）则隐蔽在村文化团负责人、24岁的李万义家中。金后来成为中国的水利部部长，罗则任农业部部长。

6月，大量地方干部离开冀中^⑦，在抗战后期，党的地方干部在很多关键时候，都把五公用作临时基地。1942年底，一位在冀中军区负责动员工作、化名为韩启民的女同志来到五公。她匿藏在乔勇家中，乔实际上是共产党乔恒泰的养弟。大家称她为大韩，后来提升为河北卫生厅厅长。另一个路过五公、化名小韩的官员，是党的早期活动家、走私盐的张曙光，他后来调到胡耀邦领导的青年团，进而成为河北省长。老朋友们最后成为好朋友，并握有实权。

党没有能力阻止日军掠夺和屠杀。1942年夏，日军与经过五公村西的小股八路军打了一次小规模战斗，此后，他们决定拿这个村子开刀，在数小时之内，烧毁了110间房屋，抓了20个男青年，杀掉了几个人，抢走了牲口、粮食和家具什物^⑧。邻村也遭到严重损失。

一天凌晨，30多个日本兵突然袭击了五公以北1.6公里、有300户农民的杨各庄，村民们被赶到打谷场，日本兵命令他们交出为八路军准备的衣服和武器。没有人回答。日军把5个人（其中3个为全村最年长者）关在猪圈里，以死来威胁，并逼着年轻妇女脱衣服，赤身裸体，还不允许任何人吃饭。正午过去了，仍没有回答，猪圈中的5个人被捆起来，点火烧死了。下午，日军把所有人都关进房屋进行威胁。村中有3个叛徒，但不敢公开说出来，他们的害怕是有原因的。1943年，八路军还是枪决了这3个汉奸。

在日军春季攻势期间，550位饶阳爱国者被杀害。此外，在饶阳最大的一次战役中，由冀中抗日政府领导人吕正操指挥的近500人的部队在滹沱河北遭到突然袭击，全部牺牲。村民们以极大的代价为抗日部队提供给养。五公党支部已从1939年的43名党员扩大到1942年底的63人，其中有13名妇女。村里还送了70名男青年参加八路军^②，李万义是其中之一。

李从山西根据地回到五公，在那儿他被培养成宣传专家。党教导他并要求他去告诉人们，胜利和正义是他们的。这一斗争是在他们的老大哥苏联领导下全球行动的一部分，苏联宁为玉碎，也不会向纳粹投降。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要走一条已由斯大林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

虽然有这些保证，但1942年日军进攻不仅使中国人蒙受了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在许多地方暂时破坏了抗日的后方。日军调动了飞机、坦克、大炮、机动部队和骑自行车的部队。据中国军事史学家记载，在饶阳西北面的定县，有1000人被日军用毒气杀死^③。日军“扫荡”后，由50个县的部分地区组成、将近1000万人的冀中根据地减小了1/3，到战斗结束时，伤亡共5万人^④。

在饶阳和其他华北抗日根据地，不屈不挠的传统农民支持并帮助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不断壮大。青年男子睡在玉米地里，避免被抓。游击队晚上出击。老民兵徐义洲指挥五公党员躲在玉米秸秆堆下的临时隐蔽处，有时几个月不回家睡觉。

这些北方农民认为，与中国其他缺乏传统的区域相比，他们对正义更为关心。他们是中国爱国事业的核心力量，这种评价似乎很合适。不过，积极的参与也有其可笑的一面，村民们后来讲述了有关孩子们的有趣故事，他们的任务是揭发可疑的陌生人，鉴别外地的党员是否是汉奸。在眼界狭隘的农民看来，外地人实在是逐渐可疑起来。在饶阳，有一个外国人，他

的真实故事传遍各地，他就是在尹村做外科医生的白人、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他死后，被毛泽东颂扬为革命烈士。

面临两条道路

在日军到达五公不久以前，抗日联盟领导下的组织处于地下状态。当日本兵进入五公时，他们遇上了表面上顺从的自耕农李子厚。他是在1941年五公第一次正式选举中当选为村长的。李和联络组织“和平维持会”中其他村庄的代表，负责这些村庄与日军之间的联络。这个委员会由10人组成，其中5人是中共党员，李子厚和张云山就是其中的两个。张已作了数十年的村长，表面上是村里保守势力的台柱子。该会大多数成员是自耕农。党员们知道这个假合作组织的真正作用，但大部分村民，包括该会中的非党员都很少了解这个组织中共产党员的作用。该会满足了日本人对情报和劳力的需求，同时也把日本人的计划和活动情报转送给游击队。

和平维持会也征收日本人强加的税款，他们从每200斤粮中征收75斤额外税款^②。不过，日军征收的税款是不定期的，当他们需要供给时，就命令维持会征收。维持会尽可能欺骗，使日军始终对村里粮食产量的估计很低，同时又不得不按要求征收和上交税款。^③

对日本人的服从使生命和财产得以保住^④。1944年初日军撤走之后，该委员会成员中，没有人被指控投敌，村长李子厚一直干到1951年。而在附近的耿口村，在战后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在伪政权中工作的4个人被揪出来，以叛国罪被立即处决。相邻的宋桥村一名汉奸的命运与此相同。在冀中其他地方，如保定和安国，日本人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比饶阳大得多，当地精英经常在和平维持会和伪军部队中，与入侵者进行

合作^⑤，贫穷的村民还加入伪军部队。由日军在安国县训练的中国军队被派驻饶阳。尽管一些当地人嘲笑安国县的伪军，但就是这支伪军杀害了名叫翟经五（他是曾经很有势力的翟姓地主的儿子）的饶阳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

采用日本人组织的机构（如维持会）来欺骗入侵者的谋略，是对五公恢复团结的考验。与村庄、党员和抗日组织结合在一起的衰落精英，处于向日本人泄露计划的位置上，但全村一致抗日，团结一心，就连李化岐和李建亭这些因他们的土地和权势而使一些人讨厌、害怕和妒忌的旧精英成员，也从未投靠日本人。李化岐的弟弟李化有被日军杀害。在五公，仅有一人从八路军开小差回来后，当了卖国贼，当地爱国者发现他带领日军抢劫“扫荡”后，将他抓获枪决。另外两个五公村民李云田和李埏（音）也加入通敌的部队，但他们是按徐义洲的指令潜入敌人内部的。他们提供情报，并帮助保护被捕的当地群众。

1942年5月之后，村民们被抓去为驻扎在饶阳的1500名日伪军挖堑壕，修岗楼。仍由于太穷而结不起婚的雇工张占，被拉到河边挖壕沟，40天没回家。五公人帮他们构筑了40多座3层高的砖结构岗楼，每个岗楼可容纳50个士兵。

五公周围三公里之内，有6个日军的碉堡，分别在西北的北韩村，北面的杨各庄，东北的屯里，东南的沃堤，南面的西沿湾和西南的集市小堤村。这些据点也是日军在游击区里的观察哨所和发动突然袭击的大本营。

由于有这么多年轻汉子为日本人做工和跟着八路军抗日，致使许多村庄劳力严重短缺。上级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动员农民们在平等的基础上互换劳力。党的领导人还希望通过合作，向村民们说明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在道义和经济上优越于农户单干。

饶阳农民们怀着对日军的仇恨，保护抗日同志。例如，1942年，经过太行山区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抗日大学学习的两个河北年轻女党员，在五公隐蔽了10天之久。当地群众担心，如果日本人来，他们就会像每个村民一样，发现这两个年轻妇女是外地人。来自邻县深县的一位可以通过，但如果来自定县的女同志一开口，她的口音就会暴露自己。对于因自己边远地区的口音而感到羞愧的农民们来说，那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言谈举止体现出文化状况。解决办法是称深县的女同志为女儿，她的同伴为媳妇。

抗日武装袭击了日军在该县的每一个据点和伪军部队。因该县在为部队提供粮食方面的成绩突出，冀中抗日领导人把饶阳树为模范县。在1942年华北平原遭受饥荒的情况下，提供这么多粮食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信仰。

有好几次日军把所有五公人集中在南李宗族祠堂的院子里，强迫他们辨认抗日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刺刀闪亮，质问者咆哮，村民们受到欺辱和毒打，房屋被烧。日军对不参加这种集会的人见到就杀。一支日军巡逻队在村西的坟地里发现了躲藏的村民，于是开枪打死3人，伤10人^⑤。日军还定期地要求维持会派妇女供他们淫乐。

1944年，当八路军将领们回冀中时，他们对那些坚强的传统农民们深怀感激之情。一些农民宁愿被打死，也保持沉默，不愿说出游击队隐蔽的地方。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游击队隐伏在地道中，一位妇女捂住自己正在啼哭的婴儿的嘴，使之窒息而死。部队领导杨成武总结说，只有长征才比冀中农民的牺牲大。

当爱国农民们的斗争重新塑造信仰和形象的时候，抗日英雄的传说可以变成神话。抗日战士们自豪地复述着枪毙臭名昭著的强奸犯“大金牙”的故事。尽管表现对新政权忠诚的传说

逐渐取得人们的共识，但事实上，许多人在战争期间仍表现出狭隘、愚昧、背信弃义和自私。有关安国县的伪军部队、送妇女给日军的村子、不给八路军征兵的领导人、杨各庄及其他地方的汉奸、那些笨拙地试图隐藏粮食的人和取得成功的亲日特务等种种事实，都没有在英雄神话中得到反映。

参战者和幸存者都骄傲地叙述他们家和村庄的英雄和烈士们舍生忘死的故事。据说在1940年，上级派五公游击队队员李健去制造地雷。抗日组织鼓励村民们制作地雷炸药的配料硝，它长期用于制作爆竹，是制盐过程中的副产品，即烧沸的大锅顶上的黄色粉末。尽管日军企图阻止硝的生产，但要完全禁止它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能成为英雄。

1943年春，李健在日军“扫荡”中被捕，他跳进一口井里自杀，但被拖了上来，受到严刑拷打和审问。村民们都学会讲述关于李健殉难时的戏剧性场面，“游击队在哪儿？”“谁是共产党员？”沉默。日本兵把李绑在树上，周围放上木柴，他们点着了火把，又问，并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李仍然不说。火把点着了木柴，当村民们把火扑灭时，李已牺牲了。

也许李健的生死确实如村民们所述，但我们怀疑如此夸张叙述的真实性。讲述这类抗日故事、爱国主义和纯粹的英雄主义似乎没完没了。据说，当日本鬼子要烧死五公村党员李二瓢、而火苗已吞没他时，他勇敢地高呼，“决不向日本投降！”

据说，另一个五公游击队战士耿铁相在饶阳第四区率领了一支40人的突击小分队。人们夸耀说，它最大的战绩是活捉了小堤外围碉堡中伪军部队的小队长。这类神话还有很多，它们使新生的国家获得了生命力和希望。

党员乔恒泰是五公工人抗日联盟（即抗联）的主任，他家是冀中军区领导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1944年初的一天晚上，乔设法拖住直扑他家的小队敌军，掩护开会的同志转移。他受

了伤，不久就牺牲了。与地雷手李健一样，乔因在敌人的多次酷刑面前，坚决不说出秘密而得到很高的评价。为抗日事业献出生命的村民就是英雄。

这些抗日历史的理想化重构，与牺牲和苦难的严酷事实相联，给予幸存者 and 他们的后人以新的意义。表面上与日军合作，实际上在执行党的任务的秘密特工，必须被从愤怒的人们手中抢出来。在五公，所有献身于抗日事业的人虽然出身卑微，却获得一片赞誉。一些人在辉煌的战绩上开始了政治和军事生涯。党保证向军属和那些抗战中牺牲者的烈属提供帮助。1943年的双拥运动号召村民们给予军烈属特惠待遇，反过来军队则保证爱护人民^⑧。五公有15户失去一位或几位亲人的烈属，大部分有烈属的饶阳村庄，采用为其义务种地和提供救济粮的形式进行帮助。五公的干部称，他们要把烈属家庭的生活提高到平均水平。那些活跃于党和抗日组织中的人发现，他们自己已成为有着共同经历、组织和信任的权力网络的一部分。他们在战时为了新国家的利益拿生命去冒险，这为他们进入新生的政权结构提供了便利和正当性。

在抗战中起领头作用的五公人，有63人在战时入党，70人加入八路军，20人加入地方游击队，大约有30个非党的群众活跃于抗联下属的各种组织，或在和平维持会工作，加起来约有150个五公人献身于抗日事业。对于近300户的村庄来说，这个前半世纪期间没有受到席卷全中国的主要革命浪潮影响的地区，战时动员十分成功。在村里和县里，新的领导人在情感上和组织上是相互一致的。许多人入了党，他们往往联姻、组成家庭。饶阳成为八路军的避难所和老家。

党通过愈合乡村的裂痕，促进对立阶级的团结，领导武装抗日，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尤其是税制改革，在广大边区（如冀中），建立了群众广泛支持的根据地。它正在产生一种组

织结构，一种实际上由党凌驾于经济和政治之上的军队和政权机构。在战争期间，党赢得了许多朋友，并越来越有能力把她的意志强加于人。

所有阶层都献身于抗日事业。自耕农、有地的佃农和那些农闲季节的雇工们被认为是爱国阶层、队伍和领导者中的代表，但来自与衰落的传统精英相关的、家庭比较富裕的干部数目却是惊人的，他们比大多数人更有文化，较早地接受了民族主义观念，很快就被第四区和县人民政府所吸收，又很容易升迁到领导岗位。他们忠心耿耿地为抗日服务，其中很多人和他们的孩子都入了党，参了军。在五公和整个饶阳县，人们的关系重新组合，出现了团结一心的局面。乡村孕育了一个新国家和富有生气的民族主义。

注 释

1. Linda Grove, "Economic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Central Hebei", conference paper, Tianjin, 1984, pp. 22~46.
2. 这段和后面段落中有关聂荣臻、吕正操、彭真、黄敬和宋劭文的简介，取材于 Donald Klein and Anne Clarke, eds.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 ~ 196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吕正操:《冀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4。
3.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卷，第 380~381 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
4. 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45), p. 142.
5. Ross Terrill, *The White - Boned Demon: A Biography of Jiang Qing*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4).
6.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部编《冀中抗日战争简史》，第 1 页

- 和第 24~28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感谢 Linda Grove 允许我们使用该书的复印本。
7. 该县早期抗日活动的材料，是根据饶阳县革命历史史料编写组编的《千古英烈》(1984)，第 2~9、28~42、47~51 页，以及当地的访问来写的。
 8. 《千古英烈》，第 29 页。
 9. 河北省地名办公室编《河北政区沿革史》(1985)，第 326 页。
 10. 魏宏运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第 71 页上有关报纸的材料，以及第 254、260 页上有关教育的统计。
 11. 《千古英烈》，第 29 页。
 12. 有关 1937 年一个 13 岁的河北女孩被 8 个日本兵强奸的资料，可参见 Lloyd Eastman, "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in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d. Akira Iriy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96。
 13. 在群众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有张端(儿童团)、乔文芝(妇女抗日爱国联盟)、李万义(文化团)和乔恒泰(工人抗日爱国联盟)。见《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16 页。
 14. 《中共党史资料》第 27 册(1988)，第 195 页。
 15. 《花开第一枝》(1963)，第 40 页。
 16.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21 页。
 17. Grove, "*Economic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pp. 22~46。关于冀中战时经济改革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南开史学：华北抗日根据地史专集》，第 189~241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18.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19 页。
 19. 同上。
 2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441~449 页，外文出版社，北京，1967。
 21. 在比饶阳县更糟的落后的山区农村，以及冀南部分地区，70% 的农户是免税的。见 Isabel and David Crook,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9), pp. 46~47。

22.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19 页。
23. Carl Dorris,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Yen-an Communism", *China Quarterly*, No. 68 (December 1976), pp.704~709.
24. 《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卷，第 38~82 页；Dorris,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yen-an Communism", p.697。
25. 《聂荣臻回忆录》第三卷，第 541 页。
26. 吕正操：《冀中》，第 203 页；《花开第一枝》(1973)，第 82 页。
27. 魏宏运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 317 页。
28. 《花开第一枝》(1963)，第 12 页。
29.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21 页。
30. 《冀中抗日战争简史》，第 89 页。
31. 《冀中抗日战争简史》，第 84 页；《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卷，第 530、534 页。
32. 委员会成员有共产党员李振海、乔墨林、李富祥，以及李殿峰、耿路常、李大开、李三柱、徐秀峰和杨来义。他们都是中等收入阶层的自耕农，除了李富祥、李三柱和徐秀峰相对贫困之外。
33.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19 页。
34. 相反，山西省两极分化的张庄村是日军的重要据点，战前没有共产党组织，这个四分五裂的村庄经历了一场强制性的土地改革。
35. Linda Grove, "Economic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p. 23.
36.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23 页。
37. 余秋里：《一个新创造》，收入美国对外广播资料中心编《每日报道》1983 年 3 月 23 日，K13。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张力

1943年，旱灾加上日军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有数百万人饿死^①。由于日本要在太平洋应付美国的进攻，使冀中所受的压力大为减轻。但可怕的华北旱灾的势头并没有减缓。五公东村的一位农村知识分子耿秀峰组建一个合作社进行抗旱，赈灾济民，建立社会主义。由于为抗日而战的乡村男儿们使边区成为新生政权的政治中心，这个合作社引起了共产党领导人对五公的注意。不过，只是当党的权威人物指导这些社会主义的初级形式向苏联合作社靠拢时，他们才强化了中国村民与社会主义合作的联系。

与1936年的4470亩相比，五公的可耕地到1943年已下降至3892亩，人口则从1390人降至1347人。但税制改革减少了5户最富裕家庭所拥有的土地，使之从465亩降为279亩，从而增加了生存的可能性。这场席卷华北的静悄悄的革命，把无数农民从1943~1944年大旱灾的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943年，五公村几乎颗粒无收。在从1942年5月日军发动进攻到1944年春旱灾结束期间，五公村320户中有101户为了活命而卖地和卖农具。此外，29户卖孩子，25户外出乞讨，21户逃离五公。90头耕畜中有2/3被卖掉，15人饿死。^②其他地方情况更糟，就在五公村北面，死神大步掠过杨各庄的

沙土和碱地。没有水，地是白色的，坚如岩石，杨各庄的大多数人逃荒走了，27户卖儿卖女，饿死30多人。

幸存者发现，难以用道义上适当的方式来表明生活的重大变故。全村闻名的“铁人”李多林，在这可怕的两年开始时才37岁，他爱枪，而且作为稳健的徐满堂的游击队队员，他总是带着自己的枪。晚上，他出来对鬼子搞破坏性的袭击，白天就隐蔽起来，到集市上打绳子。多林穷得可怜，娶不起媳妇。一天，他的朋友发现一个经过五公村的要饭妇女，李让他的朋友替他说合，这个妇女同意了，他们俩没有什么婚礼仪式，就生活在一起了。他们的财产包括他的枪，她要饭的碗，一根打狗棒，几片破烂被子和衣服。婚后第二天及至1944年春，她每天出去要饭，他则每天出去杀鬼子。^③

谋 士

日军占领河北之前，五公1/3的农户就开始与亲戚和邻居进行劳动互助了。国民党官员在接管饶阳县的短时期内，建立了50个信贷合作社、3个消费合作社、5个信贷服务与商品运销综合合作社。依附于宗族土地的饥饿难忍的农民，没有阻挠大众化的、经济上合理的合作社的推进。乡村知识分子耿秀峰认为，社会主义合作社能救人命和改善生活。

1913年，耿出生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庭，7岁进入村里规模不大的旧式小学，两年后退学。10岁那年，他的有爱国热情的大哥满亮（音）从饶阳男子师范学校毕业，旋即回到五公，在1920年初才开办的新式小学里教书，秀峰又上学了。他在学校上了5年，接受了民族主义教育，了解到外国列强如何千方百计地分裂和控制中国。1926年，欢呼北伐胜利的标语使他接触到“共产主义”一词，共产党正和国民党联合

起来，打败邪恶的乌龟和螃蟹，也即正摧毁中国的军阀和帝国主义。

秀峰出生时，家中有30亩地，而当他从学校毕业时，家里已有50亩地了，为5口之家平均水平的3倍。父母、哥哥、嫂子和他组成了5口之家，家中有一头驴，种植花生、高粱和冬小麦。在农忙季节，他们雇一个临时工。1928年，耿15岁时，在县高级中学的人学考试中名列第四，但却没有去上，因其父母认为，每月5块大洋的学费太昂贵了。1930年，他17岁时，父母为他操办了婚事。

耿认识到爱国知识分子的作用，接受了教育救国的理论，最后他相信，如果农民种好地，中国就会强大，因此他对农业产生了兴趣，遂养成了在王玉章的百货店和村北的茶坊以及村南李宽玉的中药铺里消磨时光的习惯。李是抗战时期任村长的李子厚的父亲。

听了过路者们的谈话，秀峰对中国的前途感到十分担忧。他们说，由日本商人走私到天津的毒品正在毁灭中国。有些县里的官员和五公村民成了吸毒者和贩毒者。小股强盗有时也光顾五公，土匪们还偶尔绑架一个村民，索要赎金。如果请求地方保安部队出面帮忙，费用可能达20至30银元。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时，24岁的耿立即加入了爱国的抗日组织，他被安排到村小学工作，不久成为教育文化界抗日同盟会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引起了县教育局长余时雨（音）的注意。1941年，余先派耿到西沿湾教书，它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成为试验模范村。后来耿又到北官庄教书。

1942年初，他回到五公，与县抗日组织的其他成员一样，执行两种使命。饶阳伪县政府的教育部门要求五公和平维持会选派一名教师，到它直属的村小学工作。他们选择了秘密执行抗日教育任务的耿。不久，高大、自信、表达能力强的秀峰成

为由5所小学组成的秘密中心校的负责人。

从1942年秋起，并且在1943年这可怕的旱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耿在李凤祥领导下的抗日政府中从事刻印工作。李是五公地下党支部中最富裕的党员。他们重印由第四分区地下组织编辑的报纸《胜利报》。秀峰的地下工作使他与重要的党员干部保持联系。尽管他不是党员，但他却是有着外界联系的村民。

土地合伙组

耿思索着对付饥荒的办法。战前，他在王玉章的小店中听说过土地合伙和集体化农业。自耕农李亨通评论道，俄国在革命之后变成了一个公社制的天堂。合作理论作为一种组织生产的原则使耿激动万分，可其他五公人认为这是一个妄想。1940年，耿读了一份由冀中军区地下政府出版的小册子，书名是《苏维埃集体经济》。仲夏，当村民们集中起来选举一名饶阳第四区地下政府的代表时，耿告诉他们有关苏联集体农业用机器耕种土地获得丰收的情况，村民们听了非常惊讶。1943年夏，当旱灾发生时，耿在外地工作，他想到通过合伙种地以求生存的策略。他与上级李凤祥讨论这个问题。李疑惑地问道，同姓的农户还在不断分地，不同姓的农户怎么能合伙种地呢？

是年秋，上级调耿到饶阳县城，执行刻写和印刷的任务。他的上级贺峰是一名小学教师，与秀峰的哥哥同校毕业，也是饶阳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他是地下县政府的县长。秀峰回想起古代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救国救民的故事，于是离开县城，回到五公。他开始与可靠的朋友一起，研究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一天，耿在挖甘薯时，遇到了三个缺少劳力的东村邻居乔万象、李玉田和卢墨林，他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接受合伙的办

法。^④

乔万象 30 岁，原是个拥有土地的富裕农民，1943 年的旱灾使他陷入困境。乔富裕仍有 18 亩地和两头耕畜，但有 4 个孩子和妻子要抚养。1942 年，他父亲去世，下葬后，乔背上了 100 元的债，他开始变卖家具。在他的姐夫靳清廉的说服下，富裕的乔成为五公地下党支部的第一批党员。他受过几年初级教育，并从他父亲那儿学会了打绳买卖。就算懒散不是决定性因素，乔也不能种好他的地。^⑤

李玉田 35 岁，脾气暴躁，当他火冒三丈时，有时会拔出匕首威胁别人。村民们对付他狂怒的办法，就是说“你行行好，从我的喉咙中刺进去，我不想活下去了”。那时，他就会平静下来。1942 年，经过税制改革，他有 11 亩地，一头有 1/3 股权的牛。他的大家庭由三个 10 多岁的毛头小子、8 岁的女儿、一个女婴、他的妻子和生病的父亲组成。他的父亲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买地。这个吝啬的老人与许多农民一样，在小麦收上来后，不许家里的任何人吃细粮，而用小麦换回便宜的高粱，省下其中的差额。即使为旱灾所迫，李也不愿卖他的地，他把所有的钱拿出来挖井找水，可一无所获。他破产了，1943 年夏，他将 10 岁的小混丢卖到窝堤集市，换回了 30 斤高粱。^⑥

矮个儿、皮肤黝黑的卢墨林 58 岁，人称“黑子”，他因易怒和爱抬杠而著称，和儿媳妇桂芳就常常争吵不休。他的妻子在到别人地里拾麦穗的路上摔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参加了八路军。与乔万象一样，他懂得如何打绳。卢有一只胳膊受伤致残。在他的玉米减产后，他哀叹道，不知道明年谁又会饿死。^⑦

在倾听他的哀叹诉苦之后，耿秀峰提出了度荒活命的办法。为什么不把土地、资金、农具和耕畜合在一起，共同耕

种，一起搞打绳这个副业呢？三人同意考虑这个设想。乔万象觉得他的邻居和朋友李砚田也会感兴趣。曾拥有良田的李整日沉溺于赌博，他在南李宗祠的赌窝里消磨时光，喝酒和发酒疯，伤害了他的亲戚和他的妻子。最后旱灾也使他破了产，不得不卖了最好的地，处在卖房子付赌债的边缘。在剩下的地里，杂草比庄稼还要高。李是倔强而孤僻的，但他仔细地听了乔万象的解说。^⑧最后，四人一致认为，合作很有意义，但他们惟独对耿秀峰提出的把土地合伙耕种的建议表示怀疑。以前谁尝试过这类事情？而交换劳力是很平常的事。他们仅仅同意在冬季建立一个打绳组，这样风险较小。但在最后关头，有着全部设想的耿秀峰不干了，原因是他的父亲坚决不允许他用家里的驴和其他东西去干冒险的事。年长的男子掌管银钱出入，秀峰没有办法。不过，其他四家却走到一起打绳了。

不久，地下县政府的县长贺峰来到五公，耿秀峰告诉老上级，他在五公的工作比刻写更重要。贺峰答道，他听说苏联的集体化进行得并不顺利，还造成了饥荒，他希望中国能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当时，饶阳抗日政府对旱灾的反应，概括起来着重体现在“组织起来，生产度荒”^⑨的口号中。贺峰同意耿不于刻写的工作，专门组织合作社。如果耿有困难，贺峰会给予帮助。他提醒耿要仔细向农民解释这个设想，与村干部紧密合作，一切要以个人所有制和自愿参加为基础，那样才能形成社会主义的萌芽。他强调，最重要的是私有制和自愿参加。

4户组成的打绳组没有留下半点记录材料。由于男性村民70%基本上是文盲，很少有人懂记账。合作组组员们试图说服他们的朋友耿文琛（音）加入进来，并做簿记员。他不愿意加入，但同意教乔万象记账。合作组最大的难题是资金不足。耿秀峰建议卖掉15斤粮食，再买打绳的麻。但黑子卢墨林说他太穷，太老，不能做这个新生意。卢害怕冒一丁点风险，也担

心他在财力上无能为力，会使其他人怀疑他占了他们的便宜。

当有外界联系的耿从地下县政府申请到 200 斤高粱的贷款时，合作组就变得很有吸引力了。但有一个难题，即组员们必须秘密到日军加固防守的西沿湾附近去取粮食。卢墨林很害怕，但三个较年轻的决定赌一把。他们安全返回五公后，一半粮食分给组员家庭过冬^⑩，另一半加上他们自己的少量资金，作为 1943 年冬诞生的打绳副业组的基本资金。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财政支持使合作社开始起步。至少从 1940 年以来，晋察冀根据地的党员们就开始扶持合作社了。

对刚成立的合作社给予支持的是饶阳地下工商科科长刘孚斋。刘在 1943 年秋来到五公，目的是在冬闲季节指导成立“隐经组”，它的宗旨是组织合作社进行副业生产，抵制日寇掠夺。刘把县里的 2000 斤粮食贷给了愿意参加合作社副业生产的社员们。^⑪

1943~1944 年冬，得到县里支持的、耿秀峰一手创办的五公“隐经组”共有 8 个副业小组。除了打绳之外，还有纺线、织布、轧棉、磨面、花生油坊、豆腐和木厂。^⑫有些人曾参加过 1941 年由黄宝芝和田乱子发起的、现已不存在的合作社。发展合作事业并不是件容易事，8 个新的小组组成“互助组”或称换工队。社员们赚取了足够的收入，使 49 户完好无恙地度过了灾难性的冬天。^⑬

尽管耿秀峰是一个与外界有着良好关系的革新者，但作为一名管理者却是失败的。他帮助组织的 8 个小组在结构上是松散的。到 1944 年春，干旱一结束，7 个小组迅速解散。不过，这年春天给人以吉祥的感觉，旱灾结束了，在太平洋胜利进军的美军迫使日军从冀中拉走 3 万人的部队。美国空军的官员们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发现，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得到了保护。尽管日本的伪军部队仍占领着饶阳城，并定期到乡下袭

击，但战争已明显对他们不利，他们在西沿湾、窝堤、杨各庄和小堤的碉堡都被攻克，杨各庄还庆祝铲平了碉堡。党组织的活动也趋于公开。

在刘孚斋的支持下，耿秀峰鼓励曾在一起协作打绳的4户农民进一步合作，组成了一个土地合伙组。他说，如果他们能在一起协作打绳，也就一定能合作种地。4户同意试试。在初春，他们用了三天时间设计出合伙规则。^⑨耿的父亲继续阻止他用家里的财产参与投资或加入合伙组。合伙组章程仍由秀峰起草，它的方针很明确，秋收之后，农产品销售总值的10%用于再投资。余数用于分配，一半按投入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另一半按出工的天数进行分配，保证既不使土地多的农户感到被骗，也不使那些出了大力的农户感到被骗。打绳副业也从总收入中提存10%，而分配余数时，60%基于出工情况，40%作为投资红利。^⑩遵照贺峰的指示，社员投入的土地、工具、耕畜、资金和设备均保留私有权，并且随时可以撤回。4户小组的章程尊重约定俗成的所有权。

可在其他方面，土地合伙组却打破了农村耕作惯例。其独创性体现在，这几户农民进行一年到头的资金和劳力方面的协作。有些持久而全面性的原则确立起来。关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销售以及如何分配收入的决定权，由单个农户转移给独立管理的小组。简单的储蓄体制也建立起来，组员们到会计乔万象那儿储存现金，到急需用钱时，再到合作社借支。

章程采纳了适用于记录农副业劳动中出工情况的初级工分簿记制。一个强壮男劳力劳动一整天为1个工分，一个妇女工作一天为0.6个工分，未成年孩子则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这个制度没有区分技术上熟练和不熟练、身体强弱及人的勤懒、性别和年龄差别。此外，在分配平均化观念支配下，他们也倾向于简单化的方法。

1944年3月，当这些创始成员准备通过以在章程上按红手印的方式同意合作时，脾气暴躁的李玉田惊慌起来。一个亲戚告诉他，“你将遭受损失，你的地多，其他人会拿走你一半粮食”。乔万象想搞一个折衷的办法，但春耕开始时，李宣布退出，这样其他人就占不到他的便宜了。^⑩农民们担心被当作傻子一样当众嬉耍。为了填补由李玉田离开合作社所造成的空缺，富裕的乔建议让东村的邻居耿长锁加入。

来自集市的打绳者

1900年4月，耿长锁出生时，他的父亲耿济传（音）已把10亩地典当掉一半，到饶阳董大车绳铺做工。在那儿干一天所挣的钱，足够买一斤或一斤多粗粮。^⑪打绳是五公的传统手艺，有一首饶阳歌谣描述道，耿口村最出名的是织席，王桥（王桥是王柳枝桥的简称）是做豆腐，五公村是打绳^⑫。

在耿长锁孩提时代，家里仅有5亩地，另外租了5.2亩，主要由他的母亲、姐姐和哥哥耕种。1910年，他姐姐嫁到外村，哥哥去闯关东。妹妹生下后不久就生病死了。家里没有钱供他读书。有一年岁末，为了使全家能吃到肉馅饺子，来年交好运，父亲济传以他的身体作担保借了高利贷。后来，父亲终于病倒，1915年回到五公时已不能种地了。15岁的耿长锁便成为养家糊口的人。1918年初，他继承父业，到饶阳学打绳和做买卖。^⑬

从五公走到饶阳需2~3个小时，这是年轻的耿第一次外出。在南城门，警察从上到下搜个遍，尘土飞扬的街上到处都是苦工和乞丐，他也看到少数有权有势的人。他想，城乡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耿找到了工作，就在他父亲干过的董大车绳铺。他工作勤奋，但不喜欢为老板卖命，不愿为老板收割

麦子。学徒期满后，耿离开绳铺，回到五公，这时他已精通这一门手艺，在集市上闯荡人生。由于缺少土地、资金、劳力，耿长锁只得通过种地、打绳和卖绳，勉强赡养年迈的父母亲。

1922年，他父母为他安排了婚事。他们与比耿家更穷的、西村的徐家进行说合。虽然当地文化更认可新娘比新郎大的婚配，但12岁的徐树宽还是被送到耿家生活，成为22岁的长锁的未婚妻。树宽的母亲在1920年生第四个小孩时去世了，恰值1919年饥荒之后。她父亲没有土地，只能靠当泥瓦匠，竭力维持生计。她父亲让女儿与耿家订婚，送来做童养媳，为的是让树宽有条活路。她的姐姐徐琴也如此，被送到五公西北几公里的北韩村的一户人家。^②在华北，许多娶了女童为妻的贫困家庭在社会上遭到诋毁。这样的婚姻是靠不住的。新娘被当作家庭的半合法成员遭到极端的奚落，而且时常受到暴力虐待。^③

耿家不顾她脚跛，要求树宽努力干活，她出去拾柴禾，拔草，学会推大石碾磨面。打绳也很熟练。1926年，两人结了婚，仪式十分简单。他26岁，她才16岁。不久，她就生下了女儿学仁，后来又养了6个。^④在以后的10年中，夫妻俩耕种自家的和租来的10.2亩地，打绳，然后由他到集市上去卖。由于上有老，下有小，家里一直很穷。在寻找活路的生意场上，耿不得不变得聪明和狡猾。他外出一次就是几天，去找原料、买主，赚取利润。他步行到豫北的林县买麻，然后再在邹村集市上卖，因为在那儿，劊猪师傅常需要用五公绳子捆住挣扎的猪。耿和其他人还贩运到像韶武（音）（距离30多公里）庙会这么远的地方，希图卖个好价钱。

徐氏宗族是几个世纪前逃避山西饥荒时迁移到此的。耿氏宗族是从东北方向的南马村迁来的，他们住在东村，与村中央有权势的南李集团没有任何世交。1936年村内冲突引发组成联合会时，耿长锁站在人群背后。他与乔氏宗族的关系最密

切，尤其是跟他的邻居、富裕的乔万象。

日本入侵时，耿加入了由乔恒泰领导的工人抗日联盟^③。与他的父亲一样，耿被看做来自集市的打绳者。1941年，他成为党领导下的村政权中的工人联盟负责人之一。税制改革使耿能积攒足够的钱，买了一头他占1/4股的耕牛（俗称一条牛腿）。1942年，他父亲被日本兵杀害，是40个死难村民之一^④。不久，患气喘病的母亲也去世了。1943年，在旱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耿卖掉了耕牛的股份、视若珍宝的耕犁和大部分家当。

耿买了10斤花生壳，这是最便宜的充饥食物。在把最粗糙的部分用于烧火之后，徐树宽把剩余部分磨细，掺上水，蒸了吃，这是对付饥荒的传统办法。耿在吃了花生壳之后，身体仍很虚，令他痛苦的是导致便秘。在饥荒年份，躲避死神的另一个办法是把树叶放在水中煮熟了吃，这种方法会导致腹泻。便秘和腹泻导致身体虚弱，头昏目眩，长锁因此经常昏倒。对他来说，最可怕的事莫过于卖掉他的孩子：在1943年那个令人绝望的春天，他们把大女儿学仁卖给了外村的一户人家，换回了45斤高粱，几个月后，她逃回家，长锁也没有办法归还用学仁换回的粮食。^⑤集市上，等待买主的孩子挤在一起，脖子上挂着待售的牌子。在离家较远的集市上卖掉的小孩，有时在其父母的指点下，一有机会就跑回家。

是年秋天，颗粒无收，耿让妻子背着才生下三个月的女儿惠娟，手上搀着13岁的儿子德禄，到饶阳去要饭^⑥。与其他数百万人一样，耿家似乎命中该绝。

耿长锁和土地合伙组

1944年3月，乔万象、卢墨林和李砚田同意邀请耿长锁加入刚成立的土地合伙组，同时，耿秀峰也决定去动员年长的

同族人（应称大哥）参加。当秀峰到长锁家时，他正在外地卖绳。农民们隐瞒自己的贫困或富有，为的是避免丢脸，或成为妒忌的对象。秀峰错误地认为，长锁家相对富裕，当穿着破烂衣服的徐树宽打开门时，她对秀峰说道，“你有什么要说的，说完就走。”如果她比他年轻，习俗不允许他们谈话。他问她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她把他让进屋，看看这一间半房子。后墙要倒了，炕也塌下去了，所有可吃的东西是一把树叶。可见，乡村社会充满了不信任，害怕被别人占了便宜，充满了隐秘和假象。

秀峰问徐树宽，长锁对乔万象小组有何想法。她回答说，长锁认为它很好，他经常与乔万象的弟弟万江一起打绳，并和卢墨林一起做绳子买卖。这些邻居都知道，他是来自集市的打绳人，很容易相处，是个诚实而熟练的手艺人，也是个在讨价还价中很难对付的人。秀峰问，长锁是否愿意参加土地合伙组，徐树宽说，她确信他会参加。^⑦

秀峰发现，缺少劳力的家庭最愿意参加合伙组。30岁的李砚田惟一的儿子生下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妻子也奄奄一息。有两个儿子在部队的卢墨林缺少劳力。负债的乔万象家里也有很多小孩要抚养。有5个孩子的耿长锁不仅地少，劳力也少。从不同的自身利益出发，贫困、破落中的、缺少劳力的家庭走到了一起。

乔万象和其他人想让长锁来牵头。长锁心情开朗，充满自信，又见过世面，不仅在打绳和买卖上是个内行，而且是个以快速收割小麦而闻名的熟练农民。当时合伙土地的春耕和播种已经结束，合伙组需要有个会管理并能解决小组与个人关系问题的人。若没有能干的领头人，合伙组就如群龙无首。三天后，耿长锁回到家中，加入合伙组，并同意担任合伙组组长。除了耿自己的和租来的土地外，他还投入了20斤麻和绳子。

土地合伙组由四户 22 人（男 9，女 13）、相当于 6.5 个劳动力（男 4，女 2.5）组成，全组有 40 亩地，人均 1.8 亩，比全村平均水平低得多。合伙组没有耕畜，农具也仅有一把犁和一把锄头。^⑧村民们嘲笑这几户又穷又弱的家庭能团结起来的想法。和谐的大家庭是中国人的理想，可活生生的现实是大量的争吵。怀疑者称合作组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一般人普遍认为，争吵将导致这一不切实际的冒险迅速破灭。

幸亏耿秀峰的关系，饶阳县地下政府新来的两个领导人王永来和李泰国，在党内高度评价了土地合伙组。在他们看来，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私人所有制、自愿参加和现实利益。王指示，有 46 名党员的五公地下党支部要支持土地合伙组。1944 年 6 月，耿长锁在加入合伙组后 3 个月，即由东村的战斗英雄乔恒泰和同族的耿书普介绍入党。^⑨

长锁全身心地投入合伙组，希望它能使一个处于绝望中的家庭起死回生。他的父母已于 1942 年去世。他的妻子已没有家了：1932 年父亲死于霍乱，大嫂生下小孩后不久，大哥即去世，后来大嫂回到娘家，小弟弟徐东（母亲生他时因难产而去世）是五公耿徐两家最后的家人。他参加了八路军，耿为他爱国的内弟而感到自豪，徐东也偶然回来分享长锁和树宽少得可怜的食物。当徐东在五公以东 90 公里处与日军第二十三师团的战斗中牺牲时，这种快乐也就没有了。接连不断的事情把耿打晕了。家庭行将完蛋，全家为国家、党和军队作出了牺牲。不过，耿家在合作社中获得了新生。

第四区地下政府不久为刚成立的合伙组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投入了 500 元边币。区党委派新任书记靳树芳前来调查，靳的印象很深，送了一本《组织起来》的小册子，这是 1943 年秋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所作的一次讲话。有文化的耿秀峰向不识字的社员们大声宣读，毛号召农民们向吴满有和其他劳动英

雄学习，团结起来，战胜饥荒，发展经济，支援抗日事业^⑨。毛强调，加入合作社必须是自觉自愿（绝对没有强迫），但毛也认为越大越好。未经证实的前提是，村民们自觉地赞成越大越好。

日军撤走以后，在小堤的据点被摧毁时，土地合伙组接受了毛的文章，以及八路军提供的300块砖的礼物。县属部队把一头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驴子送给五公四户合伙组。由于饥荒导致耕畜减少，因而驴子是个宝。组员们集中所有资金，日夜劳作，提高家庭收入，冀中军区的报纸《冀中导报》对四户合伙组作了概要报道^⑩。

组员们明白，获得站在支持立场的上级重视，是一种优势。这需要关系。虽然耿秀峰不是合伙组成员，但他有那些关系，以及合作社是引导农民和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不过，支持是把双刃剑，当中国农民们明白过来时，礼物就不是白给的了。支持合伙组的官员们希望按他们的想法来指导工作，可这些社会主义理论与农民们合作的想法相冲突。

党的改革政策

1944年夏，县和区里的领导敦促耿秀峰组织“麦收委员会”。虽然日军已从饶阳撤走，但地里正在成熟的庄稼似乎仍有危险。村民们冒着风险，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先把小麦收割上来，并藏起来。为了提高收割速度，耿秀峰组织了22个互助组，平均每组11户，共有246户（占全村85%）参加。7天之内，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情况下，几乎把所有夏麦收割上来并藏好了。收获的粮食中90%按参加者所拥有土地的数量进行分配，10%则按劳力出工情况分配。这些临时的换工组在收割结束后便解散了。^⑪

麦收之后，第四区政府在邹村召开大会，表扬劳动模范，耿秀峰被授予一面布旗，上写“先进模范工作者”^③。不久，1943年接替老民兵徐义洲的五公村支书李云把秀峰叫到他家，会见一位身材高大、对耿的工作很感兴趣的外地人，他就是第八军分区党委书记金城。两年前，他曾在五公躲避日军的搜捕。^④耿和五公的关系圈不断扩大。后来，李云被调到县委任职。

与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讲话号召向吴满有和其他劳动英雄学习的早期集会一样，在邹村召开的劳模大会也与农业合作有关。毛说，合作社和互助组不仅是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新办法，而且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一个阶段^⑤。夏收之后，冀中地区推广合作社^⑥。虽然战事仍是最重要的，但党还是组织了如隐经组和麦收委员会之类短期临时性合作组。不过，五公四户合作小组除了土地和劳力合伙、长期在一起进行副业劳动这些简单的合作形式之外，还需更进一步。一些党的高层领导人认为，要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们的目标是使生活更加社会主义化。

1944年7月，随着日军的溃退，共产党重新提出在华北进行减租减息。9月，新任冀中党委书记林铁主持工作。他不会骑自行车，只会骑驴子。10月，饶阳县委在五公以南不到两公里的曹庄召开会议，通过了“双减”计划。11月初，从第八军分区财政科派的工作队来到五公，继续1942年初第四区工作组离开后的工作。工作队由冀中专署的代表杨子贞、李曼克和王册负责。他们把五公称作专区进行减租减息运动的“试验基地”。在五公的试验结果将具有重大意义。边远的五公村正成为即将形成的社会主义秩序的中心。新体制一产生，那些束缚它的东西也随之出现。

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要素与某些改革相冲突。在1944~

1945年冬闲季节，双减工作队在五公办了扫盲班。对于这些具有现代思想的外地人（如为党在农村的事业而工作的城市青年）来说，吸引所有文盲来参加扫盲班似乎本身就是一个显著提高。五公妇女中仅有3%接受过正规教育。传统习俗显然是致命的东西。一位21岁的妇女嫁给了村中央的一户人家，她的“新郎”才9岁，她决定参加工作队组织的夜校扫盲班。可她的公婆禁止她去。她坚持要去，最后被他们打死了。另一位年轻的新娘不顾其公婆的严厉警告去开会，她丈夫的姐姐就打她，把她拖回家，在家里，其他人虐待她，直到她死去。把中国农村牢牢地粘在一起的传统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家长等级制的、残暴的。在许多保守的农民看来，妇女学习文化或出门与陌生人在一起的观念，理应受到诅咒。

工作队把地租制从固定的租金改变为每年收成的百分比，即佃农只要把总产量的37.5%交给地主，这对佃农很有利，同时也没有伤害绝大多数自耕农，而且地主仍可以从租出的土地上得到适当的利润。土地私有权、土地与农具的买卖继续存在。从某个角度来看，地租并没有明显减少，在30年代末，每亩地租3银元相当于正常年份总产量的37.5%，在双减运动中，不愿冒险的佃农所得到的是遭灾时的保险政策。不管天灾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他们最大的义务也只是收成的37.5%。可在丰年，地主收获颇丰。工作队还把利率降至25%，即从惯常的借10元利息3元降至2.25元^⑧。五公村民受这次减租减息的影响很小。

模范村，模范人

耿长锁合作社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靠白天一起在地里劳动，晚上一起打绳，妇女小孩都参加。劳动是累人的，但到年

底，合伙组全年生产了 9240 斤粮食，还不包括甘薯。^⑧每亩 223 斤的产量远远超过可怜的村民们一般的旱地产量。1944 年，五公村平均亩产 170 斤^⑨。

土地合伙组在种晚玉米的同时，重点放在冬小麦上，走出了不同寻常的一步。他们在一半多的地里种植这两种庄稼。像小麦这种细粮可以卖出高价，但易受旱涝灾害的影响。合伙组在小麦上的冒险得益相当可观，而从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上赚的钱则很少。土地合伙组仅种了三亩经济作物——花生。合伙组打绳副业的总收入仅值 398 斤小米，占总收入 9638 斤粮食的 4%。

在除去种子和肥料等生产成本后，4400 斤粮食用于分配，平均每人 200 斤^⑩。像乔万象等投入了较多较好的土地但缺少劳力的家庭，分得较多的收入，作为对其投入的红利。“黑人”卢墨林和耿长锁等人投入的土地和资金较少，他们的收入主要靠劳力分得。徐树宽靠惊人的劳动强度，增加了耿长锁一家的收入。

土地合伙组的试验使粮食产量接近于那些拥有良田和耕畜的富裕自耕农的产量。到 1945 年春耕时节，耿合作社又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支持，获得另一头耕畜，这样，他们就有了一头骡、两头驴、和一头牛^⑪。合伙组之所以兴旺，原因很多：风调雨顺，因而水井并不重要；合作社较小，社员又是朋友和邻居；由于所有家庭均缺少劳力，因而没有人感到被别人占了便宜；除了耿长锁的土地较少外，每人的土地相对平等；分配制度也并不露骨地照顾某人，鄙视他人；要作出重大决定时，合伙组立即进行讨论；脚踏实地、能干而诚实的组长耿长锁也很重要；耿秀峰与县、区里的关系也带来了贷款、耕畜、物资和行政支持。

尽管 1944 年日军撤走，旱灾减轻，经济趋于复苏，五公

村上交县里的税收为 10 万斤小米，但退出合作社、脾气暴躁的李玉田却遭了难。他把大部分绳子副业收入用于买粮食，养活一大家子，到春天时，已一无所有了。4 个孩子在挨饿，他的妻子由于去年秋天卖掉 10 岁的儿子而变得心神错乱，她不愿再卖掉另一个孩子，于是带着小女儿，离开了五公。后来李打听到她在沿着河北南部边界乞讨后，嫁给了另一个人。到这年年底，李共卖了三亩地，一间屋，大车的车轮，两块打谷场。他生病的父亲过世，又迫使他拿出下葬费用。到年底，李的小儿子混丢跑回家，而抗日政府又出面干涉，把他的妻子和女儿还给他，情形才稍有好转。^②

与此相对照，五公合作社的扩大，成为冀中地区支持者们的骄傲。在 1944 年鼓舞人心的秋收之后，有 13 户农民加入合作社，全劳力从 6.5 个增至 22 个；土地从 40 亩增至 218 亩，新社员投入两把犁，三辆大车；社员人数剧增至 107 人，新社员中除了许多李氏宗族的人之外，还有耿秀峰，他的哥哥、爱国的小学教师耿满亮和党的重要活动分子、同族的耿书普。所有东村的自耕农都入了社，每个全劳力的土地几乎是创始社员的两倍^③，但合作社人均土地仍只有两亩多一点，明显比 1937 年全村人均的 3.2 亩低得多。新入社的 13 户大多数缺少劳力，他们看准了入社这一经济良机。

破落中的家庭把他们的技术和难题一起带进合作社。新社员中，有 63 岁的打绳人李辉庭，他能通宵打绳，对远处的集市行情了如指掌。他把绳子运到西南 200 公里、河南省边界处的双井，再把未加工的麻带回家。他年轻时仅继承了 1.2 亩地，试图在租来的一小块土地上靠种蔬菜卖来维持生计。后来，他让大儿子去闯关东，李听到心爱的儿子死在“充满机会的土地”上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于是十分溺爱剩下的儿子占虎。在以后的岁月中，李不顾一切地为他的儿子提供经济保

障，但占虎却沉溺于赌博之中，李和儿媳常常到赌窝规劝占虎，但他充耳不闻。李辉庭加入合作社，主要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他听说了合作社是如何治好同辈族人李砚田的赌博习惯，心想，或许也能挽救他那不中用的儿子。^④

另一个新社员，45岁的张近仁是个愉快的乐天派，喜欢逗人大笑。自12岁起，他就下地干活，先是在他继父的小块地里干，后来做短工。合作社邀请种田能手张近仁加入，让他负责农业生产。在抗战中，他很活跃，先是工人爱国联盟的成员，后从事搜集情报。1939年，他加入了共产党^⑤。

合作社还欢迎张的姐夫、45岁的魏连玉入社，他又高又瘦，作为村长李子厚的手下（李派他为县抗日组织搜集情报），其地位在合作社和村权力结构中迅速上升^⑥。1944年，日军撤走时，张近仁说服魏加入耿合作社。魏仅投入2.3亩地，但他受过4年初级教育。战前，他的父亲在饶阳开了一家绳铺。魏到过很多地方，战争初期在河南干活。他熟悉绳子生意和集市行情。1944年底，李子厚指定魏调解有关村政权的争端。^⑦

干 预 者 们

于1944年11月把五公当作减租减息试验点的第八军分区工作队，在1945年1月初离开之前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是，修改耿合作社的章程。当工作队出席合作社干部在初冬召开的一次会议时，没有人敢向他们提出疑问。他们宣布，把合作社农业净收入的一半分给那些投入土地、农具和耕畜的人是“剥削”，合作社的宗旨是消灭剥削，因而他们要求按地主一佃农收成分配比例的上改标准，指导合作社的分配政策，至少60%的农业收入应按劳力进行分配。

当耿秀峰听到“剥削”这个词时非常不舒服。在合作社中，地主并不剥削佃农，何况自耕农们自愿为合作社这一共同的利益基础而劳动。他认为，社员之间收入存在差距，但较为富裕的社员并不剥削别人。脾气暴躁的李玉田曾因认为对那些投入土地的人来说50%的回报率太低而退社。他对40%又会怎么想呢？在自耕农看来，土地、耕畜和农具是长期艰苦劳动的果实，若不能收回以前的劳动果实，这才是剥削。

秀峰当然不敢顶撞来自军分区的上级官员。他心里也明白，土地较多的他的家庭会因他的反对而受影响，自己也可能因连结私党而受到批评。耿秀峰静静地坐在那儿，与所有社员一样，觉得理应尊重新政权的权威。最后，章程规定，净收入中60%按劳力进行分配。副业收入的分配也作了调整，70%而不是60%按劳力分配，30%分给出资者。^⑧工作队欢呼这些变化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

至少从字面上看，修改过的章程加上了“公共福利”的部分保障，如对工伤的医疗费用，以及在休息期间照记工分。合作社还担保因公死亡者的下葬费和为死者的后辈提供三年的固定收入。这些保障措施触动了近来濒于死亡家庭的敏感之弦。可关键性问题是：合作社的财力能否兑现这些代价很高的诺言？有些人是否认为自己受到别人的剥削？不过，由于前些年下葬费造成了家庭经济危机，因而这种福利保障受到大多数人的普遍欢迎。

外来干部还加进了“民主管理”的条款，如选举负责人之类的重要事项须经过投票决定。选举每年举行三次，分别在三个传统节日：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进行。在合作社的最初几年中，开选举会时还进行聚餐。合作社内最大的决策机构是新产生的家庭代表会议，它由每个家庭派出一个代表组成，每年召开一次全体社员大会，检查代表会议的工作。^⑨那些当选任

职的干部，由于致力于社里的事务，得到合理补偿，但他们也得参加田间劳动，否则社员们就把他们看做吃白食者，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满手污泥，却照样拿钱。管理似乎并不全是实际工作。

与新章程一样，第一次选举反映了来自第八军分区的外乡人的意愿。他们撤了打绳者耿长锁的职，让“模范工作者”耿秀峰取而代之。耿长锁则从事他的专长，负责副业生产。耿书普任副组长。种田能手张近仁负责农业生产。^⑤秀峰缺乏种田和其他工作的经验，这样他就无法循例进行领导。他的革新思想使他并不关注日常事务，而这些事对合作社的成功至关重要，他具备的只是与党的上层领导的关系，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信仰。

不管有什么任期制的民主管理，合作社的5名负责人均必须服从组织严密的、控制着地方政治的、秘密的共产党的领导。县、区和军分区的党组织随时了解合作社内的动向，并通过隶属于党组织的合作社干部发出秘密指示。

当秀峰寻找一个合适的会计处理社里大量财务问题时，工作队干涉的负面效应趋于表面化。他首先想到富裕自耕农、入党较早的李亨通，他受人尊敬，有点像当地的圣人。几年前，李圣人（我们这样称呼他）在王玉章店铺的一次讨论中，把有关苏维埃集体农业的传闻告诉了秀峰。李亨通在他的12亩地里获得了全村最高的产量。他也表示拥护合作社，但当他了解到仅有40%的农业净收入作为土地红利进行分配时，李圣人退却了。他能在自己的良田里打出更多的粮食。当李被邀请当会计时，他老练地回答道，新的方案看上去不错，但他的老脑筋不能完全胜任此职，最好的办法是，会计乔万象有困难时，他随时提供帮助。^⑥

很多合作社

1944年底，第八军分区工作队鼓励耿秀峰以最初的土地合伙组为模型，建立更多的合作社。秀峰不需要太多的鼓励，他找到战争时期的良师益友、共产党员李凤祥，后者是地主李建亭的侄儿，而李建亭家曾是五公最有权势和最庞大的家庭，不久前刚分成几个单独的家庭。税制改革进一步削弱南李的经济地位。虽然李凤祥在去年还存有疑虑，但他同意组建合作社。它由以前相对富裕的、中西村的自耕农家庭组成，其中6户姓李，三户是关系密切的张氏宗族成员。耿秀峰认为，把已经是朋友、邻居、亲戚关系的和具有相似经济基础的家庭组织起来，是很有意义的。而在宗族与土地、农具和耕畜的所有权上的显著差异，则会酿成毁灭性的争端。

背运的李玉田当初退出四户合伙组，在随后的春荒中元气大伤，现在他领导了一个由8户农民组成的合作社，其中，包括李氏两兄弟在内的收入中等的农户占有优势，虽然也有三户贫农加入该社。除了侯志堂，其他人都姓李。第三个新合作社是耿秀峰组织的，它全部由贫农家庭组成，负责人为李玉柱，6户社员全姓李。

1944年秋，耿秀峰在饶阳县委书记李太发起的生产运动的推动下，并在第八军分区工作队的鼓励下，还组织了19个临时副业小组，每个小组四或五户，专门从事运输、棉纺、豆腐、皮革加工、花生油坊和卖熟馒头。此外，120个家庭中的妇女在农闲季节还组成了15个做鞋小组。总之，在1944~1945年冬，五公村50%的农户加入互助组、换工组或合作社^②。与1944年夏收季节耿秀峰组织的22个换工组一样，新的副业小组也是临时性的。1945年春它们的特殊任务完成后，

即全部解散，但在4个合作社中的40户农民则继续组织在一起。

由打绳者耿长锁负责的副业生产，在寒冷季节干得热火朝天，其规模不断扩大。从事打绳副业的有10人。合作社在村庄东西干道的北侧开了一个木工坊，又在通往邹村集市的土路上，开了一个豆腐和芝麻油坊^⑤。由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因而在集市上赚钱又成为可能。

与1944年总收入398斤小米相比，1945年打绳一项的总收入就值2.2万斤小米，木工坊赚了2万斤，豆腐和芝麻油坊赚了5300斤。1944年人均副业总收入18斤，1945年打绳者耿长锁副业小组人均收入442斤小米，占合作社总收入的49%。^⑥合作社从副业利润中抽取一部分买了一头骡子，两头驴，一头牛，把耕畜变为合作社的财产。副业利润使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因而增加了可供出售的剩余粮食。踌躇满志的耿秀峰把成功的消息报告给第四区和县里的熟人。

吵吵嚷嚷

1945年春，耿秀峰在合作社工作中的成绩使他得到了晋升，饶阳县委书记李太把他调到五公以东16公里的小堤，在第四区供销合作社工作。他的入党及不断上升的政治明星地位，均是由他的良师益友李凤祥作担保的。打绳者耿长锁恢复原职，他和他的妻子徐树宽作为高音歌手，闻名于党组织派来演出的宣传队。有文化的魏连玉被当选为合作社总务负责人，从而减轻了没文化的长锁的负担。

可是春耕一开始，不满情绪就爆发出来了，主要是针对少一点“剥削”，多一点社会主义的新体制。那些投入土地相对较多或缺少健壮劳力的家庭感到被欺骗了。修改过的章程意味

着土地多和劳力少的这两类农户，实际所获都比他们自己耕种的收入少多了。^⑤党的社会主义体制对耕地少和劳力多的家庭十分有利，它不是鼓励投资，而是鼓励人口增长。

另外，一些人抱怨工分的计算不公平。在具有简单化和平均化特征的体制中，技术和工作强度这些关键性因素被忽视了。木工小组中的熟练木工感到，他应当比没有技术的同事多拿钱。产品不等而报酬相同的计酬方法，严重影响了熟练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社会主义对最大、最穷和最不熟练的家庭给予特殊优惠。

其他问题则使扩大了的合作社陷入混乱。一些社员抛下农活，从事私人贸易活动。李庆森入社后，开了一个小酒店，让其他人种地，自己甘愿获得土地投入所应得的份额。一些人把合作社的赚钱副业视为快生利，快往自家土地和家庭副业投资的手段。^⑥其他人则请病假，然后在别的村庄做零工。有一个社员把合作社的肥料施在自家地里时被捉住^⑦，他认为，一旦合作社破产或自己决定退出时，由于自家土地肥力提高，他就能赚到便宜。如果有这种被别人欺骗的恐惧心理做祟，那么上述这些做法就可能拆散合作关系。

妇女参加劳动的问题也产生分歧。1945年春开始，打绳者耿长锁响应县政府提出的生产运动，号召妇女参加田间劳动^⑧，这惹怒了投入较多土地的农户，和那些妇女下地很少的家庭。他们声称，男劳力已没有足够的活可干，如果像打绳者耿长锁的妻子、裹脚的徐树宽这些较为瘦弱的妇女参加劳动，那么按工时进行分配的份额就会增加，对只有男劳力挣钱的家庭来说，明显要吃亏。这些传统家庭赞成妇女留在家中。有些男人感到，与妇女在地里一起干活是一种堕落^⑨。卢墨林抗议道，当他的儿媳在地里干活时，她就不干家务了^⑩。耿长锁妥协了，妇女劳动基本上被限制在被认为合适的农活范围内，如

种棉和整棉。耕地和驾车之类的重活仍由男劳力去做。

最后，新分配体制不能解决缺少劳力的烈军属家庭的适当补偿问题。卢墨林有两个儿子参加了八路军^①，卢是否因他的爱国家庭而使其人社的土地有获得较多收入的权利？如果合作社帮助受赡养的家庭，那么分给其他人的就减少了。

农忙季节开始的时候，合作的信念更为动摇了。1945年人社的农户带来了良田、资金、技术和农具，但按工时计酬的、强加的社会主义逐渐损害了新社员的经济利益。当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时，合作社的干部们成了替罪羊。据说，有很多干部不参加田间劳动，开会和学习文件都照记工分。^②

未被察觉的来访者

1944~1945年冬，林铁的秘密司令部设在五公西北6公里处的北善村。林原籍四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毕业于由毛泽东领导的国民党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现任冀中军区党委书记^③。他听说五公成立了合作社，便在警卫员陪同下，于5月的某一天徒步来到五公，头上缠着白毛巾，一身粗犷的农民装束。在副社长、老党员、民兵队长耿书普的家中，林倾听了书普和临时回来的耿秀峰阐明关于合作社发展前途乐观的理由。林的回答简短又具鼓励性：“你们的合作社是好的，把农业和副业结合起来，社员们需要钱时，可找合作社贷款，它是个综合性的合作社。”林铁表示，如果遇到困难或需要帮助，合作社领导可以找他。然后他在茫茫夜色中，朝另一个村庄走去。在以后的岁月里，林铁一直是五公村强有力的庇护人。

1945年5月13日，当地民兵三面包围饶阳城。日军老早就已撤走了，据守县城的伪军部队从留出的一面逃走了。饶阳

解放了，没流一滴血。地下抗日政府活动公开化。饶阳县委要求安国县的同志们俘获在饶阳抢劫杀人的安国伪军部队后，把他们押送回饶阳。他们被遣送回来，并被处决。6月25日，献县解放，政府开始修复被日本占领者毁坏的天主教堂。天主教徒受到党的保护，与入侵者相比，中国新政权尊重宗教信仰。^④当日本在8月宣布投降的胜利消息传到五公时，30个年轻人步行到饶阳，参加庆祝胜利的仪式。有些人还是第一次到县城。临时凑起的游行队伍穿过了古老的城墙内狭窄的土街。这是愉快的一天，暂时冲淡了战争、死亡、劫掠、强奸、旱灾和饥荒的记忆。

党组织在邹村树了一个纪念碑，以示对饶阳第四区烈士的纪念。党员和非党员的名单分别列在上面。碑高2.1米，看上去就像那些按传统为颂扬恪守儒家美德的典范而树的碑。五公的7名烈士是党员乔恒泰和李健，非党员李富宽、李雄、李启山、李合凯和徐东（徐树宽的弟弟）^⑤。

随着日本投降，国民党军队又重新控制了华北。10月，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了华北各主要城市：石家庄、保定、天津、北京，并控制了主要交通线，但冀中平原的饶阳和其他县仍由八路军控制。

合作社危机

1945年秋收之前，社会主义成分较多的合作社内的紧张关系趋于表面化了。包括合作社副社长耿书普和耿满亮在内的8户农民宣布他们立即退出合作社，而合作社社长耿长锁把这事向五公党支部徐满堂作了汇报。由李凤祥、李玉田（两度退社者）和李玉柱负责的另外三个合作社刚刚解散。自愿从事合作生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领导者与分配不公已毁掉了合作

社^⑥。

耿秀峰从县里调回第四区工作，长锁向他简要介绍了失败经过。秀峰已从书普那儿听说了。最为糟糕的是，在秀峰回家时，他母亲质问他，为什么把荒唐的分配方案强加到兄弟满亮身上？书普和满亮投入了相当可观的土地，而且两家都缺劳力，但由于仅有40%作为土地的红利，他们损失了很多，自己耕种也不至于如此。

秀峰自责曾经轻率地服从第八军分区工作队的指令。他认识到分配方案不可行，但他又想表明他对党的忠诚。外乡人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过分要求，使全村对合作社的热情骤冷。党组织和合作社的负责人在耿长锁那快要倒塌的家中召开会议，徐满堂在会议上建议，说服退社者到秋收后再退，这样，17户组成的合作社可以再挨些时日。

1945年，粮食产量略微下降，亩产从223斤降为215斤，没有人埋怨天气不好。人均粮食总产量从375斤降为368斤，农业总产值是49317斤小米。花生种植面积翻了一倍，扩大了有销路的商品作物面积，这一决定使人均农作物总产量有了适当提高，从420斤增至458斤。合作社的主要成功之处是副业生产，耿长锁的专长所赚的总收入价值47328斤小米。^⑦这使人均总收入有明显提高可能：1944年相当于427斤，1945年则增加到906斤。

由于按照这一重要农户不能接受的原则进行分配而产生的纠葛，最后通过提高农业开支才得以解决。每亩产量215斤中，实际上仅有77斤用于分配，而那些土地较多较好和缺少劳力的家庭感到被骗。秋收之后，8户农民立即退社。合作社损失了两耕畜、两辆小货车、一把锄头和一些产量最高的土地，但退出的全劳力仅占1/4多一点。

在副业小组的资产如何处置的问题上，合作社内发生了一

场激烈的争论。退社者要求拥有所有的麻，以便他们能继续打绳赚钱。留在合作社内的“黑子”卢墨林狂怒至极。合作社除了由木工坊制作的8口棺材外，所剩无几了，而这些东西不可能立即卖掉。卢发怒了。合作社从哪儿获得资金从事绳子副业？执拗的“黑子”要求以合法的行动对付退社者。

但合作社负责人耿长锁赞成允许退社者拿走麻。他致力于发展合作社，对社里的恐慌也很敏感，他这样做，是想告诉大家一个让人放心的信息，如果村民们断定合作社占了大家的便宜，那么合作社厄运难逃。耿强调，发展中的合作社的长期利益，最好通过向那些决定退社者贷款的办法保存下来。

退社者还要求分享公积金，即1945年总产值的10%，合9665斤小米。社员们愤怒地指着章程，上面写着退社者既无权在收割后分得一份草料，也没权分享公积金。在整个冬天，喂养牲口和烧火主要靠草料。但打绳者耿长锁，会计乔万象和耿秀峰（秋收后又临时回来）呼吁那些留在合作社的人，为了避免伤和气，同意他们的分配要求。那些退社者是正派人，有价值的东西必须从经验中学到，允许犯错误，将来把合作社办得更好。在一些指指点点和暗地里咒骂之后，留下来的社员同意分配公积金、木头和草料。

在8户退社农民取走地产之后的那天晚上，耿长锁和卢墨林是在合作社的打绳作坊里度过的，耿大喊大叫，卢砸工具^⑧。1945年底，留下的9户对退社作出反应，修改了章程，决定40%的收入用于农业劳力的报酬，60%的大头划作土地红利。这些措施对那些退社者来说，为时已晚了。新章程在副业分配上还恢复了原始章程所订的内容：60%的收入划为劳动报酬，40%作为投资的红利。^⑨这些变动表明，希望吸引有较多土地和资金的人入社。不过，作为向依靠劳力赚取收入的农户的一种让步，计划吸收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而妇女劳

动一整天的工分从男人所赚的六成提高到八成。同时还决定，像耿长锁和乔万象这样越来越陷入村里事务的干部，倘把时间花在村里的政治工作上，合作社将不予补助。^⑩那是针对领导干部没干实际工作却照样拿钱的群众意见而采取的。

“半生子”李第二

1945年入社的家庭中有几户没有退社。党员张近仁和到过很多地方的姐夫魏连玉，重申他们坚决支持的态度。李辉廷老人也如此，他说，平生最大的愿望是为自己准备一个体面的葬礼，为儿孙提供一个下蛋的窝（即住房）。他那宠坏了的、赌瘾十足的儿子仍使他万分痛苦。打绳人耿长锁对他们感激之至，而对身材高大、反应迟钝的李第二有着特殊感情。在1943年的饥荒中，他家破人亡，被迫去要饭^⑪。1944年底，为了活命，他加入了合作社。32岁的李第二非常强壮，可以一只手举起铁轮大车，但他思维慢，做事也慢。村民们叫他“半生子李”，原因是他的大脑像一个还没有长熟的瓜。当半生子李遭受挫折或困窘时，就会大声叫喊，当他愤怒时，就像一头牛一样狂奔乱跳，他偶尔也会进行威胁和动刀子。

刚入社不久，半生子李背着沉重的柴火回家，坐在一辆车上的一个人取笑他说，李的两只脚还不如老牛的四蹄有用。从那一刻开始，李第二才少许想到要有一头耕畜，让它帮着干活。他央求耿长锁（叫他锁叔）买几头牲畜。一天，当半生子李正为妻子挑水回家时，他看到一辆由一匹健马拉的大车跑进村子，于是挑着水跟着跑了两里路。1945年春，合作社特地买了一头大黑骡，交由李负责饲养。他十分宠爱“大黑”，每天喂料，刷毛，并和它谈话。由于有牲口要他照料，半生子李变得更有人情味了。

李被退出合作社的讨论搞糊涂了，他感到，留在合作社和照料大黑很重要。锁叔告诉他，合作社需要他的膂力。第一年所挣的钱足够他糊口，还可以在清明节和中秋节拜祭父亲。但退社的8户中有6户与他同族，该不该跟他们走呢？第一天，他想留在社里，第二天又想退出。宗族关系太强大了。最后，他去找从未取笑过他迟笨的锁叔，长锁则说服黑脸的大力士留在社里。

1946年春节，合作社的9户农民在一起举行庆祝活动。当朋友和邻居们狼吞虎咽地吃传统的肉馅饺子时，半生子李蹒跚地走出屋子，来到了马厩，把饺子塞给大黑骡，“你吃这些饺子”，他说，“我要你为合作社拉一膀子，听到了没有？”

耿长锁越来越感到，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像一个大家庭。合作社社长耿是家长，那些有个人问题的会找他帮忙，反过来耿则要求受到尊重，首先是忠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辉廷老人入社，是为了挽救他那不中用的儿子。无论老人赚到什么，占虎都在赌桌上输掉。耿老板^②着手把占虎拖出赌窝，恫吓他，当众羞辱他，但当他在合作社劳动有成绩时，也表扬鼓励他。当这个年轻人改掉了恶习、并与十分高兴的父亲改善了关系时，耿取得了信任。耿老板是个精明、有谦让作风的人，他坚持认为挽救占虎是合作社的事。

耿和他的妻子徐树宽有时不等别人来请，就干涉社员的私事。60岁的“黑子”卢墨林与十几岁的儿媳桂芳之间的关系干分紧张。^③由于卢的妻子已去世，两个儿子又在部队，他指望桂芳料理家务，关心他和他的两个小儿子。当合作社鼓励妇女下地劳动时，桂芳看到李玉田和乔万象的媳妇穿的衣服比她好。她埋怨卢从来没在她身上花一分钱，结果黑子暴跳如雷，叫嚷着自从桂芳开始下地劳动以来，家里变得如何糟糕。耿老板和徐树宽得知卢从未考虑为桂芳买布料，并且

她一直感到很委屈之后，两人商定，从会计乔万象那儿在卢的合作社账户上取出一些钱，为桂芳买布料。他们告诉她这是公公给她的礼物。家庭关系改善了。后来耿向卢道歉，因为用了老人的钱，但说这是使每个人愉快和保持合作社顺利运作的惟一途径。

1945~1946年冬，稳健的徐满堂得到西村10户农民的支持，合伙土地为120亩。这样，五公合作社的耕地面积扩大了。除一户外，其余都姓徐。新合作社耕畜很少，这使耿合作社格外引人注目和惹人妒忌。

怀疑论

1946年初春，饶阳县召开当地的“群英大会”。耿长锁第一次代表合作社出席会议，他介绍了合作社两年来的经历，新的县政府负责人李广龙给予了肯定的评论，但其他人抱有怀疑。对于使秋天退社的自耕农们感到惊恐的合作社，他们大泼冷水^⑧。

不过，在土级领导部门，耿长锁和合作社都有朋友。是年初，林铁的部下、负责冀中地区农业工作的张克让视察了该合作社。张已听到有关该合作社的正面报道，就亲自来看看。他与耿长锁、乔万象和卢墨林进行了交谈，对合作社克服困难、帮助并救济特困户的事情印象很深。他指出，合作社在发展有利可图的绳子买卖，和把农副业结合起来上取得了成功。他赞赏合作社的劳动分工，它使乔万象的会计技术、耿秀峰的思想、耿长锁以身作则的领导能力和买卖知识、张近仁的种田技术有了用武之地。在别的地方，干部们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耿老板却不同，接受的是义务。张克让提出要向耿合作社提供技术援助。

张克让视察后几星期，耿秀峰在由第八军分区实业科召集的县供销合作社负责人会议上，汇报了饶阳农业合作社的情况。这一次，对耿长锁合作社的非难更加厉害。一些人谴责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认为把农民土地、财富和权力从家庭转移到合伙组是早熟的产物。1946年，由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处于内战的边缘，通过批判社会主义实验来使自耕农不受惊吓是至关重要的。国民党指责八路军共产共妻。来自泊镇（饶阳以东80公里的工业城镇）供销合作社的一位男同志说，有的地方传说五公事实上已“共产”了，这个消息已传遍了黄河以东的地区。有人逼迫秀峰解散合作社，或者至少把它降为互助组，即仅仅是换工和换农具，不搞土地合伙。^⑥对中国农民来说，家庭财产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秀峰回到五公后，向耿长锁通报了坏消息。不久前，当他们遵从使合作社少一点剥削的指示时，合作社几乎毁于一旦，因此他们决定消极抵抗，既不向上级汇报他们的决定，继续坚持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也不通知社员说，党组织已命令他们散伙。合作社着手巩固它的成果。由于耿秀峰的努力，合作社得到县长李广龙的支持。在饶阳，合作社还有其他朋友，如五公村前党支部书记和民兵队长徐满堂，他在1945年底调到公安局工作。没有什么能变更由冀中党委书记林铁的部下张克让所给予的鼓励之辞，以及进一步提供物质支持的诺言。

战胜暴风雨

1946年，耿长锁合作社由9户41名社员组成，包括16名全劳力和104亩土地。一些最肥沃的土地已没有了，但由于退社的是大户，因而留下的9户人均耕地面积实际上从1945

年的2亩上升为1946年的2.5亩。^⑥ 这年春天，饶阳县遇上旱灾，耿合作社体现了它的优越性。张近仁已决定，离水源很远的10亩地不播种了^⑦。相反，合作社把劳力集中在潜在产量较高的土地上。单干的个体农户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危机反应的。合作社还大量地减少粗粮种植面积（玉米、小麦、高粱），增加花生这种商品作物的面积，它不需要太多的水。花生种植面积和产量水平是1944年的8倍，合作社在市场上赚取了较高的现金收入。

合作社施用大量的有机肥，大约每亩1000斤。社里的土地几乎没有任何灌溉条件，合作社也拿不出供挖一口浅井的100元钱。无论如何，在可能退社的社员地里挖井是一种冒险。春天和初夏旱灾日趋严重时，社员们就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浇在干巴巴的地里。^⑧

挑水不是劳而无功的。夏末的小雨对于干增加小米、高粱、小麦、晚玉米和花生的产量很合适。平均亩产达285斤，比去年增长32%，人均总产量猛增到549斤，人均总收入相当于1488斤小米^⑨。全年农副业收入连续第二次大致相等。分配红利吹响了成功的号角。合作社依靠发展商业，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动员劳力，劳动分工以及众望所归的报酬分配体制，在大旱之年提高了产量和所有社员的收入。

把副业生产全部集中在绳子上的决定，使合作社大赚其钱。尽管人手少，可合作社却生产出价值30104斤小米的绳子，比去年增长37%。现在与五公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新党领导下的新的县政府，通过发放大量绳子订单而首次在合作社与新政权之间形成制度化的、保障利润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支持性的回答^⑩。耿合作社情况好转的一个迹象是，较贫困的家庭投入的土地产量要比中等收入的自耕农高。由于税收是以个人私有土地的总产量为基础征收的，因而合作社里的一些贫

农失去了他们的免税待遇。

再也听不到来自上层的有关强迫合作社散伙的说法了。1946年年中，耿老板——一个越来越有影响的民间政治家，被任命为五公村支书，该支部由64名党员组成，由他来进一步加强合作社和五公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耿老板把忠于他的人拉到党的核心集团里，第一个就是他的妻子徐树宽，她由耿书普的母亲在1946年底介绍入党，而书普则是长锁的入党介绍人。官运亨通的魏连玉也在长锁当上支书后入了党。魏显然是村长李子厚的继任者，他在1946年底选举中把魏提拔为副村长。

耿合作社的很多成功之处，以及增加上交国家的税收，已得到初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赏识。可是在村里，有着很多党员、耕畜和绳子订单的兴旺的合作社，在妒忌的村民们看来，开始像一个受到特殊照顾的群体。新生的政府越是要求村民们按照党研究过的社会主义方式安排他们的生活（就像1944年那样），文化价值观与农民家庭经济的合理性之间的潜在冲突就越大。在那些受到社会主义政权恩惠的人与所有其他人之间，以及在外来的社会主义观念与农村合作社土生土长的根基之间，裂痕产生了。

注 释

1. 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1961), pp. 166 - 178; 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pp. 61 - 70.
2.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30~31页；《人民日报》1952年3月19

- 日。
3. 《花开第一枝》(1963)，第 147 页。
 4. 《花开第一枝》(1963)，第 35 页。
 5. 《花开第一枝》(1963)，第 42~50 页；《庆祝五公人民公社集体化 20 周年汇编 (1943~1963)》，第 26~28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64。
 6. 《花开第一枝》(1963)，第 163~171 页。
 7. 《花开第一枝》(1963)，第 36、50~55 页。
 8. 《花开第一枝》(1963)，第 55~57 页。
 9. 《花开第一枝》(1963)，第 1 页。
 10. 《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7 日，1952 年 3 月 19 日；《花开第一枝》(1963)，第 41 页。
 11. 《花开第一枝》(1963)，第 13、37 页。
 12. 《花开第一枝》(1963)，第 37 页。
 13. 《人民日报》1952 年 3 月 19 日；《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31~32 页。
 14. 《社会主义之花》，第 1~2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56；《花开第一枝》(1963)，第 38 页。
 15. 《花开第一枝》(1963)，第 339~340 页；《人民日报》1952 年 3 月 19 日。
 16. 《花开第一枝》(1963)，第 166 页。
 17. 耿长锁：《过去和现在》，收入《永远不要忘记》(天津，1961)，第 56~59 页；《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9~16 页；《花开第一枝》(1963)，第 10~11、15~16 页。
 18. 《花开第一枝》(1963)，第 152 页。
 19. 《花开第一枝》(1963)，第 11~12 页。
 20. 《花开第一枝》(1963)，第 68~69、297 页。
 21.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57.
 22. 《花开第一枝》(1963)，第 65 页。
 23.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18 页。
 24. 《花开第一枝》(1963)，第 69 页。

25.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13 页。
26.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30~31 页;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13 页。
27.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39 页。
28. 统计簿, 1944~1959 年, 饶阳档案馆。
29.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48 页。
30.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1 页。
31.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33 页。
32.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35 页;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39 页。
33.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39 页。
34.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39 页。
35.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东京, 1970~1973), 第 IX 卷, 第 85~94 页。
36. 魏宏运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 第 497 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37.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40 页。
38. 《社会主义之花》, 第 1 页; 统计簿。
39. 《人民日报》1954 年 1 月 7 日。
40. 统计簿。
41. 《花开第一枝》(1973), 第 302 页。
42. 《人民日报》1954 年 1 月 7 日;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37 页; 《花开第一枝》(1963 年), 第 166~169 页。
43. 统计簿。
44.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152~157 页。
45.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115~119 页。
46.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315~318 页。
47.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40 页。
48. 《人民日报》1952 年 3 月 19 日;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37~38 页。
49.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38 页。

50. 《人民日报》1954年1月7日。
51. 《花开第一枝》(1963)，第40页。
52.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38页。
53.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38~39页。
54. 统计簿。
55.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40页。
56. 《耿长锁走过的路》，第3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66。
57.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40页。
58.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39页。
59. 《花开第一枝》(1963)，第117页。
60. 《花开第一枝》(1963)，第51页。
61. 《花开第一枝》(1963)，第50页；《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41页。
62.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43页。
63. 林铁：《我与耿长锁同志和他创办的五公大队、五公公社的关系和几点看法》（赠给作者的回忆录，1979年12月）；Donald Klein and Anne Clarke, eds.,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 pp. 574~575。
64. 魏宏运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520、521页。
65. 《河北省饶阳县革命烈士英名录》（饶阳，1981），第53页，上面列有17名战争时期牺牲的五公烈士，注明9名为党员。
66.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41页。
67. 统计簿。
68. 《耿长锁走过的路》，第36页。
69. 《社会主义之花》，第4页；《人民日报》1952年3月19日。
70.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42页。
71. 《花开第一枝》(1963)，第126~131页；萧平：《新一代农民》，《重建中国》43:1(1964年1月)，第33页。
72. 耿长锁开始担任政治机构的负责人。虽然村民们给他很多称谓，打绳人、叔叔、社长，但我们称他为耿老板，目的是说明耿长锁很好

地理解了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73.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51~52 页。
74.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42~43 页。
75.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43 页。
76. 统计簿。
77.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44 页。
78.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44 页。
79. 统计簿。
80.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第 44 页。

第四章 静悄悄的革命，恐怖之声

由于日本战败，内战迫近，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讨厌由多种阶层组成的、民族主义的合作社，以及税制改革和减租减息的渐进主义特征。1946年5月4日，中央委员会发布《土地问题的指示》，号召实现耕者有其田^①。《五四指示》反映了拉拢穷人中最穷的人、又不疏远绝大多数自耕农的意图。日本投降之后，华北好几个地方的一些比较贫困的农民和当地的抗日积极分子，没收并重新分配了土地。《指示》对这种没收土地的行为表示认可，并称许地指出，有些地方已平均分配土地，实现了每人三亩地的目标^②。但它并不主张普遍实行土地平均分配。当然，它确立的指导方针保证了土地所有权的转变不会侵犯自耕农的利益，甚至还要求归还从他们手中没收来的土地。

指示强调，要把大地主、“恶霸”和那些与日本人勾结的汉奸作为耕者有其田运动的主要目标，要求与中小地主，尤其是那些支持抗日爱国的地主进行协商。地主手中的工商业对当地经济有好处，必须加以保护。指示要求，仅仅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及人民公敌”^③执行枪决和强制没收财产。尽管有了这些限制，党却从30年代中期以来，首次号召通过没收手段把土地转移到最穷的人手中^④。7月，当《五四指示》的内容在冀中农村深入实施时，内战的硝烟已弥漫于整个华北地

区。指示对旧精英的打击多了一点，而由于获得内战胜利是党的最高目标，党的领导人开始阻止分裂农村、自断后路的全面斗争。在五公和华北大部分地区，自耕农占绝大多数。

耕者有其田

1946年秋收之后，饶阳县和第四区的官员通知各地干部，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而重新分地的依据是，战时经济改善之前1936年各户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干部们把每位村民划入某个阶级，依据是其10年前的家庭地位^⑤，不管爱国与否及税制改革中损失的土地，突然地把以前较为富裕的农民定为人民的敌人。党把“地主”定义为最大的土地拥有者，他们把大部分土地租出，还有从事田间劳动的雇工。“富农”一般指人均土地面积比地主少，自己参加劳动，剥削对象是雇工，而不是佃农。党把地主和富农称作剥削阶级。“中农”就是拥有并自己耕种土地的自耕农。“贫农”包括那些占有和耕种的土地较少的农民及佃农和半佃农。“雇农”就是农村无产者。贫农和雇农被划入贫穷的受剥削阶级。《五四指示》要求各地干部，发动这些受剥削者，因为他们是重新分配土地的改革运动的推动力。

对五公村干部来说，很难按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一对立性的新分类，对该村进行阶级划分。村民们都知道，在1936年，村里确实有有权有势的人，可他们大多是在雇工帮助下自己耕种土地。大家都明白，1936年时也有躺在炕上挨饿和由于太穷而结不起婚的人，但建立在地主—佃农关系上的阶级剥削概念，最初却源于歪曲事实的贫困状况。在战前的农村，土地出租和雇工只占耕地面积和劳力的很小部分，到30年代，所有社会群体都感受到全面衰败这一致命缺陷，它与社会动

乱、市场凋敝、战争、饥荒和土地—人口比率恶化密切相关。自清朝以来，中国的领导者都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些结构性难题。

农村的居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如宗族成员、邻居和村落），而不是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的。在20世纪中，南李宗族在五公村占据主导地位。在人数上和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李氏宗族集中在村中央。住在东村、人数较少的耿氏和乔氏宗族，与大多住在西村的张氏和徐氏宗族也都是有组织的。1937年后，由于抗日的兴起，姓耿、乔、张和徐的干部向李氏的主导地位形成了挑战。

五公村分成四个忌讳乱伦的聚居区（incest - taboo neighborhoods）：一个在东村，一个在村中央，两个在西村，由一条南北方向的小巷隔开。村民们都知道，东村以打绳为生，住在村中央者有便于灌溉的最好的土地，他们种蔬菜，西村居民则从事各种摊贩生意。

强调两极分化、剥削和社会冲突的阶级分类，根本不符合五公的实际情况：通过抗日活动，全村团结一致；社会结构中自耕农居于优势，并通过税制改革这一静悄悄的革命而得到强化；原先就有的影响富人的长期衰落同样对穷人产生影响；佃户和雇工的人数有限；租出的土地对穷人没有任何限制，且富裕农户自己耕种大部分土地。战争期间，几乎所有聚居区、宗族和经济地位的人均在抗日爱国前提下团结一致，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和八路军。此时，团结突然又让位于所谓的阶级斗争了。

64人组成的地下党支部在与第四区的领导商议后，对五公的阶级构成作出最后决定。在刚成立的农协中，参加的普通村民不多。干部们很难找到能被公正地划入地主一类的人，即使把1936年改革前的状况作为标准。在那些日子里，五公村

少量的佃户和有地的佃农所租耕的土地，占私有可耕地的2%都不到。当地干部为表示对党的忠诚，不顾现实情况，把一些村民划为剥削阶级，从而使他们成为阶级斗争的目标。

外来宗族结成联盟，把5户（全部姓李）划为阶级敌人。原村长李建亭和李化岐（与徐敦和1936年的联盟会闹纠纷者）两家被钉上地主的标记。这两户富裕的农民都租出一小部分土地，雇佣一个长工，在平均每年100天的农忙季节，还雇佣一些临时工（见表4-1）。

表4-1 1946年划为地主和富农的家庭在1936年的统计材料

阶 级	户 主	拥有土地(亩)	租出土地(亩)	长 工
地 主	李化岐	123	24	1
地 主	李建亭	80	20	1
富 农	李瀛州	122	8	1
富 农	李端府	85	18	1
富 农	李春龙	55	0	1
		——	——	——
		465	70	5

注：李建亭和李端府是兄弟，李化岐和李瀛州是堂兄弟。

有三户划为富农。李瀛州和李端府拥有的土地与地主差不多，也都雇佣一个长工，有一户租出的土地接近地主。1936年，三户富农平均每户雇佣临时工劳动93天。划为富农的家庭要比地主家大，因而人均土地面积稍小。事实上，所有划为剥削者的5户家庭，均适合于党正式划定的富农。寻找剥削者作为贫困根源的结果是，5户中有两户划为地主，被贴上穷人的阶级敌人的标记。这5户“剥削”家庭都是南李宗族的掌权者，都住在村中央或中西部，他们都支持抗日，李建亭和李端府两家都有儿子入了党，在八路军部队中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战斗。

党的领导人与较为贫困的家庭协商，从记忆中推想1936

年全村土地占有情况。他们把五公村 285 户中 60% 以上划为中农。有些两可的家庭划入哪一个都行，如耿合作社社员、党员乔万象于 1936 年雇佣了长工和短工，李老尚则租出 10 亩土地，而他们被划为中农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人均土地面积不高。有些村民嘀咕，乔富裕与东村的掌权者的关系，使他家没划入剥削者行列。1936 年，15 户自耕农靠出去做短工以增加收入，有几户自耕农租种别人的土地，但他们自己的土地面积却使他们列入中农一类。

有 103 户划为贫农。1936 年，这些贫农中仅有 25 户是有地的佃农；28 户有人做长工，大部分不在五公村；79 户有人做短工。所有这些划为贫农的家庭，包括村支书耿长锁在内，后来由于加入合作社，其财产均有所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因其 1936 年的人均土地少于一亩，所以贫农的土地远低于全村人均 3.3 亩，亦即半英亩的水平。1936 年，有 5 户没有土地。李广林、李二秃和其他人出去做长工。由于这些家庭中的男人结婚成家已不太可能，因而他们的家庭有可能断后。他们是贫农中最穷的人（见表 4-2）。

表 4-2 1936 年五公土地占有情况

阶级	户		人数	人/每户	土地		亩/每户	亩/每人
	户数	百分比			亩	百分比		
地主	2	0.7	19	9.5	203	4.5	101.5	10.6
富农	3	1.1	33	11.0	262	5.9	87.3	7.9
中农	172	60.4	808	4.7	3534	79.1	20.5	4.3
贫农	103	36.1	520	5.0	471	10.5	4.5	0.9
雇农	5	1.7	10	2.0	0	0	0	0
	—	—	—	—	— ^a	—	—	—
全村	285	100	1390	4.8	4620	100	16.2	3.3

^a 包括 150 亩庙宇和宗族的土地。

这些阶级划分与他们所反映的内容一样令人困惑。调查表忽视了副业和商业收入，而这在冀中地区对生存至关重要。不同阶级之间、甚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划分界线常常是随意的，而且划分是在长期以来情况已发生变化且通常没有记录材料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静悄悄的革命中，10年改革已加快了传统精英的衰落，对穷人十分有利。两个地主家庭的土地在1936~1946年这10年中，从203亩下降到76亩，富农的土地则从262亩降为180亩。在战时的10年中，这5户共卖掉209亩地，接近总数的一半。1946年，这些地主和富农的土地面积，仅比10年前中农的人均数（5.8:4.3）略高一点。1936年时的中农，尤其是那些占有少量土地的人，在战时也损失了土地，他们的土地总量从3534亩降到2600亩，降幅为26%。

静悄悄革命的主要受益者是穷人。战前，103户最穷的农民有471亩地。10年后，在土改之前，他们已拥有1425亩，升幅为300%。到1946年，原划为贫农的58户已获得很多土地，按1936年的标准，应定为中农。这些贫农的人均土地面积已从1936年0.87亩猛增至1946年的2.2亩。

最富和最穷之间的差距已大大缩小了。1936年，地主的人均土地是贫农的12倍，而到1946年耕者有其田运动之前，已不到贫农的3倍。1936年，中农的土地是贫农的4.9倍，而经过渐进的改革，1946年时优势已缩小为41%。地主和富农人均5.8亩，中农3.1亩，贫农2.2亩。到战争末期，穷人得到土地，富人被迫抵押和卖掉部分土地，佃农和雇农彻底消失。这场静悄悄革命搞得很漂亮，但这一为最穷的农民利益服务的渐进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却很大程度上为分析家们、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所忽视，这些领导人的目标不是财产平等，而是联合穷人反对其他人（见表4-3）。

表 4-3 1946 年五公土地占有情况

阶级	农户		人数	人/每户	土地		亩/每户	亩/每人
	户数	百分比			亩	百分比		
地主	2	0.5	13	6.5	76	1.7	38	5.8
富农	3	0.7	31	10.3	180	4.2	60	3.1
中农	172	44.4	840	4.8	2600	60.7	15.1	3.1
贫农	210	54.2	636	2.9	1425	33.2	6.7	2.2
	—	—	—	—	— ^a	—	—	—
全村	387	99.8	1520	3.9	4431	99.8	11	2.8

^a 包括 150 亩宗族和庙宇的土地。

注：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没到 100。

撇开战争死亡（包括 17 名八路军战士和几十名在日军袭击中被杀的村民）和 1943 年饥荒饿死人的情况不说，10 年内五公人口增加了 130 人。男性贫雇农的经济状况好转，使大多数人结婚娶妻成为可能。当贫农家庭的规模和收入在这 10 年中有大大提高时，“分家”这一传统做法又出现了：夫妻俩建造新的泥砖房屋，耕种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建立自主家庭。在静悄悄革命期间，以 1936 年的数据为基础划为贫农中的许多人，到 1946 年时，已成为农村生活的主流。这些农民亲身体会到，生活又被整合并赋予道德意义。

在理论上，大多数人被划为贫农表明，阶级对抗是普遍的。可事实上，1946 年包括那些被划为贫农在内的绝大多数农民都是自耕农。如果五公的阶级构成是以 1946 年的土地占有关系为依据，那么，按照用于分析 1936 年土地状况的标准，几乎所有农户都将被划为中农。

不过，五公村正面临着一个现实危机。经过 10 年改革，

较多人耕种较少土地的现象趋于严重了。给穷人带来稳定收入、避免在饥荒中饿死、使穷人能够结婚的这些条件，刺激了人口增长。1936~1946年间，五公人均土地面积从3.3亩降为2.8亩，人口加速增长十分明显。

在1946年耕者有其田运动之前，10年渐进改革构成了一次土地革命。五公村最富有者的土地通过和平途径减少了1143亩。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这种和平方式维持了农村内部的团结。李华歧和李建亭两家的土地已从203亩减至76亩。但在1946年，党的领导人坚持，人人在阶级斗争和重新平均分地中，都要向“先进”看齐。而如果不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打倒“阶级敌人”，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与冀中的大部分地区一样，无论在1936年还是在1946年，五公都没有大地主。《指示》把大小地主区分开，并要求由农民们对地主家庭的抗日贡献作出评价。如果该村没有大地主，存在着广泛的爱国联盟，那么制造分裂的斗争和暴力冲突就可以避免。当耕者有其田运动在华北某些地区以十分糟糕的调子进行时，五公村干部们强调《五四指示》中的适度打击，藉此保持村庄的团结。

平静的革命

五公村村长李子厚与支书耿长锁通过强调“耕者有其田”这一口号的文字意义，找到一些重新分配的土地。五户地主和富农为了减轻税收负担，被迫把几块土地抵押而不是卖给较穷的族人。属于庙宇和宗族的几小片地也以优惠的租金让给穷人耕种。五公村便把这些土地的产权转让给这些耕种者。再有，虽说允许地主和富农有足够的土地维持生计，但除此之外的任何土地都须分给最穷的人。

耿的领导班子派一个小代表团到这5户“阶级敌人”的家中，心平气和地商谈转让土地和牲口、农具和部分房子等财产。已故地主李建亭的小儿子、19岁的李茂修，在家里接待了农协代表。他的父亲是受人尊敬的前村长，哥哥是党员和八路军战士，茂修在抗日中也很积极。不过，由于到处在传说要进行暴力斗争，小心谨慎似乎能确保安全。茂修的妻子、23岁的范淑芳已带着孩子回娘家，避免受到冲击。淑芳是范苑村人，她父亲的土地刚从55亩减少到几乎为零，她的弟弟在八路军部队中牺牲了。1945年，她与茂修结婚，当时他17岁，她21岁。1946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李伟。在五公，范淑芳被划为阶级敌人，因为她是地主家属。可回到范苑村家中，她却是受党保护的烈属，她的大哥在饶阳第二区党组织工作，对一个妇女来说，村社和血缘共同决定着她的阶级成分。

茂修的父亲李建亭在几个月前去世，哥哥李锋在八路军打仗。茂修在自家院子里等待代表团，其中有李家所属的两个帮工。代表团把十几岁的茂修当作户主对待，宣布必须对过去的“剥削”进行清算和赔偿。他倾听着，接受了这些要求。没有暴力。代表们哼着歌，敲着鼓高高兴兴地走了。

五公村的家庭成分划定后几天，没收委员会办理了所有权转让手续，给李家7口人留下了21亩地，等于1946年的中农人均土地面积。他们继续住在宽敞的李家大院的一个角落里，其他房子则分给几个贫困家庭。在征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李茂修因其合作态度而受到表扬。

在调查了另外四个目标户之后，可供重新分配的土地共计145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3%。被没收的土地不止这些：属于庙宇和宗族的150亩地也全部被没收。最后，5户富裕中农被逼交出30亩地。总之，在1946~1947年冬，共有325亩（占全村土地面积9%）被分给贫困家庭。在由耿长锁领导的

平静改革中，共有 10 户家庭损失了土地。耿向上级汇报说，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耕者有其田的工作。在土地问题上存在的不平等情况很少，而在耕畜和水井的所有权问题上的不平等仍较多，但通过没收的办法进一步平均化，会伤害绝大多数中农的利益。

耕者有其田运动的一个受害者是受欢迎的东村的三官庙，它是五公村惟一拥有很多土地的庙宇。《五四指示》把出租土地的组织列为剥削者。在整个战争期间，党一军队发起了反对迷信的运动，说服村民们不再重建倒塌的寺庙。据记载，饶阳城东的河神庙建于宋朝，规模较大，而上级要求拆毁它。庙宇失去了他们的土地。铲平庙宇是党摧毁当地宗教神祠工作的一部分。村干部们认识到，国家有个新面貌，必须反对宗教。

土地被没收，三官庙被铲平。没有人与信徒商量。党的干部们宣布，拆下的砖用于建一所学校。信徒们把一些小神像带回家中。庙宇被亵渎和摧毁时，住在庙中的尼姑田常瑾只得孤立无援地站在那儿。最后，她在当地的集市上把残留的大神像卖掉，换取一点微不足道的钱。入党不久的年轻人张朝可，窃取圣物似地把一个大神像的头拖回家，其发怒的母亲命令他立即送回去。

1946 年底，共产党控制了第八军分区 3553 个村庄中的 88%。分区在为冀中党委准备的一份机密调查报告中指出，党控制的 3136 个村庄仅 43% “彻底地”进行了耕者有其田运动，38% 的村庄部分地执行了指示，19% 则毫无动静。^⑤五公属于彻底执行指示的村庄之一，分给农民的 325 亩地，与第八军分区的平均水平相比略少一些，而同冀中的平均水平差不多相等（见表 4-4）。

表 4-4 1946 年 10~12 月冀中地区土地转让情况

分 区	土地转让的村庄	转让总亩数	平均每村转让的亩数
第 八	1440	538302	374
第 九	1443	428655	297
第 十	716	287740	401
第十一	699	150740	215
	—	—	—
	4298	1405437	327

到了 1946 年，饶阳西南街村同样已消灭了佃户，该村 2711 亩可耕地中共有 482 亩被没收。在阶级划分中，没有人被划为地主，共有 295 亩地、人均 5.9 亩的 4 户富农则成为没收的对象，他们自己耕种 199 亩，剩下的几乎全部抵押给别人，以逃避税收。宗族、庙宇的土地与较为富裕的农民所抵押的小块土地都进行重新分配。耕者有其田运动之后，留给这 4 户富农 121 亩，人均 2.5 亩，相当于中农的水平。

内部报告表明，在第八军分区党组织领导下的 3136 个村庄中，约 2229 个村庄划定了“斗争对象”。杨各庄有两个目标，即一位地主的遗孀田寒和被划为富农的政治斗争对象白季栾。全区共有 7357 户，平均每村有 3.3 户划入阶级敌人范畴，其中 68% 为地主和富农，其余则是汉奸、恶霸和军阀。在大部分村庄里，没有发生暴力冲突。1946 年，第八军分区的耕者有其田运动似乎是 10 年改革期间没有完成的平静革命之延伸。

不过，在这个自耕农占多数的地区，在很多村庄中，重新分地的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要求进行土改的冀中 8567 个村庄中，仅有 4278 个转移了土地所有权。许多当地的干部对执行指示仅仅走过场。调查人员估计，还有 65 万亩地必须重

新分配。

战争灾难

1946年末，流血战争打响的消息传到五公。7月，国民党发动进攻，迫使共产党部队撤退。在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并开始夺回华北和华中的县城，打通长江以北的交通线。在五公以南的晋冀鲁豫交界地区，战斗异常激烈。从1946年9月到1947年1月，共产党方面丢失了25座县城中的24座，包括冀南地区首府邯郸在内。3月，国民党攻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时司令部延安。国民党进攻部队向华北全境挺进。

与日本人一样，国民党集中火力进攻主要城市，以及重要的铁路线的西部、东部和南部地区中比较富饶的县。战火从未烧到饶阳，就像每次战役都需要物力财力一样，内战需要根据地和人口。由于八路军没有条件接受国际物资援助，只得依靠国内供应粮食、盐、棉花、鞋和其他必需品。与抗战时期一样，饶阳县人民忠心耿耿地为前线提供支援和兵员。

农村党组织的角色与前线部队的使命交织在一起。周元久是西村贫困的爱国家庭中的一员，他的大哥、中共党员周河在1939年随一二〇师在遥远的新疆省（原文如此，有误）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他的弟弟在1943年饥荒结束有饭可吃时，因暴食而亡。这种情况很普遍。另一个弟弟也是党员，在1945年的战斗中牺牲。因此，只有孤苦伶仃的父母亲留在家中。在山西前线当无线电发报员的周元久在攻打大同的战役中受了伤，在战区医院中接受治疗，当他仅存的兄弟在战斗中牺牲的消息传来时，他赶忙回家照顾双亲。

党不能接受这一行为，她已为战士家属安排了一系列特殊

保障，使他们在战斗中没有家庭的后顾之忧。老人的下葬费用不用担心，收入至少能达到平均水平。过年时，军属家庭可吃到肉馅饺子，村里的领导会来看望那些缺少劳力、在农忙季节需要帮忙的家庭。在土改期间，这些家庭有时会得到额外的土地，即使缺少劳力耕种。战士的妻子不能提出离婚。

元久到家后发现，他家已获 14 亩良田。但党把他回家当作可耻的违反职守来对待，认为这是破坏村一党一军队关系的行为。周被宣布为开小差，党不顾他家所有的流血牺牲和他自己的贡献，把他开除出党。同样，有一位饶阳县委书记是独子，他拒绝随部队南下而抛下年迈的双亲，乡亲们尊敬这种孝顺行为，但他却被开除党籍。有些人因把家庭传统放在党的准则之上，而吃了苦头。但是作为包办婚姻的产物，地主李茂修的妻子范淑芳在五公村深受其苦，而在范苑村却又以烈士的姐姐受到特殊照顾。只要和军队的关系获得一种回报，生活也就好过些。在重新分地运动期间，她住在范苑村娘家。

1946 年秋，又有三户加入耿长锁合作社，从而增加到 12 户。中农刘树芳的丈夫在八路军中服役，于是她把土地投入合作社。由于她是军属，村政府有责任负担她的福利。军属和烈属可以每月从村长那儿领到 30 斤粮食^⑦，政府担保给予军属特殊待遇。

25 岁的张规为了结婚娶妻而加入合作社。战争期间，他家靠租种宗族的两亩地勉强糊口活命。在战争初期，张也当过耿合作社创始者中最富裕的乔万象的雇工。1946 年，耿合作社中第二号人物魏连玉说服张规入社。没有子嗣的魏对年轻的张给了父亲般的影响，当张需要钱和忠告时，就去找魏。张经济拮据，不可能娶到媳妇。他没受过教育，没有技术，没有土地，也没有积蓄，怎么可能请媒人帮他说亲呢？魏劝说道，加入合作社是张规结婚娶妻的惟一途径。

内战日趋激烈，八路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饶阳县发起了一场参军运动，共有700人人伍。就在1947年春节后，村长接到命令，要求把粮食运到西面的太行山根据地战区。16~55岁之间的健壮男人被征去从事运输工作。耿合作社拿出两辆大木货车中的一辆，骡子“大黑”，半生子李赶车。合作社向他保证，如果在运粮过程中死了，他的家人将享受烈属的待遇。^⑧

当一大群运粮的农民接近前线时，国民党的飞机发动袭击，赶车人弃粮而逃，可半生子李却把骡子赶到安全地方，他不懂政治，但这一幕却唤起了他对敌人的强烈憎恨。他们胆敢杀大黑！当他回到五公时，他证明，“这头骡子确实是从天上派到人间的神灵，它一看到敌人的飞机，就跑到一边，子弹都不敢靠近他！”五公的4个车队把8万斤粮食送到前线，这几乎是该村全年的交税义务。^⑨

秋季，伤亡增多。打绳人耿的合作社中，两个老社员乔万象和曾沉湎于赌博的李砚田，在沿京汉铁路、大清河以北的一次战役中志愿当担架队队员。耿合作社还帮助本社以外的家庭，只要他们的儿子在前线用担架抬送伤员。^⑩东村年轻的妇女积极分子乔文芝把村里的妇女组织成一个个小组，为民兵和正规军缝制军鞋。

在饶阳县政府供销科工作的耿秀峰，继续宣传五公村。7月，冀中军区农业局局长张克让邀请秀峰出席晋察冀边区政府召集的土地政策会议。张在1946年视察过五公，并成为它的支持者，他要求秀峰对合作社历史做一汇报。晋察冀根据地最高军事领导人聂荣臻也出席了那次会议，并对耿合作社很感兴趣。^⑪毛泽东本人对合作社在战争时期得到壮大一事印象很深，秀峰把这一消息带回到五公。

可是，内战的破坏使耿合作社损失严重。1947年粮食产

量下降 18%，亩产仅 234 斤，合作社种了 3 亩棉花，这是部队急需的庄稼，但亩产仅 25 斤。^⑧人均粮食总产量 382 斤，是 1944 年以来的最低点，尽管新榨油机赚了一点钱，可副业总收入还是下降了 17%。

不过，耿合作社的情况要比其他合作社好得多。游击队第一任队长徐义洲在 1946~1947 年冬组织了一个新合作社，由 7 户西村农民组成，共有 50 多亩地，但从一开始就信心不足。人们对这个新合作社能否运转、领导的能力如何表示怀疑。这个合作社经营小规模棉纺副业。它维持的时间较长，直到春耕和播种，可在 1947 年小麦收割前就解散了，然后各自收割自己的庄稼。耿合作社虽遇到经济滑坡，但仍团结一致，徐老兵把这归结于耿的非凡领导能力。

消灭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在 1947 年下半年，共产党加快了土改步伐。一些领导感到，耕者有其田运动已停止和失败。到处都有农村党支部严重腐化的传闻。过去有人对统一战线进行严重歪曲，它曾使比较富裕的农民支持共产党，至今仍很成功。现在又称已有地主成分渗入党内。7 月 7 日，华东局指责说，由于山东地方领导在处理地主与富农的问题上太宽大，没能满足穷人的土地要求，导致部队征兵困难，危及党的战争动员。^⑨对军烈属的诺言也没有兑现。

3 月，共产党的首都延安陷落，党中央分成两部分，其中一支由刘少奇带到晋察冀边区的司令部，在这之前，领导人就一致同意，要解放群众，就要进行土地所有权的彻底平均化。因此，在“一切权力属于无地和少地的农协”这一口号下，通过财富分配进行农村合作，而以前大获成功的统一战线政策则

被当作党内封建调和、右倾错误、富人阴谋看待。^①在7月17日至9月19日，中央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代表们集中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讨论土地问题，拟订对策。会议由刘少奇主持^②。

与会的关键人物是康生^③，他是斯大林大清洗期间在苏联训练出来的公安问题专家。康在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陪同下参加了这次会议，毛让康生负责对他儿子的政治教育。在西柏坡，5个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董必武，住在一间大屋子里，他看望了康的随行人员。康坐在会议桌的首席，显示出毛泽东对他的宠信。他介绍了他在山西林县以严厉的手段搜出地主埋在地下的财富的经验。它是会议赞成恐怖手段的一个信号。

107名代表赞同刘少奇提出的进行阶级斗争的土改口号，由此要把贫困农民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在西柏坡村，最后一个大地主齐少山早在10年前就放弃了他的土地，“这样小日本就不能侵占它”，这使他获得了爱国者的名望，成为开明绅士。在根据地区域内，只有少数地主存在。可是，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土改运动的基本方针，它指出“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强调地主和富农“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它说，农民们要求消灭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没收土地，均分给穷人^④。

指示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在有的省份，历史上佃户的比例较低，尤其是根据地地区，改革已剥夺了地主的权力。1937年之前，河北和山东两省佃户的比例全国最低，在10~11%之间^⑤。大部分是破落的有土地的小生产者，而只有少量佃农和雇工。长期以来，五公和冀中其他村庄已消灭了地主势力的残余部分。而且许多村庄在1946年耕者有其田运动以后，已没有什么土地可分了。但新指示的第六条要求，由乡村农会

没收地主、富农的财产和全部公地，然后“与所有其他村庄的土地合在一起平均地分配”^⑨。它号召重新分配土地，即使那意味着要从被党定为中农的绝大多数自耕农手中获得土地。

10月，晋察冀边区召开了长达一个月、有1000多名干部参加的会议。边区最高军事领导人聂荣臻热情地支持土地所有权平均化的新政策。^⑩代表们受到警告说，许多农村干部在执行《五四指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中，犯了“右倾错误”，也就是说，许多阶级敌人的残余势力尚存，受剥削的穷人还没挣脱封建枷锁。指示要求在残余的剥削中，寻找农民对军队征兵运动和军队后勤工作反应不热烈的主要原因^⑪。

但是，理论常常很难解释现实，这集中体现在名誉扫地的吴满有这一战时运动中最著名的农民模范身上。在40年代初，由于吴从贫困中勤劳致富，受到了毛的赞扬。当毛在1947年撤出延安时，吴留了下来，投靠了国民党。党说他是个政治叛徒，认为经济等级是罪恶之源，因而攻击吴是个富农。^⑫在党内教条主义者看来，富裕本身就很可疑。

党委书记林铁反复号召打垮剥削者，他愤怒地指责冀中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处于严重的混乱之中。腐败和公开的消极怠工已严重阻碍了耕者有其田运动的顺利进行。在冀中党委秘密刊物《工作通讯》的扉页上，林铁断言，“为了贯彻党的平均分配土地政策，整党是绝对必需的”^⑬。1947年，整个华北同时发起了整党和土改运动^⑭。

内部报告指出，地主和富农控制了武强县和深县（饶阳南面的邻县）636个党支部中的248个。在这两个县中，仅有24%的支部被鉴定为“好的和基本好的”^⑮。在饶阳东面的献县，当地许多党的干部贪污公积金，并在耕者有其田运动中对分配的土地敲诈勒索。被要求送儿子上前线的农民们受到战时牟取暴利者的迫害。调查人员指出，在献县的23个村庄中，

农民们十分痛恨当地党的干部，而且其中 12 个村庄的百姓表示，强烈要求与腐败官员作“斗争”。在其他地方，农民们抱怨给予军烈属经济援助的诺言没有兑现。^⑧因此，党便消灭经济精英，从而进一步加强那个由不受制约的权力而导致的腐败制度。党的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正是他们的政治制度，造成了他们声称要解决的问题。意识形态障碍和自身利益使新生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收益人不能认识到，它的政权结构如何滋长了党内掌权者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干出腐败的事情。

按照言辞激烈的上级指示，饶阳县派出工作队，对党组织进行审查，对第一次土改进行复查，彻底执行没收并平分土地的《土地法大纲》。党的理论家于光远带了一支土改工作队到饶阳杨各庄，发现这个地区并没有大地主。不过，在农村寻找剥削者的分裂活动仍在继续。

11 月，饶阳县委派张玉昆负责在五公的整党工作，纠正右倾错误。张到五公村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在审查之前，剥夺耿长锁和其他负责人的所有权力。工作队控制了全村，并宣布现在权力掌握在刚成立的贫农协会手中^⑨。五公村支部的党员在 1938 年建立后 9 年中，第一次公开了身份。工作队把党员们当作审查对象。华北所有党的地方领导都被非难为腐化、任人惟亲、思想右倾，应对破坏 1946 年土改和军队征兵工作负责。^⑩

在去年的土改期间，五公党支部按照 10 年前的情况进行土改，漠视副业生产的经济作用，并把盟友划入贫困阶级的行列，搞了一些政治偏袒，结果，全村的不满情绪很容易集中到耿长锁身上。张玉昆命令“封上”所有被认为是富人的家门。他们把家门被封者当作剥削者和敌人，列为预期目标，这些人的土地将被没收和重新分配。张要求穷人中最穷的人在这些家门口布上警戒线，防止他们转移个人财产，同时可以显示出富

有战斗精神，可是几乎没人响应。

骗局和技巧能魔术般地激发热情和捏造阶级敌人。张宣布，参加警戒的每个人，将有权保留这些受怀疑家庭秘密转移和隐藏的任何财产。这就挑明了利害关系。无家可归、穷得结不起婚、原是雇工的李广林和瘦小而狂热、有7年党龄的老党员、西村21岁的张端，志愿到斗争对象的门口警戒。在抗战初期，张端在地主李茂修的手下当过五公村儿童团团团长，1940年继其父亲之后入了党，时年14岁。张上学晚，个子比同学高，因而显示出自己是个维持纪律的人。人们逐渐把他看做“凶猛且保守的人”。他加人民兵，在1946年底的土改中，被定为中农。^④

在一些村子里，这种阶级斗争运动使一部分人走上领导岗位，他们最具有好战精神，反对有威望的前领导人，其中很多新的地方掌权者是年轻的无家可归者，甚至是没文化的恶棍。有些人利用运动攫取权力，忌妒成性，强奸偷盗，牢固确立自己和老朋友的地位，并表明自己是绝对忠实于阶级斗争的行动者。

在五公，除了凶猛的张之外，其他人也逐渐紧随其后，其中最突出的是西村的老民兵徐义洲，他当过游击队长和支书，由于以东村的耿秀峰、耿长锁、耿书普、乔恒泰和乔万象为首的一批东村居民的出现，他被搁在了一边。西村人对东村的干部很不满。当参与警戒者达到50人时，工作队宣布，组成五公村贫农协会。原是雇工的李广林担任会长，他是个没有阶级瑕疵的政治门外汉。

张玉昆对当地党员和干部的审查依赖于李广林的贫农协会的证词。老民兵徐义洲和凶猛的张端在审查中取得巨大胜利。可是在1946年和平土改中把自己划为贫农的耿长锁，被工作队判定为阻碍土改的中农阴谋。他们用运动的行话指责耿老板

是压制和扼杀革命活力的绊脚石。运动的始作俑者让水平较低的人抬走这块石头，把受剥削穷人的阶级能量释放出来。

对两个老党员——一个是自 1941 年以来担任村长的李子厚，另一个是副村长李正邦——的批判最为激烈。1946 年土改中，两人都被划为中农。作为村长，李子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都负责收税，按要求完成战时对徭役劳力的征用任务。农民们没有从日军、八路军或由它改编的人民解放军那儿得到报酬。1947 年，李在抗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里的管理工作，遭到多数人的齐声反对。在饶阳的一些村子里，干部们受到恐吓和毒打，有时让出手中大部分权力，他们察觉到被不公正地当成了替罪羊。其他人则逃到分区、镇和县城，躲避恐吓。在以后的审查中，张玉昆工作队与贫农协会合作，准备重新划定阶级成分和分配财产。当邻居们成为没收和蒙辱的对象时，村民们感到十分忧虑，工作队在村里的三个地方公布了各户的阶级成分。

在全村 387 户中，71 户富农家门被封，包括五公合作社的创始人耿秀峰。在整个华北，成为斗争目标的家庭被赶出家门。在五公村，一些不幸者在长达一个月的折磨中，就住在泥巷子里。有的则在逃离五公的地主李化岐空荡荡的家中搭个临时住处，李共有 15 间房和两个院子。其他人的家门虽然被封，但允许他们住在院子里。目标户的土地、牲口、农具都登记在册，准备最后处置。71 户家庭的可动产被运到贫农协会的会部进行分类，重新分配要等阶级成分正式重新划定之后。

但是，工作队如何划定耿长锁合作社社员的阶级成分呢？合作社提高了所有社员的收入。半生子李、结了婚的张砚、黑子卢墨林、种田能手张近仁和老头李辉廷等人生活一直很贫困，即使在早期改革之后，土地仍很少。但合作社引起大家注意的优点——成功地改善了社员生活，按照教条主义者的标

准，现在却应受到公开的谴责，并加以没收。阶级斗争需要有财产作为阶级剥削的证据，而到1947年底，耿合作社有一匹马，三头骡，两辆大车和两把犁，还经营两种赢利性的副业，打绳和加工花生油。忌妒的村民们抱怨富裕的合作社应交纳高税。张玉昆工作队和贫农协会把耿合作社定为富农组织。

耿长锁震惊了。合作社忠实地执行党的指示，调用其微薄的财力物力尽力支援战争，帮助军属和贫困户。就在一年前还被选作合作社发展的典型，现在却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耿和合作社第二次受到了极端政策的欺压，而这一政策的依据是把剥削视作非法获取财产的阶级观念。第一次是在1944年冬，外地人强迫改变合作社章程，减少假想中的劳动剥削。结果是合作社失去了一半社员，其他很多合作社纷纷散伙。现在，初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代表要求用没收的手段均贫富，他们正把合作社放在阶级敌人和叛徒的位置上。耿相信，把财富当作剥削的产物来对待是荒谬的，于是跑到饶阳县城找县委书记李太寻求公正，但李把耿送回家，说工作队会公正地解决问题。同时，在离饶阳不远的冀中地区党委的庇护人张克让和林铁，则对耿如何生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工作队试图忠实而准确地实施1947年的土地法，它号召没收和重新分配由富人掌握的70~80%的土地。但如果没有富人怎么办？1947年，在五公、冀中和华北许多地方，如果原来的富人现在仅有一小部分土地怎么办？前10年党的改革措施削弱了已在衰弱的地主势力，以至于根据地的政治敌人已是党领导下的小农社会。可是党强行贯彻的分类法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根源是少数富人对多数穷人的剥削。掌握着惟一真理和惟一成功阶梯的党，迫使像张玉昆这样的地方官员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对当地的公正观念恣意妄为，而不这样就会引起上级的震怒，怀疑他是否忠诚于党和党的领导。按照当

地的实际情况去做，不揭露某人（即运动中攻击的主要目标）的右倾错误，就会葬送自己的前程。在上级的高压下，很少有干部敢冒这个险。

饶阳北面一个贫困村庄，忠实地把5户定为地主，10户定为富农。在一次所谓拉地主的运动（这种斗争传遍了全县）中，地主们在公开大会之前就被揪住，要求交代他们把金钱藏在什么地方。倘若他们不愿合作，人们便把他们的手脚用绳子捆起来拖在地上拉着跑，直到他们供认。有一个村子，把两个地主斗死了；另一个村子，一个地主和两个富农自杀。还有其他活埋人的报道。

孤 儿 们

12月底，张玉昆工作队造成混乱之后6个星期，附近村庄的一个熟人，抱着两个五公村的孩子，出现在受困的耿长锁的家门口，她一边哭泣，一边诉说，12岁的女孩李转和6岁的弟弟李坛是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的父亲有13亩地，原在关东赶大车。1946年，双亲去世，他们的姑姑没有条件照顾这两个孤儿。她恳求道，合作社比哪家都有更好的条件照料他们，耕种他们继承的土地，只是人太小，不能干活。她问，耿的合作社是否真的很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耿拒绝了她的要求，因为1947年的收成很差。现在被划为“富农组织”的合作社又有自身的难题。孩子是她的亲戚，她应该照顾他们，但这位姑姑走了，说由耿来解决这个问题。^①

耿召集所有社员讨论孤儿的问题，大部分人认为，孤儿与他们没有任何瓜葛，孩子的确有13亩地，但他们却不能干活，还要负责喂养、穿衣，照料多年，合作社又不是孤儿院。但耿和徐树宽认为，不应该让孩子变成乞丐。其他人愤怒地回^①

道，如果孩子加入合作社，那么我们不久都将成为乞丐，而且村民们会说三道四，说富农合作社正在剥削孩子。裹脚的、6个孩子的母亲徐树宽曾被迫卖掉自己的孩子，她说，合作社社员负担孩子的口粮，不要交付他们的土地红利，她负责照顾他们的一切。这样也就找到了合适的理由，最后耿和徐不顾其他人反对，接纳孤儿为社员。^⑩

5周之后，就在过完1948年春节后，一位80岁的五公老汉带着他的两个孙子，10岁的李秀英和6岁的李孟杰来到耿的院子里，孩子穿着白色的孝服。抗战时期，他们的父亲到华南地区福建省的一个纺织厂做工，杳无音信。他们的母亲去世时，刚成立的贫农协会送来了一口棺材及葬服。革命恢复了一些红白喜事的仪式。经济衰退已停止，只是没人愿意照料孩子。老人恳求耿让他们入社，他们无家可归，仅继承了5亩薄地。

一些社员看到去年收入减少，政治上失意，于是反对疲于应付的合作社承受一批孤儿带来的沉重负担。但徐树宽和她丈夫宣布，不管其他人同意与否，他们要让孩子入社。姐弟俩与第一对孤儿住在一起，由树宽照料。徐和耿又成功了。

革命使一部分家庭得到了保障，就连遗弃的日本孩子也得到了照料。党的领导人因帮助抚养孤儿而闻名。受中国文化观念的影响，中文的马克思传记突出了他有4个孩子在婴儿或儿童时期死去，而且马克思竟买不起一口小棺材给女儿。由于耿合作社抚养了在五公没人想要的、李氏宗族中贫困交加的孩子，因而给人的印象不是自私的富农组织。合作社保留了有关孤儿福利的详细记录，目的在于向持怀疑态度者表明，这远非欺骗或剥削他们，而是照看他们的财产。^⑪他们投入合作社土地的红利不敷生活开支时，合作社就贷款给孤儿。孤儿们积累了一笔可观的债务。一些社员对自身是孤儿的徐树宽的做法不

满。在社员们的开支上，她完全为孤儿们着想。她把用于副业生产的公积金挪用到抚养孤儿上。李转和李坛需要棉被时，老徐就从合作社拿一条，孤儿们住的房顶需修补，她便让半生子李用两张席补洞，而当他以席子是合作社财产为理由拒绝时，老徐大为恼火，大声吵了起来，然后自己走到供应室去拿席子。^③

也许是心理上有创伤，喜欢恶作剧的李坛一直招惹麻烦。他逃学，朝井里撒尿，在地上甚至在人家的碾石上大便，对此没有人宽恕他。他又是个好斗分子，当他要吃亏时，他那瘦长的姐姐立即赶来保护他。有一次，他把耿旭打得身上淌血。耿的祖父追打李坛，而徐树宽则上前阻止老人，并数落他。如果村民们在任何有关孤儿的问题上与徐纠缠在一起，那他们就是自找麻烦。

全 国 统 一

1947~1948年冬，党中央收到了很多反映群众意见的报告，即反对平均化和恐怖的土改。许多县反映：对当地干部的攻击挫伤了经验丰富的领导同志的积极性，破坏了团结，妨碍内战的胜利进行。分裂中国社会只会妨碍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第一个提出，要控制1947年土改中升级的暴力行为。内战到了十分微妙的阶段。初夏，国民党停止发动进攻。11月，40万人民解放军经过9天的战斗，攻占了饶阳以西重要铁路枢纽石家庄，这是在长城以南攻占的第一个大城市。此举使山西、河北、山东的根据地在军事上联成一片。^④不久，国民党重新把部队从东北调到华北，使这两个地区都变得很空虚。解放军则在华北调集部队开进东北。解放军在华北的胜利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开始。

1月，约瑟夫·斯大林的特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朱德会谈。米高扬通报了斯大林的要求，即人民解放军不要把全部力量投入战斗，应寻找与国民党进行和解的办法。斯大林担心，持久的战争会导致美军卷入中国战场，威胁苏联南部边界。可是，米高扬一离开西柏坡，毛就自豪地宣布，中国的革命军队将继续前进，解放全中国，并坚决要求苏联给予承认。

共产党领导人在土改的重点问题上意见分歧仍很深。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一方面号召保护中农的利益，另一方面强调首先“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他警告说，“许多地主、富农和社会渣滓已混进党内”^⑤。不过，整个冬天，党都在调整她的土改政策。1月，任弼时指出，华北农村有10%的农户被错划为地主与富农。他说，由于那么多的战士来自自耕农家庭，这种伤害中农的平均土地所有权的政策，会导致内战的失败。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农和在战争时期获得土地的新中农占农户的50~80%，贫农只占人口的10~40%，在这样的乡村，土改进行的较为彻底^⑥。党撤回了分裂农村社会、损害绝大多数自耕农利益的重新平分土地的政策。

这股政治风气吹遍了整个华北。新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原工作队的阶级斗争错误。贫困的耿口村支书等着从未到来的工作队。他知道，在一个小村子里，把23户划为剥削者是错误的。同时，已经占据这些家庭住所的最穷的人，则要求有永久居住权。村支书拖延应付，寻找推迟非法转让的办法。全村处于分裂和焦虑之中。图谋报复的情绪在加剧。在耿口，齐心合作已是不可能的了。

3月，张玉昆的工作队离开五公，由第二支工作队取代，

目的是为了执行任弼时的讲话和2月22日的党内指示。工作队由王福录和高紫霞这一对夫妻，和一个名叫王林的年轻作家组成，王林后来长期住在五公。所有成为先进典型的村庄都有作家派驻。工作队直接向冀中军区党委书记林铁作了汇报。

新工作队得到上级指示，不能损害中农的利益。他们到五公后，立即解散了由李广林负责的贫农协会，然后审核并赞扬1946年底由耿长锁搞的第一次成分划分^⑧。地主和富农的户数又减为5个。在他们的余生中，每人都将背上这次固定下来的阶级成分，而成分的划定则是依据其在1936年家庭地位的政治化评价。^⑨家庭成分有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内涵，他通过男性血统带给妻子和子孙。那些划为地主和富农的儿孙们面临着折磨和当替罪羊，而阶级成分越低微（贫农、雇农），则其新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就越高。新工作队把被第一支工作队划为“新中农”的58户家庭，又恢复为贫农成分。大多数划为中农的，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中间游离状态，有时与阶级敌人为伍，有时又跻身于好人的行列。确切地说，这种想象中的有关阶级的科学分析，充满了主观性和政治色彩。

一旦生活被冻结在单一模式中，命运便被永远地封存不变。在充满阶级斗争的土改中产生的不是解放和平等，而是一种类似于种姓等级制的东西。抗日活动分子和五公早期党员李凤祥是饶阳的一支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他在五公村被定为富农，这样的阶级成分能够结束一个人的政治命运。有些远离老家或在革命队伍中爬得很高的人，可以用“革命干部”这类美妙的词语取代该死的家庭成分。像数千个饶阳籍部队官兵一样，李凤祥能够崛起，李茂修的兄弟也如此，可爱国的弟弟茂修在土改期间留在家中，则遇到了不幸，承袭了父亲的地主成分。当工作队确认1946年仅把三户划为富农是正确的时候，家门被封、财产被没收并堆放在贫农协会会部的71户农民才

释去心头的重负，松了口气，可以拿回自己的财产。耿口村则不同，并没有从对立的阶级斗争中解脱出来。

虽然五公村新工作队赞同 1946 年的阶级划分，确认只有 325 亩地可用于重新分配，但它改变了原来的分地方式。1946 年土改把长工耕种的土地，和土地所有者典当、出租、抵押或“贷出”，即实际上在耕种者手中的土地，真正地转让给耕种者本人。1948 年初，工作队宣布，1946 年分地无效，收回土地，把它和其他没收来的财产一起重新分给土地最少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已在耕种它。这次所有土地与财产的转让，包括 10 头牲口和 32 间房屋，都按饶阳县第四区政府提供的户主（heads of house），记录在正式的所有权协议上。⁹⁹在许多村庄，刚获得土地的农民被告知，毛泽东是他们的大恩人。

五公村的受益者中，有前贫农协会会长李广林。没有土地的李获得 2 亩地，1/4 头驴，1/4 辆大车和 5 间房屋。另一个是 1947 年阶级斗争和土改初期的积极分子、老民兵徐义洲，他分到了 5 亩地，再加上三口之家原有的 5 亩地，他还分得 1/4 头牛。原五公村支书、后在饶阳县公安局工作的徐满堂分得 9 亩地，4 口之家一共有 11.3 亩地。凶猛的张端的好朋友、与流浪女乞丐结婚的、民兵铁人李多林，在原有的 2.5 亩基础上，又增加了 2.9 亩，另分到两间房，1/4 头牛。住在庙宇中的少数无家可归者也在地主和富农的院子里分到了房子。村政府没收了一户富农的房子用作办公室。军烈属在牲口方面受到特殊照顾。

政治权力掌握在耿长锁手中，他当上了村支部书记，支部也恢复了活动。李子厚仍任村长。贫农协会的很多权力被剥夺，并更名为“贫民团”（the Poor People's Association），允许中农加入。工作队否决了李广林作为贫农协会会长所订的政策，并决定暂时仍由他任团长。但是不久李离开了五公，随军

去了南方。后来他转业到饶阳，得到一份享受国家工资的工作，在一家商店当经理。他因在阶级斗争的土改中忠于党而受到表扬。党激发了积极性。新生国家的官员们认识到，若在进攻那些所谓的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右倾主义分子方面表现积极，决不会受到惩罚，反之，缺少这种积极性就会影响自己的前程。残酷的、挑拨关系的、自我拆台的阶级斗争，在党的所有机构中已屡见不鲜。

耿长锁合作社被平反，“富农组织”的称号被废除，曾漠视耿之申诉的县委书记李太来到五公，保证他一定支持耿。合作社社员在最后的土地分配中得益较多。1946年，他们没有分得一点没收的土地，但在1948年，共有26亩地分给耿老板、黑子卢墨林、吝啬鬼李辉廷、成了家的张觐和种田能手张近仁。李太还提出去看看社员们分得的近便的良田。不过，耿对偏袒很敏感，因而谢绝了特殊照顾。

领导人忽左忽右，可忠诚和相互支持的关系网却得到巩固。李太帮助耿长锁解决一个私人问题。耿16岁的儿子德禄两次报名参军，由于他是独生子，且年纪太小，两次都被送回家。可在1948年，18岁的德禄又报了名，应征加入河北第七团。李太到耿家时，长锁和树宽正在哭泣，李说他有权把耿的儿子送回来。耿和徐处境十分尴尬，征兵运动已近尾声，饶阳党组织为部队送去了4000名新兵。如接受李太的建议，会引来很多有关特权的议论。

德禄和其他11名五公青年一起报名^⑩。由于耿老板惟一的儿子在解放军部队中服役，饶阳县委把耿作为无私的爱国干部加以重点宣传。等徐树宽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排行第七，取名转禄时，才保证宗族的香火延续。尽管耿长锁拒绝了照顾，可新生的权力结构还是推动和助长了偏袒与特权。

1948年3月，在西柏坡这一最后的农村司令部召开的中

央委员会会议上，这种结构变得明朗化了。普通士兵在门外吃饭，最高领导人却有单独的屋内餐厅和他们自己的厨子。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单独在家中与江青一起吃饭。除了一个厨师，毛还有一只浴桶，一张特大的床，一张皮革的转椅和办公桌。首脑人物都有宽敞的居所。

中央委员会开会时，座位是按照一定的前后顺序排定的。毛坐在高背藤椅上，背后是他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前面第一排是从石家庄市经过山谷中的土路拉来的软垫沙发。高级领导按等级高低，从左到右坐在第一排。第二排是硬垫沙发，也是从石家庄运来的。即使其他人到前面发言，毛也从未离开过中间的位置。毛的至高地位很明显。同时，每个人在新等级制中的地位不同，所获得的一定职位、特权和津贴也不同。

五公所受的压力仍很大，它来自五公必须实现原有贫农分得2.7亩地的土改目标，而这一目标在华北根据地广泛采用。五公人采取了一种手法，它不久就成为一种对专横和强加目标表示忠诚的普遍手段。18户相对富裕的中农，人均土地面积超过2.7亩，最后在造表时，都被改划和转入贫农组。很快划为贫农的人均土地变为2.7亩了，而且这一转划造成了中农组人均土地面积大大降低，仅比贫农的平均水平多0.1亩（见表4-5）。刻板的体制使这种花招成为各地完成任务的一把钥匙。为了保护自耕农的利益，促进乡村团结，同时满足党中央的人为要求，他们便利用政治分类，夸大过去两极分化和现在的平等。事实上，由于自耕农在这个地区居主导地位，税制改革已形成过一场静悄悄革命，所以在饶阳、河间和深县，764个村庄中仅有7.7%的土地在1947~1948年土改中被没收和重新分配。^①

虽然10年改革始于税制改革，推动了平均地权的进程，但五公人仍很贫困，在潜在的危及人命的自然环境面前，仍然

十分脆弱。土地重新分配的结果是，分散的、个人的小块土地比以前更小，人口仍在增加，而耕地面积却在减少。1936年，五公1390人耕种4620亩地，包括庙宇和宗族的土地，到1948年，全村人口上升到1557人，耕地面积减至4282亩。由于土地贫瘠，仅有700亩灌溉田，加上原始的技术，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因此，五公和冀南整个黑龙港地区的成绩，便显示了新政府在改善乡村穷人生活方面的能力。

表4-5 五公村土改后的阶级成分与土地占有状况

阶级	农户		人数	人/每户	土地		亩/每户	亩/每人
	户数	百分比			亩数	百分比		
地主	2	0.5	9	4.5	24	0.5	12	2.6
富农	3	0.7	31	10.3	83	1.9	10.3	2.6
中农	154	39.7	693	4.5	1950	45.5	12.6	2.8
贫农	228	58.7	826	3.6	2225	51.9	9.7	2.7
	—	—	—	—	— ^a	—	—	—
全村	387	100	1557	4.0	4284	100	11	2.7

a 包括原属庙宇和宗族的150亩。

农村社会主义

1948年春，土改工作队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组织五公历史上第一次“斗争会”。它的目的是，通过贬黜一小撮阶级敌人，有力地显示出党和以前的穷人的力量，以此促进贫农和中农的团结。斗争会通常是很残酷的。党坚决要求，必须消灭每个村庄中的阶级敌人。

这一事件发生在五公村北，全村人都被召集起来。工作队和村干部寻找一个政治目标，即他的罪行能唤起人们激情的活

生生的“剥削者”。但谁是谁呢？地主、前村长李建亭已于1945年去世，他的大儿子李锋是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战士，他的小儿子、不幸的茂修参加抗日工作，没有伤害任何人。地主李化岐的女儿已嫁给五公村闻名的党员耿书普的儿子。

谣传说李化岐已于前年去世了。事实上，他逃到别的县去了，住在不太远的溪头村。同样，对邻村的小地主来说，五公村是个避难所。相当一部分上报死去的地主，实际上由村民们和远离老家的亲戚保护起来。田氏宗族也许是饶阳最大的地主，它的成员都逃到安全的地方，有的到了北京，有的到了天津。

在五公村划为富农的人中，李春龙在抗战早期当过村长，没干坏事。至于李端府，他的大儿子李凤祥是党员，而且是县土改运动中很活跃的部队老兵。他的四儿子在解放军部队服役。剩下的李瀛洲，由于他快要去世，于是武装民兵抓住他的独生儿子李大林，并把他押到会场。^④

李瀛洲是个有名的恶霸和嫖客。在五公，人们见而远之，十分痛恨。他的密友和堂兄李化南是战前被国民党逮捕和枪毙的土匪。瀛洲与化南一起在南李祠堂里开赌局。据说，他诱拐寡妇，强奸年轻妇女，偷盗别人的财产。^⑤许多村民认为，李瀛洲应对他的邻居李铁头及其父亲李存立的死负责。存立和李瀛洲家做短工，干了40年。1935年，李铁头拒绝为李瀛洲干活，提出要到县警察局，控告他偷了铁头家的鸡，给他赌窝里的朋友吃。据说，为了恐吓铁头和他的父母，李瀛洲毒打了铁头的母亲，并用枪威胁铁头。结果是受折磨者入狱，县警察局逮捕并毒打铁头，把他关在县监狱三个月。据说他在那儿受尽了折磨。回到五公后不久，铁头去世了，他那痛心疾首的父亲不久也得病去世。后来，心神错乱的铁头母亲公开指控瀛洲应对他们的死负责。瀛洲第二次打她，她也去世了。^⑥

李瀛洲的小儿子对此不负任何责任，但正是他被押到会场上。铁头的大姐李芹被扶到台上，斥骂李大林。当她倾诉其不幸时，人们静静地听着。由于他父亲犯下的罪孽以及前几年所有的暴行，所以她一讲完，群众便包围并痛打不幸的李大林。大林被五花大绑，弯着腰游街，人们打他，扭他，侮辱他，逼他承认列举的罪行，然后被关进贫民团团部。对李瀛洲和李大林没有提出任何正式的指控。

不合法律的审判牵连全家，而且没完没了。在这次及随后由上级强加的斗争会上，李大林或李茂修，嫌疑犯的亲戚，反革命分子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都将反复地成为谴责的对象。在北面的杨各庄，没有活着的地主，小孤女宋朵在阶级斗争的政治压力下，预先地成为地主，也就是说，村干部决定，等宋朵长大了，再正式将她定为地主，并在她的余生，一直被当作人民的敌人对待。

在落后的农村地区，狂热分子把所谓的阶级敌人当作斗争对象是不公正的。在新生的政权中，潜在的破坏性狂热行为被制度化了。在内战革命的最后一年中，文学审查之火几乎突然出现了。华北的狂热分子把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作假报告的名叫克里空的人物借用过来，斥责其他作家是克里空。有人告发诗人艾青，说他写诗赞扬毛一度喜爱的中农吴满有，后来吴成为与蒋介石反动势力同流合污的叛徒。在五公土改工作队工作、并以一本描写冀中群众在1942年5月抗击日军“扫荡”的小说——《腹地》而闻名的作家王林，有人攻击他虚构中国武术师清除叛徒的故事。狂热分子认为，传统的武术不是赢得战争的马列主义手段。作家孙犁创作的有关滹沱河地区浪漫的中篇小说，同样被攻击为缺少现实主义。编写《新闻报》的语言纯正癖者坚持，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应被神话和浪漫主义所搅乱。在一般情况下，那些受到批判的作家不是政治斗争的

对象。

可在离五公很远的一些地方，寻找斗争目标是以无辜的生命为代价的。1948年春，土改中恐怖的阶级斗争局面结束之后，在五公东北11公里处的东留吾村，开了一次批判宋如海的斗争会。宋在抗日青年工作中很积极，17岁那年入党，1946年当上了村支书，但在土改期间，宋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定为富农，受指控迫害贫农和中农。这些指控是由他的对手伪造的，但却没有独立的审判机关倾听宋的无罪申诉。在一次斗争会后，他被拉到地里枪决。他才26岁，在以后的30年中，宋的亲戚在东留吾村的所有运动中，都被当作正式的替罪羊受尽折磨和侮辱。^⑤阶级斗争强加的永久性阶级分类，产生了触目惊心 and 有害的结果，说明了不容否认的现实状况，饶阳和全中国的政治处于流血之中。

像宋如海这些清白者死去的时候，当地人相互都明白，传统精英中某些成员得到有权有势亲戚的保护。冀中党委书记林铁，他的结发妻子壮烈牺牲，被追认为烈士，后来娶了安平县富裕地主的女儿巩童萱。林不反对没收其岳父的大量财产，但人们都说，他保护岳父和其他家庭成员，不让他们成为斗争目标。这个地区的许多大地主都挨了打，被枪毙，而林铁的亲戚却平安地度过了土地改革。人们开始认识到一种两极倾向，它不存在于由党—国家操纵的阶级斗争的出身分类之中，而在于在受恩宠者和被遗忘者之间。

政治关系有利于滥用权力，给予新政权的宠儿以特权，把其他人撂在一边。耿长锁合作社在饥荒和日军抢劫之后，与村民们一样，寻找更多的牲口。他们抢到一个姓李的一头驴，他是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兵和党员，耿不喜欢他。由于他有抚恤金，李在阶级斗争的土改中，被错划为富农。在他的富农成分撤销后，李就要求收回他的驴，但耿老板拒绝归还。耿相信，

区委派来的工作队会同意合作社留下这头驴，并把李开除出党。

建设党组织和社会主义

五公党支部重建于1948年4月，按照2月22日土改指示，工作队将领导刚恢复的地方党组织，再次从中寻找阶级敌人，但这一次是“左倾分子”^⑥。在五公，运动仅仅有助于忠于耿长锁的人巩固自己的权力。耿努力使五公和他的合作社成为忠诚的具体化身，这样，政府和当地的对手就不可能把他踢开。

耿利用整党运动，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和由个人关系网组成的党组织。党中央要求，每个村庄的党员人数应上升到全村人口的3%^⑦。五公的春季运动则把这个比例提高到4.7%。虽然许多人是文盲，但党员们在固定的、受耿领导的小组内活动，学习由区、县政府发出的文件，以及党中央的指示。

党的建设使耿把可靠的新党员带到他的政治家庭中，他精选了10名新党员，这是自1940年以来增加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些新党员都是竭力忠于耿长锁的人。耿书普的大哥——介绍耿老板入党的——曾随解放军南下，后来回到饶阳，成为县委委员。耿长锁的政治家庭日益成为饶阳的政治中心。

文盲、打绳人耿长锁还寻找有文化、政治上可靠、能对五公发展做出贡献的年轻人。耿的政治机器中的新成员之一，乔利广是一个三角脸型的18岁的小伙子。打绳人耿与东村乔万象的乔氏宗族关系一直很好。年轻的乔被划为中农，他个性温和，可以说是温顺。他的姐姐负责五公村妇女工作，她和他的大哥都在抗战期间入了党。1936年战前，乔利广家有父母、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和他自己共7人。共有11亩地，而抗战

开始时，他的大哥在饶阳附近从事抗日工作。乔家以前一直从事商业和副业，他的父亲与耿一样是打绳的，他的祖父则卖煤油。

乔利广在五公读了4年书，然后在西南不到二公里的曹庄学了两年，15岁高小毕业离校。不出两年，父母便为他安排了婚事，婚后住在东村，距耿老板家不远。乔先是加入了当地民兵组织，这是许多青年农民汉子通往权力的一条道路，后又在五公共青团支部建立之前的几年中，专门从事青年工作。通过邻居、政治和宗族联盟的关系，有文化的乔成为耿的行政助手，正如当地人喜欢说的那样，是他的“好右手”。

新国家开始控制经济，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两个关键性组织，即国营商业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建立起来，旨在恢复和引导商业活动^⑧。国家投入资金，购买产品。县委书记李太为饶阳振兴会（the Raoyang Promotion Society）提供资金，配备34名干部，负责原材料的配置和贷款发放。该会把棉花供应给尹村的纺织厂，尹村是纺车已平静了好几年的饶阳东北的集市。生产工具和技术上的援助有助于推动西北部里岗村的盐场生产。在几个月之内，饶阳县产盐的村庄由58个增加到75个。这些措施也给古老的麻袋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石家庄创刊出版的《人民日报》，对1948年初饶阳振兴会把2900户农民组织起来的情况作了报道。它说，供销合作社的优点是，农民们不用担心他们的产品销售，他们可卖给合作社，再用现金买牲口。^⑨

1943年以来，耿老板的合作社已与国营商业系统建立了关系。1945年后，合作社创始人耿秀峰一直在第四区和饶阳县的国营供销合作社工作。虽然1948年合作社的副业总产值下降了16%，仅相当于20975斤小米，但它在饶阳仍占首位。粮食产量上升了24%，每亩291斤，是历史最高点。张克让

派了一名专家来帮助耿长锁的合作社提高棉花产量。

耿合作社引人注目的成功使它成为征税人员的主要注意对象，因为征税员很难掌握个体私营商业活动的情况。1948年底，县工商税务局指令耿合作社交税，要他们承担全村大体应上缴的工商税额。耿和会计乔万象立即赶到饶阳提出抗议。税务局迅速撤回指令，没有官员敢与得到政权上层集团支持的人纠缠。但给予受宠者礼物的上级领导，也能迫使他们接受其强加的政策。

来自战斗前线的消息使忠于党的人更加放心，内战形势已转向对人民解放军有利的一面。4月和6月，解放军部队向南挺进，攻占了邻省河南的洛阳和开封，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1948年9月25日，山东省首府济南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第三野战军驻扎在华北，防止美国干涉并做最后挣扎。耿老板与他的合作社盼望着和平的1949年，盼望着由他们的庇护人来统治中国。

注 释

1. 《刘少奇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82）第1卷，第372～378页；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 ~ 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246 ~ 248。
2. Mark Seld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p.208 ~ 214.
3. Isabel and David Crook,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9), pp.179 ~ 180.
4.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46页。
5. 有关《五四指示》的术语性概括，请参见 Pepper, *Civil War in Chi-*

- na, 第 246~248 页。
6. 有关这一段和后面三段的资料均取自 1947 年 4 月 1 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区党委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基本总结》，台湾新店调查局档案馆。
 7. 《花开第一枝》(1963)，第 342 页。
 8. 《花开第一枝》(1963)，第 132~133 页。
 9.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52 页；五公村在 1948 年交税任务最高数目为 10 万斤。
 10.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52~53 页。
 11. 《花开第一枝》(1963)，第 342 页。
 12. 统计簿 (1949~1959)，饶阳档案馆。
 13.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第 286 页。
 14. 《毛泽东“大公社”思想初述》，《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论文》(1988 年 9 月)，第 1~16 页。
 15. Frederick Teiwes, “The Origins of Rectification,” *China Quarterly*, No. 65 (January 1976), p.32.
 16. 有关康生和平山会议上制定更加好斗的土地政策中所起作用的内部资料，可参见钟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第 96~105 页。
 17. Selden 在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 214~217 页对《土地改革法》的内容作了叙述和讨论。
 18. Joseph Esherick, “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7: 4 (October 1981), p.395; 参阅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85~216。
 19. 见 Selden 的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以及 Pepper 在 *Civil War in China* 第 289 页的讨论。
 20. 台湾新店调查局档案馆：《聂荣臻同志开幕词》(冀中新华书店 1947 年)。聂的讲话日期为 1947 年 10 月 3 日，见魏宏运《中国现代史稿(1919~1949)》第二卷，第 356~360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21.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第 312~314 页。
22.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p.358~360.
23. 林铁:《必须坚定整党方针》,《工作往来》第 17 号,1947 年 12 月 25 日,调查局档案馆。
24. 关于党风整顿如何产生恐怖和混乱的介绍,可参见 Peter Seybolt, "Terror and Conformity," *Modern China* 12: 1 (January 1986), pp. 39~74。
25. 《工作往来》第 17 号,1947 年 12 月 25 日,调查局档案馆。
26. 《冀中区党委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基本总结》。
27.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48 页。
28.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第 314~315 页。
29.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48 页。
30.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48~49 页。
31. 《花开第一枝》(1963),第 205~206 页。
32.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56~57 页。
33. 《花开第一枝》(1963),第 206~207 页。
34.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第 317~319 页。
35. Teiwes, *Origins of Rectification*, 第 43~46 页。
36. 《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1948 年 2 月 2 日,调查局档案。
37. 有关 1948 年春在饶阳西南的武安县一个村庄进行温和的土改的叙述,可参见 Isabel and David Crook, *Ten Mile Inn: 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1979)。剥削者被重新界定为那些从佃户和雇工的劳动中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 25% 以上的人。把 25% 的收入来自“剥削”作为标准,意味着对较富裕者的宽大。30 年代初,党在华南对农民进行分类时,所有 15% 以上的收入来自“剥削”的人都被划为富农。
38. 这类土地契约有些现仍保存着。“土地房产所有证”是饶阳县第四区政府于 1948 年在五公村发给贫农张京普的。

39. 《花开第一枝》(1963)，第 342 页；《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51 页。
40. 《花开第一枝》(1963)，第 1~5 页；《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53 页。
41. 见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第 262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2.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49~50 页。
43. 《花开第一枝》(1963)，第 326~335 页。
44.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49~50 页。
45. 《衡水日报》1980 年 10 月 5 日。
46.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第 323~325 页。
47.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51 页；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第 296 页。
48. 参阅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24: 3 (May 1965), p.363.
49. 《人民日报》1948 年 6 月 15 日。

第五章 蜜 月

从进行税制改革、旱灾结束、日军撤走肇始的文化愈合和经济复苏，在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年中继续保持下去。在一些农民看来，蜜月时期长达 10 年之久。混乱让位于秩序，家庭生活又从头开始。随着人民解放军迅速在全国取得胜利，新欢和旧乐便成为华北农民的家常便饭。河北数千农民随着部队胜利南下，在社会主义新政权中飞黄腾达。五公“土圣人”李亨通的儿子在西南地区当上了师级军官。

另一个贫苦农民李树林的生活则充满了冒险。李在 30 年代逃离五公，在北京大栅栏商业区的油店里找到了工作。日军侵入华北之后，一个饶阳籍老板征募李和其他穷困的饶阳单身汉加入八路军。在 1942 年日军进攻面前，李所在的部队撤离，后编入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其所在部队在东北成功地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然后挥师南下，李则成了广西省与越南交界处一个军事基地的副司令员，迎接胡志明的部队前来休整和训练。这些部队都穿中国军服，由中国军队发给工资，并由中国提供在内战时期缴获的卡车和其他精良装备。李两次成功地促成胡志明到北京进行秘密会谈。1953 年，48 岁的李树林娶了一名比他小 30 岁的活泼的少数民族姑娘，部队派幸运的李到学校学习管理国营商业公司，军队生涯是其声望和发迹的源头。

一部分士兵，其中包括阶级斗争的土改积极分子、狂热的张端，在内战中与地方部队和正规军部队一起战斗，他们像英雄一样回到五公^①，这正是重新团聚、结婚生子、建设家园和市场复苏的时候。恢复的集市吸引了流浪手艺人。一些人做冬天取暖的煤球和煤砖。其他人把棉花弹成平整、美观、暖和的被子。但许多战士没有回家，据估计有1100万中国人在战争中丧生。在抗战和内战中，五公有24名战士牺牲，而在人口较少的杨各庄，31人献出了生命。王桥和高桥分别牺牲24和43人，耿口村32人，邹村20人。另外还有数百名普通百姓被杀。

政权进行了重组^②。国家首都从华中的南京移到清朝的京城北京。10月1日，饶阳举行了建国的庆祝活动，就像当年向清朝皇帝祝贺一样。县城以南三公里处的段君道村准备了中国最好的、传统的烟火晚会。制盐产生的爆炸物不再用于制作地雷，而是用于取乐了。

保定成为河北省省会。抗日和内战中的行政机关如晋察冀根据地、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已不复存在。河北省省长杨秀峰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1939年入党，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担任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③。在河北，掌握实权者为党委第一书记林铁，他是耿合作社的庇护人。

河北分成几个专区，饶阳在定县专区的最东南端。专区行署设在定县城，后者以詹姆斯·晏（即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而闻名^④。共产党对晏靠教育拯救穷人而不是闹革命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党的积极分子很快赶到定县，使晏名誉扫地，对他的信从者进行攻击和压制。

自1946年以来，一直关心和促进五公村发展的张克让，担任了省农林厅厅长。1949年春，耿老板应邀出席了在饶阳县城举行的生产会议^⑤。边远的五公和饶阳紧密结合成新的权

力中心。但当第一个政府官员驱车到五公时，村民们对城里的外乡人能否理解其需要表示出传统的怀疑态度。这个官员穿着十分干净的白鞋下了车，走在满是粪肥的泥路上。仅仅在父母亲去世时才穿白鞋的村民们窃笑道，他一定在悼念他的父亲。

“发家致富”

1949年，由于天公做美，政治安定，耿长锁领导的合作社迎来了连续第二个丰收年。粮食亩产达329斤，创了记录^⑥。合作社对获得成功充满信心。那年春天，合作社买了两头骡子和一辆大车用于副业生产，后来证明这是那年的一大成功。花生油总收入增长了近5倍，相当于34009斤小米。副业兴旺则主要靠从县供销合作社借来的大榨油机^⑦。副业总收入为5万斤小米，它经历了1948年下降之后，又达到接近合作社收入一半的水平^⑧。合作社秋收的好消息传到保定，省里负责农业的张克让作了报道，合作社很快就出了名。

1949年，五公村369个自耕农家庭中，也有很多获得丰收，小麦亩产平均120斤，仅比耿合作社低20斤。但有些家庭落在后面。被迫卖掉一些土地的大约有15家，李文瑞就是其中之一^⑨，他家中有妻子、母亲和8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人帮他到地里干活。处于败落之中的还有李相，他在土改前做过长工，在田间管理上没有经验，且缺少农具和牲口，他家的粮食勉强够吃。当地一位中间商安排李卖掉了1.5亩地和他家的房子。国家是允许买卖土地和财产的。

张庆周也卖了地。他的儿子得了重病，而为了换取医药费，张把3亩地卖给了园子附近的某个人。其他家庭借钱办红白喜事。有些人正好在收割前缺钱，只得把地里的部分庄稼卖掉，或向有余钱的人借款，同时以上地作为担保。在党发出

“发家致富”的口号时，少数农户就在安定与复苏的蜜月年代走下坡路了。1950年初，政府号召农民富裕起来，毛泽东指出，“为了尽快恢复农村地区的生产，必须保存富农经济”^⑩。他宣布，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仍是十分遥远的事”^⑪。

住在村中央的南李宗族中有文化的家庭，在普遍接受教育方面占有优势。他们把十几个子女送到深县和保定的中学，以及石家庄附近著名的辛集中学上学。有几个考上了北京和天津的大学，步入领取国家工资的行列，过上了城市的生活。

在战争期间，许多为党做宣传工作的作家、画家和演员，在政府文化部门的下属机构中任职。在整个河北省，他们通过绘画、唱歌、跳舞和戏剧把各个阶层组织起来。饶阳县政府支持一个河北梆子业余剧团，它由一位女同志带领。政府还选拔有前途的少年（主要是男孩），在县城接受专门训练，从而减少女扮男装的人数。当演员的姑娘一般都出身于擅长河北梆子的家庭。虽然亏损使县剧团不具吸引力，但在以前没有演员的落后农村，许多小女孩却十分乐意到新业余剧团当演员。文化工作者骄傲地宣称：共产党政府是第一个资助中国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政府。

华北农民在经济复苏中欢欣鼓舞。饶阳南面著名的衡水酒厂在抗战时期被毁，现在又重新投入生产，产量迅速超过1927年的最高水平。勤劳的农民常常以标准酒精度为135的烈性高粱酒——衡水老白干庆祝新年和其他节日。自明朝以来，这种酒闻名远近，很快就供不应求了。

文化重建

宗族又接过去的传统举行庆祝仪式了。在除夕之夜，宗族里的男人，穿着最好的衣服，在最年长的老汉带领下，来到祖

先的墓前，焚烧纸钱，并留下食物等贡品，保证阴间里有吃有穿，还燃放爆竹。而在大年初一举行的仪式，象征着宗族内不朽的正式关系。人们以传统的磕头（头磕到地）表示恭敬。年轻人向年长者磕头，妇女向年长的姻亲磕头。男孩磕头有少量的压岁钱，而姑娘则不准参加这种仪式，因为将来她要嫁出去，脱离宗族。

在第三天吃完肉馅饺子的宴席之后，接下来的高潮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一天，孩子们特别高兴，门口挂满了灯笼，还提着它游玩。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小灯笼，里面经过特殊处理。这是孩子们过年最快乐的一天。在别的日子，他们观看流浪艺人表演木偶戏。锣声“铛铛”一响，就说明艺人来了，孩子们为之欢喜雀跃。他们还惊奇地盯着过路卖糖小贩所做的各种形状的糖果。

孩子们有很多时间游玩，如放风筝、武术、拔河、跳跳板、荡秋千比赛，或把小皮袋抛到空中，用脚背踢。女孩子们喜欢抛抓滑石游戏和跳绳，男孩子们玩弹子游戏，更淘气的则打鸟，并把它们系在树枝上。冬季，孩子们在屋子周围找地方搞一个斜坡，爬上去，然后在冰面上滑下来。

在蜜月年代，婚事频繁，农民们恢复了时兴的习惯，如用轿子或马车把新娘接到新郎家。不过，饶阳政府大抵成功地用牲口拉的车取代了有人抬的轿子。婚宴从下午开始，为期一天。每席菜都有四、六或八盘一套。每个村庄都有几个家庭准备了特殊的炊具，这是酒宴所必需的，在特殊场合里使用它们，有时须出很高的价钱。在喜庆的几天过后，新郎和新娘在一小队人（通常约有10个男孩）陪伴下，乘马车回到新娘家，进行最后一轮喜宴。正式的婚礼不仅是一个欢乐的时刻，而且意味着夫妇和宗族会有美好的未来。少数人的婚事，尤其像西村的李碌这些与党的干部关系密切的人，省去了大概比较封建

的仪式，如向每一个长辈磕头，和让新娘穿戴华丽的服饰。狂热的张端把婚事办得非常简朴。

在蜜月年代，婚姻程式的一个显著变化表现在第一次婚姻的年龄上。以前，结婚年龄在14~30岁之间，还有一些童婚，绝望的穷汉则长期光棍一条。我们的家庭调查表明，从4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人都在20~24岁（按中国计岁方法）之间结婚。伴随着悄悄的革命，土地所有权平均化进程与婚姻变迁相对应。

葬礼仍按过去的习惯进行。县城以北的吾固村保留了庞大的正方形棺槨和棺罩。它们由好木料制成，上有风景和佛教绘画，由30个身穿丧服的送葬者抬着走。

一个例外的合作社

党鼓励农民在农忙季节组成临时的小互助组来换工、换牲口和农具。由耿长锁领导的合作社则例外。在组织全年耕种和副业生产方面，以及在以劳力和投入进行收入分配方面，耿老板遵循党中央提出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原则。到1950年，河北省近70万农户中，仅60户加入了这类组织^⑩。这60户中，耿合作社就有17户。政府继续支持耿老板。春季，省里送来17.5厘米型新耕犁，取代普通的10厘米型犁。不过，合作社的179亩地分割成78块，因而政府送来的大犁用处不大。^⑪合作社社员们抱怨道，外乡人永远不会理解农民的需要。

耿合作社没有令它的庇护人失望。虽然气候很好，粮食产量却上升缓慢。但由于副业生产很兴旺，社员们的收入还是不断增加。1950年，副业总收入上升到6万斤小米，主要是花生油收入增长了31%。副业产值连续第二年占全社实际收入的45%。合作社赚钱和投资的卓越才干，以及它与政府认可的销

售商店的关系，刺激了副业的发展。副业成为了主要的行业。

这一年，合作社改变了副业分配原则，拿出70%而不是60%的净收入分给劳力。可由于利润提高，投资者并不介意。5年前外乡人强加的类似改动曾遭到村民的反对，而根据当地条件做出的选择却使一切都变得不同。迫使所有农民接受某一中央政策，这种束缚限制了经济自主权。在耿老板领导下，社员们在副业上投入了4.7万斤花生^⑭。1951年，合作社的盈利足够使耿长锁盖一栋新房子的，他拆掉了两间旧房子，买了粘土砖和木料，扩建兴旺的花生油生产用房^⑮。集市上流行这句话，“要赚钱，就要建立长锁这样的合作社”。

虽然新闻媒体越来越把规模大等同于社会主义，但一些在没有合作社的村里蹲点的河北作家却认为，规模较大的耿合作社过早地扩大，是“左”倾错误。1950年8月，河北省作家协会反对这一指责，指出当地条件需要这样的合作社。^⑯远方的陌生人以对农民不负责任的方式所进行的辩论和斗争，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省领导注意到耿合作社连续三年丰收，遂决定把耿定为省劳模，并邀请他参加11月在保定召开的河北省第一次劳模代表大会。耿就合作社的历史作了发言。^⑰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五公村赢得了声誉。11月28日，一篇关于耿合作社的简短报道，第一次出现在保定出版的新的省报《河北日报》上，虽然耿长锁的第二个字写错了，但50岁的耿的一幅小照片却使村民们激动不已。在被定为省劳模的那些刚成立的合作社和互助组干部中，耿最受器重。^⑱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者。

河北省委指出，像耿这样的合作社是一条比单干户“发家致富”更好的途径。农民不应该害怕这种合作社。人们可以自由入社和退社，社员投入的所有土地、农具、牲口均保留私有。合作社通过资金合伙可以更好地从事农副业的投资，赚取

收入。据报道，到1950年，合作社的单个社员已有能力购买他们投入合作社的13亩地。据说，在1950年，耿合作社的粮食产量要比五公自耕农的产量高出50%以上。耿合作社获得了成功，但局内人知道，上面夸大了数字。

新闻界对耿合作社的成功列出了许多原因，如合理组织劳力，合理分配，鼓励妇女参加劳动，平均每亩地施有机肥2500斤，以及合作社试用新品种。荣誉不断落到有能力的领导尤其是耿长锁身上。新闻界第一次像称颂民间英雄一样称颂五公村支书和合作社领导耿老板。他的简历激励读者们竭力仿效他那体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做法。他被描写成一个献身于合作社福祉的、无私的劳动者。他出席政府或党召开的会议，从不记工分。与其他社员不同，在空余时间里，他通常不去邹村看梆子戏演出。他和徐树宽确实有点像苦行僧，不过，耿不去看戏的原因是有点耳聋，而不是先进的共产主义意识。

并不是每个五公人都为耿老板意外的荣耀而高兴。五公村单干最成功的农民之一李亨通是个有才气的说书人，他以“鬼四（Demon Four）”而闻名。傍晚前，他把凳子放在村里主要的路口，坐在那儿讲述过去太平盛世的故事，以及流传的战国和三国时期的英雄故事。人们听得十分高兴。鬼四讲话很有力。一天傍晚，耿悄悄地匆匆走过，赶去开会。鬼四中断了他的故事，大声地对那些十分忙碌或对常人讲话十分骄傲的干部评头品足。耿明白，他必须与每个村民讲话，开玩笑，闲聊，关心和问候。他精通聊天的艺术，从而成为一个八面玲珑的地方政治家。他的生活方式表明，他是人们的朋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和完成他的领导任务，耿也学会了更有效、有条理地利用时间，走路确实急急匆匆。合作社的兴旺主要靠学到了政治秘诀的耿老板。

1950年6月，村干部们估计，在五公有37户“富裕”

的，326户“够吃的”，仅有34户缺粮。他们认为，除了146户“老中农”（1936年时的中农）之外，五公另有239户“新中农”。通过税制改革这一悄悄的革命，到1950年时大多数农户已达到中农水平。用1936年的标准来衡量，仅有12户贫农。^⑨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改善。

由于中国在1950年卷入朝鲜战争，蜜月时期被迫中断。饶阳人继续参军，西村的李大壮就是赴朝的五个五公青年之一，他在土改初期就已入伍。在朝鲜，李照料把大炮拖到前线的牲口。1953年，他被炮弹震伤，回到家中。士兵们为预防美军B-29轰炸机的狂轰滥炸，而生活在黑暗的坑道里，这是很可怕的。对阵亡和残废的战友的怀念一直萦绕着李。当坑道里堆满了尸体和垃圾时，生活在里面的战友很快生病而死。耿长锁的儿子德禄这次也在部队里，但他留在衡水地区，没有派到朝鲜。五公村没有人牺牲在朝鲜。

10月，在饶阳县北部繁华的集市尹村，政府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宣传中国的战绩。那天，饶阳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数千农民赶集到尹村，提着灯笼，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之类的口号。会场亮堂堂的，到处都是灯笼（饶阳没有电），人们一起高呼口号，支持中国志愿军战士和朝鲜盟友，并对化装成山姆大叔、哈利·杜鲁门、李承晚、蒋介石的滑稽的走高跷者发出嘲笑和怒吼。没有批斗、侮辱或痛打自己人，这是爱国的节日，团结一心的幸福时刻。爱国的五公村民也投入到全国性的支援志愿军的募捐运动之中。

不再盲目

1951年4月初，来自北京的一位农业部代表视察了合作社，把它命名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著名的合作社都

以领导者的名字重新命名。北京东面遵化县的穷棒子合作社更名为王国藩合作社。新名称写在三米高的条幅上，挂在耿合作社社部，这是上级授予的权威。农业部代表收集了耿合作社的资料，在北京广为宣传。^⑨耿老板说，合作社一直“盲目地经营”，社员们没有正确的理想。为了确保经营方向正确，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合作社开始订阅省和全国性的新闻报刊。耿保证，要使社员们首先想到国家，其次才是家庭。

这个代表的报告结论认为，耿合作社具有集中体现“发家致富”口号的富裕家庭的味道。在社部，花生堆得很高，马和骡子又高又壮，打绳和花生油加工日夜进行。报告说，社员们正准备修理旧房子，建造新房子，许多人渴望扩大土地面积，一些富裕的人已经买地，合作社集体也买了三亩地。

这位官员邀请耿老板与他一起参加4月22日召开的华北第一次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会议。这是耿第一次来到神话般的北京城。但在省城，耿听到要他谨慎的暗示。据说，农村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保障和改善农民生活，同时逐步地巩固和扩大小规模互助组上。与会代表被告知，耿老板领导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是在省委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以前，耿从未见到过这么多实权人物。场面有些吓人。不过，他很高兴遇到了华北地区的其他劳模，包括王国藩。耿和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耿应邀留在北京参加五一节庆典。盛大的场面使他眼花缭乱，几乎每个人都穿着新衣服，文职官员穿蓝衣服，军官穿绿制服。耿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听了周恩来总理所做的报告。但当耿站在天安门前大观礼台的最后时，他很难为情，他的旧衣服又脏又破，还按冀中农民的风格剃了光头。

1951年耿的耳聋加重，并开始受头痛病的折磨，这些生

理障碍使他参加会议讨论变得更加困难，而突然又有这么多的会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他人把他的沉默看做聪明的谦虚行为，把他看做谦逊而朴实的人。只要别人自夸他们村庄的成就，耿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当人们请求他讲述五公村的成绩时，耿老板回答道，事实会告诉他们一切，“无论一个人怎么说，一是一，二是二”。在重要会议上，政府为文盲的耿配了一个秘书，这象征着地位和与要人的关系。

又有两户人社，从而增加到19户。父亲死于1937年、时年17岁的魏树卫入了社，很快就结了婚，但地主的儿子李茂修的人社请求却遭拒绝。这些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人不准入社，李和他的一家都遭遗弃。

在那年干旱的春天，耿长锁组织社员挑水到地里，有些人抱怨，到远处去担水太苦了，也许不必这么做。当社员们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而错过了每年春天在邹村举行的为期5天的激动人心的庙会时，抱怨转为愤怒。使情况更糟的是，春天降雨时，其他人竟嘲笑社员们是在浪费时间。但在炎热的6、7月份，8000桶水浇在80多亩地里，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每个村庄都有井，但合作社的庄稼长势最好。^①粮食产量竟令人难以置信地上升了42%，相当于478斤小米^②。

耿对国家的要求作出了反应。村干部们与有权的庇护人结成联盟后，必须注意他们的忠告。1951年，政府急需很多棉花。五公村自耕农不愿卖，因为国家定的棉花统购价为一斤皮棉8斤小米，这价太低了，而在市场上，任何东西的价格都比这高。但是耿老板迫使合作社1952年的棉花种植面积上升到55%^③，而社员们却不接受这一决定，夜里起来破坏种棉就是一个抗议的信号。庄稼被窃被毁，放火的人增多，生产积极性因国家需求而受到阻抑。

不变之变

50年代初，新国家似乎仍有保持蜜月的势头。村民们照样沉浸在幸福之中。老民兵徐义洲和耿长锁都造了房子。1951年，17户共造了50间房子。黑子卢墨林建了一个新院子。^④结婚的张规准备造两间房。

在全村建造新房时，妇女仍不准挖地基，在地基完成时也不准参与饮酒取乐。妇女是脏的，因而是污染源，这个观念是无可争议的。

农户们考虑更多的是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们拥有自己耕种和出卖的粮食。在熙熙攘攘的集市邹村，他们买回来很多东西，而由于太穷娶不起老婆的“光棍汉”，现在也有希望找到新娘。孝敬先辈的责任马虎不得，老人们可以指望得到尊重和体面的葬礼。

饶阳还有死婚的风俗。一直没有从其他坟地运回来的光棍汉尸体被挖出来带回家，并在占卜者选定吉日之后再重新下葬，与单身女人的尸体合葬在男子的宗族墓地。这种婚姻保佑来世得子，确保宗族香火不断。

哀悼仪式也发展为满足习惯性的愿望。仪式延续三至九天，通常是奇数。抬棺人一般是偶数。抬棺人越多，这户人家就越有权势。在哀悼仪式上，一个真正有权势的家庭要请党的主要干部讲话，加以褒扬。当送葬者四至五人并肩走到墓地时，就嚎啕大哭，两种爆竹齐放。这与新年时放的爆竹不同，据说一种是在空中“咚”、“乓”，炸得很高，另一种听来像炸弹，在一个15磅的铁罐中放，如果不小心，爆竹会炸伤人。

蜜月年代还表现为文化的再生。在饶阳全县再度出现专演群众喜爱的河北梆子的业余剧团，妇女尤其积极地充当歌手和

演员。农民有农闲的便利，故在新年这一文化活动高潮到来前一至两个月内，创作和排练杂耍、戏曲及滑稽短剧。在新年的第15~25天，观看业余表演是免费的。在农历正月十五，在北京和东北的饶阳商人资助家乡的烟火晚会，使全县上空一片光明。

教育得到了发展。许多女孩开始上学，虽然在50年代初，3/4的女孩仍上不了学。县政府为中小学配备了教师。由于长期贫困，学生没有钢笔和作业簿，只得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父母用卖粮食和鸡蛋换来的钱交纳学费和书费。青年团开始为成年人开办扫盲夜校，年龄大的学习写自己的姓名。国家还在省、地、县和村一级干部中开设学习班。

饶阳还建立了第一所现代的县卫生院，虽然死气沉沉、简陋、人员不足、缺少诊断设备，但却为闭塞的饶阳带来了现代医疗保障。卫生院的主要工作是预防疾病，改善卫生条件，帮助当地村社建立卫生站。中国的药厂开始生产阿司匹林、青霉素等常备药品。卫生院、多种有效接种和基本药品提供了基本健康保障，从而延长了人的寿命。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农村医疗、生产维生素与抗生素的工厂继续为平均寿命的长期提高做出贡献，终于使中国在贫穷的、人口密集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走在前列。在蜜月时期，制度化的结果是深入而实际的，并且长期坚持了下来。生育时期母婴死亡率降低是最为可喜的硕果。大多数农民仍选择传统中医进行治疗，而接受陌生的新治疗方法的人较少。在五公，李宽玉的药房贮存了大量的中草药，生意很好，他对身为村长的儿子李子厚劝他人入社的催促无动于衷。

在蜜月年头，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与新政权采取的其他步骤不同，它在饶阳没有得到富有成效的实施。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普遍愿望，即渴望传统习惯的回归，在这里是指家长

制的家族传统。为了提倡婚姻自由，第一流的天津评剧团到饶阳演出了《小女婿》，它描写了一位母亲为她7岁的儿子安排了婚事，与十几岁的姑娘结婚，而女孩反抗，不能成婚，她喜欢上一个健壮英俊的贫苦农民，并通过离婚获得了解放。党反对心怀恶意的婆婆这个中国戏剧中常见的反面人物。在另一出戏《刘巧儿》中，一个少女不屈从她的父母，他们要她嫁给一个富农，可她已有心上人。农民们喜欢这些戏，但并没有阻止包办婚姻的延续，一些传统婚姻习惯受到异议。娶妻不止一个的富农和商人被迫离婚，不过，如果两个妻子都不想离婚，仍可以三人同居。

虽然广为接受的扫盲运动吸引了年轻的姑娘们，但妇女和国家对男女平等的热情和关心，就像两颗流星似的，不久即在互不关心和失望中骤然陨落了。当我们问于30和40年代最艰苦时期结婚的五公妇女，婚姻法是否改善了她们的生活时，有一位妇女与其他寡妇一起笑着点头，说她注意到相关的变化：“他已死了。”

男人寻求重组在10年衰败时期拆散的传统家庭，而不是以男女平等来建立家庭。虽然妇女进入劳动大军和学校，妇女的财产权和离婚权也写入法律，但实行起来很困难，因为并未对男人至上的价值观、习俗和制度做出规定。^⑤

远方的争吵

1951年仲夏，在北京发生了有关互助组和合作社政策的争论。6月29日，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宣布，认为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的逐步发展，能够“动摇、削弱、最后推翻私有制”，从而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的观点是十足的“空想”，这类错误思想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他指出，“华北

有180万党员，其中150万出身于农民”，教育这些农村干部抛弃传统的农民观念是至关重要的。他强调，互助组是作为经济恢复时期发展农业生产的手段而提出来的，它们“主要是保护，而不是削弱或摧毁私有财产”。他赞成进一步发展“建立在个体经济和私有财产基础上”的互助组，不要错误地快速发展合作社和集体化。他警告说，农村干部不要批评“个体农民”和“富裕农民”，“在发展互助组中一定要反对强迫和命令主义”。薄得出结论，农业集体化的时代最后会到来，但集体化必须建立在国营工业基本设施得到发展的基础上。^⑥7月，刘少奇同样警告不要过量地建立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并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后者认为，即使没有现代投入，社会主义也会在农村广受欢迎并扎下根来^⑦。

在全国性互助组运动中，河北是领头的省份。1951年，河北320万农户的42%加入了初级的互助组，大部分都是临时性的。饶阳县有293个互助组。在全国范围内，有17.5%的农户加入互助组。^⑧在刘少奇、薄一波和大部分国家领导人看来，这些数字说明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1951年下半年，上层领导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讨论推动中国农民走向苏联式的集体化的最佳方案。他们研究了县领导递交的有关合作社构成和成绩的报告，而大部分成功的合作社都来自华北和东北的老解放区。县领导们都试图发展他们认为国家领导人想要的合作社模式。饶阳和河北省的领导上报了五公耿长锁合作社的材料，五公村的命运与推动它发展的干部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干部们派作家宣传这个模式的经验，使国家权力结构中有数百人持赞许态度，且影响不断扩大。有关耿长锁合作社的材料表明，在以大农业生产单位的优势来说服农民方面好领导起到了核心作用，是他们把家庭的力量转变为合作社的力量。^⑨

9月，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中央委员会决议，为全党指明了逐步向社会主义农业转变的道路^⑧。毛反对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必须等到现代国营工业基础得到发展的意见。一部分领导人把互助组和小规模的合作社视为通向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步骤，毛就是其中之一。毛与其他领导人的不同点是，他强调合作社的发展太慢了。1951年在河北，与耿长锁相同的合作社共有24个，全中国仅有129个。^⑨

1951年合作社产量创下记录之后，由于当时耿合作社在国家领导人的争论中地位非同寻常，10月10日，耿老板在保定召开的第二次工农业劳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省劳模称号^⑩。河北省50多名省劳模得知，政府提倡在消灭个体农业方面进行竞争，成功的合作社有奖。省里近期目标是建立1000个模范村，1万个模范互助组，1000个模范家庭。耿立即做出响应，宣布了1952年合作社高得惊人的生产目标，向其他合作社发出打败他们的挑战：小麦亩产400斤，玉米500斤，小米600斤，甘薯6000斤。^⑪

11月初，耿、王国藩和其他农业劳模出席了在天津举行的、精心展示华北地区合作社的展览会。耿由一名《河北日报》社的记者作陪。支持发展副业、使农民富裕的华北局筹办了这次活动，并挑选了扮演重要角色的合作社样板。在天津，耿与工人劳模魏振华结成朋友，两人建立了对将来很有用的关系。

耿被当作著名人士对待，住在一个富商的旧宅中。展览厅中有一部分专门用于介绍耿的合作社，并在显著位置陈列着耿的照片。华北局的领导们款待这位没有架子的合作社英雄，给予他以前从未想象过的荣耀。他们甚至亲自给他频频斟茶。

这次展览会的气魄，不同于4月他在北京参加的互助合作会议时的那种小心翼翼的气氛。毛泽东出席了天津展览会，从

而有力地推动了华北全境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合作社规模、社会主义和五公受到赞扬。毛的关于迅速组织规模较大的农业合作社的意见，将得到贯彻。

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主持了迅速发展合作社的工作。1951年12月，省政府宣布，年内将组织3000个合作社^③，并把合作社描绘成克服河北省长期缺粮的关键。五公合作社最早成立于1943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一例证指明了农村发展的正确道路。五公是河北平原上最大的、不断取得成就的合作社。

1951年夏，耿老板注意到在保定《河北日报》工作的熟人给他的忠告，于是修改了合作社章程。保定地区的党员干部在建立社会主义合作社中起了带头作用。耿取消了在1940年8户农民决定退社后才采纳的分配制度，即60%用于土地投入，40%用于劳力的分配，而采用了土地和劳力对半开的更加“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④

春季，李辉廷以6000斤小麦的价钱，从不幸的李麦年手中买了4.3亩良田和一口水井。李辉廷向会计乔万象解释说：“没有土地，我们从哪儿获得粮食，我节省每一分钱，过得很苦，目的就是买地。”这个老汉梦寐以求的就是再买更多的土地，在秋季大丰收之后投入合作社。^⑤

可耿老板发现，土地买卖突然在领导眼中成为剥削了。仅在一年之前，《河北日报》还把耿合作社买了13亩地作为合作社成功的证据加以报道^⑥。现在党不再鼓励购买土地，并警告说，土地买卖是走阶级两极分化的道路，即一条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的道路。

耿老板在听说李辉廷、结婚的张斌、半生子李和李根立都想买地后，向第四区党组织作了简要汇报，并召开了一次合作社党员会议，最后又召集所有社员开会。耿老板担心，他的富

裕合作社又会成为遭村民怨恨，并被上级批评为自作主张改变政策的对象。在全体社员面前，他向69岁的李辉廷大发雷霆，并宣布合作社靠占其他不幸者的便宜是不可能兴旺的，不论李还是其他社员，都不准再买地。

李辉廷进行反击，老汉坚持政府保障土地买卖权。由于他一直把良田投入合作社，因而他所做的也是为了合作社的利益。但耿老板在党的支持下占了上风。合作社一扩大规模，社员们就失去了其土地自主权以及诸如土地买卖的合法权利。李感到受骗了，十分委屈，把土地还给了李麦年。^③

在饶阳，有关即将实施集体化的谣传，震动了所有集市，土地价格随着最新消息而涨跌。农民们通过当地的中间商悄悄地买卖土地，只有双方达成一致时，才见面结束这桩买卖，一顿饭便圆满结束交易。中间人每次从交易双方收取2~3%的手续费。

花生丑闻

1951年12月25日，耿老板和他的合作社第一次在中央机关报、全国性的《人民日报》上受到赞扬，该报把耿列在出席保定会议的50多名河北劳模中的首位，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推动发展合作社运动中的竞争。耿提出的达到高产目标的挑战书是众所周知的，但提出勇于创新的生产目标却是冒风险的。由于有国家支持，耿合作社在1951年产量创下记录：小麦亩产170斤，玉米245斤，高粱250斤，小米220斤，甘薯2200斤。这些有所提高的产量，与耿和其他劳模在10月宣布的、后又在12月河北省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相比，还差得很远。^④

农村中的社会主义进一步要求废除土地买卖，组织集体耕

种，完成如生产廉价棉花之类的国家重点任务。在中央内部的争论中，获胜的是强大的国家贸易统制的拥护者。在蜜月年代，远程私人贸易是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实力，把不同的地区联在一起，以至于每个地区的人都能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所需的商品。毁灭市场的混乱年代曾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现在，本地区内的贸易又被视为犯罪的投机行为，或一种资本主义剥削的最高形式。国家开始控制远程贸易和重要商品的买卖。

1951年底，针对行贿、逃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和窃取国家经济机密这“五毒”的五反运动开始了。这个运动在理论上是针对残余的城市资本主义的，但事实上，它冲击了各类商业活动，也包括农村私人的和合作社的贸易。为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提供生存手段的市场被堵死了，限制也更严了。

在“五反”运动开始前的几个月，社员李根立偶然认识的一个商人带着几个朋友到了五公[®]。来自滹沱河北一个村子的李恒信，交给耿老板一份革命大学的介绍信，它是刚在北京成立的、由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负责、专门培训党员干部的学校。李解释说，这所学校让他担任采购员。由于城里供应短缺，货源不足，有的单位希望能保障供应，甚至靠从事小规模的商业活动来保障他们的收入。李恒信建议在五公建一个采购站，为耿合作社充当中间商。他担保花生油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而在这近几年中，五公和耿合作社已从花生油生意中赚取了很多。合作社仅把花生加工成油，李负责装运到首都北京，这样，学校烹调用食油就得到了保障，价格也公道，剩余的再卖掉，合作社也可从中获得可观的稳定收入。李留在五公将近一年，与会计乔万象住在一起，李与耿长锁、副社长魏连玉及主管合作社副业的李根立也有频繁的交往。

1951年年中，李恒信建议把五公最好的花生运到天津的

市场去卖，那里的价格比当地高，更比国家的价格高得多，五公还可以把留下的劣质花生卖给国家。李根立喜欢这一计划，它能使合作社极大地提高收入，但耿长锁却忧虑重重。由于合作社得到国家很多支持，投机似乎是忘恩负义的冒险行为。

李恒信还有别的计划。他打算同合作社一起在深县用1万斤粮食买40桶花生油，运到天津去卖。其利润足以使合作社买一头强壮的骡子。与过去一样，副业利润将促进农业发展。后来，耿在回顾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时，尚记得自己最后还是否决了副业主管李根立的这个计划。李悲叹道，肉馅饺子已在嘴里，为什么还要吐出来？不过，在李恒信留在五公的那一年中，他仍帮助合作社销售花生。

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副业是合作社经济成就的源头，李恒信在1951年建议成立的副业和贸易公司是合法的。耿合作社加工花生，剥下的壳做肥料，并接受销售的委托。每个人都获利。

1951年12月底，在耿从天津展览会回来并开始把合作社重塑为一个更加社会主义的模式之后，李恒信走了。可是不久以后，一个调查组赶来找李恒信，他们说，他以耿合作社的名义从饶阳县银行借了3万元，也没有说明革命大学把付给他的资金用到了何处。他还用存款从安国和束鹿两县的商人那儿买了一批数目可观的花生油，支票上有会计乔万象的签名和耿合作社的印章。

合作社突然陷入困境，它有与骗子进行勾结的嫌疑。文盲李根立还与通缉犯李恒信一起到银行借钱。李恒信伪造会计的签名，偷偷使用合作社的正式印章。由于国家扩大了对市场的控制，并把本地区内的贸易称为反社会主义，所以最后查账表明，在李的犯罪活动中，耿合作社与它的会计有共犯的关系。耿老板认为，卷入副业和商业活动的丑闻和危险是一个严重的

教训，如果党又朝着更加社会主义的方向改变它的基本政策，那么不幸将降临到合作社。1952年春，李被逮捕，判处15年徒刑，耿合作社虽保持了好名声，但其地位有所动摇。一步走错，也许仅仅一步不是社会主义，就会导致政治蜜月突然终结。商业本身开始受到怀疑。

花生贩子入狱，那些批评耿老板错过那次为合作社赚钱机会的人失去了信任。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在支配一切。耿合作社开始疏远家庭副业生产和商业，并试图将合作农业和倚靠国家相结合。

由于反市场的压力加剧，耿老板接受了中央的“农业合作社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指示。他强调，合作社手工劳动是好的，它是社会主义的；从今以后，市场行为是可疑的。^①耿合作社自己的成功道路——把农业和赚钱的副业结合起来——被遗忘、隐藏和压制了。加强与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干部的关系，其代价是合作社从副业赚取收入的能力令人惊诧地下降了。1949年和1950年副业占合作社收入的45%，1952年下降至8%。由于国家开始控制农村市场，且集中控制主要作物的交易，结果使全国农村经济一落千丈。耿合作社把利润丰厚的副业当作报废的榨油机一样扔掉了。副业总收入从1950年6万斤小米一下子跌到1952年的7000斤（见表5-1）。

表 5-1 耿合作社副业生产的收入情况（百分比）

1945	49	1950	45
1946	50	1951	30
1947	47	1952	8
1948	26	1953	12
1949	45	1954	5

从1951年开始，不仅长距离贸易，而且各种商业和服务都遭禁止。合作社创始者耿秀峰曾经坐在里面第一次听到全国性事件和苏联农庄的茶坊也关门大吉。因而全中国的服务业萎缩或消失了。在五反运动期间，在全国9个大城市中，有45万多的商人受审查^④。农村服务行业、商店和集市网络在运动中遭破坏的情况很难说清楚^⑤。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农村定期集市网络受禁止、控制或摧毁。

买卖力的丧失，立即导致饶阳全县经济萎缩，并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许多人意识到，超过衡水白干的传统的张岗酒，失去了市场，开始消失。杨各庄断断续续的定期集市到30年代已衰败不堪，其农业生产落后，在受攻击之后又趋萎缩。土壤贫瘠的村民单靠种地兴旺不起来。与国家有特殊关系的耿合作社赔得起反市场政策所受的部分损失，但对于像杨各庄这样土壤瘠薄的贫困村庄而言，对副业和合法市场的冲击引发了一场灾难，虽然村民们建立了一个黑市。

1951~1952年春季，耿合作社又扩大了规模，东村有前途的耿的年轻助手乔利广，终于说服了自己家入社。住在村中央的新社员李金爪在入社前卖掉了驴子，从而惹怒了其他社员。后来的6户共有66亩地，社员人数增加到112人。^⑥这个规模很惊人。合作社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反应，同意把重点放在粮食作物上，其次才是经济作物花生，并把它的收入投入到新农业技术而不是发展副业上。这一决定加强了合作社与国家的关系。来自北京和保定的干部力劝耿合作社把所有的公积金（总收入的5%）用于购买新设备。^⑦

1952年1月中旬，《河北日报》表扬了合作社在农闲季节收集的有机肥超过了3万斤的目标，超额1.2万斤^⑧。但人多地少，社员们怀疑高产能否弥补副业收入上的损失。

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合作社的长篇文章，人们

才认识到耿对国家的忠诚^④。由于国家越来越垄断微薄的资金，因而优势来自于与受国家恩宠者的关系。名誉是至关重要的命运保护神。《人民日报》的文章是一篇论点乐观的报道，由1951年4月视察五公的农业部代表撰写。它以这样的方式来介绍五公的事迹，即它时时倡导超前于国家政治的政策。而当政策改变时，这类故事就得重写。

在1952年的报道中，并没有述及耿秀峰在建立合作社中的作用，合作社在1945年进一步社会主义化后的衰败也没有被提及，也没有举证说明在1947年底“过火”的土改期间对合作社的攻击。在每个时期，国家也很少给予暗中支持。报道贬低了合作社早期在副业生产上的成绩，夸大它的农业成就。说1951年粮食和棉花的亩产量为510斤和61斤，都是吹大牛，数字比实际的大。

报道警告说，遵照有关农业和商业的新路线，农村经济的中心应是基础作物，而不是商业性副业。上级要求合作社在集体财产方面投入更多，减少农业净收入中用于土地投入分配的比重。这一次，宣传耿合作社的文章已做了重要改动，副业投入已被削减8%多，耿也从中了解到了政治路线。

1952年3月27日，推动合作社发展的专区和县里的领导，在五公召开了庆功会，宣布农业部部长已把耿合作社列为全国的样板^⑤。饶阳县县长孟通、定县专区党委副书记范文禹、专区农业建设部部长张平克、饶阳县委书记王永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来自第四区各个村庄的1000多人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合作社接受了由农业部部长李书程签发的奖状、奖金和奖章。耿老板站在两面红旗前，双手接过了奖品，在毛主席像前深深地鞠躬。

4个月前，耿在保定向河北省劳模们保证，合作社将比1951年多生产15%的粮食。现在，沉浸在庆功会幸福中的耿

担保将上升33%，即1952年粮食亩产达到637斤。合作社将重点放在良种、灌溉、施肥和灭虫上，简言之，就是科学种田。邻近的耿口村村长宣誓向耿学习。

会议结束时，专区党委副书记范文禹把鲜花簇拥的耿扶到马背上，拿着各种奖品走过五公的大街小巷，而人们则站在屋顶、爬到路两边的树上，这是灰蒙蒙的五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庆祝仪式。庆功会结束后几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定县专区的互助组和合作社运动，耿在曹庄村举行的500名第四区干部和农民代表的会议上作了发言，那次会议为期两天。

目标：乌克兰

农业部和华北局党委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参观苏联集体农庄。这是中国派到苏联学习机械化集体农庄的第一个重要代表团，目的是探索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未来的思路。河北省领导林铁、张克让、杨秀峰推荐了几个人。在耿长锁当选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后几天，华北局也把他定为考察苏联农庄的人选之一。河北共派出官员、农民干部和农业专家6名代表。1952年4月，耿离开五公到保定，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省委书记林铁。由于禁映美国电影，一家现代电影院正放映苏联电影。社会主义政策禁止个体服务，在保定的主要商业街上仅有一家普通人喜欢的馄饨店。

4月底，耿在北京接受行前的简要报告。他将出访5个月，这是一次延伸的社会主义蜜月旅行。政府请北京的裁缝专门为每位成员做了西服，耿从未穿过这类衣服。仅在启程赴苏之前，耿才与李顺达和其他6个华北著名的农民干部会合，他们在他发出公开挑战后，陪他去苏联参观。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们号召所有合作社和互助组实现粮食产量翻番。^④

代表团由农业部副部长张廉石带领，副团长是华北局书记孙常慕。耿合作社又迅速与主管华北党务的华北局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70多名团员由10名翻译陪同，他们大多来自上海。他们乘了10天火车，于4月27日到达莫斯科。^⑨当一个留小胡子的男人到车站来接他们时，耿心跳得厉害，他想，斯大林亲自来迎接他们的代表团了。在蜜月气氛中，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在莫斯科，中国代表团下榻在装有电梯的、15层高的宾馆，每个房间均有自来水、电灯、厕所、电话、收音机、电唱机、内部通讯系统和指示器，而在五公什么都没有。停留在莫斯科的10天中，代表团出席了在红场举行的五一庆典，看了一眼斯大林，又观看了军队检阅表演，它最后以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又近又刺耳的噪音结束。有一件事使耿长锁感到难堪，代表团成员应该在名单上的姓名后签字，耿老板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他发誓回国后要学习识字。

在5月第一周周末，代表团乘火车到乌克兰，参观十月胜利农庄，它于1922年建立，曾在二战期间被德军摧毁。他们硬向中国代表们灌输一个基本信念：拖拉机的威力。没有拖拉机，就不可能有繁荣和现代生活方式，而有了拖拉机，集体化的农村才过上富裕和幸福的生活。在十月集体农庄，耿和其他人听说，一台“斯大林”型拖拉机每天能耕450亩地，且有23厘米深，而在五公，完成这个任务需要150人，150头牲口，150把犁铧，还只能达到10厘米深。拖拉机和集体农庄是实现无法想象的富裕的秘密所在。

这个特殊的模范农庄的住房很宽敞，墙是白色的，还有玻璃窗，挂着明净的白窗帘。屋里有弹簧床垫、桌、椅、凳、钟、地毯，还有电话、自来水、电灯和收音机。中国来访者得出结论，苏联城乡之间的差距要比中国小得多。苏联模范农庄

的家庭厨房，向目瞪口呆的参观者展示了充足的面包、牛奶、牛肉、猪肉、香肠、啤酒、白酒和饮料。工作服由优质棉布制成，并以各种花朵装饰。

代表团所访问的一些老人说，他们生活在天堂之中，不再为食物、衣服或自然灾害而担心，他们想要多少孩子就可以生多少个。事实上，他们这个国家、特别是乌克兰，不仅在二战时期人口锐减，而且在伴随着强制性集体化产生的一次秘而不宣的饥荒中，大量家庭遭到破坏。受中国文化偏爱和最近的历史影响，农民干部们特别注意到，凡生有第五个孩子的家庭，苏联政府每月付给 1000 卢布，而超过 5 个以上的，每个孩子每月有额外的 300 卢布。有 6 个孩子的妇女被称为“一级光荣妈妈”，有 10 个孩子的母亲则称为“英雄妈妈”，并且每年有 3000 卢布的奖金。的确，中国饱受了地少人多之苦。不过，由于近几十年中国家庭四分五裂，因此在参观的农民干部们看来，苏联集体农庄的家庭政策似乎像天堂一般。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的平衡，是与中国传统观念相吻合的，同时也与党的政策相吻合，当时在城市里禁止避孕，堕胎是非法的。^①

在三个半月里，中国代表团参观了 25 个集体农庄，11 个国营农场，6 个拖拉机站，9 个研究所和大量的电站。苏联农村似乎是成功的典范。在访问乌克兰之后，他们回到莫斯科休息，然后分成了 8 组，耿老板所在的小组又乘了很长路程的火车，这次是去哈萨克斯坦考察苏联式的成功，是如何在土壤贫瘠和气候恶劣的条件下取得的。一个国营农场展示了影剧院、托儿所和浴室。他们参观的一个集体农庄只有 589 户（2296 人），却耕种着 5.5 万亩地，比五公人均土地面积多 8 倍。他们参观的大概是有代表性的家庭，它由全天工作的夫妻、两个孩子和祖母组成，家里有三间房，一个储藏室和车棚，一匹马，10 只羊，两头奶牛，并有 5.6 亩自留地。1951 年，他们

劳动 1130 天，集体农庄分给他们 4520 斤粮食、3616 卢布，还有两公斤糖，户主计划给他的儿子买一架相机作为毕业礼物。一个中国代表问他，如果他的钱已用完，农庄遇上坏收成，他将怎么办。“我们不会有坏年成”，他答道。中国访问者并没有看到苏联农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失败的教训。

耿老板对许多被称为社会主义天堂的东西印象很深，他想知道怎么以苏联的经验解决五公的问题，同时也明白了他回家后必须抓住什么现实问题，而当他返回日益社会主义的中国时，蜜月已结束了。

注 释

1. 《花开第一枝》(1963)，第 89～90 页；《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53 页。
2. “The Evolution of the North China Region 1948～1952,” *Current Background*, No. 161, February 20, 1952, pp.1～3.
3. Donald Klein and Anne Clarke, eds.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II, pp.977～980; Wolfgang Bartke, *Who's Who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1), pp.466～467.
4. Charles W. Hayford, *To the People: James Yan and Village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花开第一枝》(1963)，第 342 页。
6. 统计簿 (1944～1959)，饶阳档案馆。
7. 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第 435 页。
8. 统计簿。

9.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55~56 页。
10. Mark Selden 在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第 235 页作了引述。
11. 《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第五卷，第 39 页。
12. 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第 1006~1011 页。
13. 《人民日报》1952 年 3 月 19 日。
14. 《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参阅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第 436~437 页。
15. 萧平：《新一代农民》，《中国建设》43:1，1964 年 1 月，第 33 页。
16. 《花开第一枝》(1963)，第 343 页。
17. 《河北日报》1950 年 11 月 28 日。
18. 《花开第一枝》(1973)，第 315 页。
19. 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第 433~434 页；《人民日报》1952 年 3 月 19 日。
20. 《人民日报》1952 年 3 月 19 日；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第 433~437 页。
21. 《河北日报》1952 年 3 月 15 日。
22. 《人民日报》1952 年 3 月 19 日。
23. 统计簿。
24. 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第 433、437 页。
25. Kay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26. 《人民日报》1951 年 6 月 29 日；《华北地区的发展》，第 17~23 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71 页，编者对农业社会主义的讨论。
28. 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第 1000~1005 页。
29. 胡华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第 98~99 页。山西省长治地区是涌现劳模的摇篮。William Hinton 在他的著作中对其中一个村庄作了描述。参见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30.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71 页。

31. 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第1006~1011页。
32. 《花开第一枝》(1963)，第343页。
33. 《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5日；《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57~58页。
34. 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第1006~1011页。
35. 《花开第一枝》(1963)，第343页。
36. 《花开第一枝》(1963)，第158~159页。
37. 《河北日报》1950年11月28日。
38. 《花开第一枝》(1963)，第159~161页。
39. 新华社稿，保定，1951年12月20日，载《中国大陆新闻综述》第241期，1951年12月21日；统计簿。
40. 《花开第一枝》(1963)，第6~9、19~21页；《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62页。
41. 《河北日报》1978年6月6日。
42.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318.
43. Dorothy Solingen 在她细致入微的著作 *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追溯了1954年以来农村地下贸易的控制和破坏。参阅该书第168~192页。
44. 统计簿。
45. 《人民日报》1952年3月19日。
46. 《河北日报》1952年1月17日。
47. 《人民日报》1952年3月19日。
48. 《河北日报》1952年3月30日。
49. 《河北日报》1952年4月2日。
50. 1952年9月23~24日的《河北日报》上，刊载了一系列有关苏联考察的文章。还可参阅《津埠日报》(天津，1952年11月10日)上的长篇叙述。
51. Liu Binyan, *A Higher - kind of Loyalty* (New York: Pantheon, 1990), p.38.

第六章 冒 险

当中国绝大部分农民还沉浸在蜜月中时，模范合作社已卷入如何转向社会主义农业的政治运动中去了。耿长锁合作社就是保定一定县地区中的几个这类合作社之一。由于毛发布了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题词，上级试图把耿长锁合作社树为领头羊的角色。为了遵循毛的号召，快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于 1951 ~ 1952 年冬把五公选为带头的标兵。1952 年春，已晋升为省农林厅合作社处副处长的耿秀峰被派回五公，指导生产。他推动已扩大了耿合作社的发展，鼓励组织新合作社，然后号召合并成全村范围的合作社。秀峰在当地赢得了“合作迷”的外号。

耿合作社在 1951 年底名扬四海，吸引了 37 岁的电影剧作家胡苏。把作家派到上级希望大力宣传的单位是普遍的惯例。河北文学艺术联合会派张庆田到石家庄以东周家庄的林金河（音）合作社，李满天到水向当流村（音）去写一本书，袁千里到保定西北郊的满城县，葛文到西建阳。由于党大力推行大社，文联的所有作家都到农村宣传社会主义政策。没有人留下来编辑《河北文艺》这一河北精英文学杂志，它因此被迫停刊。

胡苏是浙江人，1937 年到延安，入了党，并在鲁迅艺术

学院学习创作。1939年，他被派往晋察冀根据地，撰写有关冀中和冀西抗日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河北省文联和省委宣传部艺术处处长，与第一书记林铁关系很密切。1951年，他被调往北京电影家协会^①。1952年初，协会派作家到农村搜集电影创作的素材，胡看中了耿合作社。他与妻子刘茜来到小堤，并作为饶阳县第四区代理书记在小堤工作了两年。他立即向耿秀峰询问了五公合作社的情况。合作迷喜欢谈论这个话题。

保定的官员们把五公作为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典范而重写它的历史。1952年6月7日，《河北日报》全文发表了修改过的合作社章程^②。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1952年初由耿老板在保定新闻界的熟人写的，内容大致与耿合作社一致，强调集中于基本农业生产（粮食和棉花），而副业生产仅仅为了支援农业。新章程预言，全国新合作社运动将为集体化农业开辟道路，从而确保土地、劳力和资金的“合理”使用，及现代技术的迅速推广。

该报称，由于前年冬天砍掉了副业和商业生产，减少了人社土地和资金的利润，使合作社得到了发展，“发家致富”的口号不见了。耿老板被用来示例说明，“旧合作社章程最大的弱点是缺少爱国精神”。现在，一个模范合作社成为服从国家经济计划的单位，社员们应先考虑国家，其次才是自家。^③《河北日报》征求读者们的质疑，并在7月连载了4天^④。有位读者提出，为什么章程禁止社员们在合作社之外投资或从事私营活动？编者作了答复：劳力和资金必须以“统一的”方式管理，从而确保合作社平稳而快速地发展。该报没有提到1951年底的李恒信花生油丑闻，反而警告说，如果主管副业的李根立在负责合作社供销买卖的同时还从事私人贸易，就会出现利益冲突。

另一位读者问道，为什么合作社把土地红利降到农业净收入的50%？编辑们说，对投资给予较高的利润，会错误地引导社员们去买地，不劳而获，“剥削”劳力多的农户。该报写道，在1951年初，吝啬鬼李辉廷买了4亩地之后，耿合作社阻止了这种行为。将来大社对土地投入不给任何红利。社会主义奖励劳动所得。

有关耿合作社的传奇搞混了它成功的真实原因，而现在却把这些政策定为反社会主义的。农民们被迫按照在五公从未得到验证的原则重新组织起来。五公的经验甚至有可能与这些原则不符。在耿合作社的长篇传奇中，40年代所采用的一些章程细则，反而导致社员们退社，破坏生产，最后几乎要完蛋。国家希望像耿秀峰和胡苏这样的顾问来保障新章程取得广泛的支持。

尘云和红蜘蛛

在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耿长锁乐观地预计，1952年合作社的亩产将达637斤，虽说当时旱灾的迹象已很明显。1951~1952年冬，河北的降雪很少，春雨一直没下。太阳烤干了土地，到了5月，又热又干的风卷起了细尘，形成尘云。^⑤五公村的高粱、小米和玉米叶子枯萎变黄，棉花和花生受到大批红蜘蛛的侵害。春末，耿合作社社员们的照片登载在省报上，他们正在挖一口新的“抗旱”井。^⑥

5月，高层领导发出了饶阳与河北南端的标兵县——大名县展开友好竞争的号召，目标亩产仅185斤^⑦。大名县领导已强迫农民们编入更大的合作社，而物资或援助却要比饶阳的合作社少得多^⑧。由于旱灾进一步恶化，饶阳县委书记王永来要求1500名区和村干部重新考虑生产计划。他说，战胜旱灾和

超过大名县的最好办法是组织起来。每个区要树立 10 个模范村、50 个模范合作社和互助组。对旱灾的恐惧常导致投靠合作社。^⑤由于长期处于衰败和频频受灾之中，许多农民喜欢减少风险，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转变也可能减少富裕的希望。

旱灾中，耿合作社副社长魏连玉和其他干部召开了两天会议。一些社员想知道，荣誉是否侵蚀了警惕性。合作社的干部们批评自己在耿老板去苏联之前，没有多施肥，多播种玉米。黑子卢墨林说合作社应依靠所有社员的力量。有关缺少群众参与的意见和耿离开前所犯的错误，没有很好地反映给耿老板。魏连玉的姐夫、种田能手张近仁说他过多地依赖干部，他想起传说中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顺口说出“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俗语。^⑥社员们组成“生产委员会”以对付旱灾，它由合作社的创始者之一李王田负责，魏连玉任副手。委员会协调各个棉花、玉米和其他庄稼的生产小组，通宵达旦地开会讨论问题，各小组每 5 天集中一次，检查他们的工作。

潜在的冲突趋于表面化。魏连玉并不是惟一不满意耿老板因合作社的成功而独占所有荣誉的人。其他人被忽视了，只有耿老板被树为“劳模”，只有他被请到保定和北京出席高层会议，只有他骑在马上到处炫耀，只有他到苏联去考察。1952 年，旱灾日趋严重，社员们在耿老板向国家的允诺和合作社能够达到的产量之间，发现了巨大的差距。耿有可能成为替罪羊，但现实问题却在于模范地位使统治集团对之产生了不现实的期望。

端午节选举

合作社选举预定在 1952 年 6 月端午节期间进行^⑦。耿老板赴苏联之前曾指示，选举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正常进行。可是

在所有不满情绪暴露出来后，少数社员想把选举推迟到耿回国后，但大多数人敏感地认识到，没有耿，他们就不能做出有说服力的决定，遂要求进行投票选举。由于耿不在，因而当魏连玉说明耿不适合当领导时，副社长便显然是想要取代耿了。魏把合作社搞得井井有条，他的支持者证明，比较精明和有文化的魏是个更好的领导。电影作家胡苏对魏连玉的计划很不满意，试图拖延选举到耿回来。拖延失败后，他又打断选举筹备会，说魏没有与合作社的党员们商量，而章程并没有规定党员在合作社作出决定时扮演的角色。

在选举中，耿老板和魏连玉竞选社长之职。胡苏站在耿老板一边，联络了像半生子李这些忠诚者，对魏连玉的动机提出责难。大多数人支持耿当社长，魏则重新当选为副社长。不过，电影作家胡苏把魏当作端午节阴谋的可耻策划者。胡和耿秀峰认为，他们已说服了耿接受自己的看法，即魏是祸害。

越大越好

1952年初，耿合作社继续吸纳社员，李文志入社，他有三亩最好的地，单干时种出的粮食可养活全家。合作社把他的灌溉田转种蔬菜，从而使产值增长4倍。开中药铺的李宽玉也入了社，其理由是已“接受了上天的教导”，他认为在抗旱中社员们的力量比他自己大得多。

合作迷耿秀峰的任务是推动合作社的发展，但五公的其他合作社却困难重重。现由徐庄领导的西村的合作社，从1946年以来处境一直不佳。在村中央分别由五公党支部创始人李文考和1939年入党的李万义组织起来的两个合作社，于1951年又重新建立。这三个合作社都深陷困境。在战争期间，李万义曾在山西省党校接受了苏联式大集体农庄至高无上的教导，但

是他连一个小合作社的工作都不能做好。在惨淡经营的合作社中，多次发生冲突。在李万义合作社中，劳力多的农户感到被地多的农户欺侮了，因为他们把大量时间用于做买卖，搞副业和手工艺，而从由其他人耕种的土地上分得红利。国家越发展合作社，村干部们用于处理社员之间纠纷的时间就越多。耿长锁合作社似乎是另一个世界，虽然发生了令人不安的端午节选举，但合作社仍是团结的，领导有方的，所获的支援也很多，也有能力保持记录和组织劳力发展水利。种田能手张近仁也开始说，要是全村人都像耿合作社一样组织起来，就能富裕起来。

6月，虽然冬小麦收割相对来说未受春旱的影响，但当救命的仲夏雨迟迟不下时，玉米、谷子、高粱和花生开始枯死。人们在4月份担心的灾难，转眼到7月就降临了。合作迷耿秀峰认为，只有扩大合作社才能预防天灾，因而他想动员整个村子。由于地里的庄稼已没有希望，他便发动全村人开展挖井运动，着手为冬小麦的秋种做准备。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动员劳力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耿秀峰提出，全村每10户组成一个合作社。

许多农户畏葸不前，喜欢单干。当地人明白，大多数合作社领导笨拙，意见分歧严重，寿命不长。但耿合作社的成就成功地推动了夏末的运动。共组织了16个新合作社，有160户参加。4个老合作社有50户，另外犹豫不决的72户则组成了12个互助组，共享劳力、耕畜和农具。互助组比合作社小，他们的土地不入伙。积极发展合作社的两位官员耿秀峰和胡苏向省里领导吹嘘说，五公村正同时进行抗旱和发展合作社。

但冲突威胁着这个计划。许多社员感到，他们是被逼入社的。组织不善的合作社要有好的领导才行。许多农户抱怨说，他们被分配到资金匮乏的合作社。集体耕种的热潮产生了

组织危机，不满情绪集中在挖了 23 口新井的计划上，它必须在夏末以前完成。人们为井的位置而争吵不休。村民们都不让自己的水被别人偷去赚钱，也没有人愿意徒劳地挖井。结果是在一些很好的地方浪费了许多井眼。一部分村民没从挖井中得到好处，不满和担心便出现了。

灾情日趋严重时，混乱也在增长。8 月，一些党员开始建议，合理的发展要求把村里所有的资金集中起来，服从一个中心。合作迷耿秀峰抓住了这个绝好的机会，把全村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生产单位，这在中国农村还从未尝试过。五公村将克服土地零散，消除合作社与个人的紧张状态。秀峰强调，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消除把较穷的农户和合作社与较富的农户和合作社分割开来的差距。一切都将繁荣起来。这个激动人心的步骤是战胜旱灾和最近组织的大量小合作社的失败的最好办法。合作社越大越好。

五公村 93 名党员中大部分人对秀峰的计划抱有疑虑。没有人听说过这类事情，由 1650 人、424 户组成一个合作社似乎狂热得不太现实。早期成功的合作社是由周围的朋友、邻居和亲戚组成的小群体，但就是这些小群体还经历过管理上的困难和私人利益问题。入社资本的差异注定要产生剥削感，而不是合作感。大多数合作社很快就衰败了。就连耿合作社在依靠官方支持而煞费苦心经营了 9 年之后，也仅有 25 户。

健壮的张振生提出一种选择方案。他在 1952 年回到五公，取代有很多其他职务的支书耿长锁之前，曾设法进饶阳县公安局工作过。他提出在村子的 4 个区分别组织 4 个中型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分成几个生产队。如果能以这种规模进行合作，那么全村组成一个合作社就有根基。他认为合作迷的宏伟计划是不成熟的。

合作迷耿秀峰反驳道，张的计划更不切合实际。哪儿有领

导4个大合作社的一应干部呢？在诸如公平的土地划分等问题上，这4个合作社不会有冲突吗？由于五公党支部内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与外界有关系的秀峰便把自己的计划带到了饶阳县城。县长李广永与秀峰建立全村规模的合作社的想法一致，于是同意跟他一起回五公村。李回顾了五公党支部长期以来在合作化中所起的带头作用；而全中国正迈向社会主义，五公什么时候等过其他人充当第一？这一次，党支部通过了建立全村规模合作社的计划。

五公党支部召集20个合作社、12个互助组负责人的会议，把它们合并成一个大合作社。张支书详细说明了现存的分配问题，号召建立单一的五公合作社。合作社于部们则持保留意见。杨来义老人想，卷入1000多人的生活，风险太大。李秀绍说，管理一个小合作社就已问题不少，他们真能管好这么大的合作社吗？最后，干部们同意与社员们商量商量。村民们召开小组会，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当这一讨论要拖长和白热化时，耿秀峰回到了保定，与他的上级、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李子光进行商议。合作迷的秘密报告十分乐观。^⑩他宣称，惟一的全村规模的合作社组织将铲除利益冲突的混乱，使全村充分享受合作化的好处。由模范合作社的五公村准备带个头，其他村民则紧随其后。

秀峰声称，分红制度将向勤劳者倾斜，同时又保护劳力缺乏、依赖土地入股的农户利益。耿长锁合作社的4个孤儿和一部分老人，这些弱劳力依靠他们投入合作社的土地红利生活。大社并不终止财产的股息。耿秀峰提出了一个分等的分配比例，设置一个底数，产量高的队，收入也高。退社者不能收回他们原有的土地，但可在别的地方得到相等的土地，使其不致因收回土地而破坏生产。划为阶级敌人的家庭仍排除在外。河北农村工作部同意耿秀峰的报告，并通知他，等长锁从苏联回

来后，再与耿老板讨论他的计划。

没胡须的老耿

1952年9月中旬，耿长锁代表团回到北京，刮去山羊胡的耿，穿着城里流行的衣服和皮鞋。团员们被当作代表所在省和地区之机械化集体农业的使者，从事宣传活动。到北京宾馆看望耿的第一批人中有他的儿子德禄，由于健康原因，他刚从部队复员。^⑨耿长锁与直通省会和首都的私人关系网取得联系。这些关系网掌握着宝贵的资源，如享受国家工资的好工作。长锁在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德禄找到了舒适的办公室工作，后者正要与刘菁英结婚，她是德禄在部队服役时认识的，安国人，党员。

9月16日，河北代表团在保定火车站像归来的英雄一样，受到热烈欢迎，省政府、农业部、农林厅和中苏友好关系协会河北分会举行了庆祝招待会。在随后的5天中，代表团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进行汇报。耿老板作为河北代表团主要的农民代表讲了很多，他已锻炼成一个牵强附会而又慢条斯理的讲故事的人，他的声音也开始嘶哑。9月17日晚，在保定新中国礼堂举行的、有1000多名河北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耿老板和其他访苏的同伴，被奉为贵宾，省长杨秀峰和省委书记林铁亲自主持会议。

耿强调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必要性，重点讲述了拖拉机的作用，机械化将使生产率突飞猛进，国家和人民繁荣富裕，正如假想中的苏联那样。确实，那是耿自己的合作社不兴旺的原因。耿特别强调，在即将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机械化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当耿公开赞扬庞大的苏联集体农庄的优点时，他和其他人在千方百计组织自愿结合的合作社中所经

历的全部困难，似乎突然消失了。

代表团回国，其时中国对苏联和斯大林的逢迎正达到顶峰。这年秋天，中国报刊上全都是斯大林、苏联的拖拉机和集体农庄的照片，以及对给予援助的、“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颂词。11月，天津的《前进日报》特载了斯大林所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全文。¹⁹

在保定各党政机关和学校的无数听众面前，耿讲述了他的苏联观感。《河北日报》连续三天发表文章介绍他²⁰，还邀请他到河北省电台，向全省人民介绍他的观点，不过五公村那时还没有收音机。耿长锁多次反复地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优点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我看到集体农庄的农民们很富裕，看他们劳动，看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支援和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壮大力量。”²¹由于美国实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农业机械化所需的拖拉机、技术和技术人员只能从苏联集团输入。

可是，所有苏联援华计划中仅有一家拖拉机厂，而且几年来还未生产出第一台拖拉机。中国科学家估计，全部实现农业机械化需要150万台拖拉机。

在离开保定回家之前，耿在《河北日报》上指责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施用细菌武器。由于新中国给了他和五公村这么多，因而耿万分乐意表达他对战争的支持。在“读”了由一个国际科学家专门委员会写的报告之后，文盲的耿得出结论，“事实证明，美国战争贩子何等可恶，美帝国主义如何践踏了国际法，美国侵略者是中国、朝鲜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敌人”²²。耿长锁一回到家，便开始努力结束文盲的历史，一字不识已使他苦恼万分了。在女儿素娟和惠娟的帮助下，他开始用她们的课本勤奋地学习识字。

耿秀峰注视着从苏联回国的游历者们的公开讲话，并期待

着与耿长锁的私下交谈。两人在保定相遇，秀峰提了一些关于苏联集体农庄的问题。长锁坚定地表示，要使机械化和大规模合作社的长处变为现实。然后合作迷简短地向长锁汇报了五公的情况，提出全村规模的合作社是解决五公所面临问题的办法。他还把魏连玉和端午节竞选一事告诉了耿老板。

耿长锁和支书张振生的支持，是合作迷的计划取得成功的必需条件。耿的东村合作社有9头驴和骡子，张的西村合作社有4头。村外围的宗族再一次携起手来，占据领导地位。组成单一的大社，其中包括产量低的土地和没有什么可投入的农户在内，这将使较为富裕的小合作社社员在几年内收入减少。对贫困农户来说，大社的一个吸引力是他们将从富裕合作社的资产分配中获得好处。合作迷认识到，除非耿老板和张倡议建立全村规模的合作社，否则他们的富裕合作社社员们的反抗就压不下去。如果较富的人把组成大社视作偷窃，那么创建和发展工作就会失败。

耿长锁小心翼翼地采取行动。他了解到河北省农村工作部部长李子光和饶阳县县长李广永是这个计划的鼓吹者。秀峰还列举了河北农林厅厅长张克让的支持，是他告诉秀峰，省委书记林铁将为大社提供8万元低息贷款。耿秀峰又列举了从县里到省里所给予的宝贵的物资上和组织上的支持。而对于上级要求赶上模范村的其他村庄来说，这些支持是不可能有的。

9月25日，耿老板乘马车到五公，当地人蜂拥到土路上欢迎他，几乎把他拥进村里。合作社院子已打扫干净，红旗在院子门口飘扬，耿老板把苏联赠送的礼物（一架相机和一台电唱机）送给合作社，并从经费开支中省下钱为合作社的孩子们买了糖果、玩具和饼干，以及一副理发师用的剃刀，这样父母就能为自己的孩子剃头，他还把明信片、相册、旅游纪念品之类的小礼物送给其他合作社。^⑩

在为苏联集体农庄唱赞歌的同时，耿老板还私下里把中国官场狭隘性的故事讲给村民们听。他说，在莫斯科，中国代表团团长满街找中国菜馆。一天，他告诉代表们，他们将去一家新开的中国餐馆就餐。然后耿描述了他们走了许多冤枉路，到了一个还未开张的餐馆。村民们一起嘲笑以假世故掩饰无知的城里人。

人们连珠炮般地向耿提出了有关苏联的问题。到家后的第二三天，他先为他自己的合作社，然后为全村人做报告^⑨。他说，苏联繁荣的关键，是紧跟党的路线，把机械化和集体化结合起来。它的全部基础是“拖拉机”，这个词在汉语中找不到本来的含义，而大部分农民从未听说过，也从未看到过。他们要他重复这个词，并进行解释。耿告诉他们，意思是指未来。

上级领导要求耿向村民们保证，大规模的合作社将给他们带来富裕。他说，他已看到了苏联庞大的集体农庄使农民富裕起来。河北省政府知道，中国农民一定会相信，不再拥有自己土地、耕畜和农具的大农业合作社是可行的，合乎道德的，他们将浓缩成一个大家庭。耿在每次报告中都做了这些保证。

耿竭力赞许把劳力编入灵活的生产小组，它胜过以一块特定的土地进行分组。每个小组承担特定的任务，如照料耕畜、建筑等，然后依据劳动表现给予报酬。耿保证，通过模仿苏联，“我们能更快地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⑩。1952年，中国报纸为“我们老大哥的支援”而欢呼，在嘲笑美欧“资本主义科学”的同时，赞颂“布尔什维克科学”，包括特罗菲·李森科的理论。他是苏联农科院院长，提出环境影响能导致植物变异的观点。在北京农学院和华北农业大学，权威的李森科鼓吹驱逐从事科学研究的遗传学家，清除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并在华北平原的洪涝地区采用李森科的理论。李氏声称，把他们自己与仅仅相信一个物种内适者生存竞争的科学家相比，就能说

明帝国主义者是如何通过强权证实这一原则的。如果生存是适应的标准，那么在日占区生存下来的汉奸就比壮烈牺牲的爱国者优秀。他谴责一个物种内竞争的帝国主义科学，而提倡密植。官员们对此的反应是采用深耕、密植技术和苏联的种子，希望获得特大丰收^①。

耿老板和新闻界向人们提出了一个美好未来的繁荣景象。可残酷的现实是，1952年发生了旱灾，而且是1943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就连灌溉条件最好的耿长锁合作社也受了灾。耿在3月中旬去苏联的前夕曾保证亩产将达637斤，可收割时仅237斤，仅及1951年产量的一半，也是1945年以来最糟的收成。每亩可供分配的粮食仅为52斤，是合作社历史上的最低点^②。遵循国家制定的反贸易政策，在蜜月年代作为合作社成功秘诀的副业生产，已萎缩到相当于7000斤粮食的可怜水平。由于没有什么可以补偿粮食歉收，村民们转向国家伸手，于是国家悄悄地拨了2万斤救济粮给五公村^③。

大 冒 险

耿老板在秋收减产之后，召集村民开会，把他们编入全村规模的合作社^④。他强调，旱灾证明，除非把所有人都组织起来，否则他们就很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很多单干户的产量只有他的小合作社的一半。大社是他的合作社10年历程的逻辑延伸。苏联集体农庄证明，大规模的合作社会是获得高产和实现农业机械化所必需的条件。虽然耿的计划使一些人激动万分，但很多人、尤其是失败的合作社社员们存有疑虑。由于秀峰已得到这么多上层人士的支持，由于传来了毛提倡大规模的农庄并奖励社会主义试验的消息，于是五公村干部们试图证明他们更加社会主义。重赏那些中央注意的、发展最早和最快的

地方的做法，激发了热情，驱使人们慢慢进入危险的境地。

在10月、11月40天的时间里，每个合作社和互助组之间及内部均召开了马拉松会议。耿老板和支书张振生支配着讨论，同时，合作迷耿秀峰和电影作家胡苏在幕后做顾问。他们对交换土地和消灭耕地分散的建议漠然视之，没把它当做大社的选择方案之一，还否决了排斥李氏宗族、缩小规模的意见。

张振生又一次提出，把全村分成4个区，各个区100户，各区再依次分4个小队，每队约25户。一个区在东村，是耿老板的权力基础，另一个在西村，由忠于张振生和老民兵徐义洲的农户组成。五公村96名党员中，大部分在东、西两区。过去最富而现在却无权无势的村中央和中西部也分为两个区，进一步削弱了李氏宗族的势力。最后，干部们一致同意成立惟一的全村规模的大社。

干部们做出了重要的经济决策。村民们在掂量了这一计划后认识到，他们的耕畜、农具、水井和机械将由全村惟一的权力机构控制，然后再把它们分配到小队，每队耕种一整片土地；先按各队生产表现计算收入，再依据劳力和入股土地的股息分到个人。

反对成立单一的大经济单位的人怀疑，农村经济是否能作为整体进行有效管理。10多年来一直困扰着耿合作社的难题，在由400户组成的大社中将严重许多倍。创建耿合作社的社员们痛苦地意识到，加入全村规模的合作社，就将牺牲过去1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小合作社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和肥沃的土壤，在收成好的年份亩产可达500斤。可现在，得之不易的财富一部分将被重新分配。吝啬鬼李辉廷悲叹道：“我们好不容易改造了沙碱地，挖沟渠，亩产达480斤，三把旧铁镐已变成9头骡子和驴子。我们最好不要与他们合在一起。”半生子李不能接受离开他喜爱的大黑和其他骡子这一现实。^⑤

耿老板承认，他的富裕合作社的收入一开始将减少，但从长远来看，所有人都将得到实惠，而且将比经营良好的小社所得到的多得多。惟有大规模合作社才能实现机械化。不过，长锁仍要面对有些担心的村民。剩下的副业生产暂时还要有大约16个新的小组经营。耿合作社的社员即使心里不服，口头上也服了。大多数人同意支持耿老板，他的小合作社乐意贡献出较多的资金，这深深感动了全村规模合作社的反对者，他们没有付出劳动，却获得一份财富。与往常一样，在确定土地与劳力分配比例时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缺少劳力的农户强烈要求耿老板，在农业上土地与劳力以7:3分成，在副业上资本与劳力以9:1分成。可结果是按对半分成，这是耿老板的合作社在1951年底所采用的，也是河北省官方喜欢的方案。^⑥

争吵了几周之后，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为获得大社社员的资格，农户必须提出申请。约有200户报了名，但耿坚决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广泛的参与；要取得成功，就要有统一的计划，耕种所有的土地。讨论还在继续，抵制也在持续。一位老人抱怨道，事情太糟了，并说要搬到另一个村子去。在他的院子里，有一大堆宝贵的肥料，他确信，加入大社后，这就不属于他了。许多人害怕被迫放弃珍贵的财产，于是谣言四起。10月底，又一次召开全村大会，强调入社是自愿的。一个汉子说，他辛辛苦苦地干，得到他应得的那份，他问有什么可保证他无论何时想退社都能退出，并收回他所有的财产。耿重申，一年之后，社员们可以自由地撤回他们的所有财产。

耿长锁挨家挨户地说服不肯服从的村民。在耿自己的合作社内，坚定的支持者是结了婚的张觐，那一年，他至少可以砌两间房。经济地位和阶级成分是对大社态度的弱指数。耿对怕自己吃亏的心理做出反应。他指出，自己和最富裕的合作社的其他社员，肯定会损失大部分财产，所以如果他对大社的长期

利益很有信心，那么其他人怎么能说他们受骗了呢？

耿宣布进行第二次登记，这次约有 300 户报名。包括一些受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的传闻影响才报名的人。耿仍不满意。他又向他的支持者保证，将在三年内偿还牲口、农具和其他并入大社的资产。如果需要，全村规模的合作社将为此向社员们借钱。

第二次登记后，耿老板敦促 20 多个讨论小组各自推荐队长候选人。候选人由 80 多个减至 20 个，最后由五公村职位最高的党员当选为领导，耿老板任社长，支书张振生为副社长。原耿合作社第二把手魏连玉任财务干事，耿老板的好帮手、年轻的乔利广当选为掌管农业生产的副社长。干部大多来自东村和西村。村中央以前很有势力的传统精英和其他许多李氏宗族的农户，被无声无息地遗弃了。

得到上层领导的批准后，1952 年 11 月 8 日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全村规模的耿长锁合作社。全村 93% 的农民共 395 户入社，他们成为创始社员，仅有 29 户没有入社。有些人如富裕中农李胜当、贫农李舟秀和李忠坡害怕加入大社上当受骗。与苏联集体化一样，李茂修和其他孤立并遭诋毁的地主富农家庭都禁止入社。

来自省、专区、县、区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他们与来自其他县的劳模一起赞颂耿长锁。饶阳县的领导们提出，迁移当地的定期集市，把几个世纪来一直在邹村的集市移到五公。但耿不同意，担心这样做会影响与这一集市中心的关系。被国家忽视的村庄并不迷恋相邻的模范村。

太大，太快

仅在大社成立后 4 天，更高的权威人士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北京持相同意见的其他领

导取得了优势，强调倘迫使农民们竭力仿效大社，将导致不得人心的拉郎配和组织涣散。这种“冒险”政策必须代之以经济“再整顿”，也即与群众的选择相一致，以保证农业生产不影响工业化发展。强征的牲口要物归原主，地方干部抢当“先进”的热情必须降温，否则生产热情一旦下降，农业生产将遭受损失。

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李子光汇报指出，在1952年发展互助组和合作社运动中，河北已有470万户农民（占总数的60%）卷入，大部分加入了互助组。合作社由14个增加至1820个。但他又指出，其中有494个集中在3个县：饶阳、大名和宁河（现属天津），仅小小的饶阳就有137个合作社。河北省还有24个县尚未成立任何把土地和副业合伙在一起耕种和生产的合作社。而且许多互助组和合作社中，社员的不满情绪十分严重，他们是当地干部强迫加入的，而这些干部则是为了应付运动中的大量宣传才这么做的。许多合作社是形同虚设。在被树为标兵的三河县，305个互助组中有148个根本不起作用。最后李认为，受中央政策骤变的影响，河北的一些合作社搞得太大，也使失败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他指出，合作社的规模应在10~30户之间，任何超过50户的合作社均需得到专区的批准。李的结论是：“大合作社应在经营状况良好的小社基础上建立起来，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不应提前进行试验。”^②

1953年春节过后，省委副书记马国瑞来到五公，视察河北最炫目的合作社。马是林铁书记的副手，他在五公住了3天后对耿老板说，他将建议继续进行试验。但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包括瘫痪了的副业和加强财政控制的必要性。

1月底，定县专区党委的5名委员公开指出了区内3个“大社”（包括五公在内）的主要缺点，他们用笔名表达了他们

的观点。他们发现，在冬季，恼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五公村。在弄清应如何使用劳力之前，便把劳力组织起来了。一些村民无事可干，抱怨说“给我们活干”，其他人对强迫加入大社很不满，士气低落。李良桂承认：“看到别人报名，我也勉强报了名。”一些农民卖掉了牲口，砍下自己的树，害怕这些宝贵的财产被充公。

许多农民不愿翻耕土地和播种冬小麦，因为还搞不清大社对劳力的报酬如何分配。耿老板求助于威吓，说造成土地荒废者将被扣工分。这份报道说：“当耿长锁的大社组织起来时，人们害怕5件事：经营不善，没有自由，没有足够粮食，劳动极端艰苦，个人的日常开支没有现金。”他们发现，所有副业生产都已停止。

按照这一报道，定县专区3个大社的经验表明，这样的试验应在高产地区进行，而不是在濒于饥荒的地区进行。由于五公村在1952年的严重旱灾中损失很大，因此1953年耿的大社必须增加生产所需资金的25%，可有些家庭不仅没有什么可投入的，反而需要紧急救济。报道建议，把合作社限制在100户之内。其他地方不应轻率地冒进到大规模的合作社。^⑧

正在出现反对意见的当口，一件丑闻震动了五公村。西村一个生产队的3名干部被指控贪污：李小占、李福增和徐树林上报的数字低于实际产量。没上报的粮食分给了社员，其中许多人分得的粮食几乎两倍于官方所记载的数字。生产队干部靠把更多的粮食分给不满的农民以提高士气，而把较少的粮食上缴给大社的领导。其他村民发觉这个诡计后，便做了汇报，3人被饶阳县公安局逮捕。队长李福增和徐树林在饶阳监狱中做了两年的苦力，但党员李小占却逃避了牢狱之苦。

4月，河北省农村工作部接到一份华北局打来的电报，其中反映了邓子恢的意见——“存在着发展太快的现象”，“太

大，大多”，“耿长锁合作社大大了一点”。电报是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签发的。在农村工作部工作的耿秀峰找到刚从五公村回来的马国瑞。马坚决认为 395 户是不小，但五公能管好大社，所以对于像合作迷这样的人来，似乎一点也不大。第二天，省农林厅厅长张克让通知耿秀峰，省党政会议已对五公村的大社进行了讨论。农林厅已指示试验继续进行，但是党的农村工作部持另一种意见，张表示很遗憾。

保定的争论反映了北京的冲突。1952 年底，河北有 1082 个合作社，全国有 3634 个^⑧，刘少奇认为这些数字不可思议，毛泽东却没有。毛和他在农村政策上的最亲密的顾问们，尤其是陈伯达，都在寻找更多更大的合作社，以便为集体农庄化铺平道路。但其他国家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和邓子恢在内）却占有优势，他们强调快速发展会使农民疲于奔命，导致农民的疏远和经济混乱，阻碍向集体农庄的自觉转变。1953 年春，中央委员会决定，纠正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⑨华北局指示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让五公村的大社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中央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五公正在走错误的道路。

4 月 20 日，由 12 人组成的省工作组来到五公，以确保五公贯彻中央的政策^⑩。工作组由河北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郭方率领，组员有定县专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曾与耿长锁一起去苏联的河北农林厅的一名处长，还有合作迷耿秀峰和省委内务部副处长卢广（身有残疾）。村民们立即对卢广的缺陷进行评头品足，因为按传统文化习惯，任何一种身体伤残都是公众嘲笑的对象。村里残废的年轻人都呆在家中，不上学，以免其家庭遭受公众的羞辱。

工作组强调，由于五公是非常著名的模范合作社，所以如果大社管理不善，会使其他人不敢走社会主义道路。县里也有

意见分歧。新任县委书记高江表示反对缩小合作社的规模。但刚提上来的县委副书记张平，却同意与工作组配合。郭方指示耿长锁缩小合作社的规模。耿拒绝了，但又感到自己别无选择。如果五公被看做充满错误、必须陡然退却的地方，将使自己的模范角色毁于一旦。这一次对于耿来说，服从命令似乎并不是维护乡村与国家之纽带的最佳途径，尤其是不适于保护它与帮助过该村的县、专区和省领导的关系网。无论让步还是反抗似乎都太冒险了。耿老板把宝押在大社上，对工作组进行了抵制。

此后，工作组便做支书张振生的工作。但原先对扩大规模持保留意见的张却支持耿老板。工作组召集由96名党员组成的五公党支部开会。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党员屈从于压力。最后，工作组召开全体社员会议，组长郭方在会上宣布，上级领导很不满意。他要求缩减到80户这一最大规模，而在目前的技术水平条件下，超过这个数字则难以解决管理上的问题。他说：“试图管理这么大的合作社是错误的，如果没有粮吃，谁负责任？可以自由入社，也可以自由退社，可以让小合作社管理，也可以让家庭自己耕种，这都是合法的。”在随后的热烈讨论中，耿老板坐在那儿，一言不发。

耿长锁明白，在缩小合作社规模问题上，工作组内部意见也不一致。首先合作迷也在组里，秀峰没有公开说什么，但在背地里却努力说服其他人。电影作家胡苏也是试验的支持者。耿长锁和张振生相信，在保定、定县和饶阳，都有他们的支持者，会反对郭方的最后通牒。在他一生最大的冒险中，耿老板力劝村民们与他站在一起。

几个星期过去了，郭方对耿老板和张振生的抵制很生气。对外地人逃避窘迫时手忙脚乱的形象，幸灾乐祸的村民们记忆犹新，抱怨牙疼的郭宣布，他要去饶阳治病，并指示副组长主

持三天工作，然后就去了饶阳。在那儿，他向上级汇报了耿的不合作态度。在邹村集市上，有关五公陷入混乱、大社失败了、“个人自由”受到侵犯的谣言四处流传。有关可疑分子控制了五公党支部的谣传甚广，还有人说张振生、耿长锁和五公党支部的96名党员都受到了审查。^⑧

工作组组长郭方回到五公，宣布了林铁的指示：缩小合作社的规模。指示要求村党支部命令党员们放弃这一试验，而拒不接受就是违背省委最高权威的指示。放弃试验的党员召集相当一部分村民组建小合作社，并让他们从大社的财产中取回耕地和农具。村民们担心，最后退社损失大部分财产。

这一次，工作组的工作有了战果。有将近80户农民宣布退社。而更刺激点儿的是，有20名党员，其中包括西村老党员、前支书和民兵队长徐满堂提出退社，并与其他党员组成小合作社。共有108户退出，287户留了下来。耿长锁这场冒险的最后结局还说不准。

另一个前支书和民兵队长、西村的老民兵徐义洲也退出了大社，他把邻居和徐氏宗族中几户贫困家庭组织了起来。他还试图吸纳包括张振生在内的其他西村居民。但尽管合作的规模很小，徐还是经历了磨难。1947年，他曾遵照党的纪律，与平分土地的土改工作队站在了一起，而当时工作队临时让耿长锁靠边站。异常激动的张振生坚决要求老民兵徐义洲在支部会议上公开他的决定。耿长锁和其他干部则迫使徐重新加入大社。如果理应坚持社会主义航向的党员逆向而行，那么非党员村民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徐很孤立，只得屈从，“我错了，党员只能上这船，不能逃避”。

不过，徐感到有点轻率。回到家，当他开始告诉那些跟他走的人时，他再一次反悔了。他不能抛弃邻居和亲戚，又不能反对党。他退出了大社，张支书又来恳求他。两人都住在西

村，张以全村团结为重的理由说服了徐，最后徐同意说服邻居与他一起回到大社中来。他成功地说服了大部分人，但这段插曲的代价是，徐失去了在耿老板政治机器中的地位。耿不会忘记他的不忠。徐义洲再也没有像在战争年代帮助建立五公党支部那样，扮演关键性的角色。^⑧不过，耿老板也没有把老民兵徐完全驱赶出去，因为耿与西村的徐家有姻亲关系。在乔氏家族中，他的盟友、妇女主任乔文芝与强壮的西村干部徐连祯结了婚。耿保持了以村子外围家族间的联盟为基础的团结。

从经济上看，忠于耿的农户与退社的农户之间，主要差别在于占有土地的多少。留在社里的农户人均土地 2.5 亩，退社的家庭人均 3.8 亩^⑨。与 1945 年的情况一样，与其他生产因素相比，合作社过于偏重劳力，而许多退社农户认为，他们有较大较好的土地，所以在较小的合作社中或自己耕种，可以过得比在大社中好。在大社中，他们只能从土地和财产的红利中获得净收入的 50%。1952 年，饶阳县组织的大部分小合作社都把农业收入的 60% 分给投入土地的农户。^⑩

按忠于耿的人的说法，3 月中旬，败下阵来的郭方悄悄地滚出了村子。村民们都讲述着一个相同的故事：每一个干涉当地生活的人都滚蛋了。工作组撤走后，留在耿的大社内的 287 户开始投入生产。此后的 6 个月中，河北省领导着重巩固较小的合作社，而全国和省新闻媒介则把耿长锁和五公村遗忘了。其他人也不再鼓励向五公村学习。耿的领导群体担心，这一冒险会使他们成为精英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

不过，另一个现实，即政权运行中所有特殊和特许的待遇，对中国政治更为至关重要。被国家垄断的资源的龙头，掌握在拥有国家权力的人手中，而龙头一打开，资源就会源源而来。定县专区行署与河北省水利厅联合派出一个打井队到五公村，用柴油机打出全村第一口大水量的井。

挣回面子

1953年春末，工作组撤走后，耿老板除掉了对他不满的对手魏连玉，撤去他的财务干事之职，并要他对导致专区和省批评大社的某些混乱和管理失当负责^④。魏对当替罪羊和失面子很不满，他越来越孤立了。由于国家对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是包下来的，因而失去权力就意味着失去很多东西。当可怜的魏公开抱怨他的待遇时，恶意的诬告便落到他的身上。有人说他在抗战期间，曾在河南加入国民党，为当地警察头子效力。1951年底，他作为合作社干部铺张浪费，并与李恒信狼狈为奸，在可耻的花生交易中，差一点使耿合作社蒙受损失。魏甚至还毒打他的养子张规。

魏连玉最后被当做现行反动人物看待。那些被贴上社会主义敌人标签的人，被说成是卖国贼、间谍、社会渣滓和家庭出身可疑者。魏在支部会议上受到反复批判和斗争。他遭到驱逐和咒骂，感到万分沮丧，其身体和精神受到巨大打击。1956～1957年冬，他死于中风。老民兵徐义洲也被踢出耿的核心集团，他说魏连玉是被“批死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参加魏的葬礼。这个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农业合作化的早期先驱，成了坏人、非人、死人。

让其他人充当替罪羊的活动还在继续。由于家庭出身是地主，抗日积极分子李茂修仍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监督”下劳动。无论何时有人犯罪，茂修都是首要的嫌疑犯。在50年代初，发生了许多纵火案，当时耿老板强制实行不受欢迎的、讨好上层领导的政策：耕种廉价棉花，削减副业投入，放弃商品买卖。当地民兵和县公安局追查“阶级敌人”李茂修这一祭坛上的牺牲品。庄稼被偷和被恶意毁坏的案子一上报，他就被

捕受讯，虽没有证据证明李犯罪，但他还得继续充当替罪羊。

到了1952年底，26岁的李茂修把在五公的生活看做永久性的折磨。他于绝望中伪造了一份介绍信，用萝卜刻成第四区印章盖在上面，目的是能在东北的工厂找到工作，但五公村领导向追捕他的县公安人员做了汇报。李被判刑5年，在定县专区一所新建的劳教所中做苦力。

茂修被捕后，他的妻子范淑芳和儿子回到娘家。不过，当在山西省为党工作的茂修的大哥李锋回到五公时，范却回来把他当做真正的家长加以敬重。茂修服刑期间，国家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由于缺少建筑工人和建筑师，他被调往阜平，设计并帮助建筑县政府大楼。耿长锁的领导群体试图显示出，五公村正满腔热情地大干社会主义。五公村已于1949年捣毁了村里惟一幸存的庙宇，可干部们仍投身于全国性的肃清“封建”宗教迷信活动。他们的目标之一便是住在村中央的农民、38岁的李金爪，他在入社前卖掉了驴子，这惹怒了合作社的干部。与他的父亲一样，李是洪门元派的成员。在50年代初，国家把宗教门派视为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和限制私人贸易运动的积极反抗者而加以消灭。1952年，当李金爪的儿子神志昏迷时，他坚信是孩子的灵魂被人偷走，便向道教诸神中一个巨大神像曹王爷祈祷，把别人的灵魂借给他的儿子。儿子醒过来了，而金爪却麻烦了。

五公村治安干事听到了他的祈祷，于是强迫金爪在群众大会上坦白自己的堕落，并把他开除出合作社，定为黑分子、人民的敌人。李金爪认为，这是对他卖掉驴子进行惩罚的报复行动。他成了贱民群体中的一份子，这些贱民包括其他道士、涉嫌破坏合作经济的坏分子，和像李茂修这些被打上阶级敌人烙印的人。对宗教的攻击扩大到五公东面的献县大天主教教堂内，这所教堂的牧师曾获得保证，一旦从日军的亵渎中解放出

来，便将它作为礼拜的地方加以修复，可后来它却被改为医院了。

1953年，另一个住在五公的被放逐者是党员徐继昌，此人原是在饶阳县政府工作的干部。五公村内到处流传说，他已碰到了严重的麻烦，也许是强奸，但肯定是通奸。徐被开除，划为“坏分子”，并遣送回家，“在群众监督下”劳动。常人犯了这些罪行将被起诉，或许被枪决。而在徐的案子中，没有提出正式的指控，没有进行审问，徐也从未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村干部们从未简略地了解案情，他们设想，上级有充分的理由对徐作出贬黜和放逐的决定。有罪更是一种政治裁决，而不是法律裁决。

刚建立起来的苏联式治安力量对全饶阳县的嫌疑犯采取了恐吓的手段。晚上，摩托车灯闪烁，发动机轰鸣，开到受害者家门口，砸破大门冲进去，剥光他们的衣服，逼迫他们跪下来，然后砸碎家具，寻找假想中的证据。饶阳人说，“公安局，不安全”。

在全国农村地区，一批批黑分子成为强制性劳力，他们被迫赶在别人之前开始劳动，打扫街巷，如遇下雪则扫雪。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地从事田间劳动，禁止与坚决站在政府一边的人交谈。当地人很少跟他们讲话，因为这种交往会带来麻烦。他们敷衍了事地完成任务，低着头，眼睛不敢正视。黑分子们被派去干社会地位最低、最脏的活，如打扫厕所。他们的刑期没有时间限制，没有正当的法律手续，仅仅是政治裁决、镇压、人与人长期争斗和永久的复仇。^⑧在那些被派去看管五公村黑分子的人中，有48岁的铁人李多林，即在抗战时期与流浪的女乞丐结婚的、强壮的老民兵。他在村子周围巡逻时，仍扛着他的步枪。他相信，阶级敌人就像日本鬼子和突然袭击当地鸡棚的狡猾狐狸一样，必须把它们抓起来打死。^⑨

1953年，设在邹村的法院关闭了。此后的30年中，当饶阳人在处理有关离婚、继承和伤害这类民事纠纷中寻找法律保护时，理论上可以到县城寻求帮助，但实际上还得回村找党员干部解决。由于这个国家疆域辽阔，农民们越来越难以受到法律的保护。

引人注目的背后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达成停战协议。在10月1日国庆节这天，党颁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无论在抗日战争、内战时期，还是随后短暂的蜜月时期，长期以来，农民们一直都把粮食贡献给国家。而为了建设重工业，满足现代战争和捍卫革命果实之需，毛决定，必须再一次压低农村生活水平。而且这一次还不像以往，可以把做买卖赚的钱拿出来填补漏洞，勉强打发过去，因为那将进一步加强农村中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毛把政策上的差异称为两个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表现形式。^④知识分子梁漱溟因为站起来维护农民利益而受到公开批判。凡是反对毛提出的废止私有农业和反对把原始资本投入到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政策的人，毛都冠之以敌人和卖国贼。而梁提出的最能代表农民利益的主张，尤其激怒了毛。^⑤结果，有些中国人推测，那年年初，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毛想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而他试图迅速跳跃到社会主义”^⑥。由于档案不公开和毛的同事们保持沉默，不可能准确地把握毛为什么突然选择强迫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党内实权人物开始再一次强调，大规模的农业合作社和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是农村转向社会主义的关键^⑦。为了实现高度工业化的目标，国家进一步抑制私人贸易，寻求控制农业盈

余的途径。1953年，东北发生水灾，粮食减产，产量远低于计划指标，陈云为此制定了粮食由国家控制的政策⁴³。11月，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要求农民按照国家提出的质量要求和价格，以及每户所分摊的定额，把粮食卖给国家。定额以外的粮食仍可以合法买卖，但完成定额之后，通常很少有粮食能进入市场。

强加粮食出售的定额，显然与促使更多农民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这类合作社，尤其是大社，均有利于国家控制粮食。按合作社的账本进行征税和设定售粮定额，远比对付1亿个分散的家庭容易得多。最重要的是，在粮食流入农民手中之前，国家就先从这些合作社中取走了应交的定额。强制性的低价收购粮食，使统治集团摆脱了市场竞争，确保城市、军队、膨胀中的国家机构和推动工业化所需的粮食供应。11月发布的法令是消灭地下粮食贸易的关键步骤，此后的4年中，农业经济的两种主要作物——粮食和棉花彻底禁止自由买卖。棉布衣服匮乏。城市从低价短缺经营中受益，但农民的收入和农民们艰苦劳作的热情却大打折扣。

国家对粮食市场的控制造成了人为的短缺。仓库和运输不是为了取代成千上万被迫停止买卖的粮商。一个庞大而低效的官僚机构迅速建立起来，不仅浪费了许多粮食，而且还由国家控制用于饲料、城市和工业生产的大批存粮，建筑仓库以贮存应付紧急情况、灾害和军事之需的粮食，并出口相当一部分粮食。国家已制定了低价，所以粮食从过剩地区向短缺地区调运便并无价格差异。而粮食匮乏地区的人们渴望得到更多，需求随之猛涨。10月，粮食政策的制定者陈云拒绝承认计划价格太低，继续坚持粮食在进入消费者手中之前要由国家来调拨。统治阶层谴责投机商，禁止粮食贸易，谴责农民消费了更多更好的粮食。一些人确实在囤积粮食，等到遇上坏年成，希望能

高价卖出。但问题的核心是国家的政策。为了推动国家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军队、国家工作人员和城市居民所需粮食的控制，国家要求农民们，通过消费更少的粮食尤其是细粮，来表达他们的爱国精神。^④对于那些与国家及其经济垄断权没有特殊关系的地方而言，蜜月已告结束。

10月和11月，为了与国家控制粮食和加速工业化的措施取得一致，毛泽东要求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这一次，赞成渐进式农业改造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人，再也不能扭转毛加速走向集体化的决定了。^⑤在与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毛要求每个县建立一或两个成功的合作社，各地均要立即组织“中等规模或者大的”合作社。他说，“一两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⑥。毛继续说——就像直接对耿老板说似的——“强迫解散”满足国家需求的合作社“是不对的”，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毛坚决认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占领”。^⑦

五公村又突然地与国家政策相耦合了。毛的讲话立即传达到省、专区和县各级领导。五公是社会主义排头兵。耿老板的冒险收获相当可观。

五公287户的大规模合作社，没再遭受到1952年旱灾那样的天灾，可农业产量和人均分配额仍保持在远低于1951年小合作社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同样，人均副业收入也仅为1950年的一小半。

为了与中央政策保持一致，省领导把耿长锁大社称赞为河北省、或许是全国大合作社的杰出代表。迫使该村缩小合作社规模的工作组组长郭方，反过来纠正错误。仲秋，省委派郭方工作组组员之一、跛子卢广到五公蹲点，担任耿老板的顾问，并负责进行技术援助。现在，国家已公开地希望把农民引向领

头的耿的大社。

由王林率领的一批作家住在五公搜集材料，准备写一本书，名为《第一朵社会主义之花》。按作家葛文的回忆，合作迷耿秀峰来干涉他们的工作，他要求把写他那章的标题改为《一个种花的人》，结果他们在书中把“耿秀峰同志”作为最短的一章的标题。我们不知道宣传杰出领导人神话的作家们是否把耿老板当做五公新故事中的惟一领导人。

作家们被土壤沙化的程度惊呆了。刮大风时，院子里便会堆起数英尺高的沙尘，人们睁不开眼睛。特殊的似乎是耿长锁合作社，而不是这个村子。这些作家经调查发现，与其他农村干部群体相比，耿的干部班子似乎是无私的，就连小组组长的水平也似乎要比一般干部好，而大部分农村地区缺少这种有能力、团结、诚实的干部群体。作家们认为，印象最深的是该村的小榨油厂，但小学却是一团糟。耿对现代教育评价不高。

11月，省领导开始计划召开纪念大会，庆祝五公最早由4户组成的合作社成立10周年。庆典意味着国家已把大规模经济组织视做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老板在天津的朋友、工人模范魏振华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到五公，其中包括一个电影摄制组和一个剧团。耿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宣布，五公将出售5万斤粮食给国家，这在贫困的河北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成了头条新闻。上级领导对此很高兴。⁴⁹

1953年12月27、28日，合作社10周年庆祝大会在五公举行。省委、省政府代表乘小汽车到会，对大社和耿长锁给予高度赞扬。河北的合作社干部和400多名劳动英雄步行或骑毛驴赶来出席大会。贺信和贺电雪片般地飞到五公。省领导把一面大红锦旗赠给耿，上面写着“社会主义之花”几个金黄大字。⁴⁹

在庆功会开幕那天，耿长锁站在五公村东的平台上第一个

发表讲话，叙述了合作社 10 年来的历史，耿提到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的讲话，仿佛是它激发创办了合作社。耿机敏地声称，他和其他社员 10 年来所做的事都是遵循了毛主席的教导。他宣布，虽然目前只有 287 户社员，但不久将发展到全村规模。^⑧

耿特别骄傲的是，他的合作社曾有过照顾孤弱者和贫困户的经历。在别的外地干部讲话之前，老寡妇王英先上台讲述了合作社如何救她一命的经过。她说，过去，每两天或三天才能吃到一顿饭，现在多亏有了大社，吃得很好，谢谢耿。然后，由支书张振生解释五公村如何设法解决大社所遇到的组织问题。耿老板的入党介绍人、原游击队长耿书普宣布了 1954 年的生产目标，他草率地断言，农业产量将比大丰收的 1953 年增长 50%。

专业剧团赶来演出冀南最受欢迎的河北梆子戏。一般情况下，剧团只有在春季和邹村庙会上才到饶阳来演出。现在，五公可以与规模很大的邹村集市相匹敌了。它就像个奇迹，村民们可以在尊敬他们及其干部的大会上登台高声发言，可以免费在用席子挂起来的大围场内连续几小时欣赏剧团演出，并尽情地吃喝。

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李子光第二天就走了，1952 年，在合作迷耿秀峰向他提出这个建议时，他是第一批鼓励组织大社的人之一。提出召开这次庆祝大会的省委书记林铁没有出席，但农林厅厅长张克让来了，他很欣赏耿长锁乐意说出自己的想法。随着国家控制了更多的资金，地方干部们尽量说一些他们觉得上级喜欢听的话，真实成了稀缺的东西。于是张抓住机会拜访耿，与这个他认为直爽的汉子聊一聊。

五公庆祝大会的第二天，最精彩的场面是令人震惊地宣布，五公已被指定为全国第一个建立国营拖拉机站的村庄（当

然国营农场除外)。张克让的部下一直在寻找建立河北第一个拖拉机站的场所。从1947年开始，张视察过的合作社大部分已解散，只有耿合作社坚持了下来，所以287户的五公合作社，似乎是保障拖拉机站成功的最好赌注。

中国一小批进口拖拉机已集中于少量的国营农场。五公10周年庆典，是示范说明土地和劳力合伙的农民能用上拖拉机的好机会。张克让派河北南端的邯郸国营农场的拖拉机技术员师喜生负责五公拖拉机站。1951年，师在北京向来自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教员学习了6个月。在庆祝大会上，他的女儿师桂英以她美妙的歌声让快乐的人们欢呼不已。

五公村没有电和自来水，没有公路、铁路和运河使它与政治经济权力中心相联接，但偏僻的五公却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即大规模农业合作社和拖拉机相结合的中心和象征。1953年12月28日，五公村民和来自其他地方的劳模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拖拉机。周围30多个村庄、1万多人聚集到五公，盛况空前。^①大约有30台25~54马力的拖拉机开进村庄，它们分别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制造。当第一台拖拉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翻耕土地时，村民们惊呆了：未来的梦想实现了。一个村民问半生子李，苏联拖拉机与他心爱的骡子大黑相比哪个管用。李答道，“拖拉机真棒，但它不会拉粪”。^②

在机械的力量戏剧性地演示之后，客人们参观了合作社10年历史展览和苏联集体农庄的图片陈列，然后参观了副业生产。来自河北其他地区的农民劳模们，把耿长锁合作社颂扬为中国集体化农业的老大哥。^③

来自定县专区的代表不在祝贺者之列，因为记者刚刚详细报道了定县专区阻挠成立大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当中央和省里的审查人员发现了第一书记王春海和第二书记林大玉滥用权力的罪行时，这一政治丑闻便动摇了这个专区的地位。王的岳父

曾是安平县的一个富裕地主，土改期间成为激烈的“批斗大会”的牺牲品。据说王派林大玉到安平逮捕了责任人，并把他关进监狱。被认为在土改期间保护自己岳父的林铁，接到了来自北京的要求惩戒违法者的指示。林铁保护王的说法纯属谣传，不过林铁还是挨了批。1953年底，经过中央审查委员会严密调查之后，王春海和林大玉被撤职，王被送到一个国营农场养小鸡，林则在邯郸的一所中学里当教师。王的权力网络非常稳固，以致为了拆散它，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定县专区。1954年4月，包括五公在内的定县专区南部划入石家庄专区，北部并入保定专区。

1954年1月的第一周，五公便在全国新闻媒介亮相，引人注目的报道把耿长锁虚构成最早成立于1943年的合作社的创始人^⑤。以前的报道都写上4个创建者的姓名，而1954年却仅仅突出耿长锁，把其他人的功劳一笔抹杀。提出这个想法并进行联络的合作迷耿秀峰的贡献也同样不见了，焦点已集中在杰出的领导人身上了。

对于原先退出大社、现又回头的108户，耿老板表示欢迎。以前从未入过社的6户也要求加入，使社员增至401户。^⑥仅有23户没加入，其中包括那些成分不好的和在“群众监督下”劳动的农户，以及拒绝加入的贫农家庭。耿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国家实行对粮食垄断控制和强迫组织大规模的合作社，形成了一次以几亿中国人的生命和希望为代价的大冒险。在1953年的政治赌博中，耿长锁把赌注押在大社和反对市场上，并取得了胜利，可存在的问题依然很严重。这次冒险大行动要把中国农村带往何方？

在周年庆典的余波之后，耿老板开始把自己和五公大社及伟大领袖毛泽东联系在一起。1954年1月4日，《人民日报》

刊登了耿长锁写给毛的一封信^⑩。信的一开头是：“十年来，我们一直遵循您和党所制定的‘组织起来’的路线。”耿把合作社的所有成就都归功于毛和党，“我们知道，我们取得的一切都是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结果”。信中说，在访苏回国之后，耿以自己所见所闻，在五公和全省介绍苏联的集体化道路。

注 释

1. 《中国文学家辞典》（北京语言学院，1978），第348~349页。
2. 《河北日报》1952年6月7日。
3. 《河北日报》1952年6月7日。
4. 《河北日报》1952年7月15~18日。
5. 《河北日报》1953年3月15日。
6. 《河北日报》1952年4月15日。
7. 《河北日报》1952年5月16日。
8. 中共中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人民出版社，1985），第296页。
9. 《河北日报》1952年5月22日。
10. 《人民日报》1952年6月7日。
11. 《花开第一枝》（1963），第7~8、133~134、312~315页；《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264~267页。
12. 耿秀峰：《关于扩大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给省委农村工作部省农林厅的报告》，河北省饶阳县人民委员会档案室，五公大队，饶阳档案馆，第10卷，第2号文件，第12~17页。
13. 《花开第一枝》（1963），第24~25页。
14. 《河北日报》1952年9月18日；《津埠日报》1952年11月1日。
15. 《河北日报》1952年9月23~25日。
16. 《河北日报》1952年9月18日。

17. 《河北日报》1952年9月20日。
18. 《河北日报》1952年10月9日。
19. 耿和其他河北省代表的意见被收入共44页的《我们所看到的苏联集体农庄》(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52)这本册子中。
20. 《我们所看到的苏联集体农庄》,第1~2页。
21. 《津埠日报》1952年11月10日。
22. 统计簿(1944~1959),饶阳县档案馆。
23. 《人民日报》1954年1月7日。
24.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67~68页。
25.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68页;《花开第一枝》(1963),第134页。
26.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68~69页。
27. 《河北日报》1952年11月12日。
28. 《中国农报》第4号,1953年2月25日。
29. 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第1006~1011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5页。
31.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72页。
32.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69~76页。
33. 《河北日报》1963年11月23日。
34. 统计簿。
35. 《中国农报》第4号,1953年2月25日。
36.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64~67页;《花开第一枝》(1963),第312~325页。
37. 参阅乐黛云和Carolyn Grant著*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64~68。顾华著《芙蓉小镇》(北京,1983)对相似的黑分子强制劳动作了描写。
38. 《花开第一枝》(1963),第148~149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3~111页。
40. 1953年夏季和秋季的一系列讲话表明,毛的地位得到巩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11、115~120、121~129、131~135、

- 136~140页。
41. "The Price China Has Paid: An Interview with Liu BinY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9, 1989, p.31.
 42. Mark Seld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281.
 43. 1953年9月，国家完成了征购粮计划的80%，10月，下降至仅38%。《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9）》（北京出版社，1985），第66~68页。
 44. 邓力群、马洪和武衡编《当代中国的粮食》，《联合出版物研究中心丛刊》转载，CAR-89-093，1989年8月31日，第24~59页。
 45. 中共中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5），第300~301页。
 46. 统计簿。
 47.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1~140页。
 48. 《人民日报》1953年12月4日。
 49. 《中国青年报》1954年1月8日。
 50. 《人民日报》1954年1月4日。
 51.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75页。
 52. 《花开第一枝》（1963），第133~135页。
 53. 《人民日报》1954年1月4日。
 54. 《光明日报》1954年1月3日；《人民日报》1954年1月7日。
 55.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75页。
 56. 《人民日报》，1954年1月4日。

第七章 在苏联式的 社会主义道路上

中国国家领导人把模范标兵称作卡尔·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火车头，是它们把历史推向前进。结果表明，在火车头第一个到达历史进步之站同时，火车的其他部分也将到达幸福的目的地。河北省领导及其下属，把五公选为社会主义道路的火车头之一。大社的支持者们争相获得毛的青睐，力争使他们的合作社走在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前列。1953年底，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省农林厅厅长张克让指派矮小的卢广到五公去发动“火车头”。

在省委内务部工作的卢广是对耿的大社提出批评的人之一。当年日军侵入华北时卢在北京读中学，他和其他爱国学生一起跑到农村，加入了八路军，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彭真结上关系。卢顾问是五公与上层实权人物之间的主要中间人。秋末，在10周年庆典召开之前，卢的8人工作组来到五公。他能够获得财力物力，以证明把大规模的合作社与机械化、科学的水利管理和其他现代投入结合起来，定能达到目标。由于国家控制了宝贵的经济资源，因而选择只能是：要么跟着统治者走，要么落在后面。1954年秋，除了20户被划为“人民敌人”者和两户拒绝加入的贫农之外，五公村426户悉数加

入了大社。

大家庭？

耿老板对孤儿李秀英说：“先加入小合作社的是一家人，现在加入大社的也是一家人。”^①但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家庭”吗？有400多户组成的合作社会使农民们产生不和，从而损害积极性吗？卢广顾问在1953年底和1954年初递交给上级的、手写的、现已公开的保密报告中，提出了这些问题。

卢广的敏捷和聪明征服了当地干部，他往往对实情了如指掌。人们对他的能力感到诧异，不用草稿，就能做重要、准确、逻辑性强、以事实说服人的报告。他们还从取笑他个子矮小中得到乐趣。身高1.80米的张克让取笑卢顾问道，他坐在长椅上，腿够不着地。卢急了，就跳了起来。然后张站着戏弄他说：“我想看看你能跳多高。”他奋力一跳，可仍未达到张的高度。

卢顾问汇报说，1953年底，13个生产队在1954年合并成11个，1955年又变成10个。每个生产队以统一的标准管理自己的土地、耕畜和农具。在获得大致相等的土地和劳力之后，每个生产队各自负责增加收入和积累。社员收入是基于大社的收入、每个生产队的表现和社员个人的贡献综合计算的。^②不过，卢广感到失望的是，无论干部们如何调整收入分配方案，设法按照个人、生产队和大社的成绩进行付酬，可各人的付出和所得之间还是没有多大关系。1953年认为合作社可能太大的想法是有事实根据的。

1954年，每个生产队由30~40户组成，平均40~55个劳力。每队有一个队长，负责副业、福利和妇女工作的副队长，另有一名会计和记分员。下属专业小组承担诸如种棉花和

赶大车的任务。^③权力和主动性都集中在干部手中。

卢广发现，争吵和组织病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大社。在召开10周年庆典前后，有困难的生产队抱怨他们分到的是劣等地和弱劳力。一些生产队的干部是无能之辈，那些落在后面的生产队失去了生产的动力，开始消极怠工，等着村干部和政府来解决问题。在他看来，核心问题是如何激发和保持没有经验的大社社员们的主动性和信心。

早先的合作社作为大社的分社完整地保留下来。一队以原先的耿合作社为班底，它有15名积极分子和党员，及3名会计。可其他刚刚成立的大规模的生产队，没人会记账，有领导经验的干部也很少。曾经设法通过一些改组来解决问题，但让这个生产队帮助另一个队，或者更准确地说，让耿氏和乔氏帮助李氏，就会让一队的社员感到沮丧和痛苦。10年来，为了合作社的成功，他们整地、灌溉和提高土地肥力，现在，他们的劳动果实却突然失去，许多耕畜和农具都被分给贫困的生产队。劳动成果一旦与所有村民一起分享，那么原属耿合作社的社员收入，就远比1951年大丰收之后低得多。许多人担心，即使他们走在前面，劳动成果也不属于自己。不过，耿老板向所有人承诺，未来将是美好的。

以劳力为依据的收入分配，是以工分的形式计算的。与以往一样，男劳力劳动一整天为10个工分，而妇女和老人的标准为6~8个工分。这一制度对突出的劳动者没有任何激励，即使在原来的耿合作社中，也不能激发出生产热情。不过，虽然它的约束力很强，但由于合作社很小，还足以解决劳动强度和酬劳的问题。大社就更不能一体同心了。在卢给上级的秘密报告中，一些社员说，“如果你是能人，报酬不会多；如果你是懒人，报酬也不会少”。当游手好闲者和非熟练劳力同样获得10个工分时，熟练的壮劳力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一种报

酬制度倘把太多的不劳而获者与勤劳者放在一起，它就不能激起大多数人的生产积极性。卢顾问在内部报告中估计，20~30%的劳力浪费了。^④在大社中，每人的劳动付出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太远，不能激发劳动热情，即使稍微调整分配方案，把劳动报酬从占净收入的40%提高到50%，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的确有少数几个人早出晚归，但大多数人却出工越来越晚。对此，卢顾问长叹道：“队长们先敲钟召集他们，但敲了一会儿后还是没有动静。”一天下午，卢发现七队队长敲锣敲了一个多小时，还是只有几个干部的身影。等到还有19个人没来时，队长不得不挨门挨户去叫。村民们嘲笑道：“一遍敲，二遍吆，三遍出来伸懒腰。”在地里，没有一个人动手干活，直到队长说“咱们干吧”。有些人每次到地头时都要停下来歇息。社员们等着队长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主动性消失了。卢广发现，大社孕育着经济停滞和效率低下，在大农业合作社内，几乎不可能爆发出辛勤劳动的动力。

定额和主动性

为了解决丧失主动性的问题，卢广的工作组在1954年初设计了一个按产量定额进行分配的收入制度。这个方案由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新闻界头版头条介绍这个计划，各地的干部们则被迫学习这一方案。参加过五公10周年庆典的穷棒子合作社社长王国藩采用了它。定额制度成为长期争吵不休的中心论题，即如何废除个体经济和市场，同时又成功地保持公平的报酬分配。

定额制度确立了数百项任务指标，从犁一亩地，到种棉和收割小麦等等，它是奖励最能干劳力的计件工资制。在废除了市场作为决定收入的手段之后，新的官僚机构不得不为所有主

要工作制订定额，还有质量的评定。公允地定出这么多标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簿记也十分麻烦。每个生产队还要为每个生产小组甚至为个人制定定额，对特殊任务完成的数量、质量和速度要给予特殊规定，并确定工分多少。^⑤定额制度代替了简单而平均化的、不鼓励勤奋劳动的工分制，它要求有严密的官僚控制和保持详细的记录^⑥。个人和生产队队长每天晚上向会计汇报，但文化程度极低的义务会计整天在地里干活，常常由于太忙或没经验而不能准确地把每件事都记下来。不可避免的 errors 和争吵使人们感到受轻视或欺侮，即使会计是个细心的老实人，宗族和其他村内的矛盾极小，也常有此事。潜在的矛盾冲突非常大。

东村的一、二队（其中有耿合作社的原有班底）与西村的十一队，首先拒绝采用定额制，因为它很容易造成不和。它让人感到不像是在合作。这三个队采用耿合作社原来的比较简单和平均主义的工分制。^⑦吸引绝大多数人加入大社的代价是不得不采用使少数人感到沮丧的非人格化的管理方式。这些少数人的特殊经历，本来使他们有能力进行有效的自愿合作。

影响积极性和士气的另一个问题集中在干部们身上。卢在报告中反复指出，相互不和的村民们对干部开会照样拿工分很不满，认为那是在谈话，不是在劳动。还有一个队长痛苦地向卢广诉说道，他“一年到头日夜干，但收入比一般劳力还少，这不公平，如果我在地里干活，收入比现在多”。在给省委农村工作部的秘密报告中，合作迷耿秀峰建议，生产队长每月至少要在地里干 15 天，报酬与收入最高的劳力相同。但这就有必要增加更多的管理人员，而管理人员的报酬问题令人头疼。^⑧

卢顾问披露了 10 个生产队内部生产小组的敏感问题。每个人都想与最强壮的劳力在一起干活，确保定额得以完成或超

额完成。老者弱者和懒惰者逐渐被扔到一边。要使非人格化的管理具有公正性，就必许放弃正式合作的文化基础——邻居和亲戚关系。卢顾问的工作组确立了两条原则：第一，非人格化的生产小组均由老少、强弱的劳力组成，也不像以前那样，把朋友和家庭这些感情纽带当做成功的基础而组织生产。第二，男女分开干活。由于干部们确定生产小组的结构，男女分开体现了传统的道德准则。不过，有些生产任务（如除草），仍由男女劳力一起干。

1954年，全国性合作化运动的重点在于对农村妇女的动员^⑨。那时，五公村558名劳力中，有1/3是妇女，几乎全在地里干活^⑩。国家接管粮食市场，并把粮食收购价压得远低于市场价，从而贬低了农业劳动价值。贬值的人干贬值的工作。在五公，不久又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成为现实的是，年轻和年老的妇女分成两个单独的小组。

男人们到城里寻找收入更多的工作。1954年，一些村民变为建筑工人，其他人则当上了卡车司机、小商贩和工厂的工人。但由于政府收缩市场、个体副业和手工作坊，工厂里的工作逐渐限于城市青年，以及朝鲜战争结束后从部队转业的300多万军人。城里的工作很少，大部分依靠政治关系、通过行政命令进行安排。

1953~1954年冬，五公平整出面积从108亩到717亩不等的长方形田地^⑪，改变了由1300多块很小的私田所组成的像一块块补丁似的地表。这些田看上去像苏联集体农庄一样，虽然祖坟依旧点缀其间。县领导帮五公与邻村交换了分散的600亩地，以利于拖拉机耕种和打全村用的水井。虽然原来的小路没有了，但大社却增加了150亩可耕地。由于田地重整，各户的小块土地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许多村民紧张不安地看在眼里。

每个生产队按照卢广工作组制定的计划，种植比例大致相同的粮食、蔬菜和其他庄稼。为了弥补工分承包制内部平均化的不足，生产队之间为获得超额完成的奖金而展开竞争。卢顾问注意到，懒惰和瘦弱的人对定额和奖金制无动于衷。一些人担心，这会因扩大强弱劳力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产生不和”，但是大农业社的消极因素和效率低下使卢相信，只要有定额和奖金，就能使大部分农民出力干好活。政治鼓励和社会主义教育都不能达到这一点。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火车头正在寻找让大社富裕起来的办法。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没有人敢公开地对大社和最终发展成斯大林式农庄的优越性提出异议。领导者认为，自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核心是，大规模集体农业优越于个体农业和小规模的平等的合作社，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已由苏联大致证明。耿长锁拿出了自己亲眼所见的证据。不理解它的农民则落后了。惟一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实现集体化。在五公和其他地方组成的大农业社正处在集体化道路的半路上。

卢广为定额制欢呼，昨天的懒汉已开始早出晚归地干活了。与苏联一样，鼓励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取得非凡的成绩。卢汇报说，当八队队长要求正在收割的妇女去做饭时，她们坚决要求继续干活，直到干完为止。以前，五队和七队的社员情愿回去排队磨镰刀，现在他们都随身带着磨刀石，而且社员们相互帮助，结果按时完成队里的任务。卢写道，为了增加收入，人们为争得定额任务而吵吵嚷嚷。

中央注意到了卢广汇报中的成绩。1954年夏，《人民日报》载文描写了耿老板的妻子、五公村妇女主任、“共产党员徐树宽”，如何带领妇女们把饭菜送到地里。报道说：回家煮饭或睡个长长的午觉毫无意义，因为浪费时间就是收入的损失。^⑩这样，劳力便被更加紧张地动员起来了。

为了调动积极性，合作迷耿秀峰在1953年回到五公的一段时间里，曾提出过类似的分配制度，五公人则对此作了补充^⑬。秀峰经常想方设法使较大的生产单位取得成功。在每个生产队内部，土地和劳力的分配比例各占一半。这一比例仅适用于亩产第一次达到200斤的生产队，如果产量提高，用于劳力分配的部分就增多。亩产达到200~300斤的生产队，把200斤以上的增额部分中70%用于劳力分配，仅有30%作为土地红利。300斤以上的，整个增额部分用于劳力的分配，这样便鼓励了辛勤劳动和提高土壤肥力。这一创新便把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的按劳分配原则付诸实践。^⑭

县政府赞扬并推广五公定额制度。至1954年1月为止，饶阳县第四区280个合作社采用了生产定额^⑮。其他地方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但与走在前面的五公村不一样的是，后来者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获得宝贵的国家投资、以及接近最高层官员并被令人眩目地宣传的机会。其他合作社既没有五公这么长的历史，也没有与国家上层人物的私人关系网。在走苏联式道路的戏剧中，五公村扮演的主角已是无与伦比的了。

水……生命

1953年底，当中国制订第一个苏联式的五年计划时，五公人铭记着自己的目标是，在其5年计划中，实现亩产翻一番，达到600斤。关键是水、国家扶持和苦干。1954年，耿老板计划用78口机井进行灌溉；经过热闹的宣传，省里决定提供机器^⑯。五公属于第一批采用高效的先进工业技术的村庄，自1955年起，就有两台机器。但与许多预定的规划一样，这一计划被悄悄地搁置起来。直到1969年，五公才获得先进的柴油机。省里的挖井专家把技术传授给9名当地青年。五公

村得到财政和技术上的支持，而其他村庄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

1954年，为了扩大灌溉面积，村干部们组织了61人的挖井队。在用竹竿检验了土壤之后，村民们便搭了一个4.5米高的架子，顶部是笨重的木头装置，转动起来像个小型游乐场转轮。两个男人踩动轮子，为木制钻头往地里钻动提供必要的动力。12个男子实行三班轮换制，晚上点煤油灯继续干，40天就能挖一口井。踩动轮子是十分累人的活，几星期下来，布鞋就磨破了，他们的妻子便缝制新鞋。妇女不准加入钻井队。人们认为，女人只要靠近这个地方，就会带来灾难。

以前，五公人挖一口井必须付给外乡人大约1万斤小米。现在省里和专区政府派来技术员，为五公提供木料和钻井装置上的其他宝贵物资。1953年，省农林厅从天津调来了两个人，到五公演示沙地挖井技术，帮五公挖了第一口现代的水井。对外乡人的贡献嗤之以鼻的村民们说，这口井不管用。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经过千辛万苦，用手工工具，经受了凛冽寒风、太阳曝晒和满身泥浆后所挖出的井。

这支挖井队在1953年共挖了17口井，并提出了挖87口井和117条灌溉渠的3年计划。在五公村南面，最深的井有115米，村东南面的井最深达170米。挖深井要花费几千个劳动日，大约4000元人民币，其中一部分由省政府资助。^①邻村的农民没有得到挖深井所需的国家提供的技术和财力物力，他们嘀咕道，五公的井正在偷他们的地下水。对那些不受欢迎的村庄来说，五公及其在权力机构中的熟人似乎是一种威胁。建设社会主义也等于建造一堵墙，它把受到国家恩赐者和所有其他人分开。

当有些井开始干涸时，耿老板要求挖得再深一点。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水的问题。一些村民提出抗议，认为劳力

投入和开支过多，要求暂缓挖井。但决定不由他们作出。耿坚持继续挖，就得挖。

花费巨资挖井是在缺乏任何全面的土壤和水文调查以及任何开支结算的情况下进行的。到1954年为止，五公村已有99口井，1050亩灌溉田，而在挖井之前仅有300多亩。在此后的10年中，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灌溉面积仅增加450亩。人们筋疲力尽地苦干，可结果离目标还很远。在50年代中期，有3/4的土地没有灌溉条件。

50年代初在五公参与挖井的李过、侯昆、张文通认为，村庄的富裕依赖于他们彻夜苦十和经受寒冬的能力。他们也喜欢逛集市，近的到小堤，远的则到冀鲁边界、五公南面的故城县，去传授五公人的方法。看看世界真是激动人心。那些曾经远涉他乡、寻找工作和市场的人，如今大多数被限制在村里从事农业生产。农民与当地的集市和较远的城市之间的广泛联系被切断了。合法的外出远行，开始受到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机构的限制。

拖拉机和技术员

拖拉机耕种被公认为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步骤。从40年代末开始，东北的国营农场就使用拖拉机开荒和耕种^⑧。进口的拖拉机被当作曾加快苏联发展，并将给中国带来繁荣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1954年，耿老板19岁的女儿素娟被派去学习驾驶和维修拖拉机，她是派去学习的12名五公青年之一。23岁的徐文东到石家庄的学校用两年时间学习修理拖拉机和其他机械。^⑨徐喜欢机器，但厌恶政治，他设法远离政治运动。不久，五公便以有了3个较为年轻的技术员而自豪。

1954年，上级派19名熟练工人照管五公拖拉机站的三台

俄罗斯拖拉机（其中一台有 75 马力），并培训驾驶员和技术员。拖拉机站的全体人员，包括农学专家，都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和河北农业大学。这些技术人才是不可多得的资源。在拖拉机运行的第一年中，来自华北各地的 180 名受训者，包括 40 名妇女和 50 名饶阳青年，在派往其他地方之前先到五公来实习。妇女当拖拉机驾驶员的现象是昙花一现的。拖拉机驾驶员常常必须日夜工作，开到很远的地方。在中国乡村，女同志即使没有招致不道德行为的嫌疑，也不能干这种工作。大多数受过培训的女驾驶员很快就发现，她们必须回到合作社的地里干活。拖拉机站拥有来自沧州中捷国营农场的技术顾问，并严格按照苏联的模式组建。1953 年，全国 2788 台昂贵的拖拉机中，除了 58 台之外，都在国营农场耕种全国 0.2% 的土地。^②定名为河北省第一国营机械化拖拉机站——五公拖拉机站，正式为全饶阳县服务。但在 1954 年，只有大面积平整过土地的五公才能使用拖拉机。

拖拉机站站长师喜生，原是河北省南端抗日根据地的一名区长。他全家（共有 6 个孩子）搬到东村。其大女儿桂英与耿老板的两个女儿、拖拉机驾驶员素娟和惠娟的关系很亲密。为了表示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师喜生给他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学苏”，即“模仿苏联”。

1954 年 1 月，耿老板在给全国发行的《河北日报》的编辑们的一封信中老生常谈，引述了 80 岁老人李绪辰的话。后者是离开病床到五公来看第一台拖拉机的，他说：“我不知道，没有我们的工人老大哥，我们怎么能坚持下去。”耿重申：“苏联集体农庄的繁荣，是苏联工业化的产物，它使农村实现了机械化。”而且，如果中国能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划的那样，利用农村剩余产品优先发展重工业，那么乡村将受益无穷，因为所有村庄都将有拖拉机。

在五公村拖拉机耕种的新闻照片中，隐去了仍散布于田间的各家的祖坟。照片的用意是鞭策其他村庄成立大规模的合作社，从而获得新技术。但中国缺少拖拉机、受过培训的服务人员和其他现代投入，更不用说用外汇去进口相当数量的机器，以及开动它们的燃料。五公是国家赠与的惟一受益人，也是其他村庄无法相比的模范村。

1954年，五公村干部计划用拖拉机耕地2159亩，即可耕地的51%，可这个目标有70%不能完成^①。五公村的支持者们认为，拖拉机耕作通过深耕和快耕，能够获得高产，并节省劳力，这样就能达到丰收的目的。拖拉机还免去了增加耕畜的需求，而且拖拉机晚上无需休息，如有足够的备用零件、燃料和熟练的技术人员，它能日夜干活。五公村干部估计，拖拉机节省了5328个劳动日。^②不过，社会主义国家在减少村民们在村里的农活的同时，却又堵住了副业产品的销路和自由劳动力市场。

同年，河北省另外两个县即天津郊区的宁河和石家庄东面的晋县（著名的周景庄合作社即在该县）也有了拖拉机站。全省拖拉机耕地的总面积为5200亩，其中五公占40%以上^③。省里的设计者们想，除了土地贫瘠和缺水外，冀中能够成为中国的乌克兰，华北的粮仓。技术力量应当都集中到这里和东北产粮区，后者拥有中国最大的国营农场。

拖拉机耕地并不是免费的。1955年，村民们每亩付给拖拉机站1.2元^④。国家的财政援助使拖拉机、燃料和全体人员提供廉价服务成为可能。拖拉机站的服务区域达14个县，目标是几年之内再从苏联或东欧进口拖拉机，把服务区域扩大至全国2000多个县中的100个。1955年，五公拖拉机站扩大了它的服务区域，把饶阳县周围的20个刚成立或经过扩大的农业合作社包括在内。那一年，全站有72名驾驶员，35台拖拉

机，其中一台为 80 马力的斯大林牌拖拉机，其余的则从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进口，在饶阳的耕作面积为 99777 亩^⑧。饶阳第四区把土地平整和机械化结合起来。到了夏季，55 个村庄中有 43 个成立了全村规模的合作社。国家资助的拖拉机站是组成大农业合作社的一个诱因。

由于昂贵的农业机械化加重了对苏联的债务，所以国家领导人对依赖进口石油和拖拉机的能力进行了讨论。在紧跟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中国集中宝贵的资源和外汇，首先建立了以钢铁工业为核心的、与国防相关的重工业基础。1954～1955 年，为了避免伴随着苏联集体化的宰杀耕畜现象，大多数干部选择了渐进改革的政策。像五公这样已实现了机械化的大社，预示着农村的未来，并为解决大规模集体化的机械化农业问题提供了试验场所。不过，大部分干部同意：故意使合作社从中得益而变得富有吸引力的机械化，不可能一夜之间产生。然而毛却急不可耐。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发表了得到林铁和华北局支持的渐进主义观点，他在 1954 年宣布，中国不能立即实现机械化和集体化，不能急于仿效苏联的道路。“我们既不能大规模生产拖拉机，也不能生产足够的汽油”。要等到中国能生产出足够的钢铁、拖拉机和柴油，才能实行集体化。邓所关心的是推迟机械化，还有继续实行自愿入社的问题。为什么要强迫或威胁不服从的、有顾虑的农民呢？一个学生告诉我们，饶阳的几名教师曾告诫持赞成态度的学生：苏联在斯大林的强制性集体化中死了数百万人。

在邓看来，如果农民们欢迎苏联式的集体化，那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首先，继续按土地分红的小合作社达到这样的生产水平，即为每个社员提供充分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包括为老人和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充分的福利基金。第二，必须向

人们保证，合作社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⑤

既然拖拉机象征着苏联式道路，那么对五公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便是，由河北农林研究所张祖春率领的一支 17 人组成的技术队，从 1953~1954 年冬开始，用 3 年时间为五公培训技术员。12 月，这支技术队创建了有 57 亩试验田的五公农业试验站。试验站最后聘请了 14 名全日制技术员，负责田间管理、棉花种植、土壤改良、控制害虫以及培训所有技术人员。这些具备有限的现代知识、没受过大学教育的技术员，在种植新的品种、试验改进的肥料。他们也介绍如 DDT 和“六六六”这些杀虫剂，没有注意到生态和安全就使用了它们。“虫子怕”周元久是这个站的主要技术员。

5 年前从山西部队开小差回来的周，是与技术员一起劳动和学习的 16 名五公青年之一。这一次，长着长牙、快活的周对田间调查产生了兴趣。村民们取笑他，由于他负责控制害虫，便给他取了个“虫子怕”的绰号。周虫子甚至在炕上挂了一幅虫子的像，害虫和灭虫成了他的主要话题。有些人认为，这是他仅有的话题。

几乎有 200 多名外地专家和家属突然迁到了五公，造成了房子紧张。许多外来者住在村北面的拖拉机站附近，一些人租了房子，其他人则搬到简易招待所，它位于村中央附近，是一个有围墙的大杂院。租金和建筑工作增加了当地的收入，这也是模范村获利的另一个渠道。

1954 年，五公计划征收 1470 万斤大粪作为肥料，主要取自于公共厕所以及由农户平均分摊。目标是每亩 3000 斤肥，1953 年则为 2000 斤。这一计划主要依靠发展养猪业，这由每个生产队的老人们负责。^⑥

于部们还试图清除阻碍现代化的文化障碍。五公位于蝗虫迷信的中心附近。一般人都认为，大群蝗虫降临时，惟一的办

法是烧香，准备贡品，向天磕头。触碰蝗虫会引发瘟疫，杀死蝗虫则会引来大批蝗虫大肆侵扰。^⑧在 50 年代，由国家提供的杀虫剂使全面消灭蝗虫成为可能。

国家所要清除的不仅仅限于文化上的非经济成分，它还攻击传统的其他方面。这在 40 年代表现为拆毁庙宇。在 50 年代，国家则继续通过削弱市场来侵蚀群众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在各地巡回演出的杨各庄戏班子禁演了，因为它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国家正加紧发动一场针对传统的战争。幸存下来的、土生土长的文化非常受欢迎。1954 年，在每年一次的邹村庙会上，一个天津戏团为 5 万名观众表演了河北梆子，还有相声、幻灯、击鼓、走高跷和舞狮子，凡此种种以及其他方面的传统文化，均有助于村社团结，充满祥和。

但政府发动的一个运动使社会产生了分裂。1954 年夏，毛把文学批评家胡风贬做反革命叛徒，因为胡风要求有新闻自由，以检查政权腐败行为，防止引起百姓的愤恨。因此，教育部门得到指示，追查与反革命叛徒有隐蔽关系的人。在保定专区，河北这一运动的负责人下令追查，数千人立即被捕，其中主要是曾为旧政府工作的普通官员，他们被关押在数量急剧增多的政治监狱中。

“向耿长锁学习”

1953 年 12 月，省政府在保定召开了一次关于合作社组织的会议，方针是团结贫农和中农。这种方法正是从五公小合作社学来的。运动的口号之一是“向耿长锁学习”。饶阳第四区区委书记张玉岗汇报说，全区 84% 的人口（即 6100 户）已分别加入 355 个合作社，办法是“老社帮新社，新干部向老干部学”。在组织全村性大社的过程中，别的村庄都向五公看齐。

最早的合作社会计乔万象和大社的会计耿连明，帮别的村庄建立了会计制度。耿会计与耿长锁是同一个祖父，他们的祖坟挨在一起。无论国家政策怎样，耿老板都将把五公变成忠诚的家族政治机器，它与支持者们，如小堤的张玉岗、饶阳县委和在保定的张克让和林铁等盟友们，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

1954年4月，饶阳县第四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全面实现合作化的区^②。6月，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汇报说，河北60%的农村人口已加入互助组，虽然大多数互助组刚刚创办。全河北省仅有11400户加入合作社，而一半以上在饶阳县第四区。

土地、耕畜甚至现金也一起合伙的大社，与五公的情况一样，不得不千方百计让农民努力干活。问题是国家在1954年和1955年强制实行更加社会主义的政策，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回投入半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由于缺劳力家庭和其他家庭间常有的严重利益分歧，发生了争吵和暴力冲突。许多中国农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成分，都经历过这类剥削多于公平的大社。农民害怕被剥削：假如某人认真去干活而其他人偷懒，假如所有合伙人都报酬相同，那么谁努力干活谁就是傻瓜。

农业生产要求不违农时，要在产量最高的恰当节气里播种。但在大社，耕地是草率马虎的，而且贫困的大社是由人而不是耕畜拉犁。当土地不再是农民自己的、他们又仅从完成的生产任务中取得报酬时，他们就对生产应付了事，随意地翻地和播种。在这些较大的合作社中，尤其是刚走上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大社中，并未找到把实际的经济成果与收入差异联系起来的好办法。

许多被编入大社的饶阳县农民失去了家庭自主权，如同失去个人自由一样。社员们必须遵从有关种什么、什么时候种、种在哪儿、如何种以及与谁一起种的命令，必须把所有的收成

上缴给国家的地方官员，以满足定额、税收、福利和投资方面的需求，然后才能均分剩余的粮食。让人感到未被轻视是不可能的。

国家控制一切

1953~1955年期间，规模扩大的运动积聚了锐气，国家也加紧了对农村经济的控制，并断定劳力合伙和平均分配的大社将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因为这些合作社将消灭假想中的剥削、竞争和小农耕作与市场的不合理性。社会主义，即大规模生产和国家控制剩余产品，将比资本主义更富有生产力，因此，毛和他的盟友们设想，即使没有拖拉机和现代投入，社会主义大社在经济上和道德上也是极为优越的。要由更大规模的合作社和国家统制来取代较小的合作社和市场。1953年12月16日，中央委员会下发一份文件，号召消灭“商人、囤积粮食者、投机者和高利贷者”。它特别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得从事商业活动”。^⑧国家能合理地处置农村剩余产品，而市场却不能。市场逐渐与混乱相等同，从而遭到禁止。

“战胜”过花生中间商李恒信的五公村，被当作把粮食、花生和其他作物直接卖给国家、结果很富裕的证据。事实上，早在40年代末，五公村民们便由于副业受挫和市场萎缩而损失很大。只是由于耿老板卓越的领导和他那获得国家资源的特殊办法，这种损失才勉强被大家接受。其他地方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在关闭市场中遭受损失。他们在回应国家反对被等同于混乱的市场这一宣传时嘲笑道：“一开就乱，一关就死。”

1953年12月，卢广顾问的工作组制定出国家刚颁布的、有关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细纲，规定五公村人均分得粮食360

斤（这是仅有的口粮），各户的收入也是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形式支付，并以少量现金作为补充，而人均360斤以上的所有粮食均须卖给国家。村民们担心留给他们的太少。由于国家严格控制粮食意味着饥饿的人们不能再指望从公开的市场上买粮以补不足，情况便进一步恶化。合作社干部向紧张不安的村民们保证，如果出现饥馑，就启用福利基金提高贫困户的收入，以维持生计。耿允诺，对于饭量很大的人来说也已够吃了。

国家号召其他村庄学习五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大量的粮食和其他作物卖给国家。就在10周年庆典之前，五公卖给国家5万斤粮，大部分都取自于大社。作为交换，国家保证向大社提供宝贵的杀虫剂和肥料。但1954~1955年冬，留给饥民们的粮食不够了，许多家庭吃光了他们的粮食。到了春天，饥民们的叫嚷又使国家把5万斤粮返卖给五公。新闻界对此没有报道，而只讲五公售粮数很高。新闻是国家政策的啦啦队，而不是自相矛盾现象的可靠记录者。

在一些被激发充当社会主义道路的火车头地区，国家垄断粮食销售，再加上发动人们加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结果造成饥荒和不满。1954年，浙江省领导强迫农民们组织大社，使大社的数目突然从3298个增至53114个^⑧。有15个县由于试图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造成经济混乱，农民们被迫吃树皮、挖树根，以对付饥馑。有些人饿死了^⑨。

农民们再也不能轻易地跨越行政区划，以图粮食和棉花能卖个好价钱。相反，所有的棉花必须以固定不变的低价卖给国家加工，并且与集中加工花生油一样，其残余物在用作肥料之前，农民还得花钱去买。当国家控制并集中在城市里加工花生油时，同样发生肥料流失。农民们只得更加依赖国家慷慨援助的肥料，就连加工食油所需的原料也被剥夺了。

由于富裕必须进一步依赖国家的恩赐，耿老板便致力于培植与有权阶层的关系。他率领一个农业劳模代表团回访天津，在那儿，他见到了朋友魏振华，魏是天津棉油厂的劳模，据说他曾见过总理。农民们不能获得宝贵的国家指令性资源，可国家能合法地迫使农民把自己的粮食以固定的低价卖给国家。他们甚至不再有权选择高价卖出细粮，自己吃廉价的粗粮。农民们不敢相信，在远方还有一个控制粮食的机构（它允诺向所有需要粮食的人提供余粮）。一个地下粮食市场遂兴旺起来，在饶阳，几乎每个集市都有一个规模大而稳定的黑市。1954年，小麦1角一斤，小米和高粱8分一斤，而国家小麦统购价则为8分一斤^③。当国家收购粮食太多，从而出现人为的缺粮现象时，大部分农民便通过黑市也即秘密市场买粮，以挨过艰难的时光。

李沛琛是饶阳数千个经常出人这类市场的人之一。1913年他生于五公，15岁结婚，但第一个妻子并未生子便于3年后去世。1934年再婚，由于不能养活日益膨胀的家庭，他于1940年在日军占领的天津港做学徒（其姐姐和姐夫几年前去了那儿），加入到许多其他饶阳来的小商人和工人的行列。

李迫于生计干了一年之后，便开始为一个商人跑生意。他节衣缩食，最后自己单干。他往返于天津和山东济南，不久，一年净赚200元，全部寄回家以补家用。李沛琛一个人在济南时，加入了一贯道这一汉奸秘密组织。每年逢收获季节，养家糊口的李（我们这么称呼他）便回到五公，收割2亩菜地，12亩庄稼。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恰好在五公的家中。土改期间，他被定为中农。1954~1955年粮食紧缺期间，养家糊口的李必须为他的父母、妻子及两个女儿找粮。与很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杨各庄、邹村和小堤的黑市上买了粮食。

杨各庄受“粮食第一”的反市场政策影响，情况特别糟

糕。长期以来，庄里人靠在沙地里种花生出售以及从事加工面条这类副业维持生计。40多个村民从事当地的特长，即做游乡串户的劊猪师傅。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迫使劊猪师傅和其他在集市上做买卖的人回家务农。由于市场紧缩，国家坚持粮食自力更生，杨各庄村民担心，他们根本没有粮食可吃，因而被迫在更适宜种花生的沙地里种植谷物。结果是经济恶性滑坡，既没有钱也没有粮食。虽然这是事实，可在向上级汇报较高的粮食产量时，对此却隐而不宣。没有花生、加工、零售、手工艺的收入，再加上自身小集市的衰落，使杨各庄成了国家救济对象。

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能满足最穷者的消费需求。虽然缺粮家庭得到保证，政府有粮弥补不足，但当他们竟然前来索要，特别是成群结队地来时，国家的各种救济就不能满足当地的粮食需求了。要么有人从事地下经济，要么全家挨饿。

在50年代中期，中央在发动反市场运动的同时，又把以农产品加工为基础的手工业，从农户和村庄中转移到城里的工厂。这就破坏了当地重新兴起的棉纺织、纺丝、榨油和其他农村副业及手工业，它们无法与国家争夺原材料。⁵⁰对五公人来说，失去兴旺的榨花生油副业，是个最沉重的打击。这如同一个第三世界的厂商向经济强国交出了加工业和市场。在中国，内地农村是边远地区，国家是获利的中心。领导人的观点是，乡村暂时为工业化做出牺牲，把重要的资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工业部门，从农民手中转移到政府部门和城市。这就剥夺了许多村庄自身发展和繁荣所必需的剩余产品。

并非每项副业都在五公消亡了。县供销合作社负责为五公的打绳副业提供稳定的麻，并负责销售所有绳子。五公还增加了一项收益较好的新副业。1954年，在南李宗族的坟地里，开辟了一个果园，它地处古代的河床上，土质为沙土，无法种

植谷物。在 1953 年分裂大社引起思想混乱之后，被耿老板踢出领导岗位的老民兵徐义洲负责这个果园。国家购买所有的水果，五公与市场毫无干系。合作社从果园和打绳中赚不到多少钱。

1954 年，该县用古代的技术在五公建造了一个小粮站，用泥砌砖墙，用麦秆挡雨水，用土办法减少灰尘和污染，并防止虫和老鼠造成重大损失。长期以来邹村一直是当地的定期集市及该地区的储粮点，现在却逐渐被五公模范村取代。五公没有受到大量与国家垄断和社会主义政策直接相关的打击。与杨各庄一样，邹村的经济也衰退了。

胜者与败者

任凭在技术、行政和财政上给予支持，大社并没有在生产率和收入上给五公带来飞速的突破。粮食产量的提高为制定新政策的智囊人物提供了依据。可他们常常空想，被受操纵的合作社的面纱所迷惑，后者常使很多人飘飘然。在官方通过新闻界公开宣布的产量中，很少提到的不断变化的变项是，土地面积单位的大小（在官方的较大的亩与标准亩之间有 10% 的差距）；谷物去壳或没去壳；原棉或轧过的棉；在粮食产量的数目中是否包括红薯；夏收和秋收之和还是仅夏收或秋收；包不包括等同于谷物的非谷类作物。同样重要的是，列举的产量没有说明扣除耗费成本或劳力投入中的哪一项。模范村在一个需要保罗·班扬内斯库的口号的社会氛围中发挥作用。在政治需要面前，统计准确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原则变得苍白无力。

1954 年，大社的粮食亩产量从前一年的 282 斤增至 352 斤，而 1955 年又降至 283 斤。这些数字远低于 1951 年小合作社时的最佳成绩（1951 年每亩 478 斤），但比贫穷的冀中常年

产量高得多。不过，五公的许多家庭却遭受了财产损失。为了给火车头加油，苏联式道路要求在生产中进行高投入，仅留下少许给旅客消费。在1954年和1955年2年中，高生产成本和高积累率的结果是，大社仅把每亩90斤粮食分给社员，而1951年原来的耿合作社为152斤，准确地说，1955年大社粮食生产比1954年的水平每亩下降了69斤，就连特快列车上的农民也对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感到困惑。

1955年，五公人听到了技术顾问的建议后，将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了一倍多，达到624亩，产量从1954年每亩30斤的高产水平，激增至每亩轧棉74斤，创下了该村的记录。棉花是该地区的主要输出物资，大部分运往北朝鲜。政府正千方百计地发展棉花种植和纺织工业，她表扬了五公人的成绩，但继续压低棉花的价格。

虽然棉花取得丰收，可农民们缺少必要的现金，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实现常规婚礼、葬礼和仪式的文化期望，满足消费需要；粮食产量减少，低价统购使种植棉花无利可图。1954年和1955年分配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五公创办了耿老板曾在苏联看到的服务体系，包括一个日间托儿所，一个配发中药的药房，一个妇幼保健站，它使农村妇女生育更为安全。还出资兴办了一个老年之家，它由一名60岁的妇女管理，但不久就关门了。^⑨大社照顾了45个贫困户，其中17户是残废军人或军烈属，受到特殊照顾；有10个贫困户缺少劳力，14户少地，11户缺少种地的经验，也即他们被迫放弃了如木工、小贩和零售商这些职业，改以务农谋生。

对城市工人和国家干部，国家给予养老金和福利，并提供很多的津贴，但却没有系统的农村福利。囊中羞涩的农民们只得自谋生路或逆来顺受。五公村的大规模福利计划相当特别。1954年，五公发放3.8万斤粮食救济贫困户，卢广顾问深深

地为对待福利问题十分细心的当地干部所感动，向中央领导转交了一份有关五公村福利的报告，内容很乐观。但缺少财力的村庄实施福利计划，只得减少社员们的收入，冒着从事生产的劳力会产生不满的危险。

拔 高

五公的声誉激发电影作家胡苏完成他的作品，它以耿合作社为原型。1954年6月，他写完了《无垠的土地》，这是一部有关孤儿故事的高度政治化作品，讲的是一个即将去世的名叫魏岩的穷老汉，家中仅有的幸存者为一个孙儿和一个孙女，前景未卜。他的侄儿是一个讨厌的富农，企图从老汉手中抢走几小块地，于是假装关心。老汉对这个坏蛋表示怀疑，便绝望地为孙儿孙女安排一个可靠的将来。他叫来聪敏的合作社干部田大海，于临终前表示他很久之前便想加入合作社了，恳请大海收容孤儿。许多社员认为，扩大合作社是个坏主意，故反对接纳孤儿。大海争辩道，魏岩是他们这个阶级的血肉般的亲人，而他可恨的侄儿是阶级敌人。最后合作社接收了孤儿。魏岩死了，合作社出钱体面地安葬了他。阶级敌人的阴谋失败了，合作社得到壮大。

胡苏打算修改《无垠的土地》，把它改编成电影脚本。五公村民们激动不已，因为他们的故事将出现在银幕上，并在全国放映。但1954年底胡苏调离饶阳，最后对这个计划失去兴趣。村民们耐心地等啊等，可这部电影一直未能出现。

不过，五公村和耿长锁的地位继续上升。9月，耿又来到北京，这次是作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来的。五公的地位一上升，它的干部就有机会到全国各地游历。乔利广已提升为耿长锁的好帮手，1954年成为访问北朝鲜的青年代表团成员，

带回了在刚遭到美帝国主义破坏的土地上农业获得发展的故事。

其他有文化的青年人也在上进。1954年，未来的村支书杨同被派去管理夜校，即人民学校，它是由青年团创办的。满腔热情并与人和睦相处的西村年轻人报名入学的人数，一下子从52名上升到93名。学校是文化青年的活动中心。五公人夸口说，到1954年为止，86%的学龄儿童全在初小上学，6人在饶阳中学念书。年轻人出版双月刊《社员生活》杂志，主要是登载诗词小说，讨论农村生活。最好的诗是由拖拉机站站长12岁的女儿、早熟的师桂英写的，她的母亲牛玉华鼓励她写诗，不让她干家务活。村里刚开设的阅览室里有省报，几本杂志，还收集了400多本书。55名年轻人加入五公村剧团，上演了《妇女代表》和其他现代戏。活泼的李妥因在全区唱歌和表演而出了名，并和杨同结了婚。当和平发展允诺农民们恢复许多他们喜欢的文化生活时，妇女们在繁荣的文化复苏中表现得特别积极。按传统，村里的男人们既要扮演男角色，又扮演女角色，而现在则由妇女来扮演女角色。当一些妇女陪同邻县河间县剧团巡回演出时，还获得了报酬。

1954年，干了15年妇联主任的党员乔文芝，平生第一次参加大会。在东村长大、33岁的乔与西村的徐连祯结婚，进一步加强了西村徐树宽和东村耿长锁之间婚姻的区域联系。与很多妇女干部一样，乔没有孩子，别人看来，这才使她有时间去动员妇女。她在保定和其他1000多名河北妇女代表一起开会，保定美丽的宝塔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乔参观了石家庄市、北京市和山西省。而大部分农村妇女则难得离开村庄外出，除了偶然回娘家小住几天。

河北省妇联的代表又成为了全国妇联的代表。饶阳县农业局局长何金秀也是个女同志。乔在会上介绍了五公村的妇女问

题，强调要加强妇女的经济地位，会议没有正式讨论侵蚀婚姻改革运动的因素，或妇女平等的结构性障碍，以及妇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太低等问题。我们听到很多有关暴力的描述，相信毒打妻子是十分普遍的事情，据说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打，尤其是当丈夫感到妻子的行为已使他难堪的时候。

国家提倡女童上学。在饶阳的学校里，女孩的成绩常常比男孩好。在50年代，男童和女童都接受小学教育，有些女孩还当上了班长，但当升入初中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一些农村父亲却坚持让他们的女儿留在家中。一些最聪明的女孩失学了，她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班同学准备中学入学考试。有几个女童跑掉了，更多的则被迫早早嫁人，有一个疯了。这个可怜的女童在饶阳流浪，头发蓬乱，半裸着身体，浑身污垢，又唱又笑，躺在街中央。妇联没有干预。如果丈夫公开用手或鞋子或农具打妻子，那么除非她娘家有人（如宗族首领）出面制止，党的干部一般都不会介入。

当外国人访问五公时，乡村生活充满了欢乐。1954年，第一批访问者来自越南北方，在他们之后是一群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波兰的拖拉机技术员。

耿 家

对于耿老板一大家人来说，1955年春节是个吉祥的开端。全家团聚在一堂，孩子们有新衣服，徐树宽煮了一大锅肉馅饺子，墙上都贴上了从保定、北京和苏联带回来的画，北京中央记录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天佑也来到耿家。^⑥去年9月，耿老板在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认识了吴。

吴导演发现，这位54岁的合作社干部很瘦弱，长着一副长脸和细长的身材。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什么都不会玩，

就连中国象棋也不会下，既不打手势，也不抬高嗓门。但当耿以自信的低音，认认真真地讲述如何使苏联集体农庄适合中国的落后条件时，吴说，他被迷住了。他还为耿老板的儿子德禄安排了灯光员的制片工作。

1955年，徐树宽开始和丈夫讨论收养的孤儿的婚事。她在为李转寻找最好的对象时，想到了宋坦元的儿子宋大满，坦元是战争年代逃到五公后留住下来的，他与耿家关系很近。徐问李转，她对这桩婚事有何想法，李转平静地笑笑，没说不行。徐便赶了三里路，找李转的外婆，取得她的同意，然后与宋坦元做最后的商量，最后便告诉大满，他将与李转成婚。

此后，徐便把注意力转向年轻的孤儿李秀英身上。她已自己做主，有了一个亲密的男朋友，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徐。秀英已和合作社老四户中最富裕的乔万象的儿子乔刚决定，等村戏团一起表演结束就结婚。少数年轻人在父母的帮助下，在村里选择对象。由于五公比较富裕，青年妇女希望嫁在村里，不愿嫁到邻近的穷村去，因此，模范村与受惠很少的村庄之间关系趋于紧张。

两桩婚事很快就安排好了。婚礼在村支部院子里举行，实行婚事新办，特点是简单朴素。为了表示坚持反对传统迷信的社会主义方向，没有向老人和姻亲磕头，没有昂贵的传统服装，最为重要的是没有财礼。许多村民斜楞着眼，看着这些与风俗习惯相背离的行为。

徐树宽心中充满了骄傲，她回想起自己9岁时就失去母亲。她记得为孤儿们缝好了衣服和鞋子，并去看了医生。她回忆道：“无论多么艰难，我们常常在节日里想方设法为孤儿们做饺子吃。”^③

秀英和乔刚的婚姻加强了耿氏和乔氏这两个东村有权势的宗族的再次联盟，第一次是10年前在小合作社里的联合。以

往联姻的宗族，如东村的耿氏和乔氏，与西村的徐氏、杨氏和张氏，都用重要的婚姻巩固他们的新地位。事实上，在集体化之后，由于与外村通婚趋于困难，而为了保护家庭又需要加强与大小队干部的关系，因此村内联姻现象开始遍及全县。在整个饶阳，看不见却十分稳固的关系网得到加强。

耿老板给新女婿乔刚找了一份卡车司机的工作，单位是山东省德州水利局，向东开6小时汽车的路程。这在拿国家工资的人中，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在低效和无能的中国运输部门，卡车常常无货可载，同时，许多个人和单位急切地寻找运货渠道。由于政府抑制私人贸易和运输，萧条加重了短缺，因而司机们就能控制交易，从中获利。

国家职工意味着有相对优厚的报酬、免费医疗、养老金，不必在地里干危险和艰苦的活儿，人们称之为“吃皇粮的人”。大部分在外县工作的人，每年只能回家一到两次，总共三周，但农村家庭还是千方百计去谋得一个国家职工的位置。耿长锁的5个女婿，以及他收养的两个孤女的丈夫，都是国家职工，他对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个也未亏待。因为吃国家粮的人过得最舒适。

孤女们的婚事并非对每个人都有利，惹是生非的、李转的弟弟坛子与新郎们不投合，当她们嫁到别人家时，就没人管他了。曾在碾子上拉屎的坛子越来越成为公认的无赖。

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凹坑

对许多人来说，土改后的蜜月年代主要是重建家庭、结婚生子和提高收入。在富裕的五公村，村民们高兴地注意到了光棍汉的减少，都说与过去的旧社会相比，只有疯子不能结婚了。不过，即便在50年代中期，也不是所有饶阳汉子都能赚

到足够的钱结婚成家。那些拥有最贫瘠土地的人，或住在收入源于集市、现在又被迫从事粮食生产的村子里的人，穷得对新娘没有吸引力。与40年代一样，这些贫困地区的“光棍”们仍不能完成对祖宗的神圣义务。在受国家恩赐的人与那些在经济上成为不合理政策牺牲品的人之间，产生了鸿沟。

五公为它的声誉付出了代价。在从成功的小合作社和互助组向大社的转变中，普遍都有不满情绪：反对强人所难的挖井运动，对国家强制种植更多廉价的棉花感到不快，抱怨强迫放弃盈利的副业生产，以及在以低价统购更多粮食的同时强行扣除消费粮。这些政策使许多人的收入减少，造成亏空。^⑧在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上，复杂的现实生活被掩饰起来，因为只有胜利消息才能公开化，如内燃机泵的生产和国家统购高额的粮食等等。

在党内最高层，毛最亲密的同事力主努力仿效已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地方所取得的成绩。与此同时，邓子恢和他的盟友则警告盲目的乐观主义和高压统治，认为不应对局限于手工工具的农民家庭的社会生产、消费和思想意识这些现实视而不见。毛盯着特殊地区所取得的成绩，而邓子恢则强调需要经过自愿渐进的过程才能赢得所有农民的支持。邓援引列宁的“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主张，指出在河北大名县内部不和的大社背后，存在着强制措施，而且浙江出现了饥荒。^⑨

1955年初，毛派他的警卫员回他们的老家，其中一个来到与饶阳相邻的安平县一个村庄。他回去向毛汇报说，当地强迫农民加入大社，因为党组织坚决认为，他们只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社与蒋介石的旧世界之间做出选择。在要么走社会主义，要么挨饿的恐吓下，合作社越来越大，但士气和生产率却下降，毛告诉林铁，安平县农村的情况可能是普遍的。^⑩

随着国家重奖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成就，1954年和1955

年，许多农村干部感到了仿效大社的压力。他们感到有必要证明他们的热情，所以在1955年头三个月中，被迫编入合作社的农民是前两年总数的两倍。各地干部发现，落在后面对他们的政治生涯是个危险。中国农村开始散布着一片恐慌。

国家强制造成了粮食短缺，再加上关闭了市场大门，使农民中出现了不安情绪，一些人宰杀耕畜，有些人则囤积粮食。在保留下来的秘密黑市上，物价上涨。奔向苏联式集体农庄的运动使许多人害怕。一些农民担心平均收入以上的部分会被没收，而稍富一点就被充当阶级敌人的替罪羊，于是他们的态度渐趋消极。在大量增多的自耕农中，所谓的中农损失最多，许多人起来阻扰春耕。^④

华北全区的公安力量集中起来镇压反抗者。1955年春，河北省公安厅粉碎了6个迷信组织，指控它们“做买卖、运输、算命和行医”。中国政府让“道长”和教徒们充当替罪羊，指控他们破坏农具，毒死牲口，企图破坏年轻的合作社。^⑤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耿长锁问林铁，五公是否应发展得更快，废除土地红利，河北第一书记林铁闪烁其词，耿觉得林不同意。

五公村无法不受反抗风潮的影响。1955年7月的一天晚上，村北种的500亩棉花被连根拔掉。复员军人、恐怖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凶猛的张端被发动起来，查缉犯人。他审问了每一个心怀不满的阶级敌人，但却没有抓到破坏者。张的强暴手段迫使大家默许进一步集体化和国家强加的生活方式。在消灭由税制改革和土改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内部极度紧张的状况趋于表面化。在更加集中的大社中，社员们没有家庭感。作为迈向苏联式集体农庄的一个步骤，强制组成了更大规模的合作社，并抛弃了农民家庭经济和自愿加入的小合作社，这在经济上徒劳无益，在政治上则疏远了农民。

自愿入社

在饶阳建立大农业合作社，预示着集体农业对乡村中国的冲击力。在一个重视土地所有权的家庭社会，甚至在具有历史优势和官方支持的五公村，组织大社也是困难重重。1955年春，河北大部分农村才刚刚成立互助组。低于10%的中国农民加入由几十户或更多的家庭组成的合作社，甚至还有很多人在最初级的合作组织外观望。国家把技术和物资援助慷慨地给予了模范合作社，而在缺少这些物资和技术援助的新合作社中，报酬、劳力分配和士气等具体问题都使干部急得直跳。

是年春，为了与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意见保持一致，河北省领导警告不要强迫不服从的家庭加入合作社^③。新闻界披露了强迫入社的例子（它导致农民们宰杀未被好好照看的牲口），并描述了合作社在粮食产量下降和士气低落的重负下崩溃的情景。3月，党宣布了保障农民提高收入的“三定”政策。1955年，税收定额被砍掉。^④

4月21日，党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已注意到农村的“紧张局势”，批评了合作社发展速度过快和大量违反自愿入社原则的做法。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巩固现有的合作社，解散失败的合作社，其中浙江1.5万个，河北5000个。^⑤5月，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严厉批评了“太急躁，专注于合作社的数量、规模和高级形式”^⑥的干部们。在认识到去年的强制性措施已造成大量的强迫入社，并伴有经济滑坡之后，河北省委宣布，1955年不再成立新的合作社。整顿和自愿入社成为标准口号。河北派出5万名干部到基层，帮助挣扎中的合作社。^⑦

林铁和他的下属把注意力集中在按劳分配的问题上，《河

北日报》大力宣传 1954 年五公村首创的定额制度，向全省推荐在合作社内部确立个人生产定额的个人责任制。责任制被高呼为通过向突出的劳动者提供实在的物质奖励，以便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好办法。省领导选择五公村中央的六队，介绍它在除草中实行个人责任制的经验。^⑧

五公村吸引农民入社的方法远不止解决技术和管理问题。耿老板要求保障贫困的孤寡老人的口粮，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规定了什么是公正的。耿还试图让强劳力放心，他们的劳动会得到公正的报酬。耿老板认为，福利的首要原则是自食其力。他告诉强劳力们，老人和病残人对公益有贡献，与游手好闲者不同。1955 年夏，他汇报说，45 户需要大社供养的五保户中，有 18 户已生产出足够的余粮，可以卖给国家 4000 斤粮食^⑨。劳动福利计划的意思是，要劳力多的家庭放心，病残者并不是免费地享受，懒惰者不能占劳动者的便宜。村里保障那些失去生产能力者的基本口粮，主要来源于投入大社的土地红利，再加上劳动所得和家属赡养。以最早的合作社为骨干的一队，即采用这种办法。合作迷耿秀峰的 70 岁母亲年纪太大，不能下地干活，甚至不能到队里的猪圈喂猪。队长李砚田便在她的院子里砌了个猪圈，让她替合作社养一头小猪。那一年，她挣了 46 个劳动日。其他队照此实行，从而使 10 户这样的家庭，在家里为合作社养了 59 头猪。六队专门组织一个老人生产小组，只要哪里有轻活，就派它的 6 名成员去。虽然传统文化中许多内容无助于改善生活，如地方观念、民族主义、父权制使那些残疾人过着可怕的生活，并对可恶的大男子主义和毒打妻子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当农村的社会主义不是与从苏联引进的组织和政策一致，而是与中国的农民家庭经济和传统价值观念相吻合时，它仍是最好的。

注 释

1. 《大公报》1954年7月3日，为了推动快速的农业社会主义，大社在许多地方被扶植起来。参阅 Jean - Luc Domenach, *Aux Origines du Grand Bond en Avant*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82), p.164。
2. 卢广：《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社会贫苦户参加生产中的几个问题》，河北省饶阳县人民委员会档案室，五公大队，第13卷，第1号，第1-4页。
3. 《耿长锁设无私念生产计划》，河北省饶阳县人民委员会档案室，五公大队，饶阳档案馆，第9卷，第18号文，第61-70页。《河北日报》1954年1月11日。
4. 卢广：《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三区中如何推行“包工制”》，河北省饶阳县人民委员会档案室，五公大队，第10卷，第4号文，第19-28页。
5. 卢广：《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三区中如何推行“包工制”》。
6. 《人民日报》1954年1月7日；《河北日报》1954年2月8日。
7. 五公大队，第10卷，第4号文件。
8. 耿秀峰：《关于扩大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河北省饶阳县人民委员会档案室，五公大队，第10卷，第2号文件，第12-17页。
9. 《中国农业大事记（1949-1980）》（农业出版社，1982），第24页；《人民日报》1954年1月29日。
10. 《河北日报》1955年6月3日。
11. 五公大队，第9卷，第18号文件；《河北日报》1954年1月7日。
12. 五公大队，第10卷，第4号文件；《人民日报》1954年8月7日。
13. 五公大队，第10卷，第2号文件。
14. 五公大队，第9卷，第18号文件，饶阳档案馆。
15. 《河北日报》1954年11月4日。
16. 《人民日报》1954年1月7日。

17. 五公大队, 第13卷, 第2号文件, 饶阳档案馆。
18. William Hinton, *Iron Ox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Chinese Farming*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0).
19. 《中国新闻报》1955年10月31日。
20. Benedict Stavis,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33~36, 58~67.
21. 《河北日报》1954年11月4日、1955年4月25日;《人民日报》1955年7月31日。
22. 五公大队, 第9卷, 第18号文件, 饶阳档案馆。
23. 《光明日报》1954年4月2日;《河北日报》1954年8月11日;《光明日报》1954年9月30日。
24. 《文汇报》(香港)1955年12月8日。
25. 《中国新闻报》1955年10月31日;《河北日报》1955年10月18日, 12月18日;《人民日报》1954年7月12日;《河北日报》1954年11月4日。
26. 《中国青年报》1954年9月1日。
27. 五公大队, 第9卷, 第18号文件, 饶阳档案馆。
28. Hsin-yi Shu,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Locust Cult in Traditional Chin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9: 4 (December 1969), pp.731~752.
29. 《人民日报》1954年7月5日;《河北日报》1954年7月12日;《人民日报》1954年11月4日;《河北日报》1955年4月14日。
30. 《中国合作化农业》(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54), 第13、25页。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9)》, 1955年4月21日的条目。
32. 中国革命博物馆档案室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第三卷, 第695~699页;蒋伯英等:《邓子恢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第317~318页。
33. 这里的国家征购价是1952年当时的价格。Nicholas Lardy, "Agricultural Prices in China",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s*, No. 606 (1983), p.14.
34. Mark Selde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Cooperative and Collective For-

- mation in China's Countryside",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ed. Mark Selden and Victor Lippit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2), p.53; 《1954 年全国各地手工业调查资料》(三联书店, 1957), 第 52 页。
35. 《人民日报》1955 年 7 月 31 日。
 36. 《文汇报》1955 年 3 月 22 日。
 37.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213~214 页。
 38. 《河北日报》1963 年 11 月 25 日。
 39. 蒋伯英等:《邓子恢传》, 第 306~324 页。
 40. Michael Kau and John Leung, eds., *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 1949-1976*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6), 1, p.524.
 41. 蒋伯英等:《邓子恢传》, 第 306~324 页。
 42. 《中国大陆新闻综述》, 第 1078 号, 1955 年 6 月 17 日, 第 27~28 页; 又见 Elizabeth Perry, "Rural Violence in Social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108 (September 1985), pp.419~426.
 43. 新华社稿, 1955 年 5 月 14 日, 载《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55 年 5 月 19 日。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1955 年 3 月 3 日。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 1955 年 1 月 30 日、4 月 21 日; 邓子恢:《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 《党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第 2~9 页; 强远淦和林邦光:《试论 1955 年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 《党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第 10~17 页。
 46. 《河北日报》1955 年 5 月 19 日; 强远淦和林邦光:《试论 1955 年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 《党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第 12、13 页。
 47. 蒋伯英等:《邓子恢传》, 第 8 页。
 48. 《河北日报》1955 年 7 月 25 日。
 49. 《人民日报》1955 年 7 月 31 日。

第八章 反对合作

1955年夏，毛把中国所有农民推上了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自愿合作与加入以保护共同利益的原则被搁在一边，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毛没有看到在税制改革、减租和土改中产生了一批人数众多且还在增加的中间阶层，他说，惟有集体化才能防止将来两极分化为少数富人、多数穷人。^①强制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斯大林，曾对生产剩余产品的农民进行宣战，而毛则先在假想中确立了出现绝少数富人和受剥削穷苦大众这一现象的不可避免性。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被指责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毛让陈伯达代理其部长之职。陈列举了保定地区和其他地方土地买卖的数据，以此作为出现两极分化的证据。陈断言，集体化将防止阶级分化，促进发展。但陈的数据也说明，1953年土地买卖事实上已减少，1954年几乎消失了。^②

急速集体化

10月，陈伯达在一次讲话中，以五公为例，说明组织大社是迅速发展的关键。他说五公的粮食产量从1954年每亩419斤跃至1955年的463斤，并预计五公亩产量不久将超过500斤^③。由此证明，即使像饶阳这样的穷县，大社也能很快

实现高产。虽然五公村在 1955 年的产量实际上是下降的，但成功就意味着产量提高。陈伯达讲的数字是编造的。现在我们无从了解五公 1953~1955 年粮食产量是多少。在不同时期，新闻界公布的数字也不同。如果陈列举的高产有根据的话，那就是把花生按与粮食等值的产量加了进去，而且他也没有公开说明，1954 年和 1955 年的粮食产量是按这种计算方法人为抬高的。^①

1955 年 10 月，中央号召立即全面实行集体化，把土地、牲口、水井和农具的所有权及管理权从农民手中转移到党领导的合作社，并根绝财产生息^②。党的六中全会宣布，农民家庭经济的小生产者，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因素，需努力发展集体化，以防止两极分化。但许多农民感到，合作化就像偷盗一样。问题并不限于失去土地所有权或生产自主权，人们还受到了羞辱。在石家庄专区农村工作部工作的张新法发现，农民们对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很不满。农村作家葛文认为小合作社好，办大集体农庄则不切实际，它加重了不合理一面。腐败的个人关系变得更加重要。武邑县农村工作部的袁真武发现，在模仿苏联模式的过程中，集体农庄实行了“强制性积累”，这种积累使收割到的粮食留给农民自己的可能性极小。北京的一位农业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几乎有一半新合作社缺少有经验的干部和会计，故不能建立可靠的会计制度，而只能简单地把收获的粮食平均地分给农民。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在当时讲出这些真相。由于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的人被划为坏分子，由于党—国家坚决认为集体化是摆脱贫困的惟一道路，因此农民们保持沉默^③。他们加入了合作社。随着国家不断对集体化施加压力，耿长锁面对由大社造成的全村不满和经济滑坡，开始探寻确保五公保持领先地位的办法，他找到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

“五公的情况怎么样？”林铁问。

“落后了。”耿忧郁地回答道。

林铁没有对他喜爱的五公模范村施加压力，但他对耿老板说：“在随后的秋收分配之后，再让全体社员讨论一下。我们需要真正的理解和热情。如果条件成熟，你们就能向更高阶段的合作社（集体农庄）迈进了。”

尽管如此，长期以来，林铁没有拖延或继续冻结成立新合作社。10月，他对1953年把河北省5800个合作社中的2150个解散或降为互助组的做法做了自我批评^⑦，当时五公的大社受到严厉批评。后来，林要求到1956年春必须成立2.5万~3万个新合作社。河北省领导仍试图谨慎地发展。1955年12月3日，《河北日报》正式介绍了消灭土地红利和把土地所有权及管理权从农户手中转移到全村规模合作社的集体农庄。省里建议，1956年仅组建113个庞大的合作社，全部以那些成功的老合作社如五公为榜样。

谨慎是完全有理由的。集体农庄割断了农户的所有权与收入之间的联系。虽然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合作社内土地红利的分配份额已经减少，但河北省尚无一个生产队全部按劳力分配收入。河北省试图进行试验，而不是强制推行未经检验的制度。但中央却无视各地具体情况，要求普遍实行集体化。按照陈伯达的意见，到1956年1月，全国78%的农户已抛弃了单干，其中，全国9000万农户中的26%即约2400万户已加入了合作社。^⑧省委的谨慎只得屈从于中央对热情的充分肯定。新闻媒介报道，到1956年1月1日为止，河北已经组织了7000个合作社。

阻止快速集体化的干部有可能被扣上右倾主义者的帽子。在春耕之前，河北必须达到5万个合作社！^⑨不久，热情高涨的干部们超额完成了中央下达的指标。1956年9月，省委书

记林铁汇报说，河北 24249 个集体农庄中有 33% 是由数村甚至数镇组成。^⑩ 2/3 是以村为单位，平均每个集体农庄达 340 户。有的村庄才刚刚完成土改，有的则几乎没有经过合作化，在这些村庄，几个月之内便完成了集体化（见表 8-1）。

表 8-1 1950~1956 年河北省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概况

占农户数的百分比							
	1950	1951	1952	1953	1945	1955	1956
合作社	0.0	9.9	9.1	0.7	7.3	34.9	0.0
集体农庄	0.0	0.0	0.0	0.0	0.0	0.0	99.4

资料来源：石景潭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第 1000~1019 页。

模范村的忧虑

五公村所面临的胁迫性要比大多数村庄小且少，可干部们却没有立即组织一个集体农庄。由于五公是全国著名的模范村，在政治上有利可图，因此它的庇护人希望保障它免遭轻率行为带来的伤害。当其他村庄被迫鲁莽地集体化时，五公便派调查人员去分析所遇到的难题。他们发现，主要问题在于说服人们接受新的分配方案和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在那些有充足土地或良田的人中，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而老弱病残者及其他严重依赖土地收入的劳力很少或没有劳力的农户更不愿加入。

耿长锁对那些因失去土地收入而受损失的人感到特别歉疚。他说，在大社，收入都是按土地和劳力进行分配的，而如果每天的报酬提高了，那么全村 426 户中有 363 户以上在集体农庄的收入要比在大社多。很少一部分调查人员乐观地认为，

随着土地红利的消失，246 户的收入会提高，但 173 户会遭受损失。即便按耿老板的乐观估算，也至少有 56 户缺少劳力的家庭共 96 人受损失。

耿长锁充分认识到了现实的农民经济以家庭分工为基础，但他所关心的是缺少劳力的农户，而不是假想中的贫农或少地的农户^①。集体农庄以按劳分配而不是按土地或资本进行分配为轴心，它不公正地对待缺少劳力的农户包括老弱病残者，除非它不仅生产出了足够的粮食，而且提高了社员收入，并执行再分配的福利措施。五公村很注重对老弱病残者的福利，可是不久以后，在大部分村庄，高产、多分粮食和有效的福利措施均成为画饼充饥的东西了。

废除土地红利，使五公村有 5 户共 9 人断绝了收入来源，因为他们太老，身体太弱或残疾，什么活都不能干，也没有子女赡养。干部们配给了 2500 斤粮食作为口粮，人均 277 斤，可这不够吃。另有 20 户老弱病残者还能干一些轻活，他们申请补助 16802 元。^②虽然干部们编制了社会福利计划，但是即便在五公村，已经组织大规模的合作社和实现拖拉机耕种的机械化达两年多，村民们还是忧心忡忡。如果对许多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五公人来说，飞速集体化还是难以理解的——在那里从大社到集体农庄的强制性转变要比中国 99% 的村庄温和得多，那么可想而知，其他村庄的损失必定非常之大。

提出质疑需要勇气。集体化使已掌握大权的党委书记和民兵队长们感到畏惧。如果有人认为书记不公正，并向饶阳县委控诉，那么县委就会要求当地党组织调查此事，并对指控者作出鉴定和裁决。

把权利垄断在农村地方干部手中的一个可怕后果是，欺侮妇女泛滥成灾。饶阳县的一些村干部成了无法无天的人。地方文化的消极面中充斥着暴力和父权制，它与秘密的不负责任的

国家权力制度化掺合在一起，使得几乎不可能对强奸犯进行起诉。随着有关性暴力的传闻沸沸扬扬，在情况最糟糕地区的农民们担心，如果内情一公开，那么所有村里的姑娘的贞洁和婚姻前景就成了问题。有权者和无权者一样，在掩盖真相方面有着利害关系。

很显然，中国领导人并没有鼓励强奸犯去犯罪，但新体制却强化了旧文化中的卑劣面。毛原先的两个警卫员在河北港口城市天津就任高职，他们强迫瘦弱无力的妇女就范。许多来自北京和其他地方的新权贵抛弃了跟随他们多年的妻子，而娶年轻漂亮的女子为妻。到1953~1954年为止，党中央试图对这些非法行为采取严厉措施，这两名警卫员和天津地区的一名官员被处决。最高领导层希望，以此消除他们把权力体制制度化所带来的不幸后果。

农民们更加依赖于得到支书的恩惠，从儿子参军的介绍信或家庭成员的入党，到获得脱离农村的工作等等。集体化之后，支书控制了所有的工作安排，党的干部倾向于把好的工作留给自己亲戚和盟友。像在华北油田附近与苏联钻井队一起干活这样的社会上最好的的机会，留给了上层干部的孩子们。

随着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成为徇私、裙带关系和腐败的根源，许多农民体会到，号召社员们为所有人劳动有多么伪善。集体农庄腐败的后果是，大家都不愿艰苦劳动。虽然耿老板和他的追随者利用其地位照顾了家族成员和政治盟友，但与大多数地方干部相比，他们还是诚实、克己和守法的。

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干部与群众之间财富与特权上的最大差距出现了。生活最窘迫的妇女们开始不愿干农庄的田间农活，在家养鸡所赚的钱要比拼命干活挣来的微薄收入多得多。寻找同伴和男朋友的未婚女青年仍下地干活。地方干部享有获得国家财富的特权。可普通百姓却由于市场关闭，只能以实物

交易取代钱币，因而身无分文。1957年，河北省副业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5%。畜牧业收入几乎下降了一半。现金就更少了。高层掌权者通过大力发展特供商店获取生活资料，在这些商店里，珍贵的名牌商品以市场价的零头出售，专门供应那些在国家特权机构工作的人。

农民们发现，在吸吮民脂的体制中，他们最可怜的优先权是把他们的粮食低价卖给城市居民，为工业化服务。国家对财富的控制导致短缺、国家—社会的金字塔式分层，以及腐败社会关系的产生。社员们与那些控制财富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无法从指令性经济中获得他们所需的东西。从普遍的不满中迸发出愤怒，矛头指向那些控制财富并相互做交易的人。

一等人儿
送上门儿
二等人儿
人托人儿
三等人儿
没有门儿

五公村的一等公民发现，1955年秋末，126户农民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的集体化口号，包括那些拥有较多土地和良田的家庭，以及一些人多劳力少的家庭。反对者中有军烈属和无子嗣、晚年无人赡养的家庭，而有树木和有牲口的家庭也在其中。与1953年关于大社的争论不一样，不仅传统精英和新的富农，而且很多老革命和出身最卑微的人都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反对者，正如官方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中所说的一样。

五公村干部们努力让恐慌、愤怒和犹豫不决的人们放心，他们的利益在废止土地红利后会得到保护。1951年因买了4.3

亩地招致耿大发雷霆的李辉廷不愿屈从，他悲叹道：“如果我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无所获，那我吃什么？”^⑬1954年，他家收入592元，包括200元的土地红利在内。干部们解释说，如果废止红利，两个壮劳力每年劳动300天，那么按每个劳动日1.1元计算，全家收入总计达660元。^⑭

集体农庄允诺的巨大繁荣是空洞的。集体化的结果是，李辉廷成了许多收入减少的人之一。1955年，在相对富裕的五公合作社，一个劳动日价值0.74元，而经过20多年之后，五公集体农庄的一个劳动日价格才真正超过1955年的水平。在饶阳县，大多数村庄比五公穷得多，在集体化初期，一个劳动日价值仅1角，且以实物支付，没有现金收入。转向集体化的结果是，一些劳力富余的五公村农户完全以按劳分配的原则获得收入，但迅速给所有人带来财富的诺言却没有兑现。

当计划废止土地红利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原自耕农徐平文心烦意乱，好几天都未出门，他为了增添土地，毕生拼命地攒钱和干活，现在却未得到任何补偿便被从手中夺走了。他的女儿被请去说服他，她说，去年全家土地收入为235元，劳动所得243元，明年虽然没有土地红利了，但集体农庄给劳力的日工资将增加一倍多，全家的收入将比去年增加304元。这个数字是荒唐的。耿老板尝试着另一个策略：着重强调原来的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大社已结束了那种动荡不安的状况，集体农庄将比这更好。虽然徐家在40年代初的饥荒中，其20亩地曾减至7亩，但仍说服不了他。^⑮

1943年的饥荒夺去了东村李转若老人妻子的生命，他却死里逃生。50年代初，三个儿子答应他，以土地红利作为他晚年的生活来源。加入大社的第一年，他们信守诺言，把土地红利交给老人。李转若的土地就是他的养老金。可在集体农庄中，他不得不依靠孩子们赡养或靠农庄的福利。新体制断绝了

一些老人的生活来源，包括大社所赡养的老人。耿老板与中央领导人如邓子恢对由集体化引发的道德上和经济上的危机很敏感，他们寻求能让转若这样的老人放心、重新获得生活保障的办法。

传闻沸沸扬扬，白热化的争论爆发了。李树年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了很多树，他力争保留树的所有权。村干部们坚持树也要集体化，并同意每棵树付给一定数目的补偿金。但有4户不放心，砍掉了他们的树，卖作有用的木材。此后，村里制定一个方案，规定在卖树时，集体收取七成，所有者收三成。许多有树者感到被骗了。^⑩

村干部解释说，人们将会因牲口、果园、水井和其他被农庄接收的东西而得到补偿。但村民们却认识到，没有钱来进行补偿。卢振兴坚持要留下他的牛，不愿看到它被充公。他承认，牛用于个人运输，这是他的收入来源。但私人运输和贸易已遭禁止，于是几天之后，牛便神秘地死去了，于是卢振兴的牛的问题得以解决。一年后，全河北省的牲口数量从1955年的420万头减少到330万头。^⑪农民们情愿吃掉自己的牲口，也不愿让其他人占用。

五公村试图说服这些反抗者：集体化符合每个人的长期利益。拖拉机站的十几名工作人员和县里的干部，挨家挨户地消除村民们的疑虑。后来提升为衡水专区农业局局长的拖拉机技术员张根托和县委行政办公室的王玉昆，都来到村中央不肯服从的农民家中做工作。村中央第四、五、六、七生产队中反对者最多，这些生产队拥有良田和最好的灌溉条件，以前是种菜的自耕农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李氏宗族的根据地。就连像受过训练的宣传员李万义这样的干部都不能说服他们。李氏宗族的成员们担心，权力更加集中在压制他们的干部手中，后果会如何？疑虑和恐惧依然存在，但所有人却不得不加入，交出土

地、牲口、树木、农具，统统集体化。

更深的壕沟

1956年元旦，1000多名来访者出席了五公集体农庄的成立大会。已负责大队生产的、耿的好帮手乔利广宣布，耿已当选为社长。参观者的到来不再是新鲜事了。五公村独家占有拖拉机，吸引了参观者。父亲们喜欢带着他们的儿子，伸长脖子看会走路的机器。

饶阳县新任县委书记高健赞扬了五公村坚持“自愿参加和互惠”的原则，称赞五公村解决了社员投入共享、树木的所有权、孤儿和老弱病残者的照顾之类的棘手问题。言辞就像仪式上的咒语，而许多村民还未顺从于集体化。在原耿合作社的核心、现在相对富裕的东村，以及长期占据优势的村中央李氏宗族中，反抗非常激烈。与组织大社一样，合伙和重新分配的结果是，耿合作社社员损失最大。有关他们会得到对牲口和农具的全部补偿的保证，说服不了几个人。^⑧

1955年，公安局开始负责建立人口登记和控制制度，它把农村人口牢牢束缚在其出生地，现在又把他们重新编入集体农庄，而妇女一结婚，户口就转到其丈夫所在的村庄。到1956年，所有农民都被拴在土地上，可他们已不再拥有土地，工作则由党任命的村干部安排。^⑨由于事实上已断绝了农村劳力的随意流动，和外出做临时工及搞家庭副业，因此，国家大量投资的大都市地区及其郊区与那些封闭而偏远的农村地区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了^⑩。至于农庄的劳动报酬，社员们所获得的那份劳动价值，主要是实物，而不是现金。有些人逃离最穷的村庄，到东北重新定居。大多数人则感到集体化就是剥夺所有权，且没有追索权。

几个农户设法获得了城市工作和城市户口。国家的投资、物价、工资和福利政策对大都市地区给予优惠，保障工厂工人有廉价的住房、退休金、病休和较短的工作时间，他们还可获得粮食、健康和其他众多方面的国家补贴的服务。这些福利大大超过了邻近发展中国家的水平。^④但广大农村内地却丝毫享受不到这些福利。

五公的章程规定，集体农庄将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对牲口、大车、水井、犁和树木进行公正的补偿。即便在相对富裕的五公村，也用了两年时间才给予补偿，而且村民们都感到数目太小了。其他村庄情况更糟。大多数集体农庄把买价压得很低，并且从未对征用的财产按允诺的补偿价格付钱，因为并没有储备资金。它们承受了沉重的压力，投入很少，却又不得不扩大售给国家的粮食数量。对一个家庭来说，要求作出补偿，就等于让家人扣上右倾和反对集体农庄的罪名。这样的开端便不能说服人们忠诚而勤奋地为农庄劳动。

与苏联一样，集体化与小块私有土地联系在一起，它对农民家庭经济作出让步，并承认集体农业在生产和销售肉、水果、蔬菜和其他非谷类作物方面的局限性。五公集体农庄的章程明文规定，每户拥有一小块土地，其总数限制在占集体土地的3%。但在政治上有远见的五公村不允许存在任何小块私有土地。在全面消灭农民家庭经济方面，模范的五公村试图按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生活。国家对积极性给予奖励。

随着土地的集体化，五公开始统一使用建房用地，农户自己无权做出决定，须由村干部安排房基地。在理论上它以家庭人数和优先需求为基础。可实际上，党员干部手中的大权加剧了村民对他们的依附和奉承。干部们可以随意决定，当结婚的儿子搬出去住时，家庭是适当扩大还是分开。

由于集体农庄控制了家庭建房，五公可以展开重建全村的

远大规划，并开始消灭弯曲的小巷。直线和正方形看上去是有力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的。这个计划描绘了直线排列的砖瓦房的特点，每户都有带围墙的院子。

五公幼儿园建于1956年，在有幼儿的母亲看来，它仅仅是看管孩子的地方，而不是令人愉快的选择。老人们留在家中替从事集体劳动的母亲照看小孩，仍是常见的方法。由于家庭劳动力过剩，又似乎不需要钱，于是村民们把出钱让人照料孩子这类昂贵的集体事业，看做从劳动者身上偷钱以养活那类长着嫩手的人。

1956年6月，耿长锁又一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了证明五公集体福利制度的仁爱，他向大会汇报了有关老弱的李兴才的故事。合作社不仅在李的晚年供应粮食和柴火，而且当他生病时，还送去热面条，请来大夫进行精心护理。李去世时，合作社为他穿上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鞋，买来木棺材把他安葬。耿老板说：“如果在旧社会，就没有人来照顾李兴才。他死后，人们也只会用一些旧衣服把他裹起来，埋在地里。”^②这就带给全国农民一个信息，即集体农庄是符合道德的，是一个更大更强更可靠的家庭。那些身无分文和无子嗣而死去的人仍有一个体面的葬礼，它由代替父母位置的“父母官”操办。

五公集体农庄章程还为工伤事故提供保障。那些在工作中受伤的人三年之内有一半的工资，而死于工伤的挣钱养家者所留下的受赡养者的待遇与此相同^③。可实际上，村里并没有能力忠实地履行这些高昂的福利条款。

保障墓地和葬礼的神圣性也被写入五公的章程。章程保障社员们在墓地为亡故者挖坟及保留它们的权利。它还承认，家庭是永久性的。可是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却正在努力解决集体化的大量技术、道德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它们在建立相似的福

利制度，并关注文化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但缺乏资金、经验、团结、领导人的远见和国家的援助。

邓子恢把福利看做解决农民依附于私有土地的一个关键，因为如果一个农民“失去劳动力，又不能从他的土地上获得补偿，那么全家生计就会受影响”^④。而毛在加快集体化速度的讲话中，却没有提到这些问题。国家没有为农村人口提供退休金或福利。它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经济、积累、把粮食以固定的低价卖给国家、投入更多的劳力、获得公平的报酬。在这种条件下，集体农庄的福利除了一点微薄的收入外，再也没别的了。

1956年，介绍耿老板入党的东村居民耿书普当上了村支书，但集体化却使西村的张端成为耿老板队伍中最重要的人物。1955年，尔后在1956年7月，当对国家统购棉花的低价十分愤怒的村民们破坏了1500亩棉地时，凶猛的张和他的民兵进行了有力的调查。张对有“特务（special agents）”活动的村民十分警觉。嫌疑落在一个此后不久死去的人身上。虽然那时李茂修已经出狱，这个“地主”后来还是被迫坦白罪行。把犯罪的阶级斗争方式与古老的刑讯逼供结合在一起，使治安队员把拿所谓的阶级敌人当替罪羊并进行严刑拷打当成惯例。张端在棉花案子中的热情，使他在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给干部们留下了好印象。1956年春，他被任命为民兵队长，负责保卫工作。他充当了毫无约束的忠于耿的角色。

张端于1926年出生在西村的一个贫困家庭。3岁时，发生洪灾，他的父亲张旺晨南逃到广东省，丢下其妻抚养张端。10年后旺晨回到老家，并于1938年成为村党支部的早期党员。家里太穷，付不起学费，但在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创办的学校中，教育是免费的，于是十几岁的张端进了小学。他从未学过什么，可在第一学年就超过了年龄小的同学，当上了村儿童

团团团长和政治教员。18岁那年，他当了民兵，入了党。在1946年土改中，他家被定为中农。在随后重新平均土地的恐怖时期扮演了好斗的角色之后，他加入了与冀南八路军并肩作战的地方部队。回到五公后，凶猛的张通过民兵组织往上升迁。

张感觉到肩上新的治安工作的压力。他痛恨阅读文件。撕裂般的头痛似乎从未断过。他挥动两只拳头使劲往头上打，以减轻压力，并拼命地摇头以减轻疼痛。他在果园里静静地漫步，可无济于事，疼痛更加严重。这时，凶猛的张便通过向村民们发泄以解痛苦。他是一个全权负责治安的干部，有快速行动的嗜好。其他文盲或半文盲的庄稼汉子与凶猛的张差不多。

在东村的民兵组织中得到提拔的是强壮的李守正，他的父亲李庚在30年代就与耿书普一起在党内工作。1945年，他在其组织的小合作社失败后便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与张端一样，守正对那些越轨的人很冷酷。人们说他充满了“男子气”。因此，我们把守正称作李男子。

1956年，李与西沿弯村的张芳结婚，她乘着马车，带着枕头、被子和椅子来到五公。在传统婚礼的前夕，新郎和新娘分别与他或她自己的伙伴一起吃饭。太阳升起时，婚礼便开始了。他俩相互鞠躬，同时也向李的父母、其他亲戚和尊敬的来宾鞠躬。按照惯例，还有闹洞房的仪式。主婚人是全人高学子（即高已生儿生女），这对新婚夫妇来说是个好兆头。张芳生了4个儿子，第一年便生了一个。

不上学的顽皮小男孩，如耿老板在村里最大的外孙张满屯，把张端和李守正这些结实的汉子当作英雄看待。年轻的汉子们在男子汉的角力中进行较量。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和新的政治文化一起，激发他们模仿强有力的男性干部。

李守正在耿长锁的政治家庭中是个至亲。由于耿的大儿子

德禄在北京工作，小儿子还是个孩子，李男子便成了耿家成年的儿子。由于耿的妻子徐树宽忙于政治活动，与耿氏家族长期保持密切关系的李男子便常常帮助树宽的大女儿学仁照料别的孩子，包括孤儿在内。李家与耿家都在同一条泥巷内。中央的集体化政策并未阻止忠诚的政治网络进一步加强。

新的负担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制定了1956~1967年远大的12年建设目标^②。集体化由此在全国农村迅猛展开。各地纷纷制定计划，发动劳力实现这些目标，以此响应毛的号召。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宣布，1956年河北省粮食产量将提高36%，主要目标是实现粮食自给，关键是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设。从1955~1956年冬至1956年5月，河北人民挖了72万口井，是前6年总数的两倍，这种投入劳力和资金的巨大冒险，增加了1600万亩灌溉田。可林铁不久便发现，井挖得大快，有些井毫无用处。^③全国性目标忽略了当地的实际情况。

1956年1月，五公村公布了它的发展计划。10年规划的开始阶段，是平整土地，填沟，把30亩于涸的河床变成平坦肥沃的庄稼田，将其开辟为菜园。五公村也不再是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令1953年来访的作家们震惊的沙丘。徐树宽发动了一场从沟塘挖淤泥、积自然肥的冬季运动。村民们整个冬天都忙于填沟和平整干涸的河床。与别村交换了更多的土地，田地都作了重新改造和分派。徐树宽在带领人们为集体劳动时，既使人激动，又使人尴尬。尽管冰水灌进了她裹脚的鞋袜，可她仍带领妇女们走进冰坑里干活，其小脚碎步让人看上去好像在不断地跑。

徐接受了党的关于集体农庄是个大家庭这一观念。她在生活上早就不顾小家了，而是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新的大家庭。她抢做最重的活，经常坚持于比别人更苦的工作。对有些人来说，她是敬畏甚至激励的动力，但对于那些把保持家庭生活当作终极目标的村中央的人、那些逃避大规模集体农庄的负担的人、那些对爱管闲事的上司不满的人以及那些只在受灾时才寻求帮助的人来说，徐是个忙人、刺激剂和不利因素。她属于羞辱假想中的懒汉的那一类干部。老弱或怀孕的人也能吃苦耐劳，更不用说魁梧的青年人了。集体农庄的第一个冬天，村民们筋疲力尽，挖了4000马车的淤泥，以平整上地，提高肥力。

这种强制的积极性产生了它的对立面、消极面和无责任感。在家庭经济中，农民们曾充分发挥过自己的才智和力气，现在却要等集体农庄的干部发布命令。^②他们感到，他们的命运和耕种的控制权已不在自己手中。全中国人都得听任于那种命运。

卢广工作组和已把科学种田的基本原理带到五公的19名农业专家，在五公住了三年之后，于1956年春撤走了。卢广调到华北局组织部工作，该机构负责全区的人事安排。主管宣传的饶阳县委副书记张玉岗代替卢顾问，成为五公与县及石家庄专区的直接联系人。8月1日，饶阳县把22岁的周铁川从附近的耿口村派驻到五公，留在耿长锁的身边，定期为专区和省里的新闻机构、部队报纸和《人民日报》撰写新闻报道。高小毕业的周在区政府担任团支书后来到五公，作为公共关系代表及与上层保持联系的中间人。他留在耿身边达18年。

那一年，耿老板安排调一个有文化的五公青年到第四区政府当文书。越是社会主义，就要有越多的管理人员。西村的张朝可才26岁，但由于他思维敏捷，村民们送给他“滚珠脑袋”的绰号。不久，他开始系统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

义》、《水浒传》等。张脑袋掌握了农业的专门知识，并有处理文件的能力。他是独生子，父母以前住在又穷又脏的西村，他们用糖喂他，溺爱他。为了挨过难熬的30年代，父亲拾落穗，到村外去卖糖果。张家一天天好起来。朝可跟着父亲到地里干活，从节俭、辛勤劳动和精明的农民那儿学到了很多東西。1941年，他才11岁，由于党进行了税制改革，其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好转，这完全得益于静悄悄的革命。最后，张家三口人有15亩地，出租了3亩多。1942年，当日军进村扫荡寻找八路军战士时，朝可在自家院子里乱跑，日本兵抓住他，打他。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在一次庙会上抗击日军的耿天正。

15岁时，由姑母做媒，他与一个比他大4岁的远房亲戚结婚，她的老家在五公东北几公里处的北官庄，没有聘礼。新娘带了两只箱子，张家操办婚礼共用去700元，这是当时的价格。张的外表极为普通，这位农村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不合理开支很不耐烦。但他又觉得，农村知识分子必须尊重风俗习惯，因为不这样的话，他家就会因遭到众人的羞辱、嘲弄而失面子。婚后，他离家继续上学。1947年，17岁的朝可在高小念书时入了党。

1949年，他从饶阳初级中学应召回家，家里要他下地劳动。次年，张脑袋在杨各庄当了一名教师，可1951年又愉快地回家务农，他发现当孩子王只有痛苦，没有快乐。1952年，他带领全家加入西村的一个小合作社，受与他同宗的民兵积极分子、凶猛的张端领导。土改期间，他家划为中农。1956年，瘦瘦的、留小平头的、脸颊清瘦的张朝可当上了五公村干部。1952年，与许多别的有着良好关系的家庭一起，张家的阶级成分降为下中农，朝可因此而奇迹般地转变为真正的贫农干部。在庆祝大会期间，张脑袋显示出酒量很大，同时也是几个集体农庄的积极支持者。他还很老练地把党的文件的细微差别

及中央政策讨论的微妙之处转化为具体的选择方案，以便村干部们及时了解上层的信号。

1956年，国家在河北推广种植棉花。卢广顾问在调走之前，曾催促五公村扩大棉花种植面积，迅速减少种粮面积。五公村以前曾对种植更多的廉价作物棉花的压力勉强作出了让步，而现在棉花面积又增加了两倍，从623亩上升到1988亩。1956年，粮食面积从3101亩下降到2261亩，可两熟作物的面积扩大了。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小小的跃进中，五公人接受了李森科关于同一物种内没有生存竞争的观点，狂热地在每亩土地上种了6000颗棉籽。为了达到高产的目标，以此作为集体化取得成功的证据，五公在谷子地里增加了化肥用量。该村享有获得宝贵的化肥的特权。

灾 难

在集体化半年之后的7月底和8月，筋疲力尽、垂头丧气、相互疏离的村子遇到了另一场灾难。在小麦长势良好、与往常一样漫长的春天和初夏的干燥天气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天空开裂，暴雨连绵，洪水冲进了干透的地里。华北受灾人数达1500万，仅河北省就有4500万亩庄稼被毁。历史学家们可以回顾晚清道光年间和1939年的大水灾，但必须为社会主义政府的救灾反应作正面宣传。^⑧

村民们在凶猛的张端和民兵的带领下，使用传统技术日夜奋战，在居住区周围建造一垛2米高、2米宽的泥墙。墙没有被洪水冲垮，家园保住了，但花生、棉花和其他秋收作物均淹没在几尺深的水里。棉花从1955年每亩74斤的高产下降至24斤。五公仅卖给国家3.3万斤棉花。在1/4世纪中，五公村从未种过这么多棉花，也从未有过这么低的产量。^⑨

洪水从田野退走之后，10岁的李中信高兴地抓到一条一尺多长的鱼——村民们共抓到100多斤鱼，30年代经济衰退时，他的母亲与当兽医的父亲逃荒到了东北，而在蜜月年代，他的母亲又带着他从东北回到老家。

地里的水并非全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为了保护天津不被淹，五公以西50公里的深泽县干部接到省政府的命令，打开了河堤。天津地区防洪干部的权力比河北干部的还大。城市保住了，农村却成了汪洋一片，安平和饶阳两县看上去好像已被滹沱河洪水覆盖，形成了一个湖泊。

滹沱河北面的堤坝比较高和坚固，目的是保住天津和保定。饶阳战斗英雄张年担任水利局局长，当地人按清朝时的名称，把这个局称为河务局，该局的权力大得吓人。为了保住政府不想被淹的地方，张和他的下属只得在别的地方制造局部性水灾。当洪水高涨时，张在请示了最高领导之后，打开了南岸的堤坝。好斗的年轻汉子们听说张的下属即将来他们村，他们便以武力进行反抗。按规矩，张有权对那些阻止他们行动的人开枪。他在警卫的保护下，拿出腰带上的大手枪，活像个军阀，竟然把反抗的村民绑在树上用鞭子抽，因此人们非常恨他。

由于饶阳很穷，政府没有汽车，张便在民兵和驻守在县城的一个排中的12名战士的护送下，骑马出发了。战士们的日常工作包括看守县监狱。监狱设在老田家的大院子里，另一部分用作县政府的办公地点。战士们还押送被宣判有罪的当地居民到位于南面深县的省监狱去。

为了打开河堤，避免群众起来反抗，张的武装队伍只得突然行动。他们秘密到达目的地，迅速行动，因而避免了与年轻人发生暴力冲突。这些年轻汉子们在奋力保护村里的土地以免其被淹，保护他们的庄稼和房屋以免遭破坏。偶尔也有毫无准

备的村民被淹死。

面对 1956 年毁灭性的水灾，村民们都说：“滹沱河水真奇怪，一水一麦好自在。”8 月份的洪水带来了肥沃的淤泥，待洪水退走后，农民们就可以播种冬小麦，期待明年的特大丰收了。不过，洪水也侵蚀了房基，毁坏了泥砖墙和庄稼。

张端在领导五公抗洪斗争后病倒了，耿老板陪他到天津的医院里接受治疗。一般说来，只有有关系的当地干部才能住进这家医院。集体农庄为他付了医药费，但人们听说凶猛的张硬是坚持自己来付。由于人们不能在集市上卖商品，现金很少，张只得从信用社借钱。^⑧他仅住院一天，因为付不起更多的费用。一个农民住进城里的医院，就会负债累累。集体农庄的福利没有涉及医疗方面的问题，农村人口没有国家医疗保障。

虽然这次水灾的损失要比 1952 年旱灾小，但它仍破坏了饶阳大部分村庄，尤其是地势低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这些地方的水有 1.8 米深。在沿滹沱河南岸的罗屯和付村，土地被沙层覆盖。像耿口这些地势最低的村子所受打击更为严重。在水灾中，五公人表现了仁爱精神，把牲口饲料送到情况更糟的村子，当接受赈灾的农民们看到幸运的五公因慷慨而受到赞扬时，便因遭到忽视而很不高兴。新闻界盛赞地势高、损失小的五公村就像征服水灾的英雄一样，而忽视了被围困的耿口村农民的功绩，因此耿口村民非常恼怒。明显的偏袒使人们对称赞模范村功绩的宣传冷嘲热讽。段口村的年轻汉子们发现，当原本繁荣的经济在教条主义的狂热影响下崩溃时，结婚成家的希望成了泡影。愤怒的光棍们在一个前战斗英雄的率领下，结成了一个帮派，警告未婚的姑娘们不要嫁给外村人。

就连五公的村民也面临着冬天要挨饿的困境。1956 年，粮食产量 62.9 万斤，仅为 1954 年的一半，适为 1955 年的 70%。当新闻界欢呼五公村在抗洪中的英雄事迹和对其他村子

的慷慨时，土改中的替罪羊李大林抱怨道，已有人家因无米下锅而挨饿了，而他家便是其中之一。^①

1956年底，灾难加剧。以前从事贸易活动的“富裕中农”刘振清设法退出了集体农庄。他到县里甚至省里的干部面前申诉集体农庄管理不善，呼吁发还他的土地。贫农李三逊和张转，与刘一起发泄不满，要求收回他们的土地和耕种权。耿老板回答道：“你们可以退社，但土地必须留下。”做买卖这条路已走不通，不仅土地现已属于集体，而且劳动者也如此。^②

五公北面相邻的王桥村，集体化之前有300人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做工。由于集体化和户籍限制，大部分人被迫返回老家。1955~1957年间，五公人口从1912人减至1711人。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是拖拉机站把工人及其家属派到别的地方。此外，一些已在外面工作的村民从五公迁出户口，另有一二十人迅速取得城市户口，他们担心将来脱离集体农庄在法律上不太可能。^③

但五公人口的减少也是由政策的致命冲击所致。集体农庄把人们捆在一起，筋疲力尽地劳动，灌溉和平整土地。它强迫许多新劳力，包括妇女和老人，都下地干活。由于管理费用、售粮给国家的数目、资金积累和其他投入上升，而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以及洪灾毁坏了秋收作物，村民的收获很少。尽管当地干部否认这一点，但我们的家庭调查显示，1956年五公人口下降的原因是老人和病人去世，以及在疲惫不堪、营养不良和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下，虚弱的妇女怀孕率降低，流产率上升。很多妇女早产，而婴儿出生后，母亲没奶，也没有医药。饥荒中，由于人们没钱操办婚事，因而只得推迟举行婚礼。同时，妇女的月经不规则，性欲下降，也导致出生率下降。婴儿死亡率也猛增。^④

五公村想方设法帮助贫困户。水灾后，便把2万斤粮食分

给救济名册中的 38 户。此外，25 户军烈属和五保户也获得救济，总共有 10% 的家庭靠救济活了下来。由于禁止贸易活动，大部分行业都实行了集体化或国有化，饥肠辘辘而又自尊的农民们被迫依靠集体农庄的救济。

有的村庄没有五公集体农庄所拥有的正统性、团结、粮食储备、财政援助和地势高的优势条件，饥馑就更加严重了。像杨各庄这样的穷村子，土地贫瘠，又没有水，所以禁止贸易、粮食第一的政策以及集体农庄的纪律约束，对它的打击最为严重。没有余粮的大部分贫困户需要把东西换成钱，再在黑市上买粮吃。长期以来，手工艺、加工和服务行业的收入，决定着许多农户和整个村庄的生与灭。而摒弃家庭商品经济的教条主义政策却迫使农民从事半合法和不合法的经济活动。

像杨各庄这样的穷村，平时还能履行保障贫困户福利的五项保证，可在遭到自然灾害的打击时，福利基金很快就用完了。而在救济唾手可得时，农民还经常嘀咕，它让人丢脸，而且数量太小。很多人嘲讽“五保”时说：“五保，五保，比现在死还好。”有一个故事流传甚远，讲的是饶阳北部的一个村子里，干部们急于完成对一个没有任何亲属的老头儿的照顾，便把还在呼吸的老汉按进一口棺材里。村民们尽量避免重负，不愿成为五保户。宗族关系是现实中的福利体系。

1956 年，饶阳县成为灾区。中央政府第一次发放紧急粮食救济。紧接着，省里也给予赈济。^⑧ 尽管秋收作物损失很大，可新闻媒介仍报道说，五公村拒绝接受国家救济的 8000 元，依靠自己微薄的储备粮度过难关，把模范村说成是自力更生的。而实际上，国家给五公村送去了稻米和面粉，并免去了它的售粮定额。^⑨ 利用五公拒绝救济的目的是，阻止更多的人向国家申请救济。

1956 年，河北省粮食产量 680 万吨，比集体化前 1955 年

的产量低得多，人均 384 斤，比前 4 年中的任何一年都低。^⑧计划在粮食产量上来个飞跃的省政府不得不调拨 3.36 亿元用于直接救济和贷款。这相当于河北农民在普通年份上交农业税总额的一半以上。为了应付饥荒，河北省分派了 3.6 亿斤小麦。^⑨

集体农庄的发起者把 1956 年的灾难归咎于坏天气，他们坚决认为只有国家和集体农庄的救济，才使农民免遭饥馑之苦。事实上人们是在市场上寻找粮食。由于水灾是区域性的，河北有的地方如保定就有余粮，这些粮食很快运到了饶阳的地下市场，而这些市场正是国家试图取缔的。在黑市上，玉米 0.15 元一斤，大约是国家统购价的两倍。由于政府机构拼命把粮食从饶阳运往大城市，因而在发生自然灾害时，饶阳农民迫不得已转向了黑市和半合法的粮食市场。

然而，针对无效的反市场政策而采取的有效办法也遭到取缔。庙会和农村集市消失了。由于当地集市萎缩，就连学校用的石板也见不到了。经常在冬季跑到很远的地方找活干的木工和手艺人，现在都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了。尹村大量的富裕小商人被转化为贫困的农民。饶阳经济萎缩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地方文化。蜜月年代以来，一直在乡村巡回演出的受人欢迎的当地业余剧团不见了。孩子们十分喜欢的马戏表演也是同样下场。

在饶阳的许多地方，尤其是靠近滹沱河北岸的村庄，男人们习惯于在每年秋天农闲季节开始时，乘船顺流而下，到天津找活干。出发 3~5 天后，便停在献县和工业城镇泊镇（现名泊头——译者注），这个镇据说有中国第一家火柴厂，它位于滹沱河与旧大运河及津浦铁路的交汇处。集体化和控制外出，使冬季到天津做工的周期消失了。1956~1957 年和 1957~1958 年分别在滹沱河上游建造了水库，紧接着，保持饶阳和

天津之间贸易联系的这条河禁止通航。国家在努力扩大治水工程时，忽视了河流的交通运输功能，全国有很多内陆水道严禁通航。为了断绝资本主义的联系，努力使每个小区在经济上自给，竟摧毁了带来经济活力和多元化的地区间的联系。

饶阳还没有铁路和油面公路，几辆卡车被用作公共汽车。与传统的商业周期一样，从饶阳的主要集市尹村到北京，每5天发一趟班车。到北京或天津只需行驶一天时间。在饶阳东部开始建造一个泥路跑道的简易机场，主要用于喷洒治虫农药。

1956年，愤怒而又担心的五公村民质问为自己辩护的耿老板，按他从苏联回来后的允诺，为什么集体农庄还没过上“吃面包牛奶”的生活。他说：“他们每餐有面包、牛奶和肉，住的是瓦房，但你们想想，那种幸福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苏联农民30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⁹⁰

一些村民回想起集体化的第一年1956年，都说是他们财运的最低点。虽然数据是零碎的，但看来可以证明，五公与许多河北村庄一样，遭受了一次大灾变。在人们的记忆中，只有1943年大饥荒期间饿死的人数超过了它，那次饥荒曾刺激形成了第一个小合作社。

农业集体化和市场国有化严重损害了农村贫民的利益，而国家的目标正是帮助贫民，保护他们免遭不法商人的剥削。饶阳作为石家庄地区的一个穷县，税收负担相对较低。1957年，它获得了补助金，弥补了1956年的部分损失。

灾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种制度化过程把传统苏联模式中的反生产力方面跟登峰造极的教条主义结合起来了。1956年，中国统治者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目标，缩减了副业和商业，损害了劳动积极性，关闭粮食市场，使人们在劳作中筋疲力尽，把人们束缚在强制性集体农庄的土地上，而且发放救济粮的速度又很慢。它预示着一场悲剧将要发生。⁹⁰

恢复改革

1956年9月，耿长锁又到了北京，这次是作为党的八大代表去的。自1945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召开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庆祝中国快速转变为集体和国家所有制，并取得了新的优势^①，同时宣布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已告结束，土改和集体化制度变迁已大获全胜。^②接连不断的发言者断定，工作重点将转移到发展经济和技术、提高生活水平上来。

爱国知识分子又应邀扮演刺激发展和精简官僚机构的重要角色。党还赞成进一步开放文化，包括群众文化。1954年复刊的河北文学杂志象征性地取了一个生气横溢的名称：《蜜蜂》，以取代灰色的官僚化名称《河北文艺》。山西和河南也以相同的方式，分别为杂志取名《火花》和《洪流》。这种反官僚主义改革的鲜明色彩，正是百花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杂志倡导中国的民族文化形式，嘲弄苏联的观点和有权势的人，教师们异常活跃。王凤辉以笔名在《蜜蜂》上发表了《讽刺的好坏》一文。嘲讽党的会议又长又空，建议带着衣箱去开会，尽管人们仍有可能睡着，但至少他们可以休息得舒服些。

在这种比较开放的气氛中，经济改革者们批评国家强制性集体化抛弃了“自愿和互利”的承诺，指责集体农庄导致了农业管理和耕种上的混乱，并使得勤劳能干、经济情况稍好却失去劳动热情的农民们生活水平下降。邓子恢反对毛的飞速集体化的意见。为了恢复农业兴旺所必需的责任感和有效的管理，必须重建把劳力、农具和资金承包给小组或家庭的制度。以反对冒险主义的名义，经济改革行动包涵了制造更多的有用消费品，开放市场和信贷。^③

到1956年春，全国猪存栏数从1亿头降至8700万头，因

为人们情愿宰掉，也不愿把它送给集体。随着改革的进行，猪的征购价格涨了很多。在“私人所有，个人饲养，政府支持”的口号下⁴⁹，国家鼓励家庭养猪。商业部长陈云建议大幅度提高征购价格。在他的支持下，全国范围内的私人养猪的数量迅速回升。然而五公已开始集体养猪，大粪集中在前年秋天挖的30个大坑里。五公拒绝实行“八大”提出的关于提倡私人养猪、提高家庭收入、猪肉消费和肥料供应的改革精神，集体农庄继续限制家庭获得收入的机会。⁵⁰大约在1951年发生了花生丑闻之后，耿老板一直避开私人领域，甚至当国家批准对集体化和国有化的消极方面作某些补偿时也如此。

由于动员压力减轻，五公削减了40%的棉花种植面积和每亩播下的种子数量。1956年底，该村增加了副业投资，集体农庄创办了10个小企业，包括一个木工厂，一个榨油厂，一支运输队和一个林业组。⁵¹五公村唯一的财政储备金为副业提供了资金。到了岁末，人均收入仍比前年下降了30%，正好44元。这次收入减少的惟一原因，可能是集体农庄在1956年分配了97%的净收入，以至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再投资的了。自从建立大社以来，这是第一次人均收入降至低于60元，也是从1953年到写作本书这段时期内分配额最低的一年，而且只付2元现金。正如为了合乎道德地生活和传宗接代、家庭需要儿子一样，购买从房屋修缮到葬礼以及结婚嫁妆用的家具等必需品都需要钱。饶阳农民说：“是儿不死，是财不散。”但事实上，集体农庄通过榨取现金，给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进行生活的家庭带来困难，因为它需要很多现金开支，农民们不能仅依靠粮食过日子。

1956~1957年最令人欣慰的文化信息是河间县16岁的裴艳玲大获成功，她是河北梆子戏的明星演员，曾为老干部们表演，名声很大，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内的国家领导人指名邀

请她到北京展示她的天才。饶阳和邻县的百姓把裴称誉为一个对优秀地方传统作出了贡献的成功者。

1956年水灾的恢复工作尚在进行中，老人和孩子便从传统文化活动中得到享受。五公的打鼓队进行表演，每个大鼓由4个人敲，并按他们的节律跳跃舞狮。五公派了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表演队到邹村庙会进行表演，有2万人拥来参与该年规模最大的集市。拖拉机站站长的女儿师桂英唱了一首集体化的赞歌，以及几支有关水灾之后重建家园的歌。

1957年初春，耿长锁离开五公前往东欧，再次与政府农业代表团一起去考察。他们从东德来到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天晚上，欣赏了文艺节目，包括正规的交际舞在内。耿发现，西方人的习惯让人着迷。但他后来告诉五公村民说，中国考察团团长对东道主捷克人大发雷霆，说他们从中国来不是为了看这些表演，来这儿的宗旨是为了严肃的国际社会主义。不久，双方相互谅解，捷克方面坚持这些舞蹈是应受到尊重的地方传统。耿长锁悄悄地笑了。一些城市干部的偏狭始终让五公的农民干部感到很好笑。村民们很喜欢有关这个愚蠢干部的故事。

在东德，耿访问了集体农庄，提出进行友好的竞争。他回国后，信也到了，但它是用德语写的，中国农民看不懂。除了注意到比较现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与东德看上去很相像之外，他们没有看出什么名堂。使外国人不能理解中国现实的相同障碍，使耿看不到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遭镇压后苏联控制的中欧地区的现实情况。

回国后，耿为饶阳学生做了报告，这次集会充满了国际团结的味道。会议一开始，就唱了一首激动人心的《国际歌》。年轻人为崇高的理想而激动万分。耿讲述了与一名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谈话，谈到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同学们听了这个简短的故事，全身热血沸腾。如果国家有困难，那么这些

年轻人在听了报告之后，便想帮助解决它们，并促进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通过革命获得的希望没有消失，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化作用也没消失。

改革为1957年邹村庙会带来了更多的生机。不过，那些快乐的春日以一场激烈的混战而告结束。在结算中，邹村的代表质问外地的戏班子，为何用了村里的煤却未付款。戏班的演员过来大呼小叫，然后与当地人扭打起来，戏班负责人是一位在战斗中失去一条腿的退伍军人，他试图让双方平静下来，可反而受到攻击。武断的当地军人坚决要求，必须惩罚侮辱爱国军人的行为。这一案子引起专区和省里的关注。

虽然包括军队在内的权力结构变得更加稳固，但1956~1957年的改革的目的，在于弥补由集体化运动的经济不合理性所造成的损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认为，1956年初开始的动员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已造成衰退。作为河北省治水工程的临时总指挥，他希望中央提供更多的资金，遏止海河及其支流的泛滥。为了与经济改革取得一致，集体农庄将引入计件工资制。五公早就用它来激发劳动积极性，并将由几个村组成的集体农庄缩小到一个村^①。河北在一年之内解散了所有由几个村组成的集体农庄。但无论改革采取什么措施，集体农庄和政治制度却坚定地保持下来。

社会主义关系网

五公村的模范地位靠着与掌握各层权力的干部们的关系网才得以保留，这些干部控制着稀缺的资源。模范们靠着渴望成功的精神支柱、对上级领导的忠诚以及婚姻和社会关系，把本村和邻村的农民联结成当地的和地区性的关系网。

1955年底，毛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收

人了一篇有关五公的文章。该书（三卷本）简明扼要地介绍了100多个模范合作社，他编辑这本书并撰写了按语，目的是推动集体化。但五公没有列入发行到乡村的节选本中，也许是五公的攀登历程不够激动人心，缺乏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嗅觉；也许是由于五公合作社以商业副业起家，然后在拖拉机站的帮助下，发展机械化农业，这与毛喜爱的自力更生、手工劳动和粮食第一的理论观点不投合；也许在毛看来，五公对定额、奖金和激励的强调似乎不够大公无私和共产主义。

五公村干部们也感觉到他们受到了毛的藐视，因为他非常赞赏五公以西、仅有一小时吉普车车程的安平县南王庄的成就。领导人让它的新老板王玉昆展示什么？他的小合作社已四分五裂了！几十户退了社，只留下姓王的三户相互帮忙^⑧。可在1956年2月7日，南王庄的领导还受到毛的接见，他为三户邻居组成的失败的合作社欢呼。对于毛选中的河北的两个村庄，王玉昆的南王庄和王国藩的西铺村，政府给予奖赏，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而五公村却没有。

毛亲自为准备收入节选本的有关五公的文章写了眉批，他知道五公已建立了400多户组成的大社，但他决定不给五公最高的赞誉。不过，一旦处于国家偏袒的圈子里，任何一个都不能轻易抛弃。北京的历史博物馆的档案管理员于1957年来到五公，收集早期合作社、土改和第一个大社的记录材料^⑨。由于陈伯达、林铁和其他推动者和庇护人对五公很赞赏，五公继续得到国家的关注和支持。

模范地位给五公带来极大的好处。1956年，除县城以外，饶阳最大的邹村医院开始搬到五公村边，最后它变成了五公医院，为饶阳南部20个村庄提供医疗服务，并得到专区的资助。这一搬迁表明，国家的新模范的地位远比旧的集市中心高。

给村里带来现代医疗事业，并未使每个人都高兴。医药国

营化迫使李宽玉的中药铺关门大吉。由于国家控制了商业，公开的中药市场消失了。许多家庭自己种植的草药仍在残余的黑市上买卖，但由于五公与国家的关系很密切，且厌恶市场，许多有价值的药便在五公毫无用处。更糟的是，虽然医院提供了传统以及现代的医疗保障，但五公的中医大夫却没有草药供应，被迫放弃中医行业。老年人抱怨说，走到村西头的新医院真难。他们不喜欢陌生的大夫，不喜欢排队等候，填表和付挂号费。他们一旦生病，便在家里让熟悉的医生上门看病，买他们认为可信的草药，但国有化商业和集中化的医疗体制结束了这一切。如果某人讲述有西医大夫的当地医院的实际成就，那么许多一直不信任外乡人的村民就会抱怨这一损失。^④

同样，虽然现在用拖拉机耕地，但收割仍是手工劳动，通常用短柄镰刀收割庄稼。村民们认为，他们在使用手工工具收割没一颗属于他们自己的粮食。从1957年开始，此后的20年中的每次夏收和秋收，五公一直有饶阳学生来参加义务劳动。高级中学组织几百名学生到著名的模范村帮助收割（当时只能步行或骑自行车，没有卡车运送学生）。饶阳的其他村庄从未享受到这些援助。这个体制使这个享有特权的村庄进一步富裕起来。

耿老板为他与高层领导的关系而担心。他觉得，由于向新闻界所作的有希望获得高产的允诺和预言后来没有兑现，造成了五公形象不佳。他认定，这种窘境是由外地人造成的，尤其是接连不断地要求估算五公夏收庄稼的产量，并最后把最高的预计数字公之于众的那些新闻记者。耿告诉手下的干部和村民，要求他们别再屈从于那些不知内情的外地人，对外地人提出的要求和建议一律说“是，是，是”倔强的耿很喜欢自己“硬头”的美名，他要外地人体验一下，五公人可不是那种可以任意欺侮和摆布的人。

国家可以摆布手中无权的人。上级决定在饶阳东部建一个小型飞机场，他们征用了周围村庄的土地，却没有给予任何适当的补偿。与那些建造预防下一次水灾的大坝而失去土地的河北农民一样，这些农户深受经济衰退之苦。人们暗暗地评论道，“不得不两人吃一碗饭了”。

教 育

1956年，五公小学增设了五年级和六年级，然后开办了一所三年制初中，吸引了邻村每年有能力付3元学费的孩子来上学。在饶阳农村，受过8年教育的人凤毛麟角，五公也是如此。初级中学有240名学生，13名教师和职员。全县唯一的高中在县城。

教育发展了，可女孩上学仍受到限制。当一些女孩准备徒步到饶阳县城参加为期三天的入学考试时，文盲的父母告诉她们，上学到此为止。有一对父母的最后通牒是，把女儿嫁给一个陌生的男人。这位女孩两次以死相争，最后与她的男友成婚。

1956~1957年小小的跃进造成了浪费和损失，导致预算减少，教育由此受到影响。1957年，300名饶阳初中毕业生仅有1/4进入高中，教育普及的目标由于受到政府优先考虑的事项、捉襟见肘的财力和传统观念的限制而难以实现。在饶阳一所初级中学，当上级宣布只允许少数人进入高中后，学生们非常愤怒，在宿舍墙上和黑板上写道：

饶阳初中生，
白搭九年功；
高中没考上，

师范不招生；
出路只一条，
回家把地种；
宏愿何处诉？
愤恨怎能平。

在思想解放的百花运动中，这类挫折产生了一种共识。批评者谴责说，一方面教育经费紧张，另一方面腐败的官员过着奢侈的生活。

反右运动

1957年夏，党发动了一场反右运动，压制和惩罚那些在此前的百花运动中讲真话的人，当时党要求鸣放，以批评官僚主义，提出改革建议。7月，毛号召向“地主和富农的反革命活动”发起进攻，攻击对象迅速扩大到所有怀疑集体化和其他政策的人。

在反右运动中，掌权者打倒了那些指责干部无能和腐败或政策上有瑕疵的人，或者那些抱怨上面摧毁了群众积极性的人。过去被当作攻击目标的人仍充当替罪羊。在农村，进攻目标集中在那些阶级成分为地主、富农甚或中农以及知识分子的人身上。指给孩子们哪些小块土地以前属于他们自己的农民，有可能遭批斗、示众或入狱。在全国，成千上万的人被送进劳教所，在那儿死了很多人，幸存者则惨不忍睹地遭虐待达20年甚至更长。石家庄有几百人被送到山西省险恶的煤矿，充当真正的奴隶。被定为右派者多达百万人。这些人成为遭诋毁的阶层，他们的家庭和子孙被剥夺公民权。河北省委的两名委员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个是为了贪污问题，另一个是因为替一个

被诬陷为“反革命”的同事进行辩护^①。人们认识到，批评当权者会使自己和亲属陷入无尽头的地狱。惟有沉默和谄媚才是安全的。

夏末，到处都传说在五公拖拉机站，右派将成为整顿运动的目标。在站里工作的4个农学院毕业生保持沉默，他们问朋友，“什么是右派分子？”一些人猜想，右派分子必定是反对集体化，反对拖拉机站带头走的道路。结果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很容易被指责为阶级堕落（class degradation）。

全中国共有30名记者，因写了揭露扩大合作社招致普遍不满的、对干部开放的秘密商店网络的文章，而被划为右派，并被遣送到落后地区去劳教。河北文学杂志《蜜蜂》的所有作者都被指责为右派和反党集团成员。河北文联的1/3会员被宣判有罪，《北京文学报》把著名作家孙犁当作集体化的反对者加以批判，他曾创作了关于滹沱河地区的小说。孙请了病假，宣布他不再创作。

群众文化又被当作封建迷信受到批判。对一位河北作家有关传统武术的作品进行了批评，以此来鼓舞反对这些东西的全国性斗争。庙会遭禁止。几十年来，五公人于1957年最后一次欣赏了本地最出名的传统评书。邹村村民终于意识到，爱国者和老兵们已站起来支持在春节混战中被打的士兵，政府通过关闭集市来惩罚他们了。以前的一个筑有围墙的集市村落，作为行政、商业、医药、教育和慈善事业的重要中心的邹村，变得萧条冷清了。

国家把那些1947年土改中推行阶级斗争路线和后来通过农业手工业集体化、压制贸易活动、捣毁所谓的农村封建文化、侵犯农民利益的人称为革命者，即使这些人造成的危害人命关天，他们也至多被认为是头脑发热或走在时代前面。另一方面，仍有人冒着被划为右派分子、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反革命

分子的危險，批评这些政策造成了群众性的恐惧和离间。揭露违法乱纪、寻求民主或激发农民们更多的经济积极性，是要冒被捕或被当作政治罪犯、人民敌人的风险。有可能被划为右派的行为都会危及自身和前途。左的错误可以原谅，右的错误却不能。

在河北，对右派的打击主要集中在教师身上。在饶阳县城，高级中学进行反右运动。与反胡风运动一样，官员们被迫把有文化的人当做人民的敌人。40多名教师中有3人被划为右派。若政治迫害点燃狂热行为，上级会对当地干部给予奖赏，因为他们在本单位找出了5%以上的右派分子。那些以前响应百花运动、揭露腐败或提出改革建议的人很容易受到攻击。现在，腐败分子对准了他们的批评者。这个制度宣判理想主义的民主人士有罪，而对图谋报复的人给予奖励。受害者被关入监狱，一些人遭毒打，许多人背上黑锅。饶阳全县的中小学教师被召集到县城，宣判他们中间的右派分子，并挑选了50多名教师进行人身攻击。当地干部总在提防着教育农民孩子的外地教师。

国家坚决认为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可它们惩罚划为右派教师的手段，却是强制他们过农民的生活，把他们发配到很偏远的乡村，这是一种永久性的国内流放形式。就连高中生也被警察抓起来，直到国家颁布政策，阻止把学生划为“黑分子”，才决定当众释放。不过，仍有一个学生被中学开除出校门了。

长期以来不信任文化人和外地人的当地干部们，绷紧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打算找人代替反右运动中损失的农村教师。党中央下达文件，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仍需要阶级斗争。知识分子被划入了资产阶级，属于阶级敌人，其罪证是犯了右倾主义、支持民主和个人自由、反对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如果阶级忠诚是政府所期望的，那么文盲和半文盲的农

村干部就会逐渐只相信和重赏那些与他们一样诚实、厚道、操当地口音的人，并怀疑和排斥那些有文化、讲话像操旧时官话一样的人。没有文化的老兵们的地方网络更加紧密了。

虽然人们知道如何确保自身安全，但这些政治变迁并没有使曾是八路军根据地的老百姓们觉醒。革命已转变为忠诚。人们试图在忠于毛、社会主义、党的军队（人民的保护者）的框框里搞清楚事情的意义所在。而与这些基本原理一对照，不公平和时代悲剧便消失了。忠诚者说，那些被党冤枉的人，都应把自己看做被慈爱的父母错误惩罚的孩子，于是，少数对惩罚有怨言的人也就哑口无言了。

1957年，五公村“地主”李茂修的妻子范淑芳，很难既当母亲又当妻子。她和11岁的儿子李伟从安全的娘家住回五公村。孩子的合法居住地是他父亲所在的五公村，因而李伟只能在五公上学。她的丈夫即将结束因逃跑罪被判刑5年的劳教生活。传统的家长制要求，他回家时，她必须在五公村。范与生病的婆婆即前村长李建亭的妻子回到五公后，发现没有一粒粮食。当然，说什么也不会把粮食分配给反革命分子、罪犯、地主的家庭。范勇敢地去找五公村干部们，坚持要求他们看在她死去的兄弟的面上，使自已有权作为烈属家庭受到优待。但他们告诉她，她是地主分子，十足的黑分子。此外，由于自从范在12年前嫁到五公，便开始打骂她的婆婆，村民们对其傲慢态度很厌恶。他们可怜她的婆婆。土改期间，李家大院内最大的房屋已分给了贫困户。李家挤在几个小房间里。1956年，村里又要征用一间房作为仓库。范恳求村里不要征用，但他们轻蔑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她跑到县城，汇报五公村干部们正让烈属挨饿。饶阳县官员要求五公村干部进行核查，村党支部却给范扣上地主分子、诽谤者和外出破坏社会主义的捣乱分子的帽子。

反右运动开始时，范淑芳被拖到一个院子里，它在卢广顾问工作组住过的房屋后面。治安主任李志亭和民兵队长张端掌管着一切。年轻的李中信和他的哥儿们挤进去观看这个场面。刚从监狱回来的李茂修从人群背后抑郁不平地看到了这一切。范被五花大绑地带到台阶上，在全村人面前低头弯腰，他们强迫她交代破坏社会主义的罪行。气氛十分紧张。人们开始推搡、打骂和侮辱她。在遭到很多肉体折磨后，范坦白了，但虐待她的人拒绝接受她的坦白，因其缺少诚意。她必须学会诚实。于是，残忍的折磨继续进行。从此，范淑芳再也没有公开申诉过。

凶猛的张端是五公村反右运动的急先锋。他追查出养家糊口的李沛琛曾在天津日占区加入了汉奸组织一贯道，以及其他在粮食短缺时把粮食弄到黑市上卖的人。虽然国家规定，对于仅是一贯道的成员而没有卖国行为的人不算刑事犯罪。但在1957年8月，李沛琛却被抓了起来，与道士李金爪及其他黑分子一起走到饶阳。全县共有数百人被迫露宿在公安局的院子里。

他们被分成14组，每组由公安干警监督，每天都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几周之后，李沛琛被释放回到五公。凶猛的张端告诉李，他现在是黑分子。9月，李被判处3年劳动改造。开头两个月在邻村从事强制劳动。李发现，他的黑分子成分和强制性苦役，3年和7年之后都不会有终结。五公的苦役由李志亭掌管。

李玉田在集体化之后很不满：孤独、饥肠辘辘和愤慨。他退出最早的合作社之后，再也没有从1943年饥荒中喘过气来。他的妻子离他而去。我们无法知道1957年运动把他定为右派时期其命运如何^②。一些干部称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也无法了解李大林的命运，他在土改期间遭迫害，又在1957年因抱怨

饿肚子这一破坏集体农庄的行为而难逃此劫。我们被告知，他仍活着，但病得很重，不能接受访问。由于我们成功地了解到了其他人的命运，因此李玉田和李大林的命运可能更惨。李黑炎、李玉清和所有其他黑分子都与曾经很有势力的李氏宗族有牵连。

当国家对农民的要求日益迫切时，凶猛的张端又站出来，让人们保持一致。抗战、静悄悄革命和蜜月年代的热忱、团结和合作事业遭到了破坏。由于耿老板的领导，凶猛张和民兵的威慑，以及国家要求镇压阶级敌人，农民们心里都很害怕，就连抱怨挨饿也要被无情地判刑。呼吁大家关注国家强制性灾难，被认为是进攻社会主义的行为，谁反对国家认定的通向共产主义的惟一道路，阶级敌人的称号就随时可能强加到他头上。五公和中国都处于可怕的骚动之中。

注 释

1. 《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第五卷，第201～202页；Mark Seld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342; Mark Selden, "Cooperation and the Socialist Transition in China's Countryside", and Edward Friedmen, "Maoism, Titoism, Stalinism: Som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Maoist Theory of the Socialist Transition to Communism",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ed. Mark Selden and Victor Lippit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2), pp.32～97, 159～214。有关合作化前的改革如何减少了两极分化的有价值的介绍。可参阅 Vivienne Shu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2. 《光明日报》1956年2月3日。

3. 《陈伯达文集》（出版地点和时间不详），第 77~78 页。
4. 陈伯达并不是惟一用这些欺骗性数据来隐瞒 1955 年产量下降的人。饶阳县委副书记张玉刚在 1956 年 1 月提出相同的数字，耿长锁在 1957 年 1 月重复了 1955 年上报的 463 斤的亩产量（《河北日报》1956 年 1 月 9 日、1957 年 1 月 18 日）。1978 年及后来由五公会计提供的数据表明，粮食亩产从 1954 年的 352 斤下降至 1955 年的 283 斤。
5. 强远淦和林邦光：《试论 1955 年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党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第 13~15 页。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 153~154 页；胡华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第 134、143~145、158 页。
7. 《人民日报》（1955 年 10 月 30 日）讨论了 1953 年的决定。亦可参阅《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五年计划》（保定，1955 年 10 月 6 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第 1150 期，1955 年 10 月 14 日。
8. 《光明日报》1956 年 2 月 3 日。
9. 《河北日报》1956 年 1 月 7 日。
10. 《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20 日。
11. 《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30 日；《走在前面的高级社》（河北人民出版社，1956），第 49~54 页。
12. 《河北日报》1956 年 1 月 9 日。
13. 《河北日报》1956 年 1 月 9 日。
14.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79 页上的数据照例很异想天开。刊在 1955 年 10 月 30 日《中国新闻报》上的一个故事说明，李在加入合作社之前收入为 200 元，1954 年则为 32 元。
15.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77、82~83 页。
16. 《河北日报》1956 年 6 月 27 日；《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30 日。
17. Kenneth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93.
18.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78 页。

19. 参阅 William Hinton 的 *Shenf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第 105~107 页对束缚在土地上的问题的讨论。在最初几年中, 这个体制管理不严, 有些城市和乡村内部的移民仍在继续。从 1960 年以来, 对进入城市的控制就非常严厉了。
20. 参阅 Mark Selden, "State, Market, and Sectoral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States versus Markets in the World System*, ed. Peter Evans et al. (Beverly Hills: Sage, 1985), pp.275~291; Martin Whyte, "Town and Count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mparative Urban Research* 10: 1 (1983), pp.9~20; and Ajit Kumar Ghose, "The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ural Reform in Post Mao China", in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side*, ed. Keith Griffin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4), pp.255, 272。
21. Nicholas Lardy, "Subsidies", *China Business Review* 10: 6 (11~12 1983), pp.21~23。
22. 《河北日报》1956 年 6 月 27 日; 《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30 日。
23. 关于五公集体农庄章程全文, 可参阅《河北日报》1956 年 1 月 9 日。
24.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给中央委员会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1954 年 7 月 15 日), 收入 Chao Kuo-chun, *Agrarian Policies of Mainland China: A Documentary Study 1949~1956* (Cambridge: Harvard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57), p.74。
25. Selde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p.357~364。
26. 《光明日报》1956 年 6 月 25 日。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27。
27. 《第四十个春秋》(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3), 第 21 页。
28. 《河北日报》1957 年 2 月 1 日。
29. 《河北日报》1957 年 8 月 22 日; 《联合出版物研究中心丛刊》DC-401, 1957 年 8 月 28 日。
30. 《耿长锁走过的路》(河北人民出版社, 1966), 第 89 页; 《花开第一枝》(1963), 第 89 页; 《花开第一枝》(1973), 第 71 页; 萧平: 《新一代农民》, 《中国建设》43: 1, 1964 年 1 月, 第 32 页。

31.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89 页。
32.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89 页。
33. 《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29 日。
34. E. Le Roy Ladurie, "Amenorrhea in Time of Famine,"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chap.15.
35. 《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29 日。
36. 《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30 日；《衡水日报》1962 年 10 月 1 日。
37. Kenneth Walker, "Grain Self-sufficiency in North China, 1953 ~ 1975", *China Quarterly*, no. 71 (September 1977), pp.558, 568; Walker,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1975 ~ 1980 and 1952 ~ 1957: Some Basic Statistics," *China Quarterly*, no. 86 (June 1981), pp.231, 233.
38. 《河北日报》1957 年 8 月 23 日和 28 日。
39. 《人民日报》1957 年 2 月 3 日。
40. Nicholas Lardy,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他在该书中对反市场政策的后果作了描述。
41.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p.91.
42. "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已基本解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外文出版社，1956），第一卷，第 116 页。
43. 中共中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5），第 260、276、286、298 页。
44. Nicholas Lardy, *Agricultural Prices in China*,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s, No. 606 (Washington, D. C., 1983) 列出了 1952 ~ 1957 年猪肉价格为每公斤 0.53 和 0.73 元（第 14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 187 页。
45. 《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1 日。
46.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 87 页。
47. 《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20 日。

48. 参阅《五亿农民的方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外文出版社，1977），第121~134页。
49. 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第433页。
50. 《第四十个春秋》，第78页。
51. Fredrick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White Plains, N. Y. : M. E. Sharpe, 1979), p.321; 《河北日报》1982年12月3日。
52.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90页。

第九章 生死之争

尽管发生了种种制度变迁，从30年代末的税制改革开始到1958年，饶阳农民的日常生活仍陷于现代化之前的贫困之中。天若下雨，小路积满了水，人们只得守在家中。没有下水道，食物也很简单，且千篇一律，早饭是玉米糊，中午煮粗粮，晚上接着吃，几乎吃不到肉、家禽、鱼和新鲜蔬菜。家里没有椅子、沙发、床、收音机和钟。妇女用石头和从很远的井里打来的冰冷的水洗衣服。烧饭时，连续不断地往房子中央的灶膛里放麦秆，烟雾和灰尘弄脏了卧室，呛到肺里。用于取暖的煤粉的污染作用与此相同。在雨雪和冰冷的天气里，大人小孩，甚至老人病人都到院子后面的茅厕里方便，连像卫生巾和卫生纸之类简单的生活用品都没有。当然更没有自来水和电。

现代化和奇迹

老百姓和干部们都欢迎现代化。调到石家庄的保定干部都认为，石家庄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城市，新的政府大楼安装了蒸汽散热片，而保定还是用煤炉取暖。饶阳的干部预言，由于1958年飞机喷洒了“六六六”杀虫剂，产量会上一个台阶。饶阳人相信，杀虫剂能消灭四季皆有的虱子和臭虫这些祸患。

村民们希望能有消灭跳蚤的化学品。

为了消灭玉米害虫，驻在天津的复员空军飞行员飞到饶阳新建的简易机场。饶阳已为他们准备好了帐篷，但他们却轻蔑地拒绝了殷勤的招待，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返回舒适的保定或天津。饶阳实行飞机喷洒农药的目标是玉米地，戴着面具、激动地挥舞红旗的年轻人站在地里为飞行员做引导。喷洒工作进行了两周，玉米的害虫急剧减少，但这也出人意料地减少了萤火虫、狐狸和蛇。随着其自然天敌被消灭，蚊子和老鼠又泛滥成灾，老鼠正与农民们争夺宝贵的粮食。

任凭怎么现代化，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虽然政府宣传反对封建迷信，但合法的婚姻仍保持以男方为主的习惯。父系一方5代之内的婚姻仍然禁止，否则就视为乱伦。不过，现代体育运动很快被人接受。天津体委负责人认为自己是先驱，1896年篮球刚在美国发明后不久，就把它介绍到了中国。1952年，开始举办全省体育比赛。1958年10月，河北省运动会分别在天津、保定和唐山举行。1959年，凭借天津的实力，河北举办了全国第三届游泳运动会。在手枪射击比赛中，饶阳南部一个农民创了记录，为这个地区争得了荣誉。由于传统的武术衰落，它在反右运动中被斥为封建迷信，青年团便推广现代体育运动，尤其是篮球和乒乓球。建造农村学校时，建筑工人首先搞好篮球场，以便他们能从现代体育中找到乐趣。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追求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此时毛把传统的苏联道路看做产生受过教育的苏联式干部的精英路线。1956年，改革派官员曾试图弥补强制收缩市场所造成的损失，以及集体化带来的消极与僵化，可现在，许多干部都站到了毛一边。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寻找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它不是建立在挣钱上，而是建立在共产主义基本信念的基础上。

这些领导人把保定正北面的徐水县树为理想模型。来自全国的农村干部都到徐水来取经模仿。徐水县领导在1957～1958年冬的治水工程中赢得了声誉，他们发动农村劳力，并与扩大民兵队伍的运动结合起来。1957～1958年，中国新增的灌溉面积比前8年的总和还多；年轻的民兵们组成斯达汉诺夫式生产队，挖沟渠，筑水坝。作家康濯被派到徐水，记述他们无私且军事化地奔向共产主义的经过。

毛断言，正确的思想观念能释放出神奇的生产力。1958年1月，他宣布，所有批评快速集体化是“冒险主义者”的人，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分子。他说，一旦右派的观点得到肃清，生产奇迹就会涌现出来。毛不仅在徐水，而且在河南省看到了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陈伯达等人写的有关大社之成功、修筑大坝以及灌溉工程的劳动力大动员的报告，于是信心倍增^①。这些报告向毛证明，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错误的，因为邓认为，在中国，手工工具和有限的管理知识使小合作社、互助组甚至家庭耕作更合适更有效。毛坚决认为，中国农民将齐心协力地走共产主义道路：均贫富，废除货币，军事化劳动，消灭市场，严禁商品生产，一句话，废除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和剥削^②。邓子恢的话不再有人相信时，他便失去了说话的权利。实际上，所有高级干部都支持省委书记吴芝圃的共产主义倡议。

共产主义动员

虽然政策改变了，可忠诚的网络却得到了巩固。1958年2月，毛原先选拔并给予高度称赞的河北省合作社干部、穷棒子合作社的王国藩和南王庄的王玉昆，出现在河北省的杂志上，而作为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最喜欢的合作社领导人，耿长锁佩戴

着共产党奖章的照片则被装帧在彩色封面上^③。耿老板遵循毛提出的与资本主义分子做斗争、奔向共产主义的路线。1958年4月，“富裕中农”李清永因密谋破坏生产而被捕，他被指控为伪造生产队长李树新的命令，毒死了队长李壮家的猪，并发动了那次很多人参与的拔掉棉花的反抗行动。李清永被告发而入狱。5月，听说“富裕中农”李昌散发秘密传单，五公民兵抓获李昌，也被关进大牢。^④

由于林铁没有强迫河北省在动员劳力和强制实行共产主义组织中冲在最前面，他被迫辞去目前的省委书记之职。5月，新任书记刘子厚在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庞大的增长预算计划。刘是河北人，1931年因反对日军侵占东三省而被学校开除，1936年入党，在冀南和华中的游击队工作。1949年后，在李先念的支持下，晋升为华中区的行政官员。1954年李调到北京，任财政部长，加入政治局，刘则随他成为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6年2月，刘任庞大的三门峡灌溉、电力和治洪工程的第一书记。^⑤与耿长锁的关系网一样，刘子厚与李先念的关系经过大量政策巨变的洗礼，一直非常紧密。

5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耿长锁听到毛的法定继承人刘少奇公开地说，“辛苦几年，享福千年”^⑥。毛保证，大集体农庄将使中国一天之内完成别人20年时间完成的任务。中国将迅速超过英国，然后在8年多的时间里，超过美国。^⑦毛求助于巨大的集体农庄，由它使中国经济来个大跃进。6月，在保定开会时，国家统计局得到命令，只许公布能发射高产卫星的数字。毛竭力推崇人的创造性，它比苏联刚发射的人造卫星更重要。统计局长们成了啦啦队长。

6月14日，毛明确表示，问题不在于单纯的增长，还在于真正的共产主义即废除所有的私有财产。毛认为，家庭是私有财产的残余，他把将来要消灭的农民家庭当作一个经济单

位。农户、小块土地和家庭副业生产都应消灭。为了取代家庭的社会功能，建立了托儿所来照料孩子，建立了集体食堂以废止各家各户的炉灶。毛说，这些措施将开辟一个纯洁而美好的社会。他推测，也许男人和女人的生儿育女功能仅需保留一年。^⑧党的宣传机构把注意力从高速增长转向强调建设共产主义。

7月，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总编辑陈伯达把徐水县和河南省的大社称为“公社”。他说，向公社的飞跃，开创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意味着没有货币，食物应该免费，对农民来说，这意味着储备的粮食和其他食品可以无偿消费。

对于那些为官方的激励、徐水和河南的故事以及众人期待的特大丰收而激动不已的人来说，一派富裕景象的共产主义似乎伸手可及。两倍于计划价格的当地粮食黑市价迅速回落。其他地下经济的价格也紧随其后。

8月，毛视察了在京汉线上的保定专区徐水县和定县的试验合作社，以及附近的安国县，这些都是很容易接近北京领导人的地区^⑨。徐水成为全国学习的两个典型之一。随着河北省会和省委书记林铁在1958年从保定搬到天津，提倡诸如公共食堂而不是私人家庭的大社和共产主义组织的保定干部，就能在这个地区很容易地强制推行教条主义路线。1958年春，徐水县把男人和妇女的食堂分开。大集体农庄在组织劳力的同时，破坏了农民家庭经济。农民过上了有组织的生活，虽然新闻界没有报道分开住宿，但来访者却四处散播这个传闻。只有少数最狂热的地方才仿效它。

另一个焦点是河南省，据说那里正在释放高产卫星。毛选择河南的大社作为向共产主义转变的组织形式。河南省让统计局变成了宣传部的附属机构。^⑩

在视察保定专区期间，毛由华北局主管农业的阎达开和河北省委负责商业和财政的刚提拔上来的解学恭陪同。毛的裤子在凸起的肚子上吊得高高的。他听说徐水预计秋收粮食特大丰收，达55万吨。毛问：“你们怎么能吃得掉所有粮食？剩余的怎么办？”他建议把不种粮的地改种油料作物和各种蔬菜，提高饮食质量。“种得少一点，半天劳动，还有半天用在文化方面，学科学，促进文化娱乐的发展，创办大学和中学”。^①

毛的指示通过电话会议和报纸迅速传达到各地。在两天之内，保定专区定县汇报说，种植了2300亩油料作物^②。离开保定后，毛在河南提倡建立大的劳动组织。他的简短评论“人民公社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然后，毛在河北的海滨疗养地北戴河召集中央委员开会，指出他亲眼所见的大社证明，中国不久能将共产主义基本原则付诸实施。陈伯达提出废除货币和商品，认为由于国家取代了市场，大农业合作社将实行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即按需求为每个人提供消费品^③。领导层赞同这些政策，中央委员会预计，粮食产量将来个大跃进，达到人均1000斤。大家还赞同组织公社这一庞大的军事化集体组织，把工、农、商、学、兵都紧密结合在一起。毛轻视市场经济中科学种田的生产前途，为了能够共同富裕，他提倡进行重新组织和广泛的劳动动员。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区别没有了。公社架起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那年秋天，饶阳人都学会了唱：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沿着金桥往前跑，
幸福生活步步高。

党没有注意吸取五公村顾问卢广所总结的教训，即仅有宣传不足以使农民苦干并干好，而是提倡把全国农民变成刻板的半军事化劳力。在五公，奖励和报酬、大棒与胡萝卜常常诱发高强度劳动。那些在最脏的地方长时间劳动的人得到公开表扬。那些没有达到高指标的人公开受辱。一旦劝勉失败，毕生都依靠履行诺言的领导人就倾向于借助更多的强制手段。

从8月23日到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水人民公社颂歌》一文。当农业部长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赞扬徐水的文章时，河北的官员们断定，他是徐水的庇护人。徐水县7个公社平均有4万~5万人。驻在徐水南梨园乡的记者报道了400个女劳力，“她们很多人穿着粉红色花布或有蓝花的白布做成的短上衣”，与600个男劳力一起，组成了一个军事化的“劳动突击队”。他们背着枪，行军到地里，先训练，后劳动，干部们喊着操练口令“一、二、三、四”，进行军事化劳动。1957年以来，徐水一直被树为全国民兵建设标兵，正如毛指出的——“军事化、战斗化和纪律化”。其后，为了准备防御战争和促进劳力动员，在全国乡村都建立了民兵组织。^④

河北全省的文化机构都被组织起来，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服务。党号召人民保卫祖国，消灭敌人。在河北南北走向的铁路干线两侧，修筑了防御工事。6月，河北文学杂志《蜜蜂》停刊。1959年12月，它改名为《文学卫士》，以适应国防建设。为向共产主义进军服务的文化政策，主要围绕宣传备战这一主题。创作不出能加强全国性备战的的作品，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刘真的《英雄乐章》由于把战争描写成大混乱并可能导致人们逃避战争而受到批判。党告诉河北人民，最高准则是壮大自己，消灭敌人。由于军事化成为大跃进的中心目标，作家欧阳山因在其作品中认为似乎存在一种共同的人性、不是通过确立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判断敌友、不能使人们更加痛

恨敌人而受到攻击。1959年，河北的作家们被召集到北京，学习如何富有战斗精神地创作，以便为战时共产主义服务。

徐水县大寺各庄把共产主义具体化了，那里办了4个食堂，“20个戴白帽子，穿白围裙的炊事员”为全村124户烧饭。在谢房村，《人民日报》记者发现一个幼儿园，“一栋又高又白的房子”里有173名3~7岁的儿童，大部分住在幼儿园。“男孩都穿蓝短裤还有红花的白背心，女孩都穿白衬衫和蓝裙子，衬衫上有彩色的花朵”。在清洁的“幸福之家”，住着12位老人，专门有人照顾他们。^⑤中国的共产主义观念与严格的性区别及极其尊重老人的传统文化相一致。

由于中国苦于缺少纺织品、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因此有关徐水县统一制服和建筑的消息造成了恐慌。农民们猜想，徐水人肯定用粮食换漂亮的布匹，做成五颜六色的套装。据传闻，这种交易将造成徐水粮食短缺。农民们担心，国家正在征用所有建设所需的私人财产，因而必须在国家没收之前抢先卖掉财产。市场上供过于求，价格猛跌，用于造房子的大木梁价格下跌90%，仅为5元。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提倡深耕、小麦亩产量达7000斤而在全国新闻中名声鹊起。五公的最高亩产量为400斤。徐水县宣布，深耕2米，每亩播种子100斤，施用30万斤肥料，再追加宝贵的化肥，亩产可达12万斤。外人纷纷到徐水来考察共产主义。

国家在全国农村组织了由1万户以上农民组成的公社。小块私有土地与大部分黑市一起被取缔。集体化的逻辑把经济控制权从家庭转移到党指派的管理人员手中，而且远不止此。在北戴河，中央委员会号召立即扩大集体组织，包括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理发店、公共浴室、老年之家、农业中学和“红专”大学。^⑥混乱和昂贵的建设随之而来。中国

能很快结束贫穷落后状况的愿望转化为政策。发展的拦路石是匮乏，它卡住了瓶颈，从资金和运输工具到熟练的技术员、现代农业科学和农业机械化中的任何一项，中国都很缺。

老兵们竭力回忆当年的动员使打败日本的战争机器和国民党军队成为可能，大部分农民回忆起土改后的丰收，心中充满快乐。历史哺育了一种信念，出现了一个热情迸发的时期，尤其在年轻人那里。

工人们被派往远离家乡的地方。饶阳把工人派到内蒙古的钢铁城市包头。在国营炼钢厂工作的农民们竭尽全力，再也不回集体化农庄了。一个120人组成的河北梆子剧团被派到内蒙古，慰问在那儿工作的数千爱国的河北籍工人。剧团在包头郊区安营扎寨，旁边是中国氢弹工程的生产点。对蒙古人来说，汉族工人流入内蒙古似乎是对他们的土地、文化和命运的威胁。国家领导人表示，汉族流入是为了缩小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差距，而把工业迁入内地，也将使中国沿海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城市受到进攻的威胁大为减轻。

河北省试图通过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义务劳动解决水的问题。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冀中完全依靠水库和运河里的水。它们是在1958~1959年动员了数百万劳力用锄头、铁铲和手推车建造起来的，遵循了毛在3月成都会议上对水利专家的批评，水利建设要调动群众积极性。^⑧乱哄哄的行动常发生意外，滥用地下水增强了土壤的盐碱度，造成了浪费和巨大损失^⑨。不久，1963年发生了可怕的大水灾。有关不利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观点，实在是言过其实。

与传统的苏联道路相比，对群众力量和智慧的依赖被表达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而苏联则错误地依靠官员和高层次技术人才的精英力量。在石家庄，干部们为俄语教师寻找别的工作。河北全省地方干部扫盲教育的学校关门大吉。8月，饶阳和其

他县的教育工作者被召集到天津改写课本，目的是消除来自苏联的不利影响，突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群众而非精英。

在饶阳易受洪水袭击的地区，虽然人们欢迎进行水利建设，但强征和派送劳力到很远的地方为陌生人干活却是无法接受的和有害的。“突击队”日夜苦干，使牲口和人达到生理极限，甚至超出极限。损失超过了所得。为了建造一座水库，以灌溉石家庄周围的平原地区，1958年，水利部的工程师们长途跋涉来到山区、石家庄以西的西柏坡村，也即召开1947年土改会议的地方。党的最高领导人住的房间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室仍保持完好。他们将和西柏坡村一起被筹划中的岗南水库淹没。村民们被蛮横地告知，大跃进将如何影响到他们。

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在西柏坡指挥战争的党的领导人使用过的家具和其他历史文物被包装好，运往北京妥善保存。上级要求村民们在山的高处重建一个西柏坡村。岗南水库淹没了富庶的西柏坡平川，政府给予的补偿很少。该县失去了最好的庄稼地，即使在10年之后，村民仍停滞在贫困之中，比土改前还严重。^⑩

在肃清谨小慎微和现实主义的气氛中，1958年9月10日，刘少奇主席来到了河北模范县、声称已进入共产主义的徐水。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及其家人一起申请公社社员资格。徐水宣布亩产达2000斤后，实行免费供应制度，所有的粮食、衣服和公共服务都将无偿供应。^⑪

狂 热 性

由于6年中全省人均产粮逐年下降1.8%，河北省提出来个大跃进，宣布每亩达到2000—3000斤的3年目标^⑫。这个长期缺粮的省份，在1957年粮食产量全国倒数第二，它从

1956年小跃进起便开始减少种植面积。1958年，官员们计划增产10倍，并讨论减少种植面积50%。期待中的丰收将为林业、果园、畜牧业和经济作物，以及学校、医院和公共服务提供资金。

毛泽东急切地估计亩产量为2000到10000斤，并建议实行“三三制”，即“种粮面积1/3就足够了，另有1/3转化为草地和森林，剩下的1/3休耕，从而把全国变成一个大花园”。^②一些饶阳干部认为，三三制的想法与苏联农学家瓦西里·罗伯特维基·威廉姆斯的观点相同，此人出生在一个姓威廉姆斯的美国家庭^③。尽管苏联对李森科进行了批判，而且1956年中国也公开评估了他的价值，但在反对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反右运动之后，斯大林式的李森科教条又在华北农村干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不遗余力地提倡密植，它被用来证明在同一物种内，个体之间相互协同因而长得茂盛。1958年和1959年，贫穷的华北农民希望，密植这类的骗局能在产量上来个大跃进。他们响应毛的号召，冒险地减少粮食种植面积。

干部们狂热地相互攀比。河北提出在平原地区组织1万户的公社，甚至鼓励组织一些1.5万和2万户的公社。省政府响应毛在徐水发出的号召，指示公社兴办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高中甚至大学。“在10或15年之内，所有现在不满25岁的人都可达到大学文化水平”。

这种欣快症（euphoria）并不普遍。毛个人认为，在河北，“35%的人基本上接受公社，但对特殊问题持反对或怀疑的态度，15%的人反对或对公社持有严重的保留意见”。他把反对意见归咎于地方领导权掌握在“富裕中农甚至坏分子”手中。^④在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之后，大家虽对庞大的集体农庄存有共同的疑虑，但说出来是要有勇气的。第二年，五公拖拉机站站站长师喜生争辩说，深耕会损坏昂贵的刀刃，把没有

肥力的土壤翻到地表。他坚决认为，强迫快速干活和用犁耕地而不加保养，会导致工作质量下降，毁坏昂贵的、不能重复使用的机械。省里领导被请来制止师对大跃进的怀疑。师被撤职，送到邻县的一个工厂。在此后 27 年中，除了新年，师很少得到批准回家团聚。

河北省行政机关作了改组，以推动向共产主义的转变。省会从保定迁到天津。为了给大规模治水工程提供便利，147 个县被合并成 80 个。华北局临时撤销。我们从饶阳的情况可以看出，组织机构的激变怎样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⑤

1958 年 3 月，饶阳县从隶属于石家庄专区转而隶属沧州专区。

1958 年 4 月 28 日，沧州专区撤销，饶阳并入天津专区。1958 年 12 月 20 日，饶阳和武强县并入天津专区下辖的扩大了献县。

1960 年 1 月，原属饶阳的东部 3 个公社留在献县，其余并入深县。

1961 年 7 月 9 日，扩大了深县解散，在 1958 年并入深县的安平县恢复建制，原饶阳县脱离深县，并入西面的安平县——除了 3 个公社留在献县以外。

1959 年，河北农业厅厅长张克让调到北京，担任恢复的华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自 40 年代以来，张一直是五公的庇护人，他有 15 年没来五公了。任凭机构怎么混乱，五公仍有一些高层的朋友，权力关系网仍很稳固。

五公上空的红旗

社部设在五公的红旗人民公社于 1958 年 9 月 9 日宣布成立。不久，更名为五公人民公社，下辖原饶阳第四区所属的四

个乡镇，共5万人。耿长锁任社长。但耿无法有效地领导拥有该县1/4人口的单位。交通运输是原始的，没有机动车辆，耿也不能骑自行车，因而他只得穿着灰白的粗布短衫和黑裤子，头上缠着普通的白毛巾，从五公的社部走到东面3英里远的邹村，或西南8英里的小堤。耿的朋友送给58岁的他一头驴子，但遭到他的拒绝。步行使耿看上去没有特权。在五公，无处不在的微不足道的腐败产生的刺激较小，但在别的地方，秘密控制资源的不负责任的权力所产生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邻近的杨各庄转向穷困的衰败过程，由于村于部的残暴和盗窃而变得更加严重。在老人们看来，清廉的耿依旧是“集市上的卖绳人”。他因廉洁而赢得声誉：别人骑驴时，他步行；别人买了新鞋时，他却补上补丁；别人向所有干部送礼（如甜瓜）时，他总是拒之门外。

公社在理论上是资源合伙、扩大劳力规模、防范大灾的一个途径。通过合并36个村庄的财产，扩充了公积金，这样就能买电力设备、卡车、工厂和挖井的机械等单个村庄买不起的东西。农村将赶上城市，体力劳动者将赶上脑力劳动者，贫困者将赶上富裕者。广泛的劳力动员使平整土地、提高土壤肥力、挖灌溉渠、修筑大坝、挖井修路成为可能。那时，机械化将有用武之地，而在农村，星罗棋布地都是工厂，不再被资产阶级科学家误导的农民科学家播种改良过的种子，研究出优良的耕种方式。

但实际上，扩大了的管理机构威胁到五公村民的利益，因为它比邻近的其他村庄富裕得多。他们在这次合并中所受的损失，要比1953年加入大社时原始合作社社员的损失大得多。8月29日，河北省在关于成立公社的指示中规定，集体农庄的财产转为公社财产，进行统一管理和平均分配。

五公公社的36个村庄改为大队；五公的10个队改为3个

生产队。耿老板所在的东村原来的一、二、三队合并为一队。老民兵徐、张脑袋、凶猛的张所在的西村，原来的七、八、九、十队组合成最大的第三生产队。原由一条小巷分割开来的两个限制乱伦的村区合在一起，处于村中部的四、五、六队合并成第二生产队，这是对现实不满的种菜户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李氏宗族势力的旧堡垒，自耕农家庭和旧水井比较多。在村中西部有一些改革前最富、势力最大的李姓家庭，从村中央分割出来，并入第三生产队。村中央 90% 是李姓家庭，东村和西村中李姓家庭占少数。

在五公村被分割削弱和心怀不满的、现称为二队的村中央，1958 年的产量比西村的三队低 50% 以上。不管如何宣传公社是组织劳力和分配收入的单位，三个扩大了的生产队其实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收入分配的主要单位。西村和东村的村民憎恨并反对在全村范围内进行分配，因为那意味着跟曾经很有势力、现在经济上落后、政治上遭挫折的村中央李氏宗族一起进行分配。

由于历史上曾有建立在邻居和宗族基础上的扩大的合作和机械化，因而若在五公村内部重新组合成较大的生产队，倘不能为大家接受或行之有效，那是行不通了。在中国大部分农村，由于缺少收入统筹和劳力组织所需的信任关系，因而规模庞大的新组织是不合理的。人为地把几十个村庄扭合在一起的大单位不具合法性，也不能形成经济规模。忽视适合于小块土地原则的手工劳动最终是要完蛋的。

不过，五公村又得益于它是公社社部的所在地。国家资源被统治机关所在地所垄断。邹村的区政府所在地资格被取消，有 20 名医生、30 张病床的县医院分院原坐落在邹村集市，1956 年开始以很快的速度搬到了五公。专区大量拨款资助耿老板的医院，这对五公来说可是条财路。饶阳县医院与大多数

农村医院一样，深受财力匮乏之苦，又无权要求国家增加财政预算，就连冲洗地板的消毒剂也很缺乏；由于没有足够的厕所，病人就在地板上小便。社会主义政策禁止私人医生开业，因此村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寻医问药。现实政治只允许报道和预测增长与成功。

1958年10月25~28日，在天津举行的河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耿长锁听到刘子厚省长赞扬“高产‘卫星田’”，1000多个大社公布的亩产量超过1万斤。1958年，五公亩产量382斤，不能获得卫星资格。后来，陪毛泽东到徐水的阎达开来到五公，告诉耿老板，“你们是模范合作社，五公必须成为一颗‘红卫星’”。也就是说，五公应该公布比别人更高的数字。但几年前曾赞同一些浮夸数字的耿，却拒绝把五公产量进行惊人的夸张。鉴于耿近年来发表了激烈反对同事们尴尬地宣布高产的言论，其为人又老实可靠，让他鼓吹高产量是困难的。阎发火了，“照此下去，三年之内，你们五公休想在报纸上出现”。^⑤

威胁变成了现实。政治立场是获得宝贵国家垄断资源的一个依据。在1958年初至1960年春的两年中，五公在省和全国性报纸上消失了^⑥。耿长锁仍保留其全国著名农民干部的资格。1958年11月，耿与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又一起当选为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河北代表^⑦。

在这位五公在省里的最主要的庇护人林铁看来，跃进意味着推动农业现代化所包含的“四化”，即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肥沃化。国家资源应服从于实现这些目标。在宣传部门重点突出自力更生的同时，国家机构又向关系密切的地方倾斜。林铁悄悄地另外拨了200万元给五公，以修建一座电站，扩大拖拉机站，建造一个日产40万块砖的砖瓦厂，创建一个农具修理厂和运输队。当毛号召中国知识分子撰写村庄、家

庭、公社和工厂中劳动人民的历史时，天津南开大学派了90名学生到五公公社，他们从8月至12月底，天天与村民们住在一起，白天在地里一起劳动，晚上一起促膝谈心。

其中一个学生叫邹志远，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的教授。公社成立时，他曾到过五公。邹的结论是，五公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它的发端，合作社创建时，干部们相对来说是诚实和勤勉的，这暗示着对大部分农村干部的否定评价。在五公时，邹参加了植树，这是全国性植树运动的一部分。种在路两旁的树就是木材、收入、防风林，它使农村变美了。他看了灌溉沟渠和平整过的土地，由于很多男人都参加了劳动突击队，村里很安静。

邹注意到，五公很难让周围的村庄接受他们的领导。无论他们怎么干，这些村民都赶不上，如果发生旱灾，五公能指望由国家资助挖的几十口深井里的水，而其他村庄仅有两口浅井。这些村子羡慕和缺少五公这样的领导干部，他们团结，而且最重要的是五公的公积金及与国家的关系。其他人说，五公有这些是因为它起步较早。他们无法模仿模范村形成过程中的大部分经历：由于领先而得到国家的奖励。因此，向模范村学习的号召听起来很空洞。

1959年，河北省政府派一支由作家王林和武森林带队的历史编写组到五公，秦征负责编写大纲。20万字的稿子写成了。^④宣传机构中掌权的教条主义者却禁止出版由南开历史学家和河北作家们所写的有关林铁模范村的历史。

剥 削 劳 动

在大跃进期间，人们夜以继日地从事苦不堪言的劳作。1958年，五公公社征募了数千人，修筑村与村之间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主要土路。各生产队遵守军队纪律，听从“总司令”

的命令，他按照“战略部署”到处差遣人。这项工程忽略了公正的分配、群众的支持、所能忍受的身体极限，以及各单位之间的冲突。只要计划中允诺给各个村庄带来直接好处，那么低工资和肉体上惩罚性的劳动，便不会产生无法克服的问题，今后会以较高的生产能力和收入作为回报。但在许多地方，当地获利甚微。大跃进运动许诺扩大合作，可在激情昙花一现后，过度疲劳和备受辛苦的人们又转向了内部自我保护。这样，不信任和地方观念又加剧了。

1958年，参加五公公社组织的工程劳动的人，每天的报酬是0.2元，同年，五公村一个劳动日也从3年前介于0.71~0.8元之间，下降到0.49元。1955~1959年间，劳动的天数翻了一倍，可人均收入却在下降。国家无节制和无偿地使用劳动力。1958年9月，五公和其他村的劳力向西跋涉几公里，到桑园挖灌溉渠。是年冬，五公人又开挖了1980米的灌溉渠和15口井。水泥管取代了竹管，放入越来越深的井里，水却似乎在消失。

宝贵的资源被零碎地消耗了。当时的报道称，1958年，中国建造了6000万个社办厂，每个公社在一年中约办了125个新工厂^③。无论数字怎么夸大，劳力和物资总是紧张到了极限。宝贵的资源被浪费了，产出的价值却很少，财富流失了。在最穷的地方，破坏也最剧烈，公积金几乎不用于生产。

1958年8月和9月，毛特别关注中国的钢铁行业的工业化运动。农民们建造了100多万座粗糙的鼓风熔炉，即西方人都知道的“后院钢炉”。9月初，2000多万人加入这个运动，最后共达9000万人。^④ 饶阳的每个公社都得到命令，派200~300个男劳力去炼钢。9月，五公村派了45人到东面145公里的泊镇去炼钢。人们自带工具，没有任何解释，他们回家时，马和货车都留在了工作场所。五公中学也造了一座原始的鼓风

炉，积极分子们收集“废”铁和钢来熔炼。国家从城里派工作队到全国各地农村，强迫农民们投身于那种浪费。五公农民被迫上交大致没用的铁铲、破饭锅、破农具以及所有能放进炉子里熔化的东西。在别的地方上学的五公学生被迫说服他们的父母捐赠原材料。在许多村庄，所有锅盆都熔化掉，通常连全村惟一的煮饭工具也不例外，它是专为重要仪式的宴席而准备的。饶阳的青年学生被派去寻找建造炼钢炉的砖头。残存的破庙又因有砖而遭破坏，饶阳古老的城墙也被彻底拆除，就连校舍的砖墙也被抢得破破烂烂。当燃料缺乏，以至没收稀少的木料、有用的门板甚至贵重的棺材时，河北农民的心凉了，并开始疏远。由于把阶级斗争吹嘘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途径，因而在许多村庄，过去的富裕家庭的祖坟遭洗劫。砖头用于建造炉子，棺木作燃料，炼出来的低质量的钢铁当然是废物一堆。

运动高潮恰好与秋收同时。地里需要劳力时，炼钢运动却吸引了几千万熟劳力。熟练农民去炼钢，收割与冬小麦的播种任务却留给没经验的劳力去完成，其中很多是妇女。1958年，由于气候特别好，创记录的丰收就在眼前。张克让告诉我们，1958年亩产152斤，是河北在1952~1961年这10年间达到的最高记录。可饶阳与许多地方一样，有这么多劳力被派到别的地方，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粮食留在地里腐烂。由于没有经验，弱劳力不能完成秋收任务。结果，1958年歉收。这不仅预示着在金钱、舒适和燃料上锐减，而且越冬夏熟作物也因种子不好而产量下降。这还预示着雨水充沛的南方稻米产区和北方内地将有一场大灾难，因为这两个地区都一样，劳力组织不合理。

到了10月，食物越来越少。很显然，群众性炼钢运动是一场浪费极大的灾难，在两个月之内，熔炉即被放弃，毛在党内对没有调查就发动这场运动作了象征性的自我批评。这一不

合理的群众运动停止了，可是混乱还在继续。农民们被迫开展深耕运动，他们照例用铁铲在一小块土地上把夹有沙土的粘土挖上来。而这种土壤要3~5年后才能变得肥沃起来。这是折磨人的苦差事，平均每天挖0.1平方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已完全没有缓慢地一步步努力的耐心了，现在就需要成功。河北的刘省长发起了一个“突击种小麦”的运动，并向农民们担保，往年每亩100~300斤，而1959年的产量至少1000斤。刘的口号是“学河南，赶河南，争第一，勇向前”。^⑧刘指示农民们，有些田地要深翻1.8米。尽管挖到地表的生粘土没有肥力。

1958年秋和1959年春，五公和相邻的园子村都集中劳力进行“突击”。数千名男女劳力在地里挥锹，他们夜以继日，把五公2000亩硬如岩石的土地深翻0.45米，有的达0.9~1.5米。还调集了邻村的青年民兵来到五公，帮助先进村进行深翻，共干了两星期。这种征调劳力引起了深深的不满，于是耿长锁终止了他提出的空洞计划，让他们回家。在这些年轻人看来，耿老板看上去是个诚实的传统农民。他跟他们打招呼，向他们表示感谢，甚至和他们一起坐在地里，吃普通的午餐：馒头、咸菜和汤。

五公村技术员周元久没有为大跃进进行辩护。他后来说，以前耕地0.21或0.24米，对玉米和小麦是不够的，它们的根长到0.45米，深耕可让根往下长，叶子长得更好，有利于灌溉和提高产量。最后，五公每5年使用拖拉机深耕0.45米。

国家提出“合理密植”的要求，使受灾程度比1956年更大。五公每亩产棉最高为74斤。为了达到高产1000斤，他们每亩种了5000颗种子，甘薯每亩达2万颗，玉米为1.2万颗。结果，庄稼也深受相互偷吸营养成分之苦。后来，五公干部们认识到，只有适度密植才能提高产量。

大跃进激发出了广泛的积极性，但有个领域却被彻底根除了，即商业和与之相关的家庭副业。1958年，天津在小商人和商店主中发动了进攻“资本主义自发性”的整顿运动，消灭了已遭挤压的企业和服务行业。服务业衰落或消灭了。^③在全饶阳县，织布和织口袋的家庭纺车闲置起来。新衣服越来越贵，旧衣服越来越破。妇女们的技能荒废了。

上级要求每个公社自力更生，以满足基本需求。这样，商业单位只要在社员中分配本公社的产品，而省却了各地之间的买卖。各地都铺张浪费地生产，而这些产品本可以在别的地方买到，质量既好，价格也低。一种新的承包制减少了货币交换，它与陈伯达在1958年提出的消灭商品生产的号召如出一辙。^④消灭了商品和货币，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就越来越快。多功能的公社在理论上将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那怕是滚珠轴承。可实际上，关键性的缺口扩大了，生产蒙受了损失，文化生活必需品无法满足。

邹村集市的盛大春季庙会，曾经每天吸引两万多人到此，现在也被迫关闭。庙会被当作“封建文化”现象而遭禁止。当私有小块土地消失，摊贩和手艺人被并入集体单位，货币也不再在乡村流通时，定期集市便萎缩了。在华中和华北的落后山区，破坏市场的情况最为严重。干部们通过急进地摧毁副业和市场，来表明对毛和公社的信仰。这些贫困地区产出的微薄公积金被白白地浪费掉，粮食吃完了，人们也筋疲力尽。由于当地市场被取消，要走到一个工厂、中介市场或行政中心，去获取盐、布匹和紧缺经济物资等任何东西，都需要5天时间。

1958年底，派到河南的调查人员发现，所宣布的亩产7000斤粮根本不存在。更糟的是，他们发现了官员们如此热衷于竞相向国家售粮，以至村里几乎没有余粮了。到1959年1月，许多地方已没什么可吃的了，要到春末庄稼才能收割，

而且胡乱播种的庄稼产量极低，于事无补。乞讨者开始潮水般地涌向河南的城市。就在新闻界吹嘘特大丰收的同时，到河北徐水公社访问的人发现，这里同样存在粮食短缺和饥馑。逃到城里的农民披露了大量死亡的人数，而且情况还在发展之中。

尽管当时毛也对浮夸的口号感到怀疑，但没有一个人敢揭露国家的灾难性的教条主义政策。政治气候不允许对标榜为左派、先进的、社会主义的东西进行任何批评。受到批评的是右派分子、反对进步的敌人和反动分子。认为社会主义是超越发展阶段，就是站在所有旧的邪恶势力一边。指出经济不合理性、衰退、灾难和饥饿的每一个人，将因窒息建设一个美好未来的活力而被指控为向群众热情泼冷水，被迫作自我批评，或遭受更严重的侮辱和虐待。到处都在散播着有关近来反右运动的传闻，基本上每个村庄都有像五公拖拉机站站长师喜生或挨饿的李大林和范淑芳这样的牺牲品，以及像养家糊口的李沛琛这类十足的替罪羊。呼吁关注造成饥馑之事实的人，只能使自己或其家庭成为牺牲品，遭到同样受侮辱的命运。政治语调传递出丧钟，乡村一片沉寂。

在悬崖上

那些驾驶社会主义特别快车的人，不是拼命地刹车，而只是开得稍慢一点，仍在危险地歪斜着疾驶。12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由6000个先进村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耿老板为主席团成员。耿与穷棒子合作社的王国藩及陪他到苏联去的李顺达一起，听取了关于整顿公社问题的新决定。12月，毛同意从悬崖边退回来，允许某些商品生产存在，归还一些自留地，鼓励养猪，限制国家投入，采用某些把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与报酬直接挂钩的责任制，但这些动议既没有取得政治优势，也没

有形成制度，因为没有发动实施这些提议的运动。庞大的组织依然如故，华北很少有农民拥有救命的自留地，它们大多数已在1958年被没收。毛不同意中国进入世界粮食市场购买救荒粮。官员们继续宣传像徐水和河南这些快速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地方。大跃进猛烈地冲向悬崖绝壁。

1958~1959年冬，运动并没有停止，人们被迫去平整土地和挖井，男人们则被派往大的建筑队和水利工地。在五公，夜里上工有夜餐吃。五公种了400亩甘薯，正好免于挨饿。但到了春节，当村民们按惯例清点分红时，发现自己已陷入困境。虽然保证了最穷的农户也能吃到饺子（通常是用高粱面代替小麦面做的），但吃肉馅饺子的人家却很少。

不过，受惠者必须表示忠诚，模范村应增加售给国家的粮食。1959年4月，34岁的民兵队长张端担任村支书，在他的领导下，五公卖给国家18万斤粮食，是历年来最高记录的两倍。在1959~1960年那个饥饿的冬天，村里的储备粮吃光了。当时是于得越多，收入越少。公社成立时，干部们清理了所有私人的储备粮，现在农民们已颗粒无存，一筹莫展。

杨各庄和其他邻村灾情更重，粮食亩产量降至100多斤，低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平均水平。在10多年时间里，杨各庄一直停滞在不幸的1959年水平上。一般说来，土壤贫瘠的最贫困地区复苏时间最长。受打击最严重的是河南和安徽南部与中部这些地区的农民们，他们的儿子为了革命胜利而流血牺牲，他们希望毛的密植、废除市场和劳力动员的政策能把他们从贫困中拉出来。

刘子厚省长宣布，河北省1958年秋收打破了历史记录，粮食产量达450亿公斤，是1957年大丰收的两倍多。棉花的统计数字更为荒谬^③。相比之下，1958年五公产粮看上去少得可怜。徐水和保定附近的其他模范县均声称产量增加了5倍，

并许诺明年再翻一番。^⑥无论产量有多高，河北省却没有能力去收割、保管或分配它，从而变成了灾区。实际人均产量从470斤降至404斤，而且这个数字还掩盖了仅靠晚甘薯来避免饥馑的真相。人均粮食产量（甘薯除外）从402斤降至264斤的挨饿水平。特大丰收的口号掩盖了一场灾难。^⑦1/4世纪之后，河北还没有达到大跃进狂热的第一年所提出的人均产量1000斤。事实上，实际产量下降了，耗尽了资金和劳力，人们只有挨饿，成了厌倦的玩世不恭者，最初的热情消失了。

1959年，国家降低了1958年夸大了的全国生产要求。可河北的官员们仍坚持1958年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比1957年增长23%和12%，虽然不像刘省长又一次提出的增加5倍和15倍那么多。河北的收成实际上下降了。^⑧

中央政府采取折衷的办法，它不提日益严重的饥荒，却告诉农民们要节约粮食，并建议地方干部批准农民拥有一些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不过，国家还强调，农民要交粮食税，按夸张的上报数字售粮给国家，恪守建立在不可能那么高的产粮数字之上的指标和义务。^⑨

关注粮食产量——几乎是国家公布生产状况的惟一方式——就能掩盖一场灾难，即使上报数字是准确的也罢。五公在1959年上报了创记录的亩产量为430斤，不过与1957年的57元相比，人均收入才46元。在收入减少的同时，农民们元气大伤，固定资产从1957年的7.3万元降为1959年的4.7万元，牲口死了，机械也损坏了。国家要求更多的投入和更高的售粮数目。干部们被迫吹嘘更高的产量，压制空粮仓和空肚子的消息。

面对缺粮的冬天和不可达到的指标，地方干部们命令浑身无力的人们去种庄稼，而这些庄稼既能使他们活下来，又能被等同于粮食而作为预期的产量上报。饶阳派人去学习保定专区

种甘薯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其发源地徐水县。农民们还听说，在河南砍掉了其他庄稼种甘薯。1959年夏，在饶阳玉米和其他庄稼长势良好的村庄，干部们命令社员们像这些模范地区一样干。当为了种甘薯被迫砍掉好庄稼时，妇女们嚎啕大哭。由于种得太晚，甘薯通常只有手指那么大。粮食危机更严重了。一些饶阳农民躺在地里，拒绝干活。一些人反复地说，“人骗地皮，地骗肚皮。”

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最后试图让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对日益加深的灾难。在1958年冬天，回湖南老家的农村地区考察时，彭在一首诗里写下了他的想法：^{*}

谷撒地，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彭在庐山指出，毛特别赞赏的河北典型徐水公社出现经济滑坡^①。虽然许多领导逐渐与彭一样对大跃进深感忧虑，但当毛向彭突然发难时，大多数人或保持缄默，或加入进来。毛宣布，停止还是继续大跃进政策的问题，是“两个对立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生死斗争的继续”^②。彭冒着被划为阶级敌人的风险，与毛进行争执。在庐山，除了彭之外，还有几个人进行这种冒险。说出真相就惹祸上身，因此，饶阳人常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

* 这是一首民谣，是彭总和平江做调查时，一位伤残的老红军递给他的，并非彭总所写。最后应还有一句“请为人民鼓咙胡！”——译者

毛剥夺了彭德怀在军队、党政机关的高级职务，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然后毛让林彪接替彭，担任国防部长。像彭一样，原华北局的成员们因犯右倾保守主义而受到批判。试图检查大跃进经济不合理性的河北农业厅官员同样受批判。毛不是从悬崖边撤回来，而是做出了继续向前、执行教条主义政策的殊死决断。

1959年9月，毛对河北刘子厚省长提出的卫星田大加赞赏，卫星田就是把公社10%的土地精耕细作，以期获得高产^②。这一年中，毛无视农村发生的饥荒，又一次下令削减种粮面积，共减少了1250万公顷，占总面积的9.5%。大跃进的急先锋河南省减少种粮面积达14%。^③1959年河北省削减7%，而自1956年以来，总共削减了130万公顷，占种粮面积的14.5%^④。

1959年，粮食短缺日益加剧，原因是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的粮食创下了记录，达6650万吨。虽然1959~1960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15%，但国家征购的粮食却比1958~1959年多32%。^⑤

已赞成从教条主义做一些后退，并赶到庐山为现实需要而进一步公开作出让步的毛，在批倒了彭之后，现在又突然命令干部们继续贯彻教条主义政策。这意味着废除自留地，消灭家庭养猪、鸡和鸭，征募更多的劳力到大型水利工地，创办更加集体化的公共食堂，总之，要推动“农村中激烈的阶级斗争”^⑥。全国都被迫按照仍在吹嘘其荒谬成功的河南省遂平县最早的卫星公社的模式向前跃进。

那年冬天，河北怀来县农民没办法，只得吃树叶。在石家庄附近的山区，人们不再干活，甚至屠宰牲口以吃饱肚子。可国家不是去战胜饥荒，而是把中国农民推向悬崖。

小型文化革命

与 30 年代一样，经济衰退使家庭丧失了传统的支配行为道德的能力，宗族和村庄开始脱钩，家庭内的争斗变得更加险恶。人们用“穷架”来表示可怕的斗争。家庭关系疏远，许多家庭破裂了。这一回使农民更加不幸的是国家发动了一场针对大众文化的斗争。在大跃进期间，陈伯达和其他教条主义者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它与列宁提出的战胜亚洲农民头脑中的“中世纪残余物”的口号相关。充满封建迷信的头脑将被社会主义伦理观念和科学所取代。为了解放生产力，陈发动了排斥和消灭宗族的运动。^{④7}

1958 年，原来改为医院的献县天主教堂现转变为工厂。日本人以前就曾褻渎了教堂。中国的爱国者们自我辩护地告诉我们，就在石家庄北面的正定，日本人无恶不作，砍下了巨大的青铜菩萨的 42 只手臂并在天津的一个工厂里把它们熔化掉，做成了子弹。

1958 年，51 岁的保定罗马天主教神甫彼得·约瑟夫·范学延阁下被逮捕并判处 15 年徒刑。范神甫是 1951 年梵蒂冈委任的最后一批中国牧师之一，因其在思想上继续忠于教皇而成为阶下囚。^{④8} 饶阳境内幸存的道观和佛寺被拆毁。在饶阳北部的一个村庄，三座残存的寺庙（一座佛寺、一座土地庙、一座敬奉战神的关帝庙），均在 1958 年的炼钢运动中被拆毁，寺庙的木墙和木椽都变成炉中灰烬。

大多数信徒在家中进行仪式活动，因而可把家庭定义和解释为免遭国家干涉的神圣的保留地。一些老人为了烧香膜拜，执拗地走到寺庙原来的所在地，而治安部队则经常把这些人撵跑。在一些村子里，有儿子牺牲在八路军部队中的老妪们感

到，她们有权反抗任何胆敢向其公开膜拜挑战的人。掌权者常常是最迷信的人，却也是最不易因仪式公开的不利后果而遭受攻击的人。当饶阳县一位公社书记的父亲去世时，儿子请来了道士，让其挥舞着仪式上用的剑，超度死者的亡灵。1959年春，党号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早晨吃了饺子之后，农民们照常干活，庆祝新年的两周假期、向老人致敬以及其他传统活动也被取消。

五公村干部们仍按照传统的伦理规范来办事。有5个女儿的李老汉在大跃进开始时去世，当时他咕哝道，“要是有个儿子，那就好办喽”^⑨。现在，全家收入只靠有6个女儿的寡母，她从未挣到足够的钱为女儿们买合适的嫁妆。由于国家执行减少货币流通的政策，抚养孩子的寡母身无分文，要不是当地干部帮着解决学校课本，在过年时提供新衣服，使其和同学们到店里去时也用一分钱买块糖，就要蒙受羞辱。

村里为李老汉的女儿提供了福利。耿老板曾与他的母亲到佛寺膜拜过，并深受没有仪式的婚姻之苦，他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压力。可自1948年以来，他始终忠实地执行党排斥宗教和清除农村文化中有害成分的政策。不过，耿帮助失去父亲的姑娘们找到了工作，其中两个成为部队军官，一个在合作社药房工作，第四个做了年轻的村干部。利用权力阻止家庭分裂，体现出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家长。但在一个既不团结也不富裕的村庄，干部们就不能阻止家庭破裂的趋势了。

由于饶阳县实际上无法承担其费用，传统文化又受到攻击，县政府便从内蒙古召回了县剧团。饶阳没有能力养活整个剧团，只得遣散了3/4的演员。在蜜月时期恢复的、群众十分喜爱的河北梆子几乎消失了。而在河间县，当地人引以自豪的是，至少他们保存了这个戏种。

五公村干部们未曾设法对手下的村民们说，他们是倒退的

封建反动分子。虽然当地信用合作社停止对婚丧和节日庆典的贷款，但文化问题只被描绘成经济上的大跃进。1959年夏，五公村支书张端召集村民们，讨论从田里迁移坟堆的问题，他提出把坟迁到一个公共地点，即村子南边、最初有90座坟的南李宗族公墓。凶猛的张坚决认为，迁坟既能保持对已为他们做了许多的党的信仰，又能让他们自救。革命意识能够产生出财富。平整更多的土地，就能改善灌溉条件和机械化耕种。张建议把棺木用于生产方面，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用它，因为坟墓的气味渗到棺木里去了。当然，没有要求妇女去挖坟，死与阴、女性联系在一起。为了获得哀号中的吉祥气氛，妇女的污秽必须有男性（阳）的活动进行平衡。

张先邀请村民们迁移祖先的遗骸，后来他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可众人缄默不语。他要求，如果大家同意迁坟，就举手。每个人都举了手。但民主程序是表面文章。就连村里的实权人物也闭口不言。几乎每个人（尤其是老人）都存有疑虑。但党已决定了。

五公村较大的宗族都有自己的坟区。族长们经过讨论，反对迁坟。3天后，张端毫不犹豫地挖走他祖父母的遗骨，放在一个小木箱里，用车运到南李宗族的墓地安葬。在党的压力下，各个宗族最后都同意不反对迁坟。18亩北李宗族的墓地被平整为耕地，部分南李宗族的墓区被分配给其他宗族。每个家庭继续把死者与本宗族成员埋在一起。

墓区的重新划分伴随着权力的变迁。衰败近百年的北李失去了它的墓地，在本世纪权势受到打击的南李，也失去了它垄断村里最大墓地的权力。墓区风水最好的地段分给了耿氏、乔氏、杨氏和张氏这些在革命中获得权势的宗族，还有北李宗族。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父亲和祖父埋在什么地方，但许多人无

法确定更早的祖坟。在迁走新坟后，土地就被推平了。各家自己决定迁走多少代祖坟，可一些性急者懒得迁坟就把土地平了。

为了说明阶级斗争如何产生财富，耿坚决认为，就连死去的富人也使活着的村民过着贫困的生活。他说，较富裕家庭的坟墓用了很多砖，大约2万块，就像一栋普通房子一样。当村民们对用破损的坟砖造房子畏缩不前时，村干部下令把砖用于水利工程。这太令人气愤了。有位寡妇的女婿是个部队军官，他威胁说，要把耿的命令主义陋习报告上级组织。但耿指出，寡妇本人也举手赞成把坟砖用于经济生产目的。这位军人被空洞的民主形式挫败，最后便不干预此事了。

到1959年底为止，通过迁坟而增加了60亩耕地。但还有很多坟墓散落田间。老人们反对迁坟。^⑤ 干部们希望用压力和对财富的许诺，最后能将所有的坟墓迁到公墓。在饶阳的其他村庄，挖坟现象极其严重。强制手段逐渐破坏了村庄。由于农民们应为共产主义劳动，而不是物质刺激在起作用，因此未向农民提供补偿，便从田间迁走祖坟。有些村干部简单地命令坟堆必须推平，其他干部则整理他们自己祖坟周围的墓区。有些家庭为了抢救财产，干脆挖出墓穴，把遗骨处理好，棺木用作柴火。许多人千方百计重新把父母葬在木棺里。一些愤怒的家庭坚决要求保留他们的祖坟。有几个家庭公开说，谁敢搬他们的祖坟，就杀死谁。为了反抗强加的文化蹂躏，农民们只得依赖传统中比较狭隘的暴力因素。

传统包括肉体的虐待，男性家长把鲜血淋漓的毒打看做对不服从的惩罚。饶阳汉子们说，“好面是揉出来的，好老婆是打出来的”。村里的社会关系仍充满着暴力。就在1959年春节之前，李小狗和一些初中同学一起逃学。那可需要勇气。父亲听到无故旷课的报告后，有可能把孩子打得出血。^⑥

李小狗逃学到邹村集市去买做爆竹用的硫磺。在回五公的半路上，他爬到树上，打开包着的硫磺，但它从他手里掉了下来。当他下树拾起它时，包裹在他手中爆炸了。他的同学跑去找老师，老师跑到出事地点，把他抱到刚从部队回来、曾学过救生的张平那儿。张把杀菌剂敷在手臂上，用绷带包起来，并把他送到简陋的饶阳县医院，在那儿炸烂的手臂被截去。

村民们帮助李小狗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老师们在他的手臂上装了钩子，这样他就能翻书。他试着用钩子和嘴使用工具。几十年来，李成了一个能干的修理工。李小狗的妻子是一个头脑迟钝但能做家务的妇女。李家抚养着两个健康的孩子，带着一点点与中国文化准则相符合的面子和自尊继续生活。

复兴的传统准则带有宗教形式。伊斯兰和武术仪式的门派在邻县广为流传。在饶阳，一个秘密的宗教门派在扩大，它综合了道、佛、儒三家的教义，大量年轻人纷纷加入。其首领姓齐，被奉为国王，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书法家，他的家人也成为次一级的王。它欢迎已婚妇女加入，但嫁到村外的姑娘则不允许加入。当地人常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该派所有的成员都必须经过入会仪式，它以特殊的祷文和仪式操办婚事，超度死者。有时在午夜，几百人秘密地聚在一起，烧香，用方言交谈，迎接救世主的降临，然后会员们一起分享一顿夜餐。为了迎接救世主的到来，会员们必须保持诚实和恭敬。一旦团结陷入崩溃，农民们便以传统文化寻找凝聚力。当犯罪四起，魔道滋长时，会员们相互支持，按伦理准则行事。

迁坟和其他诸如废止庙会、拆毁寺庙、砍掉传统戏剧、损毁中药和传统烹调器皿，强制收缩商品买卖的集市（而这些商品是庆典仪式所需的），所有这些破坏性的教条主义政策都挑拨了农民的关系。饶阳农村流传着一个特别丑恶的地方干部的故事。他用暴力挨家挨户地阻止向老人磕头，但当他到父母的

家中吃年夜饭时，其虚弱的母亲却要他向家里的每个人磕过头之后，才能吃肉馅饺子，而卑贱的儿子遵照年迈母亲的要求磕了头。村民们从这个小小的胜利中得到了满足。在很多村庄，干部们通过强迫人们在春节放假期间做苦役来整治他们。使中国文化发生冲突的文化革命已公然开始了。

放开肚皮吃饭

在毛赞扬安徽一个公社“吃饭不要钱”之后，国家号召办集体食堂，以取代团聚在一起吃饭的家庭^⑧。1958年秋收之后，五公村建了10个集体伙房，接着合并成一处，地点在原南李祠堂内，但很快有又分成三个集体食堂，各队一个。军事化的集体食堂没有桌子，没有屋顶，也没有取暖设备。在门外用砖头堆个墩子，上面架块旧木板，人们自带凳子、碗和筷子。1958年秋，由于有绝大部分男人在建筑工地劳动，妇女被迫下地收割，许多人便欢迎有大炉子和大锅的公共食堂，因其没有时间做饭。一些年轻人也喜欢在吃饭时有机会交朋友，而不再在等级森严的家庭中服从于老人。

不过，有的家庭不喜欢与陌生人在一起吃饭。反抗的家庭带着饭碗到伙房，再把饭带回家。一些愤怒的家庭吃私自藏匿的少量粮食，不愿到公共食堂吃免费的食物。在许多老人看来，吃免费饭和想吃多少吃多少，似乎是不道德的。民间常说，吃着今天的要想着明天潜在的自然灾害。“丰年要当歉年过，遇到歉年不挨饿”。对老人和病残者来说，每餐都要走着去公共食堂是十分痛苦的事，而对需要多种营养的喂奶的母亲和打盹的孩子来说，在同一时间吃饭也是十分困难的。当端给病人和老人的饭菜送到家时，已经冷了，几乎不香了。在下雨和漫长的冬天，这一切就变得更糟了。

好在秋收之后，许多贫困的饶阳农民在免费的公共食堂填饱了肚子，高兴地评论道，“这才是共产主义”。一些公共食堂还有肉吃。但肉和粮食很快就吃光了。到1958~1959年饥荒的冬天，农民们自己认为，要是他们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畏缩不前，就幸运多了，饶阳大部分村庄的公共食堂挨过1959~1960年的冬天之后就关了。五公的三个食堂办得时间稍长一点。

赞同跃进的共产主义观点的聪明人张朝可认为，五公办公共食堂是件好事。他回忆说，1959和1960年严重困难时，它们使一些人免遭厄运，不用出去要饭。但他又说，人们对大食堂从来就不认同。事实上，它们成了烧清水汤的伙房，是国家推行的贫困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与粮食免费政策相关，在那里很容易获得食物，限制很少，且没有簿记，与其他公社一样，五公公社印制蓝色的饭券，持有者可在公社的任何食堂免费吃饭。经济学家薛暮桥后来发现，由于免费供应，一些农民一直吃到“肚皮撑得鼓鼓的”，三个月就吃掉了一年的粮食供应，最后导致“全国农村社员都挨饿，在一些村庄，相当一部分人饿死了”^④。1959年初，中国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到河北昌黎县调查发现，公共食堂“与农民的习惯、风俗和思想水平不一致，造成浪费，与全国的气氛不协调”^⑤。但是毛坚持认为，让这些浪费的、令人不满的组织继续存在，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五公谨慎地设法限制免费供应，从各户分得的收入中扣除饭钱。人们依然在公共食堂吃到非常多的蔬菜，而且在经济条件恶化时，外乡人也到五公食堂来吃饭。像五公和相邻的王桥这些比较富裕的村庄，都经历过像抢劫一样的吃白饭，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被施舍给外乡人了。由大跃进造成的饥荒促使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的对立，因此农民们越来越依赖于普通的亲

戚关系。在情况稍好的村庄，宗族成员在帮助情况更糟的亲戚。

对饥荒的解释

党中央就有关如何解释饥荒的问题通知地方干部们，要求他们把巨大的灾难归咎于坏天气。一个头发花白的五公老前辈告诉我们，“天下雨了，但没有下到发洪水的地步”。国家用1960年夏苏联撤走援助来顶罪，但早在此以前，就已有人开始饿死。大跃进中的死亡人数不是1958、1959、1960年间惟一的错误政策造成的突发性和一次性错误所致，相反，它是制度化程序、价值和利益的至高点，它在此以前便已造成可怕的后果，如在1947年土改和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恐怖时期。人为制造的地方冲突被称誉为“阶级斗争”，而这种狂热行为被大加赞赏。但国家预先堵死了农民挣钱和发展经济的路径，关闭粮食市场，消灭农村手工业、副业和加工业，并推行脱离实际的大集体农庄时，一场普遍性的灾难就更有可能发生。有的人因指出饥饿和灾难而被划为阶级敌人，这些人及其家庭遭受残酷打击。百姓和干部们被迫把意见咽回肚里。

早先支持大跃进的刘少奇私下里认为，由于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了太多的粮食，结果使“人们挨饿，家庭被拆散”^⑤。不过，农民们被告知，党是无可指责的，毛与他们一起吃苦受难，他已指示厨师自己不再吃肉，按小个子的饭量进餐，不浪费一粒粮食。农村来的士兵都倾向于相信毛是最好的人。

到1959年底，五公村民被迫吃玉米秆，只有少量柴火，没有食油，人人都能吃到食油已是20年前的事了。那年冬天，地里长的、用大粪浇灌的蔬菜通常不煮就吃了。疾病与饥饿也在折磨着骄傲的五公人，一些村民私下里说，“公社不如合作

社好，合作社不如单干好”^④。一些饶阳人暗自嘀咕道，毛正在行善，但他们却没吃的。一些人回忆道，在革命战争期间，党的干部们说，他们的目标是看到人们能够吃饱。而现在，肚子却只能半饱。如果有个干部靠近正在发牢骚的农民，那么他们就会迅速地住嘴。一个粗心的饶阳农民在嘀咕说“我要当面告诉毛，我们肚子饿”之后，立即被公开批判，并开除出党。饶阳县的干部们已对大跃进的狂热性作了限制，所以情况要比最极端的地区好得多。

在情况较糟的地区，虚弱的、垂头丧气的农民留下一些干瘪的庄稼在地里腐烂。到了冬天和第二年春天，没有食物可吃，也没有医药，病人死去，婴儿和老人也如此。相反，饶阳的饥馑情况要好得多。由于缺乏粘合剂，五公的草面馒头做不起来，一到手里就散。随着储备粮耗尽，人们开始利用废物，平时瞧不上眼的食物，现在抓到就吃。前拖拉机站站长的女儿，作家兼女歌唱家师桂英去偷萝卜吃。村民们编了个小调，说明偷是合理的，“低指标，瓜菜代，谁不偷，谁活该”。饥饿的河南农民涌入河北乞讨。^⑤干部们试图记下饥民偷吃掉五公多少粮食，希望有一天得到补偿，可这一天从未到来。

很多河南游民是妇女，她们被赶出丈夫所在的村庄，这样，食物便可留给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到处都是乞讨者。在河北沧州地区，饥民们涌进火车站，希望用自己的东西换取粮票。在饶阳，一些丈夫把妻子卖掉，换回食物和钱。越是穷的地方，卖妻的数目越大。为了遮丑，妻子们被称作远亲。与15年前的饥荒一样，在一些情况最糟的地区，脖子上挂着小牌子的孩子被丢在繁华的地方，希望一些富裕的家庭带回去养活他们。如果家里的顶梁柱去世了，那么十几岁的女儿就被卖给远方出高价钱的人，以获得粮食使其他家人活下来。在50年代初销声匿迹的妓女又出现了。在饶阳，有一个卖妻案臭名

远扬，几年后，丈夫回来要求带走被卖的妻子，这个妇女拒绝跟他走，于是他到法院要求收回他的财产权。法院判定妻子胜诉。

回族抢劫团伙袭击了饶阳以北的河间县粮站。部队被派到饥荒地区，用有刺的铁丝网和武器守卫粮站，这些团伙沿着铁路线从河北跑到山东，袭击火车获取粮食。国家因此决定在每列火车上配备几名警卫。

饥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受浮肿病的折磨。皮肤表面肿起，闪闪发亮，如果皮肤受压，就不再弹回原状。因饥饿而变得虚弱的五公干部病倒了。合作迷耿秀峰带着肺结核病回到五公，早就准备“去见马克思”了。五公村把储存的宝贵的食油留给孕妇，使健康的年轻人勉强挺得过去。但病人和老人就麻烦了，按会计耿连民的记录，12个老人早早去世。

石家庄郊区农村通常比较富裕，可还是有一些人挨饿。在与山东交界处及河南和安徽南部的比较贫困的地区，情况更糟。河北饥荒最严重的是饶阳西南面的永年县和北部的霸县。农民们被迫吃平时连狗猪都不吃的东西。如果饥饿的农民不冒险吃掉饿猪和病猪，那么它们就会发狂或很快死掉。

1960年，河北的灾情最为严重。五公的产量降到每亩310斤。全村共产粮72万斤，勉强达到1959年的2/3。售给国家的粮食已缩减，可耿老板仍忠实地卖给国家2万斤小麦。1960年五公人均粮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270斤。面对饥荒，绝望的农民们转向黑市，在粮食短缺、需求过大和国家压制市场的综合作用下，粮食黑市价直线上升。

五公的穷邻居杨各庄信奉粮食第一的大跃进政策，其副业早就大大萎缩，集市也废止了，花生种植面积下降60%。从1956年到1978年，华北花生种植面积下降了30%。^⑧对杨各庄来说，取消花生和其他经济作物，就意味着没有价值产出，

没有钱用，菜里没有油。这意味着在比较适于种花生的田地里，种粮食是一种浪费。

集体化之后，由于没有钱，也没有东西可交换，杨各庄经历了长期的粮食危机。1958年，贫困的村民卷入大跃进，希望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到了1960年杨各庄深受其害，粮食亩产量勉强达到100斤。当饥荒地区需求很大、而粮食供应很少时，黑市价便扶摇直上，玉米涨到每斤8角，高粱从8分涨到6角，小米从8分涨到5角。如果还能找到小麦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从1角涨到至少1元以上，山羊的价格从15元涨到150元。一年之内，地下经济中粮食现价上涨了6~10倍，甚至更高，而人们的现金又很少。

1959年春，由于没有粮食，一些生产队向村民发放证明，特许他们去乞讨。盖着生产队印章的证明，证实持证人的阶级成分是好的，说明乞讨是由村里减产造成的。这种做法在后来几十年周期性的困难时期持续了下来。

1960年整个五公公社的平均亩产量远低于200斤。由于翻耕的土地很少，虽然糟糕的30年代平均水平也低于200斤，可现在人口却比那时多得多。这样一来，粮食危机非常严重。到1960年，中国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和猪的产量比1951年还少。由于50年代人口迅速增长，人均水平则更低了。^⑨

成千上万的河北农民沿着20世纪初开辟的逃荒路线涌入东北。移民开垦了边疆地区的土地，一些人组成新的集体农庄，以便把户口合法地迁到东北，这是惟一可把留在河北的家人迁入东北的途径。农民们在体制内或绕过它进行迁移。

商人和逃荒者在半合法的迁移过程中，把有关邻省农民拿起武器抢粮的传闻带到饶阳。过路人说，在山东历史上曾造过反的地区，政府枪决了关在监狱里的前国民党官员，声称他们谋反。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继续上报虚假的生产数字，实际在进入1960年后，河南饥荒已非常严重，因而他被撤换，被永远排斥在高干行列之外，但从未被起诉或被捕。据说在饥荒最严重的县，一些支书拒绝向村民提供外出要饭的证明，以便阻止他们逃到城里觅食和工作。支书们坚持一切都很好，不需要救济，最后受到公开审判。遂平、信阳和河南其他饥荒严重的县的地方干部被公开处决。官方的说法是，当地的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故意破坏党的正确路线，要对饥荒中饿死的人负责。士兵们收到了家信，信中描写了挨饿、家人去世和妻子被抢的情况。党向他们解释说，当地的流氓要负责，并将被处决。来自饥荒地区的外出乞讨者把公开处决的消息传了出去。乡村有根有据的闲聊似乎比上级的空洞口号更可靠。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陕西省有一位妇女，在三个世纪前李自成推翻明朝举行第二次起义的地区，领导饥民们夺粮分粮。刘少奇主席后来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应急的办法，那我们就会倒退到苏联内战时的局面”。当时，战时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曾导致农民起义的发生。^⑤

最吓人的故事从河南和安徽传到饶阳。有消息说，在饿死人百分比最高的安徽省，饥民们扒尸体吃，曾是大跃进急先锋、现在饿死人最多的河南省，可怕的故事几乎多得说不清。每个逃荒回来者都说，他所在的县经受了最严重的打击。有的说许昌，有的讲信阳，还有人说别的县。^⑥到处都流传着某地方人都已饿死，其他人则说有的村庄老人都死了。从事救济工作的士兵们发现，人们躺在地上，有的已死了，有的奄奄一息。很多人太虚弱，拿不动战士们送来的救济物品，战士们把那些有可能救活的人迅速送往医院。全国有2000万~3000万人饿死，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⑦

河北农村贫民对河南有的村庄人都死光的消息特别感兴

趣，有的人正在寻找能避难的空地。饥荒造成的损失如此严重，以至有报道说，政府设法把人口从过剩的地区迁移到饿死人最多的村庄。数百名饶阳志愿者移居他乡。过路人说，河南人口锐减的地区正改为庞大的劳改农场。一场劝导从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向西迁移”的运动，使大量人口从河北西边的穷邻居山西省迁移到人烟稀少的贫困的西北地区。在内蒙古和新疆，大多数是迁居来的汉族人。

内战中失败后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放出气球，怪风把它吹到河北平原，饥民们打开气球内的包裹，不顾一切地寻找食物。可他们只找到了传单、玩具和药品。农民们一度盯着天空，寻找划过天空投放气球的军用飞机。

但就在饥荒日趋严重的时候，国家仍在建造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纪念物。饥民们闲谈着能吃饱饭的城市居民，他们正在建造中央政府的大本营人民大会堂，它于1959年10月1日国庆节前突击圆满完工。那一天，北京举行了阅兵式，展示了大规模的军队和自己制造的现代武器，象征着共产主义如何使中国保持独立和强大。中国还展现了在1959年国际体育竞赛中赢得世界冠军的气势。获胜的男子乒乓球队被当作英雄，在新落成的大会堂受到热烈欢迎。自豪地欢呼在国际体育竞赛、军事成就和城市重工业持续发展中的胜利，它们被描绘成中国不再被讥笑为东亚病犬的证据。

河北省政府不顾日益恶化的农村灾荒，以报告上所写的1700万元的代价，开始在天津建造一座让高级官员下榻的真正的宫殿。类似的建筑在全国到处都有。天津综合大楼中有一个舞厅，内有豪华地毯，还有一个电影院^⑥。官员们带着年轻姑娘去跳舞，放映的电影中有中国人认为是色情的电影。人们嘲弄道，干部级别越高，看色情电影越容易。与其他由国家指定的稀少而奢华的消费项目一样，那些党、政、军系统中级别

较高的人享有优先权。普通农民被排斥在外。与饶阳和全国一样，在天津，权力网络使那些在国家机构中工作的人掌握了资源，它们结合得如此之深，就连大规模饥荒这样的大灾难都不能动摇它们。

注 释

1. Jean-Luc Domenach, *Aux Origines du Grand Bond en Avant*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82), pp. 148~163.
2. 胡华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166~171、174~175、177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18、324页。
3. 《河北画报》1958年2月。
4. 《花开第一枝》(1973)，第347页。
5. Wolfgang Bartke, *Who's who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1), p.246; Donald Klein and Anne Clarke, eds.,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I, pp.631~632.
6. Duncan Wilson, ed., *Communist China, 1955~1959: Polic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422.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212页；参阅 Wilson 编 *Communist China*，第424页。
8. 《毛泽东“大公社”思想初探》，《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论文》(1988年9月)，第2~6页。
9. 《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10. Domenach, *Aux Origines du Grand Bond en Avant*，p.298.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219页。

12. 新华社，1958年8月11日，《中国大陆新闻综览》（香港），1958年8月15日。
1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24、325、328页。
14. 《当代背景》，第520号，195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221~222页；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ck, and Eugen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27。
15. 《中国农报》，1958年，第19期，第1页。
16. Wilson 编 *Communist China*, 第454页。
17. 1986年10月14日，《中国日报》上的一篇报道记载了25年前在河北怀来和密云两县建造两个水库的破坏性后果。在密云，近8万人移居到别的村庄——不准他们流入城市——为服务于北京的水库让路。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一半，从1.6亩降到不足0.9亩。两县成为依赖于国家救济的不景气的缺粮县。
18.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II,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4, 40.
19. 《人民日报》1988年3月28日，第4版。
20. 《刘少奇同志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222页。
21. Kenneth Walker, "Grain Self-sufficiency in North China, 1953~1975", *China Quarterly*, No.71 (September 1977), p.55;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8, 32.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229页。1958年10月，毛认为1959年河北省在1/4的耕地面积上使粮食产量翻一番。MacFarquhar, Check, and Wu, eds.,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p.447。
23. S.V.Utechin, *A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Russia* (New York: N. P. Dutton, 1964), p.590; 有关 Villiams 的资料，我们得感谢路爱国的

帮助。

24. *Miscellany of Mao Tse tung Thought, 1949 ~ 1968* (Washington, D. C.: JPRS, 1974), I, p.149。1958 年秋，毛发现他喜爱的模范县徐水，不只是“捆绑、毒打、怒斥和抵制队长，因而每个人都害怕争论，他们已改开斗争会，给予某些惩罚”。MacFarquhar, Cheek, and Wu, eds.,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第 460 页。鉴于速度和跃进的压力，毫无疑问，拖后腿是一种比毒打和咒骂更严重的犯罪。
25. 河北省地名办公室编《河北省沿革志》（石家庄，1985），第 326 页。
26. 《河北日报》1977 年 9 月 17 日，10 月 23 日；《第四十个春天》，第 4 页。
27. Wei-yi Ma's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Language Materials on the People's Communes* (Ann Arbor, Mich.: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2) 一书中没有提到五公。
28. 《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2 日。
29. 《花开第一枝》（1963），第 355 页。
30. Mark Seld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80.
31.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II, p.114.
32. 《中国大陆新闻综览》（1958），第 1877 号，1959 年 9 月 9 日。
33. 《中国大陆新闻综览》（1958），第 1863 号，第 33 ~ 34 页；《大公报》1958 年 1 月 7 日；《中国大陆杂志集萃》（1958），第 140 期，第 421 ~ 446 页。
34. Dorothy Solinger, *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101 ~ 107、196 ~ 198、276。毛可能已开始怀疑消灭贸易和货币的后果。1958 年 11 月，他发现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工资可发。访问徐水大学的一位教授发现，每月所得的工资仅 15 元，还不够每天买两包前门牌香烟——你能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MacFarquhar, Cheek, and Wu, eds.,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p.446。
35. 《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联合出版物研究中心丛刊》，1877 - N

- (1958)。
36. 《中国农报》，1958年，第21期，第3页。
 37.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pp.133、136~137。1958年，河北大幅度削减粗粮种植面积，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了60万公顷，甜薯增加108.9万公顷。
 38.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pp.136~137。
 39.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78、279、337、345页。
 40. 联合研究所：《彭德怀一案》（香港，1968），第393~395、400页；Parris Chang, *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10~121。
 41. 胡华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188页。
 42. 《人民日报》1959年10月20日。
 43.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pp.146~150。
 44.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II, p.126。
 45.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pp.130、132、150、152。
 46. 胡华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190页。
 47. 《红旗》1958年7月16日；《中国大陆杂志集萃》第138期转载，第5~17页。
 48. Amnesty International, *China: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4), pp.50~51。
 49. 《第四十个春天》，第99页。
 50.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97页。
 51. 《第四十个春天》，第184页。关于打孩子的一般性资料，可参阅Margery Wolf, *Revolution Postponed: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5。
 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225页。
 53. 《经济工作必须掌握经济发展规律》，收入《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九（人民出版社，1980），第7~9页。
 54. 《光明日报》1983年1月17日，收入《联合出版物研究中心丛刊》82（1983），第46页。

55. 《评刘少奇视察湖南》，《中国大陆新闻综览》增刊25，1968年6月29日，第13页。
56.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第102页。
57. 有关大跃进时期河南农村生活的生动描述，可参阅刘清邦的短篇小说《好运头》，收入 *Roses and Thorns*, ed. Perry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83~101。
58. 马洪、孙尚清著《中国的经济结构》(北京，1981)，《联合出版物研究中心丛刊》CEA-86-064转载，第151页。
59.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II, p.322.
60. 参阅 Roy Medvedev, *The October Revolution* (19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xxv, xxvi。
61. 信阳农村的一位居民当时汇报说：“我刚从我出生的村子回来……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有我的婶婶还活着；她的儿子也死了……她怎么继续生活……一天晚上，一头饿得只剩皮包骨头的猪闯进她的院子，她立即关门。然后把饿昏的猪打死。当晚她剥掉了猪皮，并把它埋掉。子夜时分她便爬起来，把猪挖出来，切一块肉煮着吃。她没有给她5岁的儿子吃一口，害怕他说出去。一旦村里仍活着的那些人发现了，他们便会冲过来，威胁说要打死她。他们打她，让她交出猪。她盯着饿得直叫的儿子！妈妈，我饿，妈妈。这一直持续到 he 死。” 《白华 (Bai Hua) 在香港谈他的想法》，《东张 (Dongzhang)》，第45和46期 (1987年12月，1988年1月)，《联合出版物研究中心丛刊》转载 CAR-88-009，1988年3月4日，第9页。
62. Basil Ashton ed al.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 4 (December 1984), pp.613~645; John Aird,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China's 1982 Census", *China Quarterly*, No. 96 (December 1983), pp.613~640。在80年代，中国新闻界公布死亡人数为“二千多万”。
63. 《天津地下宫殿的秘密》，《卫东》1967年4月2日。这份红卫兵报纸出版于天津。

第十章 革命的国家

1938年，第一位秘密到五公的八路军战士隐蔽在其姐夫、东村富裕的乔万象家中，不久联系了本族中的其他人和邻居，组成一个党支部。后来，当这些宗族又与村西头的徐氏、张氏和杨氏等其他外来宗族结成同盟时，五公党支部成为国家运转轨道中的一颗星辰高悬空中。革命战争很快巩固了一种体制，它不仅通过传统的个人关系，而且还通过区域和制度结构的分布来保障特权的存在。大都市郊区的农民能够分享到中心城市如北京、天津所控制的资源，因而在闹饥荒时不致挨饿。同样，河北省石家庄山区虽然遭到经济上不合理、文化上疏远的大跃进政治的严重创伤，情况仍比其他边远地区要好些，因为它是主要的军事根据地，而军队控制着获得宝贵资源的优先权。

享有特权者与受排斥者

部队乐于从贫穷的老解放区征募忠诚强壮的爱国青年入伍，把他们分派到高度机密的岗位上，从遥远的中印边境到全国的首都北京，均有饶阳籍战士。他们的父母可以获得工分，好像儿子在家干活一样。战士们还有几元现金作零用钱。在整

个困难时期，他们还可以回家帮助父母干活。1960年，党中央终于着手解决饥荒问题，在恢复较为合理的经济政策，如把小块土地承包给农户时，政府把军属放在首要地位。

可是，如果哪个地区在这种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下降，如1958年河北省省会从保定迁到天津，那么当地居民就失去原有的地位和优势。保定失去了控制资源用于自身发展的能力，它开始从河北的头号城市（除了北京和天津之外），下降到第4位，排在唐山、石家庄和邯郸之后。由于最高的城市垄断了宝贵的资源，受宠最少的小城市得到的仅是残羹剩饭，通常只能为居民提供生活用品，比饶阳这样的穷县稍好一些。正统宣传着眼于阶级，而不是个人、家庭和村庄，它认为应当按照官员所在的地方和网络的结构等级制度提供机会。

鉴于林铁的关系网在河北省有很高的地位，五公村在大跃进饥荒中所受的灾难便不像邻庄那么严重。1959年，当饥馑日趋严重时，五公村依靠林铁的资金建成了一个发电厂，以此来庆祝人民共和国诞生10周年。一些家庭用上了电，几个家庭有了稀罕的收音机。成串的电灯为突击队夜间干活提供照明。

4名青年组成一个放映队。他们用自制的幻灯片进行政治教育。为了放映露天电影，在村北专门建了一个梯形看台。当种植新的作物对五公公社有利时，在大跃进期间遭破坏的中草药迅速被取代。五公村有两个80和300千瓦的小发电厂，林铁提供的庞大的大跃进资助使建造发电厂成为可能。它是该地区第一个享用电力方便的村庄。三名经过特殊培训的当地技术员维持发电机的运转。有了电，便能用机器进行粮草加工，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用来抽水浇灌农田，带动村办工厂的机器。对于受惠者来说，即便在困难时期，生存机会也扩大了。

徐树宽抚养的最小的孤儿李孟杰参了军，躲过了当地的饥

荒。师桂英的父亲挨了批，被调出五公拖拉机站，可她仍能从她受国家恩宠的五公村的地方关系中受益。她被安排到幸存的饶阳剧团，后被送到富饶的天津，在河北艺术学校进行短期学习。

1958年2月，耿老板的大儿子德禄因政府千方百计削减开支而从北京下放回乡。1959年10月，他成为发电站的几个负责人之一。而在一年前，他已作为放映队员恢复领取国家工资。1958年，德禄的妻子林清英成为安国县农业银行的一名正式职员。第二年，林清英调到五公，在农业银行饶阳支行当会计。往好的地方调需要关系。人们设法紧紧抓住国家阶梯中最高和最受惠的梯级，甚至不惜以家庭分裂为代价。就连村里的卡车司机和村办厂工人，也想方设法调到国营农场工作。国营农场持续亏本，可国家却拨款弥补损失，并向农场职工提供免费住房、医疗保健、少量的现金及退休金。

五公在政治上强大的一个原因是，邻居和宗族关系已形成一个建立在个人权力网络之上的、稳定的、全村范围的联盟。相反，在被国家发动的各种警戒运动（Vigilante Campaigns）弄得四分五裂的村庄，仍停留在软弱无权的地位。那些处于底层、深感不平的人，只能以忌妒和蔑视的眼光看着统治阶层中等级较高的人。

1960年春节，当饶阳农民敬祖时，大多数人没钱买爆竹。死气沉沉的市场上，再也没有使人们感受节日快乐的各种精美的东西和娱乐项目了。几乎没有人吃上肉馅饺子。生活已陷入穷苦之中。

1960~1961年，为了重振经济，统治集团放松了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可人们仍按照国家建构的关系进行贸易，这些关系对某些人有利，把其他人排除在外。在金字塔式的指令性经济中，首都北京可以征调全国的粮食。现在的河北省省会天津

则能从全省调运粮食。所有商品，从细粮到书本、自行车，都在准确的等级关系中按照跟中央的接近程度进行分配。

当城市居民抱怨他们没有足够的细粮时，只能吃甘薯的饥民们愤怒了。在1960年那个灾难性的冬天，就连北京人也只得采用传统的方法应付饥荒，如剥树皮。为了减少食物的摄入，政府指示城市居民躺在床上，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

农民们议论着城里人不道德和不配享受。饶阳人回想起清朝时流传的顺口溜：“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乡民们重又说起保定人叛变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并遭人唾弃的故事。

饶阳饥民们强压着怒火，看着公社信用社干部在收割季节骑着自行车下乡，然后下令用卡车把粮食运去完成定额或还债。他们抱怨道，干部们拿走了所有的东西，留给他们的仅仅是残渣。

头场还贷款，
二场交征购，
社员分配在最后。

银行收回所有到期应付的债款，而如果没有留给农民们足够的粮食过冬，那么乡村只得从国家手中购买返销粮。农民们失去的是质量上好的小麦，得到的却是高粱，甚或红薯干，将之加水做成食之无味的窝窝头，能使喉咙酸得可怕，把胃烧得疼痛难忍。以前只有在没办法的时候，农民们才吃薯干窝窝头。^①现在就连河北的城市居民也不得不吃窝窝头了。

有粮食的农民们对到乡下找粮食的城里人拼命要价。城里人用5尺布票换一斤粮票。一些出生在四川和湖南的随军家属来寻找红辣椒，她们来自于由于热衷跃进而遭到破坏的保定。

她们回城市后，诅咒辣椒的黑市价太高，已从每斤5分猛涨到5元。农民们用他们的粮票去换手表和其他名牌消费品，他们认为这些商品都被享有特权者所垄断。他们的商标意识很强，商标被当作国家等级体制中身份高低的标志。几乎每个人都能对质量上乘的香烟、自行车和收音机的牌子如数家珍似地脱口而出。少数农民甚至拒绝把粮食交换或卖给任何拿国家工资的人，声称他们只同与他们相同的普通人做生意，宁愿少赚一点。

尽管以社会主义反对迷信的名义进行了长期斗争，并宣称实行“城市无产阶级专政”，可农民文化仍以最传统的方式具体化为意识和行动。进村的外地人仍被当作陌生人和不公平的根源来看待。公社干部们生活在一个单独的居住区，几乎很少到农民家去或住到农民家中。当饶阳籍人被迫悄悄地坐在一边，以便不让别人取消他的乡音时，他们仍感到羞愧袭人。当年轻硬汉、尤其是那些退伍军人反抗治水干部引水淹没村庄时，他们以村庄的中坚自居。到处都在传说是城里人寻找食物导致物价上涨。

农民们依靠自己的智慧求得生存机会，这与耿老板的办法有着重大区别，后者的目标是加强与国家的至关重要的关系。耿老板通过顺应国家需求来为其效力。五公村声称，1959年的产量比1958年增长了65%，可在1978年我们看到会计簿上明明写着仅增长了13%。在持续饿死人的农村饥荒中，就连受宠的五公村民也喊着要求国家救济。再来一个荒年，非但鸡蛋、猪肉和食油几乎买不到，而且日常用品、粮食和蔬菜也供应短缺。耿的领导班子把生活需求压到最低点，以此为步步紧逼的国家服务。

徐树宽力图压制痛苦和觉醒的呼声。她说，“与1943年相比，我们进了天堂”，那时她与其他人去要饭，被迫卖掉孩子，

眼睁睁看着心爱的人饿死。其他干部也做了比较：过去政府漠不关心，家人生离死别，而现在政府免除捐税，把粮食分给农民。^②村干部们把村里的情形比作到佛寺里祈祷。祈祷者们得到答复，没有人会饿死。耿老板对村民们的请求置之不理，他们要求把因严寒而没有正常发芽的40亩没有灌溉条件的棉田改种谷物。可他坚持要忠于国家，他说：“国家计划是种棉花，即使产量不高，我们也得种好它。”

为了有助于平息愤怒，五公村的干部们盼望着国家奖励。他们告诉村民们，如果他们努力干活，挖掘新水井，用新建的电厂提高灌溉效率，那么所有损失都将得到补偿，五公的发展也将重新开始。村民们以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为巨大的骄傲，感到自己比没有这种关系的人优越，因此，一旦教条主义政策终止，那些较好地与国家融为一体，或尽可能连续获得两三个丰收、生产出可供出售的余粮的地区和村庄，也不会十分贫穷。

饶阳的一些村庄安排了守卫，日夜看护庄稼，但饥民们仍冒险去偷。所有陌生人都受到怀疑，人们还常常怀疑守卫人员，信任沦落了，任何有偷盗嫌疑者均被搜查。由于没人敢搜查党的干部或他们的孩子，因此，他们便被大伙指责为无处不在的硕鼠，把农村弄得道德沦丧，干群关系的鸿沟加深。

五公村果园不得不加以保护，防止小偷和想瓜分它的愤怒农民进去。五公人在果园周围筑起了木栅栏，只有一个大门，上面有一把笨重的锁，其钥匙被小心翼翼地保管好，由凶猛的张端的老友、铁人李多林掌管。耿老板与从未批评过他的张凶猛之间的联盟，不仅有助于联合东、西村的宗族，还使全村保持了团结，因为张与村中央李氏宗族的关系很好，特别是他与战友、老酒友李万义的关系。

在20年前的饥荒中娶了丐女的李多林拿着刀，后面跟着他的杂种狗，指挥民兵们轮流值班，守护五公果园。他们晚上

值班时，都带着席子到果园里睡觉。五公人设法不让外乡饥民抢走这宝贵的食物。虽然耿老板威胁说，只要哪个干部被发现有小偷小摸，即便是一分钱，后果也不堪设想。但村民们都说，干部们不可能保护好果园。

在附近的耿口村民看来，五公果园的栅栏似乎是获得国家资源的特权的另一个证据。像耿口这样的普通村庄，不可能有稀少的昂贵的木料，为果园上篱笆。耿口村民们说，他们不能阻止五公的年轻人去偷他们的水果。五公有栅栏，而耿口没有，这展示了两个世界，受宠的一个得到保护，并纳入国家轨道，另一个则遭遗弃。为了防止窃贼来偷，耿口村民只得在成熟前便将苹果摘下。

所有的饶阳村庄都在收获季节派民兵看护庄稼，有些村庄一年到头都进行看护，包括晚上。在巷子里巡逻，守护着树木和所有其他有可能成为饥民和愤怒的人们偷盗对象的集体财产。通常有两个民兵在村部办公室值班，以应付紧急情况。两个人相互监督。这些护卫队中的年轻壮汉常常变成一伙无法无天的人，他们闯进赌窝，在对男女赌徒同样进行体罚之后，再把钱占为己有。赌徒们很少向上汇报。在充作村监狱的一间无窗的房间里，被合法地关进去的人通常要遭打。

农民文化活动有时得以允许开展，且丰富多彩，平时则受严格限制。孩子们长大了，害怕别人议论，如果违背传统习俗，则有辱门风。所以，聪明人张朝可在结婚时的花费恰到好处；而男子汉李守正结婚时请来一位“全人儿”。有时，传统文化中最不好的成分加剧了现行制度的最要命的后果，这一制度不让掌权者负任何责任。当时，强奸案子增多。而村民们认为，有些受雇佣的民兵凌辱了妇女，受害者及其家属还不敢揭露罪犯。农村的单身妇女生活很痛苦。对于被强奸者来说，结婚前景暗淡。匿名信寄到上一级党的干部手中，要求整治这种

状况。饶阳有一个民兵队长，是臭名昭著的强奸犯头子。最后，很多匿名信终于使上级部门决定进行调查，这名强奸犯头子终于被判处15年徒刑，进了深县的省第三监狱。省劳改局把监狱设在卫桥公社的荒地上，周围是高墙和电网，里面关了数千名犯人，其中包括受人尊敬的书法家、饶阳秘密宗教派别首领王齐。

非党员群众可能因强奸被枪决，可党与部队的干部却通常不会被诉诸刑事诉讼。要惩罚党员时，一般经过特殊的党的法庭，而不是法院。常见的惩罚仅仅是工作调动或降级。正义并不是瞎子。判处强奸犯15年徒刑，这反映了国家对地方干部之特权的看法，它的依据是巨大的民愤。

在每个阶层中，这个制度歧视那些最不愿依附于国家的人。当国家对发展原子弹和火箭技术给予最高优先权时，军队和重型机械工业部的有关厅局有优先从清华和中国其他最好的科技大学中选拔毕业生的权利。指令性经济给那些失宠者造成全国性经济短缺。由于被国家偏爱的单位垄断了宝贵的人员和资金，因此，享有特权者到底如何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以及什么时候需要，这本身的随意性就造成大量浪费。40年代末把牲口送给耿老板，1953年把拖拉机开到五公，1959年建造电厂，以及获得化肥和草药的特殊途径，都反映了特权的政治逻辑，它无益于经济效益的提高。

有限的改革

1960年和1961年，中国政府改变了基本经济原则，允许重新进行私营活动和市场交易，同时，中央也继续通过军队宣传共产主义基本原则在道德上的崇高性。经过种种自相矛盾的变革和迟疑不决的动作，得到加强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继续营造

着生活的希望。影响日常生活的力量非常之复杂，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单一连贯的国家政策的成功。

1960年，饶阳县各党支部接到指示，召集村民开会，回忆旧社会的生活多么痛苦。很多人回忆说，在税制和土地改革之后、集体化之前的蜜月时期，生活曾一帆风顺。5月，面对北京仅供应10天的粮食，天津仅供应7天，国家终于允许农民从最具破坏性的大跃进政策中撤出来，这些政策已严重破坏了农村和全国的经济。

五公的张朝可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每个村庄可以决定改变分配制度。五公把全村范围的生产队管理权下放给一、二、三队。继较早地终止了浪费极大的后院炼钢和不受欢迎的公共食堂之后，仓促建立起来且人员短缺的学校、医院、日间托儿所也被关闭。时间、设备、资金、信任和生命被极大地浪费了。在饶阳，除了东风机械厂之外，所有新工厂均关了门，这个厂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才由农具修理厂扩建而成，它的熟练工人们继续修理农具。

在饶阳，由国家提供资金的、供老年退休职工生活的养老院没有关门，它按照城里的标准提供食物。有很多人要求住进这家有40多张床位的养老院。不过，只有那些政治关系过硬的人才能住进去。无论政策路线怎样，徇私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五公从县里宝贵的化肥中得到最大的份额。而可怜的耿口村到处寻找化肥，但一粒也未找到。饶阳农民们对迫使他们向权力低头以求得生存的体制给予了讽刺：

溜须拍马，吃香喝辣。

不溜不拍，饿死活该。

不在受宠之列的农民们，以与五公人大相径庭的方式生活

着。这个享有特权的村庄的三个生产队各有 150~200 名农民，从而证明五公党员仍赞成大集体农庄，可相邻的村庄一般都建立更小的生产队，规模仅为五公的 1/6。这些村庄的干部力图说服人们，可他们已被庞大的非生产性组织弄得涣散和惊恐。在最大的村庄，农民田间集体劳动的报酬以实物形式支付，农民们无法赚到所需的现金。任何支付现金的行业或副业都被看做好工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学习种田。农民们开始说，“只有傻瓜才种地”。

在 1960 年那个焦虑不安的春天，就连改革也加剧了饶阳贫困村庄的紧张气氛。县里干部下令解散集体化了的手工作坊，减少集体投资，希望通过让劳动者们自己掌握更多的劳动果实，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可是工人们必须留下属于自己的设备回家，而许多村的党员干部并没有给他们一点现金或财物，就突然不闻不问，让他们自生自灭。其中很多人被当作弱劳力，不准在集体地里干活或参与集体分配。后来，他们只得从事国家集体忽视的、并不十分合法的商业活动。在邹村和别的地方，小型集市开始复苏。囊中羞涩的人们也来到集市看热闹，观赏免费的唱戏和武术表演。

1960~1961 年的改革改善了生活，减轻了饥荒。中国农村经济向前发展了。已遭毛贬斥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计划重新出山。与 50 年代初和 1956~1957 年一样，农民们被迫采纳责任制，包括在卢广顾问指导下五公首先实施的包工和定额。在破坏严重的安徽、四川及全国农村比较贫困的地区，农民们开始欢迎更为广泛的改革，包括家庭责任制。改革有力地刺激了家庭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五公的庇护人、河北省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张克让，在北京的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工作，这使他成为被证明是正确的邓子恢的下属。邓仍然主张采取与农民理性想吻合的激励和组织形

式。在有些试点的村庄，河北省允许把近 8 亩地承包给农户。河北省家庭承包责任田的主要发起者是张家口专区的胡开明，他在大跃进之前曾是林铁手下的副省长。

至 1961 年初，作为应付人口大量死亡的紧急措施，党中央同意允许家庭副业和地方集市的存在，不再把使用内行专家或定额制度当作阶级敌人的犯罪行为对待。^③邓子恢恢复了发言权^④。

5 月，张克让落实邓子恢的政策，第一步是召集各专区负责人开会，讨论责任制的问题。张发现，邓是个南方人，矮个儿，很健谈，工作勤奋，十分注重到基层调查。会议报告了河北省改革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张家口胡开明的经验。这些改革引进了日间管理责任制，把土地包给贫困农户三年，甚至包给人们土地以养羊和马。农村工作会议作了总结，并介绍了责任制，它除了耕地、播种和收割之外，还有广泛的利用价值。据说这些改革使遭受饥荒袭击的安徽省重新复苏，特别成功。河北省当局批准了这些新政策，在平山县和邢台专区最落后的地方，立即把它们付诸实施。1961 年，在 4 个相邻的县：衡水、武邑、枣城（强）、深县，土地被分给农户耕种。

在中国广大农村，转向正常状态的另一个标志是，结束了针对所谓封建传统进行攻击的文化革命。全县又一次恢复按习俗进行哀悼死者的仪式。这次文化正常化可以从天津的精英圈子那里得到反映。6 月，文学杂志《河北文艺》重新出版发行。知识分子不再成为攻击对象。

大多数饶阳村庄已在 1958 年消灭了私有土地。而 1960 年又出现了私有土地，有时自留地的比例占到全村土地面积的 5~10%。村民们坚决要求扩大自留地。五公村民们听到了邻近的深县已开始行动的传闻，在那里，农民们不仅有权耕种自留地，而且有权耕种未开垦的荒地。这一政策实际上对荒地作

了更宽松的规定。相邻的王桥村将这一政策付诸实践。

虽然改革恢复了村庄的某些职能，但制度化了的大灾难继续肆虐。有关房产和宅基地所有权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变为愤怒和争论，而对农田、牲口、农具和手工业已失去控制的宗族，正把继承的打算集中在幸存的合法财产和家庭住宅上。父母不敢把财产遗赠给女儿，生怕被其他家庭的人抢去。无论宪法如何保障男女平等，女儿都被看做另一个宗族的人，因为最终要嫁给别人。因此，她们在农村没有地位，也没有宗族资助网络。有关继承权的争论慢慢地沸腾起来。人们害怕买卖房子。买了一栋空房的某位回乡城市工人发现，它很快就成为掷石块和放火者的目标。由于宗族首领现在并无解决兄弟间纠纷的合法性，于是兄弟们作了创新，一些具有所罗门智慧的人，准确地把房子一切为二。由于法律管不着，宗族权威又弱化，财产纠纷常常诉诸暴力。

饶阳仍很穷，属于边远地区，以致官员们没有一辆轿车，就连县委书记也只能骑自行车上班。人们凭自己的力量对付经济灾难。他们认为，凡是国家给予优惠的人，经济状况均较好，这很不公平。人们私下议论，腐败的官员们为家人安排最好的工作。

五公人是幸运的。在全村范围的管理水平上，耿老板的近亲耿连明坚守会计岗位已20多年了。耿会计的廉洁为于部和群众之间建立某种信任和团结的关系提供了方便。这位富裕的自耕农从新中国成立之前便长期担任此职（直到1984年他去世），就连在国家坚持只有过去的穷人可以信任和提拔的时候也不例外，这反映出耿老板领导班子令人瞩目的团结和诚实。而当五公西村居民叨咕他们那边的会计贪污时，他便立即被革职，并重新任命初小毕业的李志民担任三队会计。账目在布告栏上公布，没有秘密，这就叫民主。

为了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巩固其权力，1961年，耿老板任命东村的邻居、身强体壮的李守正担任民兵队长。守正的老母亲饿得受不了，违反了不准在集体田里拾穗的禁令，寻找残留的粮食。为了挽回面子，李守正躺在自家门口，向所有行人大声哭诉他的羞愧。如果换了别人而不是刚守寡的母亲给他找麻烦，守正将给这个狂人一顿打骂。李确实很尊敬他的母亲，是个大孝子。李还喜欢快节奏的体力运动。东村的贫困家庭很少在公共场合讲话，家中也没有一本书，孩子们老早就退学了，他们都很尊敬男子汉李守正。他设法让他们的孩子参军，这对农村穷人来说，是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一个途径。进一步加强李男子汉与耿老板的政治家庭之间关系的，是计划把守正的小女儿李宽哲嫁给留在乡下的、耿最大的外孙张满囤。姻亲关系仍有益于政治关系的加强。

反对改革

那些置身于受国家偏袒保护的特权轨道之外的人们，通过巧计、市场和流动而幸存下来，可是像五公村这样愚忠的干部们却比较欢迎教条主义，他们通过垄断政府渠道而获得了资源。虽然教条主义者试图证明对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有合理性，如促进共同富裕，可是对遭排斥的残余组织发起的斗争，实际却使已经有特权者进一步攫取了特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持续反对市场和私有财产的斗争，结果将进一步损害弱者的利益，而更加强有力地巩固了特权者的地位。其实越是一大二公，结果就越是两极分化，使最穷苦者永远陷入贫困，同时加剧了攫取国家资源供应的热衷程度。

在受偏袒的五公，男子汉李守正担任民兵队长之职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他进行了一次公费旅行，到天津出席民兵会议，

这是守正第一次进城。农民们没有获取食物或住宿的钱或途径，这需要一张官方的证明和配给的粮票，因而他们无法外出旅行。虽然干部和群众一样，谴责腐败，赞颂廉正，但正是一种组织结构展示出受国家偏袒者与普通农民间的鸿沟。

1960年11月，国家重建了党中央的6个地方局。河北仍受华北局管辖，陈伯达的教条主义盟友李雪峰现为华北局的负责人。在李—陈集团之外，偏爱有效的物质刺激、逐渐转向与群众意见一致的局领导，包括林铁及其盟友，其影响已缩小了。政治风向仍然向着大跃进政策的教条主义方向吹。李森科式的遗传学家仍掌管着他们的机构。取代了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从1960年开始发动了一场运动，目的是把军队转变为实现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典范，驻在饶阳的部队强有力地推行了这一政策。自1938年始，饶阳年轻人的命运就与这种部队联系在一起了。五公注意到了把军队转变为共产主义美德的典范的号召。五公村民兵组织在运用军事术语和学习强壮的爱国官兵的作风上走得最远。在农村民兵组织中，像耿老板的外孙张满囤和刚从东北回来的李忠信这些年轻人，对毛的爱国主义号召响应最热烈。

政治意识最强的耿长锁女儿、饶阳中学的学生和民兵积极分子耿惠娟，定期去拜见她父亲的密友、饶阳武装部负责人李国昌。他是林彪发起的这场运动的急先锋，在饶阳大力提倡毛的思想。惠娟还去看望同学张平，并进一步发展到两人结婚。张平的父亲张合任县委副书记，是耿的政治家庭中的又一个盟友。与耿老板一样，张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因不发动进攻别人的运动而受人尊敬，是使饶阳远离最可怕的大跃进运动的权力小组成员之一。

耿老板不让五公卷入经济上最充满生气的改革，他坚持大集体农庄，与市场保持一段距离。耿和支书张端力劝村民们在

1960~1961年难熬的冬天提高集体田地的肥力，虽然很多人已精疲力竭了。目标是平整和改造200亩新的庄稼田。

在西村，不满情绪最强烈，许多人憎恨队长徐连祯，咒骂他是个恃强凌弱的恶棍。当妇女主任乔文芝的丈夫徐连祯强迫他们去干像平整冻土地这样浪费体力的苦活时，西村人狂怒之至。耿的好右手乔利广建议，这活儿应限制为最容易平整的100亩地。沉稳的徐满堂争辩道，在如此缺钱的年代，不应限制副业生产，要让人们去干挣钱的活。最后，耿老板进行了折衷，结果是那年冬天就平整了100亩地。

在上级指示的改革和教条主义两个方向之间，耿老板跟1953年作巨大冒险一样，没有按照改革者们提出的路子前进。他对未来忧心忡忡，成了一个烟瘾很重的人。他压制了村里的不满情绪和各家各户的热望，忠实地恪守毛的号召，巩固人民公社。耿不久断言，五公所有的家庭都买得起冬天取暖和烧水泡茶的柴火，他还宣布公共食堂和幼儿园已把妇女解放出来，从事户外的的工作。耿的有关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叙述登载在报纸上。在军队系统和华北局的教条主义领导人寻找更多的理由支持他时，一些村民怀疑耿老板正牺牲他们的利益往上爬。

在耿赞扬大跃进的成就之后不久，曾在1943年使他支持不住的营养不良，再次出现在他身上。他倒下了，左臂感到麻木，这种感觉持续了好几天，身体出现浮肿，视力下降，饥肠辘辘，腿也开始痛苦地肿胀起来，听力进一步衰退。总之，耿与许多其他干部不一样，他也分担了苦难。但与普通农民不一样的是，他很快被送进在邹村的卫生院。

公社党委决定，帮助这位60岁的英雄人物渡过困难时期，他们给他送去了鸭蛋。很多中国人认为，鸭蛋对身体的恢复特别有益。为了与新闻界报道的好干部匹配，耿把鸭蛋送给了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在医院里，他仔细总结了近几年来的教训，

考虑了五公的政治前途。在他躺在病床上的半个月中，一位曾帮助提高五公知名度的新闻界朋友前来看望耿，送给他一套刚出版的大字体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耿发现这些书中很多都看不懂，但他努力去领会和忠于毛的意思。

耿长锁出院后不久，1961年1月，林铁请他到北京饭店这座首都最好的宾馆开会，讨论收入和粮食分配问题。也就是说，林想讨论如何激发劳动热情，结束由跃进政策和饥荒引发的对抗和消极情绪。在那儿，耿遇见了大寨村的陈永贵，去年8月，《人民日报》对其成就作了大量宣传。他们俩开始了亲密的政治盟友关系。

这些农村干部是一批很幸运地得到国家偏袒和对消灭市场有偏爱的人，他们应邀来讨论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讨论内容涉及到开支庞大的福利过度膨胀、教育计划和缺乏劳动热情的问题。有消息说，在有的地方，干部们求助于暴力，把农民赶回集体田里劳动。一些与会者评论说，农民们欢迎减少农庄的强制性要求，积极响应把土地承包给个体农户。家庭承包和重建市场使农民恢复了辛勤劳动的积极性。其他人则争辩道，在传统的苏联式集体经济结构内，正确的按劳分配使活儿干得更快，也更显示出平等。耿长锁竭力赞同对集体劳动给予适当的报酬，但当一些与会者似乎把按劳分配加以绝对化时，耿却深感不安。他争辩道，如果社会主义是指帮助不能养活自己的穷人，那么在困难年代，当病人和精疲力竭的人艰辛地干活时，正确的政策便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创造的价值分配，由此他反对正在讨论的建议。耿长锁认为，集体必须关心所有的人，不论有没有自然灾害、个人不幸或缺少劳力。可实际上并没有人对这个一致意见提出任何异议，即对困难家庭尤其是缺少劳力的家庭，集体必须给予救济。但1961年的首要任务却是改革，刺激衰退中的中国经济。

讨论的调子使耿感到迷惘。他了解五公、它的合作社的长期历史和国家的支持，可他不了解最穷的、饥荒严重的地区。在那儿，不受欢迎的、管理极其糟糕的集体农庄应对收入减少负责，而关键问题是家庭生存。大跃进已浪费了五公集体积累的资金，损毁了机器，宰杀了牲口，耗尽了人力，留给村民的只是饥饿和沮丧。耿认为，为了重振五公经济，村民们必须为农庄的未来重新投资，为所有的人提供保障。但耿听说北京人建议的政策恰好相反，他们讲，分配得越多，给家庭和市场的主动权就越大，对集体投资的关心也就越少。

耿感到迷惑不解，站起身来，四处徘徊，头嗡嗡作响。也许他误解了讨论的某些内容，因为其听力已衰退，不久前才离开卫生院。虽然会场上照例是静悄悄的，但耿感到不能不说了。他强调了为所有人提供保障的需要，然后突然停止讲话，说“让我们吃饭吧”，随即走了出去。没有人跟他走，耿回到他的宾馆房间，没有被叫回去。三天后，他接到回家的通知，但要他对在这里听到的只字不提。在分配问题上，耿不仅突然与他的庇护人林铁意见不一，而且与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的意见相左，刘同意为了渡过饥荒，中国必须扩大个体经济的自主权和市场。^⑤

尽管饥荒仍在继续，可新闻界仍把五公1961年春节描绘成一幅幸福的景象。耿把自家目前的好运与1943年作了对比，那时他的大女儿学仁以45斤高粱的价钱被卖。而报道说1961年春节，当耿回到家中时，发现小女儿秀娟正听着唱片，笑着在电灯下玩耍，正等着吃肉馅饺子。

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把重点放在经济调整上，但同一次会议又号召地方干部们学习毛的思想。党同时发起了意识形态教育和经济与行政改革，前者鼓励人们充当革命者，实现共产主义誓言，后者则帮助人们寻找克服饥荒的办法。在党内，

人们把革命与改革的结合称为“政治上左，经济上右”。

有关态度要革命化的号召，使助长恐慌和奉承、抑制主动性和创新的制度适得其所。改革有助于结束大跃进的灾难，但政策并没有抓住历史遗留问题：从贫瘠的土壤和仍在恶化的土地—人口比率，到滋长中的腐败，以及发现、培养与任用有才能的人等。河北省的改革很缓慢。据张克让说，1961年其他省经济开始复苏时，河北的粮食产量下降到每亩113斤，是十年中最低点（参见表10-1）。^①

表 10-1 河北省粮食产量

单位：斤

年 份	官方的数字	年 份	官方的数字
1952	138(旱灾)	1957	137
1953	120	1958	152
1954	116(国家低价购买)	1959	140(饥荒)
1955	136	1960	122(饥荒)
1956	119(集体化、水灾)	1961	113(饥荒)

资料来源：数字由张克让的办公室提供。

广州会议后，中央领导到农村研究大跃进所产生的影响。1961年5月7日，在河北省委代表的陪同下，周恩来在武安和其他县作了为期三周的调查，他在上海向毛汇报说，农民和牲口仍十分虚弱，不能满负荷劳动，农民们还要求批准回家吃饭。公共食堂、免费供给制和人们无法认同的大单位制收益分配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在整个大跃进中，这些方案被鼓吹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而到了是年6月，全部被废除。^②

五公村三队关掉了公共食堂，杨同曾把它办得不错，勉强赢得大家的尊重。就连仍赞成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聪明人张朝可也认为，这些共产主义制度不受欢迎。“一听说可以自由选

择，马上就废弃它了”。尽管普遍遭难，可恐慌和狂热在政权结构中已如此习以为常，以致有些官员宁愿维持丧失威信的制度，也不愿冒险采取有可能被认为反社会主义的行动。

只有在经济衰退的饥荒压力下，统治者才放弃了最大限度地各地方、各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自力更生的政策，而终于扩大了国内贸易，并首次进口粮食。毛在早些时候曾断言，南斯拉夫和苏联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粮食，证明它们对帝国主义有依赖性。粮食进口实际上使国家减轻了压在农民身上的负担，即养活国家干部、军队和城市居民。征购的粮食越少，在困难时期留给农民自己的粮食就越多。粮价在1958~1961年间曾暴涨1000~15000%，1961年改革的结果是，粮价下跌35%，饥荒结束了。

不过，改革者们不能公开且全面地继续按他们计划的逻辑进行改革。毛警告说，像农村家庭责任制和搞活农村市场这样的改革，如果推进的太远，就会导致资本主义。改革完全改变了社会主义所保证取得的革命成果。他得出结论，这种倒退，铁托已在南斯拉夫实行了。他反对让农民“单干”，认为应代之以鼓励走“共同富裕”的集体道路。

一场新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与彭真、刘少奇及其他中央领导干部的关系很密切，他们严肃关注着最近的灾荒，设法使中国摆脱教条主义政策，但其他国家领导人，如在保定地区和华北局有其盟友的陈伯达、国防部长林彪及其在饶阳部队的下属，都提倡以阶级斗争把革命推向共产主义。耿在北京饭店出席的一月会议，为考察传统的苏联模式及改革者反教条主义的选择提供了一次讨论的机会。

60年代初，耿长锁似乎正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走向教条主义，尽管他的个性和对人们生活的关心没有改变，但到1961年年中，他的庇护人开始在公开刊物上表扬他，宣称

“耿长锁从来不忘读毛主席的书”，并说他的看法已经被革命化了，因为“毛主席怎么说，耿就怎么做”。在耿看来，正是毛建立了新中国，摧毁了罪恶的旧社会，结束了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

全国范围内出现的这些革命或改革的相反意见，在五公也各有其支持者。远离政治运动的农机修理专家徐文东，为他的机器不再被滥用和捣毁而感到高兴。但有些村民对结束大跃进政策却感到若有所失。年轻的李忠信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大跃进的成功创造上。1961年，一分现金也没有。各家各户正把精力放在如何渡过饥荒上，将要进入初中学习的忠信和20多名同学一起被迫离校回家。李家很重视教育，忠信的大哥在外婆家、邻近的耿口初中教书。全国农村学校刚刚得到发展，就被迫缩减了，忠信和一起回家的同学被告知，在困难时期，他们的家庭需要他们暂时留在家中帮助家人。忠信的父亲是兽医，离家到东北20多年之后刚回到家中，他要儿子准备考试，以便进入东北较好的学校学习。忠信的母亲则想让他准备进农学院，可饥饿已使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没有力气学习。

忠信认为自己很幸运，进了一所大跃进期间匆忙中建立的乡村农业学校。学校设在邻近的邹村，有从城里学校下放来的好教师。他认为自己平生的愿望与大跃进的创造是一致的。李忘记了教条主义者对教育的破坏，看到的只是他从未有机会继续他的求学生活，它被终止革命政策的改革者所打断，而正是它将给他提供美好的生活前景。

不过即便在五公，当改革放松了国家对经济严格控制的某些方面时，农民们还是紧紧抓住了开放的新经济机遇。虽然耿老板在取缔家庭责任制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就像抗战英雄乔恒泰的养子乔勇那样，很多其他村民对禁止副业生产和做生意挣钱非常恼怒，于是他们不顾耿老板、凶猛的张端和徐树宽

的哀求，开始从事这些生产活动。关系变得紧张了。在全国农村，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千方百计地逃离集体农庄，以免被拴在土地上，还老得奉承有权的干部，这些干部统辖着他们，而他们则像雇农那样纯为生计而劳作。

村党支部组织开会，解释为什么五公不像别的地区一样也允许家庭优先干集体农庄。五公也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不过支书张端宣布，五公依靠更大更强有力的家庭——集体农庄。他预言，如果大家在冬闲季节吃得少一点，如果他们种植更多的甘薯以挨过暂时的危机，那么，由于公社不再强迫村庄从事高代价的、不明智的大规模活动，五公很快又将向前发展。与以前一样，所有人都将从中获利。在华北，由支持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张克让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对五公没有任何影响。除了恢复了小块自留地之外，饶阳县实际上仍保持集体耕作。

但对于饶阳县最穷的村庄来说，在饥荒的余波中，沉重的国家控制的解除扩大了生存空间。有些人逃避人口众多的集体农庄中低薪的田间劳动，甚至跑到遥远的边疆定居。寒冷的天气和遥远的西北边塞似乎是一些充满机会的土地。移民中有手工艺人，在保守的饶阳，他们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看待。

在农闲季节，从事田间耕作的传统农民家庭寻找非农业性工作，用所赚的钱买回精白面粉，在特殊场合招待客人，或者买回结实的箱柜，以便在女儿出嫁时有像样的嫁妆和体面的婚礼。但在耿老板看来，在国家体制内运作的，是一个极为不同的逻辑。

国家的阶梯

忠于个人的紧密关系网充斥于各级政府组织之中，外人无从看清真相，即便是在大跃进带来灾难期间，国防部长彭德怀

对老家湖南省的受灾情况作了了解，因为省委书记周小舟让他知道实情。当毛整批彭时，周也受到了牵连。可在湖北，政治局委员董必武了解的实情很少，因为省委书记王任重对许多事情避而不谈。王在他的位置上安然无恙，最后湖北省组织了据说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它位于沙洋地区。

就连自称为耿长锁最早的知己的、主管农业的张克让，也无法看透真实的耿。他于1961年到北京在邓子恢手下工作。在张的面前，耿对不称职的城市干部进行辛辣的讽刺时会有所节制。张错误地得出结论，耿十分忧郁，因为他从未笑过。

1961年初，当干部们开始认识到农村正在发生的灾情时，他们发现农民们呆呆的，不肯说出真相，只是向不负任何责任的国家权力表示敬意。饶阳农民讽刺说，领导干部一声吼，农民就要吓得跳起来。他们说：

上级放个屁，下级当本戏；
领导动动嘴，社员跑断腿。

邓子恢发现，尽管大量群众对大跃进政策很不满，但“害怕被扣上右倾帽子的干部们，仍不敢实事求是地把本地区的情况向上级汇报”^⑧。刘少奇主席也有同感，当他视察湖南省老家时，只有他的亲戚才开诚布公。当一位参与1947年土改的高级干部回到曾经战斗过的老根据地村庄时，一位欢迎他的农民跪在地上磕头，头和身体在地上碰得咚咚作响。

无权无势的人千方百计地逃避受伤害。饶阳的教师们害怕管束来自五公的学生。邻村的农民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与五公的年轻人打架。五公村民似乎像暴徒和骗子一样，因为无权无势的人们发现，在与那些国家特权领域里的人打交道时，毫无公平可言。

计划经济有所差异地分配它所控制的商品，这恰好加强了等级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结构。当饥荒严重而看不到商品时，国家为官员们建立了一个五级供给制。军队按军衔给予特殊供应。饶阳干部们获得了最珍贵的药品、肉、营养食物，以及像自行车和缝纫机之类稀罕的高质量名牌耐用消费品。这种分配由商业部军队特供局掌管，它掌握着大量名酒、糖、肉和油。在春节，准确地按级别高低，直接把这些东西送到高级将领和文职官员的家门口。

分给文职官员的最好商品，是给那些在26个级别序列中职务高于13级的官员，这通常意味着必须是专区级或更高。饶阳没有文职官员获得最高档次的恩惠。但饶阳有几个最高的文职官员，符合送货上门的第三等要求，即他们的职位在14~18级之间。在文化落后的饶阳，没有人能享受第四级的待遇，它专门送给杰出的艺术家和其他文化名人。^⑨不过，该县有很多人收到第五等和最末等的商品，即留给那些在很多领域取得成就的人，从劳动模范到技工。在饶阳，享受高级配给待遇的几个文职官员和军队干部，可以买到足够的特供货品，这进一步巩固了个人关系网。一些贵重的药品和营养品专门留给生命垂危急需药品的人。努力为穷人提供最低的保障，被当作为穷人服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据。正当特供制得到加强时，一种综合的配给制也对普通大众产生了影响。即便在农村，买布和粮都需要票券。配给制大概是应付危机的手段，可后来延续了几十年。

五公村希望通过它与国家的关系来重新获得成功，但普通村庄不得不进行大量的改革，撤除对市场和农户的限制。耿老板首先起来抵制国家有关发展家庭经济和增加收入分配的指示，而大部分村庄却立即削减了集体投资，扩大了私人投资，以保证养活所有人，而获得更多的自己劳动果实的农民们，也

再一次看到付出与报酬之间的联系。为了保障粮食和其他商品的流通，国家放松了市场控制，包括秘密粮食市场。

包括耿老板在内的党、政、军国家网络试图表明，勒紧爱国主义的裤腰带，忠于禁欲主义的信念，国家和集体农庄就能保持强大。饶阳的干部们宣布，农民在人均留下极少的360斤口粮后，须把所有粮食卖给国家。农民们不相信360斤就够了：“够不够，三百六”。饶阳所有的老人都相互诉说，在旧社会，当时他们年轻力壮，在一个为期5天的集市上，他们就能赚到相当于150斤粮食的钱，接近很多人辛苦一整年所挣到的一半。1961年秋，耿老板了解到，由陈永贵领导的、迅速崛起的山西模范村——大寨，也把360斤最低口粮以外的所有粮食都卖给了国家。他立即把五公的口粮改为359斤，其余的卖给国家。不管大跃进造成的灾情有多大，争取巩固体制的逻辑引导着诸如耿这样的人寻找显示革命热情的途径，以取悦于国家领导人。

耿老板和他的同僚们为了获得国家垄断和分配的资源，与国家建构的政治竞争原则保持一致。这便是五公获得拖拉机、技术援助和电站的秘诀。刘少奇主席送给模范县徐水的干部们一台崭新的莫斯科牌电视机，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有国家体制中的高层人物才能赠送这么贵重的商品。

结果，政治智慧引导耿老板及当地的庇护人跟南王庄的王玉昆领导班子建立了联系，它是毛泽东在集体化运动期间选出的典型，与国家领导人相关的恩赐也流进了南王庄。公路把该村与专区首府联在一起，公共汽车可以把乘客带到专区首府及更远的地方。在南王庄，专家、良种和资助创造出一个硕大的果园。不过，王本人有点土皇帝的味道，其他干部和村民都害怕他的出现。他的儿子在炫耀一块大手表，上有金色的表带。外国来访者乘汽车来到南王庄，参观毛赞扬的想象中的自力更

生的成果。与落到王玉昆或王国藩所在村的大量好处相比，耿老板的五公村极需国家投入。中央政府把很多钱倾注到徐水及河北其他重点县，以便让全国仿效。1958年，在河北的几个地方，如著名的种棉周景庄所在的晋县，国家已从附近的石家庄接通了输电线路。

耿长锁得出结论：在农民干部中，穷棒子合作社社长王国藩对毛的指示理解最好，主要体现在大集体农庄的神圣不可侵犯、抑制家庭经济生活和市场。对耿来说，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缺少良好关系的附近村庄在利用改革促进家庭、市场和副业的活力，这是无足轻重的。他关注的是一些模范村在获得国家资源方面正在超过五公。与耿地位相同的人并非无权无势的贫困农民，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受偏袒者。

耿没有详细讲述国家在把大量资金送给五公的同时，却没有送给邻近的村庄如杨各庄、邹村、耿口。在他看来，林铁给五公公社的大跃进资金，若与流入王国藩的建明公社的资金相比，似乎少得可怜。耿的目标是，要为五公获得与王为建明公社争得的同样多的资金。1958年，建明公社没有声张，却得到很多帮助，建造了自己的化肥厂，这是河北惟一的一家。1955年，毛挑选出并给予高度赞扬的王国藩，乘着大跃进的东风，获得更大的名声和更多的好处。他的公社位于北京东北140公里的遵化县，是个受灾极其严重、过去很穷的地方。它的两个村庄西铺（穷棒子合作社）和沙石峪是最早组织合作社的村庄，它们正在成为中国领导人通常的游览点。得到国家最慷慨资助的河北公社被树为全国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公社可以自力更生的榜样。但当普通农民对这些空洞的口号表示怀疑时，他们就有可能变得只顾自己和玩世不恭。其他模范村的干部们拼命想知道他们的村庄如何才能与西铺和沙石峪一样交上好运。

由于同等地位的人总是留心对方，模范村也就盯着模范村。耿老板眼盯着王玉昆、王国藩和陈永贵。五公生产专家、“聪明人”张朝可被派到最成功的模范村庄去学习。为了加强联系，并通过学习从土壤改造到劳动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以便提高产量，张朝可南到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河南省七里营公社的刘庄村，东到山东省的杨榆穴，北到王国藩公社的沙石峪。耿老板自己也拜会了王，两人并开始通信。

普通中国农民面临着通过迁移、副业、农民家庭经济、市场活跃的机会，寻求生存保障和改善家庭生活的困境，这与那些控制着特殊资源的在国家网络内调动的干部所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天地。教条主义者倾向于把受排斥者的生存行为当作自私的和资本主义的。这些资本主义的萌芽被看做是一种威胁，须经革命斗争即转变世界观、动员群众和发动进一步清洗的阶级斗争来加以消灭。在中央一级，反对教条主义创始者的人们发现，在苏联于1960年代成为中国的敌人之后，已很难证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正当性。改革者们经历了一个更加艰难的时期，以证明政策选择的合理性，这种政策有可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从而凭空被断定会导致剥削、贫困和两极分化。因此，与革命所承诺的共同富裕背道而驰。鉴于改革有利于使经济从教条主义灾难中复苏，毛逐渐把改革看做破坏实现革命目标的行为，耿的看法与此相同。当时的中国构筑了反对改革的思想、利益和制度，而这些改革本可以使占压倒多数的中国农民走上强大和富庶之路。

注 释

1. 《光明日报》1983年1月17日，收入《联合出版物研究中心丛刊》，

- 第 82 期 (1983), 第 46 页。
2. 《人民日报》1963 年 12 月 7 日。
 3. 胡华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 197、203 页。
 4. 蒋伯英等著《邓子恢传》，第 343 页。
 5. 在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耿长锁这一早期反对“资本主义”改革者的故事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1984 年，教条主义路线在官方已遭到批判时，我们对耿老板说明了这一点。后来，他虽 80 高龄，改革路线已占上风，但他仍很顽固，甚至好斗地坚持他在北京饭店会议上反对新经济政策的这一观点。
 6. Kenneth Walker 对粮食统计的推测普遍提高了 1952~1958 年产量数。*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36, 150。
 7. 胡华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 205 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 293、295、296 页。
 8. 蒋伯英等编《邓子恢》，收入胡华编《中共党史人物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七册，第 374 页。
 9. 乐黛云认为，特供商店体制对列入等级体制中较低层次的主要知识分子很有用。乐黛云和 Carolyn Wakeman, *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94~95。这一体制在 Lowell Dittmer,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58~61 也做了描述。

结 语

我们到中国乡村共访问过 19 次。1978 年，在我们第一次访问期间，河北省的官员们把我们介绍到耿老板的五公村和邻县的两个比较著名的模范村，即王玉昆的南王庄和姚富恒的后屯村。主人还把我们带到杨各庄，并把它的萧条归结为缺乏好的干部和弄巧成拙地依赖市场。他们还允诺到附近的邹村集市去看看。虽然它在春季大约能容纳 2 万人，但市场却是死气沉沉。在首次访问饶阳所听到的传说中，把五公所取得的主要荣誉归功于它的领导人，毛的缩影（mini-Mao）耿长锁，而没有提及合作迷耿秀峰及其革新思想，除了私下议论外，也无人公开谈论林铁在大跃进中给予五公的财政资助。

我们做了 10 年的调查研究，收集了那些年中国家投入的数据资料，并与林铁、张克让、胡苏、左志远、邹铁圈、张端的家人、魏连王家人、李茂修一家、李沛琛、李金爪、师桂英、师喜生、耿惠娟、耿秀峰、葛文，以及众多首次访问中我们未相识或没见过面的人进行了交谈。这些人帮助我们理解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构性动因。在这十多年中，我们多次到杨各庄、邹村、耿口和其他村庄访问，在这些村庄，制度性的产物是萧条，它向我们展示了政策和运动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这些政策和运动全面阻碍了许多贫困村庄的发展。第

一次到河北访问，住了一个月之久，收集的那些数据资料没一个是有用的。

若不是林铁后来自愿提供资料，那就无从知晓他在大跃进期间给了五公村两百万元的财政资助。其后，如果耿长锁不提醒注意，那么我们亦无法了解到国家给了王国藩的西铺村数目更大的财政资助。为了揭示集体化后幼儿数量减少这一外人看不到、而内部人不肯透露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家访。我们十分了解官方对通过现场访问收集资料所作的限制。

四个连续性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象为极权主义的人可能认为，他们的观点可以被本书中有关国家对农村生活的渗透、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和动员性的一党专政进行控制，以及导致少数掌权者和多数无权者之间产生差距的一切因素的讨论所证实^①。本书对遍布的治安警察和民兵组织的暴力作了描述，而以前的中国乡村研究对此未曾关注。但把中国视作极权主义，便不能抓住从事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改革的干部中所发生的政治冲突的重要性。^②它掩盖了地方权力是如何扩大、自我巩固和捍卫地方利益的，也使人看不清宗派网络是如何产生其固有生命力的^③。最重要的是，极权主义理论预先假定了一个自我复制的极权，可我们的研究却发现了一种矛盾的体制，其扭曲的逻辑逐渐使国家变成非法，并使社会产生异化。在1949年前的反抗斗争期间已在酝酿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它多么无情，都不是永恒的自我复制的极权。它远非一块全面控制的磐石。它在胚胎时期就形成了导致国家与社会分裂的因素，这种分裂最终引起了被疏远的大多数人的愤怒。

从深层次看，抵制变迁和保护稳定的结构性因素不是受到

教条主义者的政策风向的冲击，就是受到改革者的政策风向的冲击。既没有致力于转变内在的政治文化，对保安性的国家控制提出异议，也没有摧毁地方上牢固的关系网络。政治文化、国家控制和地方关系网络结合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已经不能通过特殊的政策来摧毁它了。

本书的研究发现，一种强有力的、普遍的文化，在亲戚关系和村庄、家庭和居住地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如1984年耿老板的长孙成为五公村支书，这与1938年八路军联络员靳清廉躲在他姐姐家，建立了一个基于宗族和邻居关系之上的党支部并无二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发动了不受欢迎的反传统运动，却均未成功。官方的社会主义文化确曾使原始忠诚变得更加强烈，更加神圣，这时它们不免隐而不露。如果国家控制削弱，这种热情和信仰就会爆炸，从而改变政治形态。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反对地主、私有财产和市场的斗争，还是群众运动和大灾难，都未使人际关系和认识方面产生重大变化。^④当农民们在社会主义新结构内部和周围自行其是时，他们同样利用了传统价值观和人际关系。

农民们按照宗族、宗教、村庄遗留下来的惯例和标准，以及包含在长期形成的习惯中的传统规范进行思考和行动。某些国家行为的不合理性和长期的非道德性使农民们进一步转向传统规范和组织。多样化的与自卫的农民整体和为了进攻传统而试图渗透到社会中引起冲突的国家机器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构成了农村生活的内容。

因传统太庞大，也太复杂，从而不能简单地说好还是坏。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例如家长制、性别歧视、暴力，悲剧性地强化了新权力体制中的负面，使之变得更糟。但传统文化和经济措施并非只有不合理的一面，这类措施也包括从家庭内部分工到通过准备救济粮应付自然灾害等许多在经济上有效的

甚至是救人一命的办法。农民家庭经济还有助于进行某些合作。50年代初蜜月时期党的政策依赖于农民传统中某些健康的势力，却又把家庭耕作、副业和商业当作恶魔和剥削；同时，逐渐把中央集权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的控制视同为解放的外来经济教条，损坏了经济，疏离了农民，破坏了农民家庭的合理性。节俭和勤劳程度减弱了，命令主义的从属关系和家长制得到了加强。

在被以阶级斗争为名义的政治清洗制度弄得四分五裂的农村，村庄和家庭失落于无力的地位。有些失败者抵制垄断资源的、与国家机构关系密切的组织，他们暗中着急，在背后散布流言，警告其孩子不要与那些得到干部偏袒的人发生冲突，并谴责有特权的村庄进行偷窃。那些孤军奋战者相信，要求他们竭力仿效那些人的疯狂之举，乃是虚妄的。那些处于国家运转轨道之外的人要生存，就须佯装不知，奉承，建立私人关系并寻找有权势的庇护人。也许耿老板在向他的养女解释社会主义制度时，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旧家庭秩序的规模变大了。

国家仍在进攻文化以及象征着人一生中意义重大的时刻（包括出生、结婚、死亡）的仪式，还有那些与寺庙、宗族和节日相关的公共信仰，从而褻渎了许多对中国人生活极为重要的东西。这些非正式的纽带是社会粘合剂。^⑤ 哀悼和庆贺人皆有之，分享快乐、悲伤和痛苦是人性的需要。

国家发动了对农村文化和家庭经济的斗争。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后果是，被没收了这么多私有财产的农民，紧紧地抓住从家庭到宗族再到婚姻关系这些幸存的、实际上已少得可怜的家庭财产。这些设防的传统心理埋藏得比较深，常常表现在秘密会社和宗派中。有的暗中保存他们珍藏的东西。党乏力地宣扬性别和代际的平等，宣布婚姻个人自主。反市场的集体化教条主义把农民锁在村里，无视农民流动的要求和市场的力量，它

们在有的地方已削弱了农民家庭文化中的保守成分。为了生存、保持尊严和逃避穷困，许多农村家庭按照更加狭隘和专制的方式来行动，权力在握者也如此。社会主义逐渐掺入了许多传统中最糟的东西。

在体制内部，无人采取行动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挖井忽视了环境因素，地下水位下降。化肥常被尽可能最大量地使用，忽视了对人的健康和其他生物之生存的影响。鼠灾四起。当老鼠吃掉了更多的粮食时，鼠药的需求大增。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认识到需要解决正在不断恶化的生态危机。

地方干部的作风和人事方面的变迁终止了革命蜜月时期，而从历史编撰者对革命群众是老百姓还是一群暴徒的争论来看，这个变迁被概念化了^①。这个问题不应被当作寻求落后群众的本质来看^②。我们发现，内地农民原本并不是天生无理性的。早些年，当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干部与百姓的需求相一致、并在五公村结成联盟时，他们起用受人尊敬的新干部，与农村文化中积极向上的、团结的方面融合起来。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的静悄悄革命和蜜月年代，过上与文化期望相一致的美好生活曾经成为可能。但当外地来的干部实行分裂村庄之暴力和恐怖时，他们便采用原先的方法和自发抢劫。它们固然可以动员流氓，却不能团结整个村庄。在传统农村生活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降低的趋势同时并存。强化命令主义压制的国家政策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有人注意到五公村的这一转变：在50年代，凶猛的张端和他的助手铁人李多林发迹起来，而李茂修、李沛琛、李金爪和师喜生则成为替罪羊。在我们研究过的其他大部分村庄，缺少像五公村那样的统一领导和得到国家支持的经济后盾，因而遭受了更多的暴力、当替罪羊、痛苦、虐待和压制。^③

在寻求农民们对这些创伤有何总体反应时，本书并没有倒

向农民社会能否理解为伦理经济还是理性经济之争论中的任何一方^⑨。伦理经济学家并不否认经济理性的重要性，而理性经济学家也接受地方文化的相对自治。可是如果采用理性经济来表示农民充当分散的个体角色，那么本书所提供的关于居住地和宗族群体的直接性和首要性的关键性资料，便同理性经济的基本前提相矛盾，如果采用伦理经济来表示农民是仅关心生计的农夫，那么本书中有关市场、副业、临时工和汇款之重要性的资料，则否定了伦理经济学的基本要素。与以往有些人强调民族主义，另一些人则强调经济改革对农民的动员的争论一样，伦理经济与理性经济对立的争论，现在看来有点勉强。

破坏性的国家政策，在经济关系仍植根于多子多孙的、精耕细作的家庭关系之上的村庄里行不通，但在1952年之后，原来以集市和外出赶集为媒介的村与村之间的关系却因受中央集权主义者的限制而减弱。做买卖的人和流动的核心家庭没有增加，赶集和上庙会越来越少。经济后果也是如此，如1954年河北粮食产量骤然下降，原因在于国家取消了粮食市场，并强行把粮价压低。结果是粮食产量比此后任何一年都低得多，除了1961年饥荒之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针对农民文化的教条主义斗争出人意料地通过限制农村和家庭文化生活而加强了狭隘的地域成分。

由于贬低农民文化的价值，集体农庄看上去像一匹不能运货的跛驴。随着集体农庄与国家堵住了劳力流动的出路，不能充分就业的家庭劳力增加了。把额外的家庭劳动时间视为免费的农民家庭情愿辛勤劳动，谋取生计。因此，集体活动范围的无情扩大，使那些家庭感到家里像被盗了一样，而他们相信，他们的生活本可以过得更省更好。由于缺钱的集体农庄效益差且分配不公，农民家庭拼命地让某个家人在国营机构中谋得一份拿薪水的工作，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挣钱就行。为了勉强生

活下去，农民们只得适应这种环境。

这种传统的物质实用主义，在毛以后的时代受到知识分子的谴责，他们追溯到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坚决认为农民的这种适应性产生了没有骨气的满足情绪，而不是积极地反抗非正义。在思考农民们为什么不积极地反抗强加到他们头上的灾难时，这些分析家发现，家长制权威的家庭社会化，有利于对暴虐的政治领导人的崇拜，有利于地方霸权的产生，而这些地方土皇帝能够从反知识分子和反城市的愤怒中获取文化上的支持。的确，从1947年的恐怖时期到大跃进，大量忌妒的农民图谋报复地要求把其他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上。教条主义政策强化了农民文化中这些天生的残酷内容。

在这期间和这些地区，蜜月时期的团结让位于痛苦的分裂。事实上，从与曾在这些地区进行土改的积极分子的交谈中可以发现，在1949年建立新政权之后，这些地区行动迅速，一次性地重新分配了土地，而通常是由那些年轻的城市人指导解放最贫困的人，把斗争矛头对准他们的敌人。他们帮着把最具报复心理的人变成村里新的掌权者。这种情况在像饶阳这些解放较早的地区不太普遍，基础较好的当地党组织按照较为渐进的程序制定土改目标。而在解放较晚的地区，则由充满了愤怒和痛恨的有报复心理的年轻无赖，通过个人和宗族间的仇杀，残酷地肢解了村庄。相反，在那些分裂的饶阳村庄如耿口，几乎是平安无事。

可是，如果民主曾与各种独裁主义文化糅合在一起，如希腊正教、罗马天主教、犹太教、神道教（日本），更不用说蒙古的佛教，南亚的伊斯兰教和印度教，那么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惟独儒教文化不能与民主相容。而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东部儒教地区已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民主。中国传统的农民文化与前合作化时代的自我管理的合作社是相融合的，无需排斥主要的

进步性政治主张。

在中国农村，新制度的合法化不是民主，而是农村汉子们狂热的爱国主义。无论经济政策带来多少阵痛，从国家以强制性价格控制粮食贸易，到宣布市场为非法和以集体化的名义没收农民土地，再到大跃进的饥荒，新政权都一直在农村穷人中保持合法化。农民出身的战士的爱国经历，与对待领导人的传统态度有关，年轻人也许痛恨地方恶霸和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可新国家却是他们的。毛泽东是他们的领路人。制度的牺牲品可能是忠诚的，不管他们有多么不满。

在徐水公社，年轻人一面劳动，一面唱歌。饶阳的青少年听到《国际歌》的旋律就群情激动。耿老板介绍东欧和中欧的国际团结的报告在他们中间引起共鸣。华北农村青年投身于林彪发动的建立纯洁无私的民兵组织的运动中。所有人都试图证明，他们是英勇牺牲和作出贡献的革命先辈的真正接班人。为了国家和共产主义利益的理想主义，在中国青年一代中汹涌激荡。

领导者、社会准则和制度，以及毛、军队的“男子汉气概”和军队—民兵的这种合法性纽带，与年轻人在社会化中的结构性倾向相吻合。年轻的男民兵在武艺士进行较量。在五公村，像耿老板的外孙张满囤和刚复员的李忠信这些后来居上的民兵干部，比赛举起盛满水的大锅，并只准用手指紧贴在大锅的外面。英俊而又高又壮的李忠信展示了令人敬佩的男子汉力量。在合法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着连续性。

当然，大跃进有损于合法性。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并未吸引年轻人用尽浑身解数，到不景气的集体农庄之外去寻找工作机会。村民们开始嘲讽干部，埋怨事情正如何越变越糟。农民们注意到，免遭饥荒之苦的城市工人不敢吐露真相，因为这样做就有危险丢掉他们的粮食保障，即所谓的铁饭碗。但一无所

有的农民就没有什么可丢的了。一些农民瞎嘀咕，毛的所有理论可能是伟大的，可伟大领袖却没让人们吃饱。现在农民们连要饭和赚钱的权利也被剥夺。

在许多人的眼中，包括家里有人受迫害的在内，毛会做错事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大部分农民仅仅希望毛能知道他们的困境，他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和最大的救星。在抗日战争以及在土改中宣告结束的静悄悄革命中，正是他使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对许多贫困农民来说，毛、军队和国家仍象征着一条通向幸福生活的道路。

不过，反对力量也在酝酿之中。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动力和结构中找到一种早期的张力，当它越变越强时，最后的结果便极为严重。这些种子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在体制基因中种下了，例如无情地打倒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的治安部队，以及把所有积累起来的财富当作剥削成果的社会主义观念。毛并不是由于1957~1958年反右运动的不公正或大跃进的经济不合理性而突然犯错误的。在五公村，专横而不负任何责任的权力在由外地人组成的工作队中就已出现：1944年，他们强制实施了经济上不合理的分配方案；他们还报复性地寻找替罪羊；1948年，合作社有能力从一个无权的老民兵中夺走一头驴并把他开除出党；50年代，强有力的治安力量不断壮大，它把无辜的牺牲者打倒，且不给申述权。在这些弊端中，有些起源于中国传统，更多的则是从苏联引进的。但在饥荒时期，牺牲者们最初归咎于个别腐败和野心勃勃的地方干部。可中央领导人努力把义愤集中到外国人和叛徒身上。

贫苦农民汉子们的民族主义以他们的军队和国家已拯救了穷人这一观念为前提，从而预防制度受到攻击。当毛把饥荒归咎于1960年苏联撤走援助时，这种民族主义观念引起一种积极的反应。耿长锁认为，在50年代，为了打败美国的经济封

锁，爱国的农民勒紧裤带，是他们拯救了中国。他毫不犹豫地同意是农民在60年代又一次拯救了国家，当时，为了进一步打破苏联利用中国的饥荒而强占租借地的企图，农民再一次勒紧了裤带。农村的穷人把保卫祖国的战士看做自己的孩子，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感。我们在研究中收集的资料表明，认为毛格外注重平稳地发展经济是错误的。事实上，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军队事务、民族主义要求和诸如消灭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私有财产这类乌托邦目标上。

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认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法国革命的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在法国的重要地区，在1789年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分歧——常可回溯到17世纪宗族分歧或农民起义——继续影响着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政治。在中国也一样，无论北京推行什么政策，中国仍继续保持新的一致。这种对国家建设事业的爱国主义认同感如此之深，以致华北农村青年热切地响应1960年林彪提出的民兵建设的号召，目标是建成一个毛提出的独立的，为穷人服务的国家。1961年，国家利用这种浓厚的理想主义，把苏联当作替罪羊，并谴责一些县级干部，让他们对大饥荒负责，并把他们处决。

除了农民文化和新民族主义之外，第三个连续性超出了政策变迁和宗派的盛衰沉浮的范畴，它深藏于赋予制度结构以实质内容的忠诚的个人关系之中，而后者变得更加牢固了。无论是谁，只要处在人、地方和组织机构阶梯化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他都必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道出了成功的秘密：关键在于跟国家的关系。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级党组织要求饶阳抗日组织派一个农民到延安汇报抗日中心地区的生活。但农民们却对长途跋涉到一个又穷又陌生又遥远的地方不感兴趣。一个来自曹庄村、绰号小狗的可怜乞丐拿着路费走了。他在权力中心的位

置使他很幸运，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他搬往控制资源的首都，在北京当了官。

政治犯、永久被流放者和黑五类处于地狱般的深渊之中，人们都避免落到这般地步，这些人的儿子很难找到对象，因而家族面临香火断绝。官员们拼命地抱住自己在国家梯子上的台级，煞费苦心地想往上爬，他们的合力产生了一个极端稳定而实际上又不稳定的体制，在这个体制内，政绩、创新、技能、干劲和贡献不像籍贯、个人关系和政治地位那么重要。书中已阐明了个人关系网络如何产生、运作，以及如何在农村通过与党政军上层领导的关系而加以制度化。

由于体制是整体结构的一个方面，所以个别人的禁欲主义无法改变它。耿老板过着于分简朴的生活，但他又处在国家特权阶层之中。统治者赞扬自力更生和共同富裕，却对受宠的少数人给予奖赏。对于那些特权圈子以外的人、那些无权享受宝贵财富的人来说，不可能因为耿老板谢绝一台留声机，或因为他的村庄采取了平均分配财富的形式，就会得到生计上的改善。

那些圈子内的人获得了最新、最好、最宝贵的财富。他们有关系。至于那些圈子以外的人则被迫相信一个谎言，他们被告知，公有和平等将带来财富。农民并不感激为他们制造工具的城里人，国家对禁欲苦行的平等鼓吹越多，它对许多圈外人就表现得越虚伪；他们被迫过着艰苦的生活，而特权者却公开地从得到巩固的体制中获利。受排斥者在体制的围墙外寻求生存机会，而这一体制结构又迫使任何一个受宠的单位设法抓住所有的好处，不管它是否过剩。受宠者当然更加喜欢社会主义了。

虽然眼睛盯着五公村果园篱笆的耿口村农民能够看到，通过制度化的个人关系网络，受国家偏袒者只顾自己，可在饶阳

县，受宠者和被遗弃者之间的差距确实要比大多数地方小得多。耿老板正确地指出，在河北，像西铺、南王庄和周景庄这些模范村，所得的国家援助远比五公村多。许多外地人注意到，这位姓耿的干部拒绝了国家提供的主要市场和无偿劳力，他一点不贪，比较诚实，也比较注意不像其他地方大多数特权干部那样把和邻村的关系闹得很僵，拿走所有能拿的东西。组织体制建立起来，在较大范围内巩固了不平等和等级制度，并拉开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差距。对饶阳县的研究只会暗示：在别的地方情况何等严重。

根深蒂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连续性，反映出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及可供解决它们的有限资源。从清朝到民国衰败，国家领导人寻求有才能的当地人致力于民众的福利，由此国家就能富强起来，直至足以抵抗外来侵略。就连偏僻的饶阳县也受到这种现代化改革尝试的影响，但在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仍是税收提高，土地—人口比例恶化，腐败和暴力加剧，列强将其意志强加给中国。在爱国的中国人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似乎彻底清洗了屈辱的过去。

但结果是裂痕并未得到弥合。虽然新政府唤起了民族主义情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并加速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仍没有解决，而有些方面甚至更严重了。由于国家领导人把计划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加以拒绝，因而土地—人口的比率进一步恶化。同时也没有全面推行把有文化、有才能的人用在适合的工作岗位上。新的腐败形式得到巩固，教条主义者轻蔑地拒绝了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嘲弄现代社会的准则和教育。

始于30年代的群众性教育改革是10年静悄悄革命的开端，它在50年代继续进行。饶阳中小学教育对男孩和女孩都开放，虽然只有比例很小的毕业生能升入高中。但包括农村教

师在内的这么多有文化的人，在 1957~1958 年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了冲击，知识分子和文化努力（cultural endeavors）受到了冷遇。当地干部们把外地文化人当作潜在的叛徒。由扩大办学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最终破产，这迫使当地政府关闭大量学校。大跃进之后，教条主义者向爱国的农村青年提供了民兵工作、劳役和政治运动。这个制度自豪地把没有文化的、政治上忠贞不贰的积极分子当作其基础。

毛以后时代的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毛的失败与 18 世纪中期的清王朝很相似。由此看来，一旦排外性民族主义和正统观念盛行，国家就把世界先进科学拒之门外，从而严重限制了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在蜜月结束后的年代，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萧条只不过是失败的两个世纪中的又一次失败而已。一代代统治者通过自尊的排外主义口号巩固自己的地位，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仍然陷在历史困境之中时，许多东亚国家已跑到前面去了。

争 论

本书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的腹地，对有关中国不同农村地区的特征的一些重要争论提供了解决的线索。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市郊农民看来，像饶阳这些地方是文化和经济都很落后的地区。住在市郊或交通干道沿线的人有 15% 感到经济上很宽裕。在雨水充沛的适于生长多熟作物的南方产粮区，农民的儿子们没有参加红军去打仗，对日军的感性认识极少，因而面对着与爱国的北方贫苦农民完全不同的现实。1947 年就完成土改的一些东北农民发现，国民党军队跟在他们后面追。他们杀死了所有有可能揭发土改中之残酷一面的人。他们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9% 的生活在国营农场，他们分享着产生

另一番感受的安全和福利。在没有现代交通和通讯的最穷困的山区，西北和西南地区有 25~30% 的人情况更糟。在任何一个国家，政治冲突和联盟都反映了地区的差异。而在一种把人们锁在村里不准外出的制度中，这些现实问题显得格外沉重。^⑩

学者们讨论了革命是否不可避免，外来侵略的偶然事件是否阻止了国民政府结束混乱、衰败和岌岌可危的统治的问题。无需否认日军侵入所造成的转变，如使一直受压制的共产党在饶阳和华北平原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不过，有一点却是真实的，即国民党已不能用爱国主义动员已经强大的精英，更不用说发动大多数农民了；1937 年之后，共产党在这两个方面均取得了成功。国民党不能容纳农村内部处于分裂状态的势力，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税制改革却取得了成功。

一些学者把农民的民族主义归因于对日军暴行的普遍反应。我们则认为，在日军到来之前，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已经找到了民族主义的解决办法。日本的非人道确实具有重要的动员作用，因为现实的先决条件使爱国者们把这些暴行看做例证。否则这些暴行仅被看做坏人的个别行动，或是所有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悲剧。

从民族主义角度来看，广泛的农村知识阶层形成于 20 年代北伐抵达华北的时期，就连内地的农村文盲也受到反帝动员的影响。早在义和团时期，许多农民便把外国宗教和在外国威胁面前发抖的中国政客们视为非法。

有关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两者间关系的争论还在继续。一些学者提出集体化是结束毁灭农民家庭的两极分化的衰败趋势的惟一途径。但在包括饶阳在内的内地农村，长期衰败并不是由两极分化造成的。最大的受害者是受排挤、被迫离乡背井的人，而留下穷得无力娶妻以便延续家族香火的人。一些

人跑了或死了。不过，华北的记录材料却与土地集中在少数比较富裕的地主手中这一观念不符。比较富裕的家庭也在衰落。在内地，几乎每个家庭都急剧地趋于没落。后来，共产党保护来自贫困乡村的战士家庭的政策，使穷困潦倒的汉子们可以养活他们的一家人。复仇的农村流氓，有不少来自亲戚关系很少的贫困家庭，他们对教条主义领导人的破坏性动议最敏感，也最拥护这些领导人的政策，这些政策需要政治替罪羊，制造一种恐怖气氛。本书描绘了这种农村流氓阶层如何与军队和民兵缠在一起，助长了一种邪恶的普遍政治文化。

经过社会变革，党的战时改革给贫困农民带来了新的希望。饶阳社会秩序的逆转，在1938年和1946年的对比中得到充分反映。到1946年，在税制改革中受到削弱的富裕宗族成员，通过交出土地来逃避交税，故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土地所有权已分散化，产生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小土地自耕农世界。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分散与以前的危机时代形成对照，那时贫困家庭设法通过把土地捐给有权有势的家庭来逃避交税，从而有利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①

1938年至50年代初的静悄悄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相对公正的社会，但党的教条主义者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是，好像它几乎从未出现过。党的许多领导人在认识到自己正在通过集体化和国营化经济取代农民家庭经济、领导一场通向社会主义和公正的阶级斗争之后，便把农民的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看做带有剥削性质的资本主义倾向，并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极少数富人和贫困化的大众。党的领导人如此迷恋苏联道路，以致他们从未认识到进行自我革新的重要性。40年代所进行的静悄悄革命，本来可以避开苏联的信条；但最终还是采用了它，而在领导人的头脑中的观念，对后来影响巨大。受社会主义以国营工业为基础的理论所驱

使，党的领导人未能从他们在农村解放平均主义小农经济的生产力这一特殊经历中抽绎出普遍性原则。^⑩党史学者很少提到在1938~1954年这14年多的困难时期所实行的人道的根本改革，曾经重新整合了家庭和村庄，并以与农民理想相一致的方式改造农村生活，使党取得合法性，允许家庭单干和互助合作并存，扩大口粮的分配比重，激发了经济活力，从而提高了生产力。中国不仅仅进行战争动员，实际上，家庭重新组合、文化复苏、经济上继续获利贯穿于整个蜜月年代。对于已经历过10年静悄悄革命的农民来说，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并非一个大断裂，不过，对农民来说很不幸的是，必须消灭农民财产和文化的思想观念也与之俱来了。

从1952~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政策抑制市场，从农村获得剩余产品，为城市的军事工业服务，也为支持迅速膨胀的官僚机构服务。从抑制远程贸易开始，国家紧紧抓住了以强制的低价征购粮食和棉花的垄断权。先入之见使党的领导人无从理解，他们的政策怎么会造成短缺、导致腐败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尝试实行更多的国家控制和更大的农业生产单位。^⑪最后在1955~1956年，党放弃了静悄悄革命和蜜月年代所取得的许多最美好的成果，走上了强制集体化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对农民来说，大跃进教条主义这一悲剧性转折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因此，集体化并不是促进和刺激农民家庭经济的自然结果，而是一个经济上代价极高、政治上异化的大断裂。它打破了与农民经济合理性相一致的政策。种田有各种各样的任务，如耕地、播种、除草、灌溉、施肥、收割、储藏、上市等等，每一项都要求按时行动，而且只有在与购买者交换时才能赚到钱。无法决定劳动成果中百分之多少应归功于除草者或灌溉者，也无法测定并恰到好处地向最有贡献者付酬。精确地评价

和计算每个部分对整体工作的贡献是不可能的。除非以感情粘和或昂贵地兑现诺言来支配种地者，否则任何集体分配体制看来都是不公正的，因而实施起来令人沮丧。

1953年，卢广顾问开始寻找解决五公大社平均分配方案的办法。1953~1954年间，他设计了复杂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制，以弥补大社平均化的消极影响。尽管他设计的某些付酬办法相对来说比另一些办法更公平，但没有任何一种能完全消除大社的紧张关系、消极状态以及所经历的不公正的持久性根源，而这都是集体化道路上的绊脚石。本书对大社试验失败的分析，有助于阐明为什么集体化越是一大二公，反而越是每况愈下。

本书建立在法国学者琼—卢克·多梅尼赫的开拓性研究之上，是他调查了大社如何成为集体农庄和公社的试验形式。从1953年开始，毛和他的助手们便密切注意这些大社，不过没有历史记载。他们分析了国家给予极大支持的单个实例，坚决认为这些特定村庄的成果可以普遍地加以推广。毛提出的迅速积累和发展的动员计划和压力，均把农民尽可能快地——事实上比可能的更快——推入更大更共产主义的劳动组织，但国家强制性的大劳动单位不能给穷困的杨各庄、萧条的邹村、非商业化的尹村或四分五裂的耿口村带来富裕。它们和其他大部分村庄在艰难的道路上蹒跚前行，而像五公村这类受宠的村庄则路途平坦。提倡向模范学习的政治口号助长了大部分中国农村对于未来的错觉。

集体化的异化性影响并非必定造成最大的经济灾难，那还需要有经济上不合理的教条主义政策和可怕的政策推行手段，其中有些已在1947年可怖的土改中开了先河。这种政策在1957~1958年反右运动中达到了空前程度，正如人们所说，它使1958年成为毫无真话可言的一年，而随后的饥荒则是由

精英们的狂热行为、强制群众保持沉默、异化性的苏联式集体农庄的经济不合理性，以及教条主义者针对群众文化、货币、商品、家庭副业和市场的战争等等混合的产物。^⑨这种教条主义加剧了中国偏离改革政策的道路，而正是它当初创造出了蜜月年代的希望。

自我夸大的创伤

一些历史学家把这段失败的历史当作证据，以此证明一个非共产党政府也许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用世界市场的机遇，建立强大的农民家庭经济，更好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可是没有别的政党有能力夺得全国政权，建立这样的国家。

由于以前的统治集团和运动不能建立一个强大到足以捍卫中国利益的国家，因此，在20世纪前半半个世纪中，苏联在蒙古的扩张和日军对满洲的进攻破坏了贸易和人民的生活，即使在边远地区饶阳也是如此。由于国民党不能保卫中国，因而内地农村的衰败在某种程度上仍在继续。当然，20世纪初介入世界市场的东北几省及天津、福州和其他地方的引人注目的发展，确实拓展了经济机会，连趋于破产的人不敷出的边远地区的农民也从中受益，从而缓和了他们衰败的速度和痛苦的挣扎。与世界市场联接的地区的收入虽不稳定，却使老民兵徐义洲从福州回到老家五公后便成了家，而像李沛琛这样一些人不敷出的家庭，也靠从天津寄钱保持完整，这类收入还使李忠信的父母在东北活了下来，并在此后回到老家。虽然世界市场对政治的渗透加剧了军阀混战，并使征服合法化，从而使中国农村受到掠夺和破坏，但世界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仍可视为纯粹的经济现象，它有益于一些农民的生存。事实上，人口稠密的华

北平原上的幸存者需要进入市场或与城市相连的副业、商业或手工业，以弥补少得可怜的农业收入。

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可朝鲜战争的禁运令却暂时阻碍了它与深深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国家之间的往来。而从1952年开始，中国政府不光把外国投资，还把长途国内贸易当作剥削加以根除。结果，新政权又造成了一些伤害，足可与那些由破坏市场和搞垮经济的征服者和抢劫者所造成的损害相提并论。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混乱之后，50年代初远程贸易的恢复，确实使一些生意人赚了很多钱。不过，有很多限制牟取暴利的办法，如税收、立法和竞争。这些措施可以使鹅继续孵金蛋。中国统治者倒是没有杀鹅，但却发动了一场针对市场的战争。在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农民们承受了由压制市场和集中资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冲击。

最早的悲剧预兆是1947年的阶级斗争土改，当时所有农民生活水平均已得到提高；就连党提倡的合作计划的受益者都被嫉妒的眼睛盯着。人们把赤贫者当作产生共产主义力量所依靠的惟一源泉，差一点把穷人较少的耿合作社当成剥削者的富农组织。这种教条主义以站在穷人一边的名义破坏繁荣，平分财富。这些公开赞成贫困的政策，反对惟一能给所有人带来财富的发展。虽然穷人从财富的一次性分配中获利，但这种平分政策的重演，阻碍了所有人的富裕，使贫困地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家庭陷入贫困之中。

把1955年之前自愿入社的、渐进主义的和自我管理的小合作社政策看做某种选择道路的分析家们，并没有看到党坚定地走苏联道路的决心，即现代国营工业必须以集体化农业为前提。在华北内地，社会主义领导人坚持走苏联道路，国家控制了农村经济剩余产品。毛和邓子恢都同意这一点，毛急于走上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可邓仍希望提高农民收入，逐渐为现代投入提供资金，最好是按自愿的方式进行集体化，因为这在物质上对所有农民都有利。相反，与斯大林一样，毛强调集体化是国家对所谓的阶级冲突的干预，是站在正在壮大的、受剥削的、占绝大多数的穷人一边，反对占少数的剥削者。^⑤不过，我们在研究中并没有发现用于证明这种外来教条，即证明集体化是避免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材料。由于革命已培养了大量中产阶级，不管是什么在50年代制造了贫困或阻止了发展，反正不是增长着的富农剥削。

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鉴于大量的相对自治权受国家控制，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国有化，对于地区的战争和禁止人口流动，政治已成为决定性因素。1945年，驻在五公村的党的工作队，在合作社中推行新的分配方案，疏离了农民家庭，导致合作社的分裂。耿秀峰知道，许多人感到更加教条主义的分配方案是不公正的，它忽视了必须对土地和资金的投入给予奖励，但他又不能反对上级党组织。结果是失去了一半社员家庭，把合作社搞到了崩溃的边缘。

1955年，当毛命令停止按苏联道路进行试验时，所有农民又被迫走上了中央政权强制的一条道路。仅有少数地方保留了合作社。不过，差异性扰乱了党的列宁主义推测，其领导人借着马克思的科学理论，率领所有人走上一条奔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的评论家们称这个党强加的惟一真理的正统观念为“一刀切”。由于强制所有人走一条路，就不可能再有发展、富裕或正义的自主要求了。生活本身被集体化和国有化了。各地的积极性没有了，农民们发现自己已无独立的人格。传统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不可能让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大多数无权者获得权力。

在当时的中国，国家权力的集中和领导的偏好使得国家目

标和组织结构的性质至关重要。对于权力的专横、强制和滥用，没有任何检查制度。通过阶级斗争促进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是体现民主的最高形式这一列宁主义信念、斯大林主义体制和政策，以及遵循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者，均使农村爱国的支持者牺牲惨重。本书把注意力放在革命历史中固有的选择方案，以及传统苏联道路和最后选择的教条主义道路这两者之间的相关代价上。更加共产主义化的教条主义动员政策虽然合法化为帮助穷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堵住了穷人脱离穷困的大路，即使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也是如此。

旧史学与新史学

回顾一下轻浮的宫廷贵族式的启蒙批判，本书在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的争论中，在对政权中心决定政治事件的强调与对更深层的结构性力量的关注的争论中，并没有选择任何一方。每一种论述方法都抓住了重点，虽则是局部的现实。

与新史学关注由非个人历程形成的自治群体一样，我们的研究也发现，社会解体、长期经济衰退和软弱的国民政府是有益于革命民族主义生长的重要的长期性因素。但正如旧史学所提出的，政治也具有决定性和根本性。毛强制进行快速集体化，强迫向共产主义进军，压制邓子恢提出的渐进主义方法，均影响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机会。1959年，毛撤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并擢拔林彪，这并不仅仅是一场宫廷政变。他们允许继续推行灾难性的大跃进政策，使数百万贫困脆弱的中国农民身受其害。权力顶峰的斗争以及决策往往影响深远。

本项研究也着重详细描述了农村家庭挣扎着从国家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中幸存下来的经历。农民的选择和计谋是由深层的

连续性促成的，从农民文化中的不信任、家长制统治倾向和强有力的憎恨外国人的民族主义，到家庭和文化中丰富多彩的传统，以及受气候、土壤和土地—人口比率制约，不一而足。农民们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尊心来撰写历史。

与主张研究平民而非精英，或主张诠释、意蕴和连续性而不是纠缠过去历史的原因、结果和断裂的新史学家们相对应，本书一方面连接家庭、宗族和村庄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领域，另一方面又把国家、统治意识形态、经济控制和政治历史的领域连接起来。地方干部们生活在已经社会化的农村习俗中。生存策略中包括利用宗族关系和国家结构。权力结构也是家庭关系的网络结构。此中的现代成分很少，比如年轻流氓、年轻人、半文盲的农村汉子们的暴力、狭隘、家长制力量，并非源自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斯大林的制度，甚或毛的指示。本项研究揭示了现代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传统农村社会、人类行为、信仰和结构的相互作用和动力网络，已经扭曲的和正在扭曲的整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得到巩固的体制充满了非法的力量。在大跃进的饥荒期间，有人秘密地把精英的新年礼物送到一些高级官员的家里，而大多数人却没有饺子和爆竹。这种体制在秘密送礼曝光之时就破坏了其合法性基础。它因组织伪善而为自己埋下了处于非法地位的种子。这种伪善造成大众性的玩世不恭和追逐私利；在大跃进饥荒的复苏过程中，腐败开始普遍流传。

这一等级特权体制体现了封建传统的成分，它与现代化中的世界性惯例相抵触^⑥。可五公村、饶阳县和衡水专区的掌权者却明确否认我们的分析，即把集体化描写成牢固确立封建式的制度。他们拒绝把没有土地、不能离开土地、与土地关系密切的农民，与生活在封建君主统治下的农奴、毫无权利可言的农民进行比较。地方干部们坚决认为，社会主义保障了劳动人

民的权利，农民不再受地主剥削。他们辩解道，集体农庄公平地按劳付酬，是在为所有社员，并首先是以前的穷人谋利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也不会进行剥削。所有农民在财产上和经济发展中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社会主义被宣扬为一个合理的、广泛的、公正的分配制度。

集体化时代的执政党公开地以充满封建色彩的语言使自身合法化。干部们公开主张他们是父母（通常只是父），而人民——甚至基层干部——则是孩子（子民）。相反，在共和政体中，却假定公民是成人，而非需要喂养、惩罚和强制服从的孩子。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被描写成受到关心他们的父母之惩罚的孩子。其实，他们的地位并不是由个人的行为、而是由被婚姻和出身所决定的血缘关系所导致的。

在否认上述现象的封建性质时，官员们忽视了诸如耿口、杨各庄、邹村和那些不受偏袒的地方的农民，以及全国被贴上黑阶级成分标签的、数目一度扩大的“非人”的经历。借助于穿不透的墙，国家把受排斥者和受轻视者与受国家偏袒者隔离开来。饶阳机场建在一个没有良好政治关系的地区，对所征用土地所支付的补偿低得荒唐可笑。人们通常因土地被征用所要求的、而且很难得到的补偿是，为儿子在国家特权机构中谋得工作。当国家从没有有力庇护人保护的村庄征用土地，将其用于监狱、办公楼、道路、大坝、工厂和其他工程时，它们很少得到补偿。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民共和国意味着为无权的穷人实现物质上的富裕，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蜜月年代，国家开始认真地实施改善穷人生活和为穷人服务的计划，为穷人提供土地、保健和教育，但伴随着强制性地低价征购粮食和土地集体化，国家又很快地收回了恩泽。向高级干部开放的部队医院的治疗水平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但农村医院却

岌岌可危，如饶阳的一家医院就变得破落不堪，或者准确地说是败落了。在预算上从不与公民商议。受排斥者无法知道，更不用说施压了，他们的预算优先权掌握在秘密决定资金的精英们手中。普通百姓无从得悉合理抉择所需的信息，政治参与仅流于形式。为劳动人民建造的休养所和疗养院实际上是为劳模们准备的，后来又只为官员们专用了。在国营部门中最好的工作和令人覬覦的位置，均被干部子弟继承。事实上，阶级地位的冻结，阶级成分的继承，以及对市场和个人能动性的否认，把大多数孩子牢牢地钉在他们父母的位置上。

封建式的准则被普遍地遵循着。尽管存在着财产继承、校友关系网和私人俱乐部，自由的共和国总还为天才们大放异彩的精英生涯创造了空间。胜任应该且通常是第一位的。但一旦具有封建性质的国家巩固了它的权力结构，便会使人任人惟亲的作风、私人关系和坚贞不二的忠诚在决定提升谁的问题上成为决定性因素。这种忽视竞争原则的情况，必定与现代化原则相冲突，使统治者失去信用。

在一个共和国中，人人均在法律面前被设定为平等的。而社会主义国家本将超越资产阶级世界，因为在那里富人用钱买法律保护，法律拒绝保护穷人。但消灭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党，却又使身份等级的不平等制度化，按照在国家网络中的等级位置进行权利分配。在本书所披露的材料中，刑事判决不是根据犯罪的性质，而是根据政治地位裁定的。特权，甚至法律本身是由对身份进行分层的等级制决定的。给予一些人特权并排斥其他人的首要原则，是在等级制中获取命令权和资源。殊欠平等的、坚不可摧的中央集权制度构筑了生活机遇。

公共管理中的共和主义实践，包括能人统治集团中的行政部门，意味着取消个人的、私下的和秘密的管理方式，也即废

除封建式忠诚关系，建立一个开放、沟通的公共政治秩序。无论现实中的自由民主理想多么遥远，可具有封建性质的国家却掺进了更多个人的、秘密的和透明的东西。

不过，农民们却非常自豪，他们在排他性的新政治仪式的内涵中发现了合法性。即使只是举手批准已由上级干部秘密决定的事项，会议似乎并非空洞的。应邀参加会议的贫困农民中没有黑分子，那些人中包括以前有钱有势的人。所以贫农对新制度的感受首先是，它赋予了他们以尊严，并把他们从一个不起眼的无权世界中捞救出来。即使会议是令人厌烦的，且受到操纵，表决仪式本身也意味着一个承诺，即以前的穷人不但不是好人，而且理应受到尊敬。

在毛以后的中国，主张改革的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封建性成分适合农民的口味，因为与他们的传统和期望相一致。很显然，在这一点上有很多事实值得我们注意，本书就已发现了很多。我们把农民理解成道德主体，不仅仅是落后的残余力量。党的早期政策与农民取得一致，依赖并扶持了农民的力量，而党的后期政策不仅打击了农民家庭、价值观和文化，还在达到教条主义顶峰时，严酷地建立在忌妒和张力之上，而那也是复杂的农村文化中所固有的。毛和农民出身的军队领导人对这种农民文化中的历史怨怒理解得很透彻。等级制的权威、家长制的两性关系和迅速恢复暴力的永久性模式，在中国保守的农民和掌握国家权力者中得到了加强。保守的大众文化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对强壮的传统农村汉子的文化冲击充斥于军队和乡村。这些文化因素阻碍了两性的平等和民主的实践。

在农民的经验分类中，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权力巩固之前还是之后，城市居民通常与傻瓜、叛徒和剥削者没有区别。干部们被看做在有椅子、沙发、灯具、暖气、窗户和卫生间的舒适

办公室里过着平静生活的人。而这些物质享受在农村一样都没有。这些可疑分子不仅尽情地享受从辛勤劳动的农民手中偷来的东西，还伪善地自夸他们在提高其他人的生活水平。有代表性的是，一些五公村的村民，直至耿老板政治关系网中所有饶阳的干部，都对只是稍稍有点城市气派的、有文化的耿秀峰不满，因为他声称他在合作化中的作用更大。在他对于文件的知识和他的外界关系中，他似乎太能说会道了，几乎是个异己分子。虽然耿老板也成功地建立了与外界的关系，但耿秀峰却更易于被怀疑为有威胁的外乡人，而不是全面动员的集体化的支持者。

农民们不信任夸夸其谈者。他们认为，他们在抗战中的默默受苦和勇敢作战，加上他们又脏又累的户外劳动，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农民和没上过学的地方干部们热情地欢迎对在假想中轻视他们的专家和自负的知识分子发起教条主义的攻击。耿老板知道如何与这些群众热情打成一片，正如向没有文化的穷人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的凶猛的张端和男子汉李守正一样。我们看到过守正在小街上慢慢地走，周围挤满子他的信徒，当他们高兴地伸手触摸他时，还听到那些东村人咕哝道，“守正来了，守正来了”。

当毛宣扬共产主义式的自力更生，消灭不劳而获者、市场和货币时，农民们对毛所说的话表示理解，他与他们在一起，与他们在爱国军队中冒着生命危险的孩子门在一起。有关抗战的神话没有关注到税制改革——而正是这一改革在1938～1946年的静悄悄革命中创造出了一个自耕农世界，它只注意贫困而没有文化的农村战士们之间的同志关系和英雄主义。农民们把毛的口号理解为他们的牺牲会得到报答，城市的剥削将结束；而这样经过长期奋斗，农民们最后将享受到自己创造的全面富裕和共产主义的丰硕成果。由这种教条主义所造成的经

济灾难，迫使许多农民选择诸如做小生意、移民、寻找城市工作等半合法的生存策略，从而使之很容易被攻击为反社会主义。它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可从政治上来看，教条主义激情却继续把最高领导人与贫穷的农村群众团结在一起。对许多内地穷人来说，一大二公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合法性，即使它变得更具强制性和破坏性，助长流氓抢劫，痛恨商贩和压制替罪羊，要求对领导人的忠诚和崇拜，并且怀疑城市、市场、知识分子、富人和玩世不恭者。

无论大跃进的饥荒还是跃进后的经济改革，基本上都没有对社会主义方案做重新规定。统治者仍然设想，对穷人来说，与市场 and 私有家庭相关的任何东西都是剥削性的、有害的，即使是在利用这些手段来恢复遭毁坏的经济的时候也不例外。眼睛盯着苏联经验的传统社会主义者，都有这些教条主义预想。而那些想把改革建立在静悄悄革命成果基础上的领导人，却颇费周折才使其方案合法化。看到农民家庭经济长处的邓子恢，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而此中绝非不重要的原因是，他与毛及其他领导人对于集体农业之最终目标的认识是一致的。农民家庭经济之先天存在着经济合理性，但它不能为大多数掌权者所接受。

制度的逻辑性使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陷入困境。60年代初，有些为饥馑所震惊的领导人开始认清传统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和大跃进的共产主义教条主义两者的结构性缺陷，但使人们接受改革方案却殊非易事。与在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灾难之后紧接着实施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样，对农民家庭和市场作出让步是渡过饥荒所必需的，但它似乎又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农民家庭经济从本质上看似乎有资本主义倾向——准确地说是应被共产主义加以消灭的倾向。大跃进后60年代初的改革，只不过是克服假想中的偶然性问题的一种临时策略。

“经济上右，政治上左”是使经济改革合法化，并给 60 年代初萧条的经济带来生机的一种党内的口号。它既不是一种稳定的妥协方案，也不是一项长期政策。政治仍处于主导地位，它反市场、反家庭经济，主张教条主义的、全面动员的集体化。与专区和省里教条主义领导有关系的饶阳党、军队系统里的干部，几乎都认识到安全的道路是狂热地执行更加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路线。当各地党员明白政治热情是飞黄腾达的可靠途径时，改革者已不能轻易地培植具有经济合理性和文化整合性的地方模式了。

此外，掌权者把新政权创建的个人关系网络的等级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也即惟一能创造出没有剥削的幸福世界的途径。一个人可以批评单个的坏苹果，但不能批评在围墙里面的、生产坏苹果的社会主义果园。可以寻找在假想中使人们贫困的剥削阶级敌人，但不能导向对预算体制的批评。当饶阳农民还住在茅舍中时，国家预算却拨款在天津为精英们建造一个文化宫殿。寻找剥削者的结果是五公村发动了对地主儿子李大林、李茂修、1952 年选举中耿的竞争者魏连玉、道士李金爪、养家糊口的李沛琛、拖拉机站的有文化的技术员兼站长师喜生的批判。这些人不是有权有势的剥削者，而只是有缺陷的替罪羊和个人怨恨的发泄对象。耿老板的领导班子很少受到惩罚性的报复，他们比较关心群众福利和团结，与许多地方干部不一样。

1947 年阶级斗争的土改预示着将把生活撕成碎片的危险。对旧精英的后继者进行复仇，变成了制度化的东西。信教的人们，几乎每一个不幸的灵魂，甚至只有一头驴的不讨人喜欢的退伍老兵，都有可能成为替罪羊。有权有势者利用动员运动，对那些惹他们痛恨者实行个人的报复。1949 年后清查叛徒和道德沦丧的腐败官员的斗争，多是使不幸的和不受保护的人进

人圈套。而在这些进攻和问题背后，存在着某种国家体制和结构的动力，它使数百万爱国的、忠诚的农民受到威胁和陷入穷困。

本书对由于无力解决的历史上根深蒂固的问题所产生的痛苦后果做了研究；分析了成功、失败、代价、没有走的道路、在改变现实的过程中深层连续性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原先解放生产力的改革诺言没有履行。制度得到了巩固。农民传统、新民族主义、乡村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关系网络构筑了此种制度的结构；它借助于给予一些人特权，让更多人靠边站，对所有人进行分层的方式而建立起来，因为它对国家权力持有者与几亿无权农民的行为准则作了规定。尽管在所有国家主义的现代化过程中，好战精神、倒退和教条主义均具有内在的危险性，但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封建成分，流氓政治文化，以及中国大男子权威主义，是导致中国进步缓慢的主要原因。

在寻求如何在改造中国的同时，又可保持中国传统；在对付现代的、强大的外国势力挑战的同时，又提高穷人、保守的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方法的过程中，爱国的中国人将继续他们的曲折斗争，该斗争可上溯到大清王朝。对于伟大中国文明的子孙后代来说，中国，正如鲁迅的诗集《野草》中的过客一样，仍有“（往前）走”的声音在他前面召唤着。^①

注 释

1. 关于近来抓住中国极权主义问题的广泛研究，可参阅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 - Mao Re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2. 关于与这些有选择的列宁主义道路相反的观点，可参阅 Dorothy

- Solinger, ed., *Three Visions of Chinese Socialis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4), and Alec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3)。
3.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53 (1973);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 - Mao Reforms*, chap. 3.
 4. 关于文化连续性, 可参阅 Richard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and Margery Wolf, *Revolution Postponed: Rural North China, 1900 - 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5.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 - 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6. 对革命有代表性的双方争论的观点, 是 George Rude 和 E. P. Thompson 站在大众一边, Gustave Le Bon 和 Sigmund Freud 站在暴徒一边, 参阅 Rud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and Gustave Le Bon; *The Man and His Works*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79)。
 7. 关于还表明不同的状况和生态环境能造成不同的大众反应的历史观点, 可参阅 Elizabeth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 -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8. 相似的复仇心理在其他社会主义体制也同样存在。“这种最小公分母的减小, 在人们的心灵中产生了最恶劣和最低级的本能和反应……反抗的奴隶要使自己获得瞬间的自由, 除非他的主要愿望是极具破坏性的复仇。反抗的奴隶至多找到一个稍好的恺撒”。Adam Michnik, *Letters from Pri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45、51。
 9. James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Peasant*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Samue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10. 关于突出地区差异的真知灼见的著作, 可参阅 Steven J.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 -*

- 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与 Levine 的书一样，对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地区研究较多，例如 Yung - 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 - 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1. Kang Z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3
 12. 《人民日报》1985 年 2 月 26 日，第 6 版。
 13. Jean - Luc Domenach, *Aux Origines du Grand Bond en Avant*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82)。
 14. 经济学家 Amartya Sen 许多关于饥荒的著作表明，政治因素是决定性的，而不是作物歉收。例如 “How Is India Doing?”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ia: A Reassessment*, ed. Dilip Basu and Richard Sisson (New Delhi: Sage, 1986), pp. 28 - 42; and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Robert 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6. Lowell Dittmer,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他认为中国的列宁主义国家是非封建性的 (第 58、79、245 页)。Kenneth Jowett, *The Leninist Response to National Depend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8)，他第一个对这种传统主义现实进行系统分析。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 - 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富有创见性地把这种传统观点用于中国工厂研究。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的封建主义隐喻最早于 1957 年由学生领袖林希翎所用。Dennis Doolin, ed. *Communist China: The Politics of Student Opposition*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1964)。Tsou,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 - Mao Reforms*, chap. 5, 他分析了他所认为的封建主义传统。
 17. 鲁迅：《野草》(北京，外文出版社，1975)，第 33 页。

附表

表 A1 1944~1952 年耿长锁合作社土地面积、亩产量和总产量

单位:亩、斤/亩

年份	玉米		小米		高粱		小麦		晚玉米		红薯		每亩粮食产量	人均粮食产量	花生		棉花	
	面积	亩产量	面积	亩产量	面积	亩产量	面积	亩产量	面积	亩产量	面积	亩产量			面积	亩产量	面积	亩产量
1944	7	220	6	210	8	180	15	130	15	155	1	1000	223	375	3	250	0	0
1945	33	200	35	210	30	180	80	130	80	150	5	1800	215	368	35	250	0	0
1946	12	210	12	220	11	200	40	135	40	165	4	1900	285	549	25	280	0	0
1947	10	140	12	200	10	190	53	135	53	155	5	1800	234	382	30	280	3	25
1948	20	210	20	200	18	200	80	135	80	160	5	1900	291	621	35	280	5	30
1949	22	230	20	200	20	200	80	140	80	185	5	1500	329	681	35	280	5	30
1950	20	230	20	200	19	200	80	150	80	190	5	2000	336	662	30	280	5	35
1951	25	245	20	220	23	250	100	170	100	200	5	2200	478	1008	40	280	6	40
1952	15	174	20	185	15	179	180	194	180	45	5	1140	237	497	40	134	10	62

表 A2 1944~1952 年耿长锁合作社人口与劳动力情况

年份	总人口 ^a	男性	女性	总劳动力 ^b	男全劳力	女全劳力	男劳动力占的百分比
1944	22	9	13	7	4	3	57
1945	107	52	55	22	17	5	77
1946	41	20	21	16	11	5	69
1947	55	27	28	20	13	7	65
1948	67	33	34	22	14	8	64
1949	71	35	36	24	15	9	63
1950	73	36	37	26	16	10	62
1951	82	41	41	31	20	11	65
1952	112	55	57	49	28	21	57

^a 人口包括入社各户的所有成员，包括小孩和在外下活的成年人。

^b 这包括非全劳力的人，如两个半劳力合计一个全劳力。

表 A3 1944~1952 年耿长锁合作社收入情况

单位：千斤粮食

年份	农作物总收入 ^a	副业总收入	副业收入所占百分比	总收入数 ^b	人均总收入(斤) ^b
1944	9	0.4	4	9.4	427
1945	49	47.0	49	97.0	906
1946	31	30.0	50	61.0	1488
1947	29	25.0	47	54.0	981
1948	58	21.0	26	79.0	1179
1949	61	50.0	45	111.0	1563
1950	73	60.0	45	133.0	1821
1951	107	47.0	30	154.0	1878
1952	79	7.0	8	86.0	767

a 农作物总收入包括谷物、经济作物(如花生和棉花)以及表 1 中未列人的其他一些农作物。

b 总收入数和人均收入数不考虑生产成本、投资积累和上交国家的税收。

表 A4 1953~1961 年五公村谷物种植面积、亩产量和主要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的产量

年份	玉米		小米		高粱		小麦		红薯		耕地面积	灌溉面积	粮食种植面积	亩产量	粮食总产量	人均粮食产量	农作物种植面积	花生		棉花 ^a	
	面积	亩产量	面积	亩产量	面积	亩产量	面积	亩产量	面积	亩产量								面积	亩产量		
1953	400	297	300	207	200	229	1100	125	60	3420	3400	450	4600	282	958800	572	5590	500	283	230	21
1954	700	347	700	205	340	219	1300	202	240	2300	3390	不详	4600	352	1193300	712	5540	600	239	250	30
1955	490	332	859	225	352	314	1315	206	150	1500	3101	1100	4915	283	877600	481	5863	822	377	624	74
1956	183	271	404	190	0	0	1414	233	168	2300	2261	1200	5089	278	628600	329	7186	110	284	1988	24
1957	207	438	616	256	81	269	1497	152	139	2060	2772	1200	4262	300	831600	486	5980	528	335	1190	55
1958	340	502	615	308	125	473	1178	195	185	958	2988	1500	4416	382	1145200	656	5747	579	246	752	46
1959	322	502	590	306	984	212	871	252	400	580	2492	1500	3313	430	1071600	614	4643	600	235	700	69
1960	713	293	455	134	230	152	800	430	650	1084	2258	1500	3058	310	700000	378	4298	450	66	780	59
1961	1300	360	456	273	210	248	850	215	250	602	2296	1500	3144	437	1003400	527	4254	260	191	850	62

表 A5 1944~1961年五公村人口与劳力情况

年份	总人口	男性	女性	劳力总数	男全劳力	女全劳力	男劳力所占的%	从事工业和副业的劳力		
								在队里	不在队里	在队里
1944	1400	690	710							
1945	1430	705	725							
1946	1480	720	760							
1947	1520	737	783							
1948	1600	767	833							
1949	1650	792	858							
1950	1620	827	793							
1951	1640	856	784							
1952	1650	870	780							
1953	1675	905	770	428	265	163	62			
1954	1675	933	742	558	379	179	68			
1955	1823	954	869	586	405	181	69			
1956	1912	961	951	627	380	247	61			
1957	1711	833	878	717	398	319	56		40	40
1958	1745	844	901	744	398	346	53	21	40	40
1959	1744	845	899	685	330	355	48		40	40
1960	1853	887	966	695	330	365	47	25	60	60
1961	1904	890	1014	702	346	356	49		60	60

附表

表 A6 1955~1961 年五公村收入与收入分配情况

单位：千元

年份	谷物总收入	副业总收入	副业收入做占的百分比%	总收入	净收入总计	用于分配的总收入	社员人数	人均分得的收入(元)	以现金支付的人均收入(元)	一个劳动日的价值(元)
1955	151	10	6	162	126	113	1823	62	8	.74
1956	101	14	12	115	88	85	1912	44	2	.71
1957	149	19	10	168	109	99	1711	57	5	.85
1958	137	14	9	151	124	81	1745	46	2	.48
1959	162	19	10	181	134	91	1744	52	3	.78
1960	128	19	13	147	114	100	1853	54	5	.52
1961	174	27	13	201	146	129	1904	68	15	.59

注：人均分得的收入是按用于分配的集体收入(包括以实物和现金支付的收入)进行估算的。

表 A7 1952~1961 年五公合作社和五公生产队售粮给国家的情况

单位:千斤

年份	小麦	粗粮	售粮总数	占总产量的百分比%	人均售粮(斤)	棉花	花生
1952	0	0	0	0	0	0	0
1953	0	60	60	11	49	10	150
1954	0	70	70	6	42	17	140
1955	20	50	70	8	38	33	180
1956	0	0	0	0	0	33	0
1957	20	25	45	5	26	57	100
1958	30	50	80	7	46	20	60
1959	50	130	180	17	103	33	80
1960	20	0	20	3	11	40	0
1961	30	40	70	7	37	47	10

译 后 记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的中文版终于面世了，我觉得心中有一种快感在激荡，同时又有一种沉重感。无论是快感，还是沉重感，我想应当说出来，或许会好受一些。

该书的三位美国作者，爱德华·弗里曼是威斯康星州立大学（Madison）政治学教授，毕克伟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San Diego）历史学教授，马克·赛尔登是纽约州立大学（Binghamton）社会学教授。他们均是美国中国学研究队伍中的新生代和“左翼”学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1972年，他们即来到中国，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最早一批到中国访问的美国青年社会科学家。到北京后，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该书于1991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很快便获得1993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约瑟夫·列文森奖。由于该书是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之一，也代表了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最高水平和最新趋势，因而引起美国国内和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给予较高的评价。我相信，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将有力地推动国内学者在农村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

在美国有相当一批新生代的中国学研究人员，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由原来对毛泽东在1949年后进行的社会变革的大致认同，到经过冷静的思考，并进行严肃而认

真的学术研究，得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结论。他们从微观分析入手，在大量细致的实地调查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很显然，这与我们国内偏重于宏观分析和仅从党的政策如何制定，如何影响农村的单一、单向的研究思路大相异趣。我认为，这种微观分析和宏观的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同时也正因为如此，书中的有些提法和结论与我们的研究迥然不同，当然价值观和学术观念方面的差异也造成我们有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些观点。无论如何，美国学者的研究无疑可以促使我们发现以前没有注意的内容，诚如古人所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们的观点和结论是否准确和正确，需由大家去评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们的研究态度是相当严谨的。从1978年开始这项研究工作，到该书出版，前后经历13余载，这是我们国内所少见的，与国内学术研究中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数量，不重质量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研究中，他们还采用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这与我们传统的史学方法不同。传统的史学方法偏重于考据、辨伪，偏重于用现有的文献资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所接受的大部分是这种训练，而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是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长期以来被忽视。目前，历史学危机的感叹时有所闻，我想，开拓理论基础和新的研究思路，而不是片面地追求适应市场的需要，这将使历史研究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命力。

翻译是件苦差事。我译此书前后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1996年元旦，我将译稿寄给毕克伟教授，请他指正。毕教授看后，表示很满意，这是对我的工作的肯定，我很高兴。实际上我在逐译过程中，得到他的很多帮助，这本译稿也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需要说明的是，本译稿对书中有的地方做了少量

的技术处理。刘东先生在许多地方对译稿做了校正，谨此深表谢意。我要感谢我的恩师张宪文教授和左用章教授所给予的很多帮助；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张德琴女士，若没有她的督促、体贴和关怀，我几乎半途而废。正值爱女诗涵周岁生日，谨以此书作为礼物献给她。

由于这是我的第一本译作，其中的错误和不当肯定存在，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该说的似乎都说了，窗外，秋雨绵绵，秋风中传来一丝凉意。我依稀看到华北平原上农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又在把汗水和希望埋在地里，心里充满了对丰收的渴望……

译者 识

丙子年秋于金陵桃源斋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作者 =

页数 = 4 1 0

SS号 = 1 0 8 2 1 2 7 5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